

歷史與現場 47

西藏生與死

——雪域的民族主義

董尼德／著

蘇瑛憲／譯

ISBN 957-13-1040-9



目次

第二部　烏雲籠罩著「世界屋脊」

第一章　新民族主義的興起　145

第二章　控制與解體　207

第三章　和平有期？　255

附錄

中文版出版前言

我很高興看到本書得以中文付梓流傳，因爲我深知，今之華夏子弟，無論在台灣、香港、大陸或其他地域，對西藏的現代史及當今實情有深入了解的並不多。這不啻是一件可悲亦復可嘆的事！群峯環繞，長期閉鎖的「雪域」承襲了千載的高度文化，其前途實與整個亞洲息息相關，對中土人士而言尤其關係重大。或許我們應該說，不論僧俗，吾人均不得漠視西藏此等高度文明所遭遇的嚴重威脅。

以地域言，西藏人毗鄰其漢族兄弟；在心神方面，兩者卻無相似之處。歷經數世紀，西藏偶爾也成爲其右鄰的對手，卻時常爲之漠視，而幾乎從未被對方了解。藏人雖然也有動盪的歷史，大體而言總算還能與漢人的帝國和平共存。自一九一一年以迄一九四九年，藏人甚至趁國共鬥爭及日本軍閥侵華的時機，重拾自由，衛（前藏）、藏（後藏）一帶一度居然罕見華人蹤跡。

諺云：鄰朋由我，兄弟由命。這個道理，藏人從經驗中知道得很痛切——自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軍入藏以後，他們生活的痛苦實在難以名狀。華人於此能否有所意識，乃是全盤問題的關鍵。因爲，我不得不相信，西藏深具特徵的文化能否存續，可以說完全取決於中國人和西藏人是否可能眞正對話、妥協。我深切盼望，這本書能夠重新觸發中國讀者對西藏的好奇與關心，

從而能爲中國與西藏的互相了解和對話，略盡棉薄之力。

自一九九〇年本書法文原版面市以來，拉薩和全球各地一樣，事態千變萬化，有如浪潮洶湧。始撰書之際，我甫自居留五載的中國大陸返抵法國。當時，我懷抱著盡可能就西藏的眞實情形，以公正立場撰寫一部實錄的心願。於是，我盡力摒除諸般私心好惡，及種種人情俗務和官僚體系的糾葛，心中僅存不奉承、不詆謗的信念，展開撰稿的工作。我深信，若要對有關問題了解透徹，必先明瞭中、藏雙方的論點與論據；而一旦這些論說經過詮釋、比較，眞相便可不辯自明。因此，我們實在毋須庸人自擾，或陷身論戰，或附和某方——當然，更毋須贊成或反對西藏獨立。我盼望本書能夠成爲讀者開啓客觀思考的鎖鑰，更盼望讀者明瞭事實之後，能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涉或操縱的情況下，有自己的判斷。

今天，中文版問世，而我初衷未改。同時，我相信，我極力秉持的原則也得到了尊重。我爲中文版做了大量增補的工作，也趁此良機再度深究西藏問題。我承認，當我感到西藏已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時，有股激情在內心翻滾。我相信，年來威脅西藏的危險正與時推移，逐日加強，且行將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爲此，我要指出，喜馬拉雅廣闊高原上不可逆轉的漢化運動，正有如惡浪暗潮，即將席捲西藏文明。

當這一天來臨之時，中國和西藏將不再有絲毫分別，而西藏可以吸引觀光遊客者，唯殘存的民俗而已。近日，對西藏有所認識的外邦人士一旦從西藏走一趟出來，莫不異口同聲說，中國移民潮威力強大，華人飯館、店鋪、旅社已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設；且不說狂熱的建築風潮破壞了早已不很平衡的西藏城市的風貌，區區拉薩也出現了賭場！

跡象顯示，緩和數年的移民潮如今又熱絡起來了。事實證明，看起來似乎比較不帶火藥味的新政策，一旦部署妥當，卻具有無比的殺傷力。北京政府似已透徹了解，若要征服頑強的西藏，實毋須訴諸武力與叫囂。此等大軍西征之舉唯有造成反效果，因爲這會促使西藏人更團結，決心更堅定。北京確信，若欲獲勝，開啓「人口活門」足矣！既然西藏人之於中國人猶如滄海之一粟，這場未經宣告的戰爭勝負已定。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需要多少時間才能獲得最後勝利？二十年？抑或十年？

近來撼搖共產世界的動盪情勢鼓舞了西藏人，也激勵了受壓迫的民族。但我不禁認爲，西藏人大有時不我予之嘆！若要免除預知的死期，西藏人和中國人必得恢復理智，重新對話；他們也必須覺察到，時代不同了，無有可以離群索居而不被孤立於世的國家。然而在新仇舊恨層層積壓的情況下，重建互信，決非易事。不過，也有值得樂觀的跡象出現：我以爲，大氣候正逐漸轉變，海外華人和台灣人的思想尤其如此。

對西藏問題素來保持緘默的台灣政府，在一九九三年四月正式宣布邀請達賴喇嘛來訪。甫到任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駿逸明白表示，此項邀請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尤其是不要求達賴喇嘛必須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一九九三年五月，達賴喇嘛的手足胞兄嘉洛敦珠抵達台灣訪問——這是五〇年代以還，西藏流亡政府的有關人士首度訪問台灣。訪問的目的無他，一爲重建台灣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間的對話關係，另一即爲西藏精神領袖訪問台灣預作籌畫。目睹此項新發展，吾人感到無比欣慰。

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必須感謝譯者蘇瑛憲先生。由於他的才華和耐力，讀者得以實實在

在地分享本書中敏感主題令人激動的情景。十餘載的友誼，當我提及翻譯本書的計畫時，他毫不遲疑地答應承擔這件繁重的工作。謹於此向蘇君表示我最深摯的謝意。

Pierre-Antoine Donnet（董尼德）

一九九三年五月於巴黎

本書中文版付梓之前，承蒙在華盛頓的「國際支持西藏運動」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研究員阿沛・晉美(Jigme Ngapo)先生通讀全書，校正謬誤。他熟諳西藏事務，知識淵博。由於他的鼎力協助，本書才得以達到目前的品質。容我在此向阿沛・晉美先生致上深摯的謝意。

董尼德

一九九四年一月於東京

法文版代序

我和許許多多的法國人一樣，對西藏幾乎是一無所知。即使國際特赦組織的年報一再指出在西藏頻頻發生駭人聽聞的事情，我承認我是在看了這本書之後，才對那些數字有實質意義的了解。它們直接觸及我心深處，而不再祇是一些抽象的符號而已。由於 Pierre-Antoine Donnet（董尼德）大量採用敵對雙方——西藏和中國——的資料並且加以深入研究，我們得以身歷其境地了解祇剩下幾百萬居民而已的千年古老民族，是如何逐漸地走向末日。

歷史性的悲慘事件肇端於西元一九五〇年中國以強大的武力侵略西藏。從那個時候開始，全世界少見的幾個瑰麗的國家之一，一個充滿著和平與宗教傳統的國家頑強地抗拒著毀滅的危機。西藏的滅亡不僅僅是幾樁謀殺，和尚與尼姑的被酷刑拷打，上千的人被送進改造營，這也是中國政府要把這個國家、這個文明從歷史上除名而進行的眞正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大屠殺。中國在西藏所進行系統化的漢化措施，足以保證西藏會在中期內滅亡。這些是在普遍性的冷漠中進行的，更可怕的是在某些人害怕喪失擁有十億消費者的未來市場和在某些人畏懼觸怒強鄰的情形下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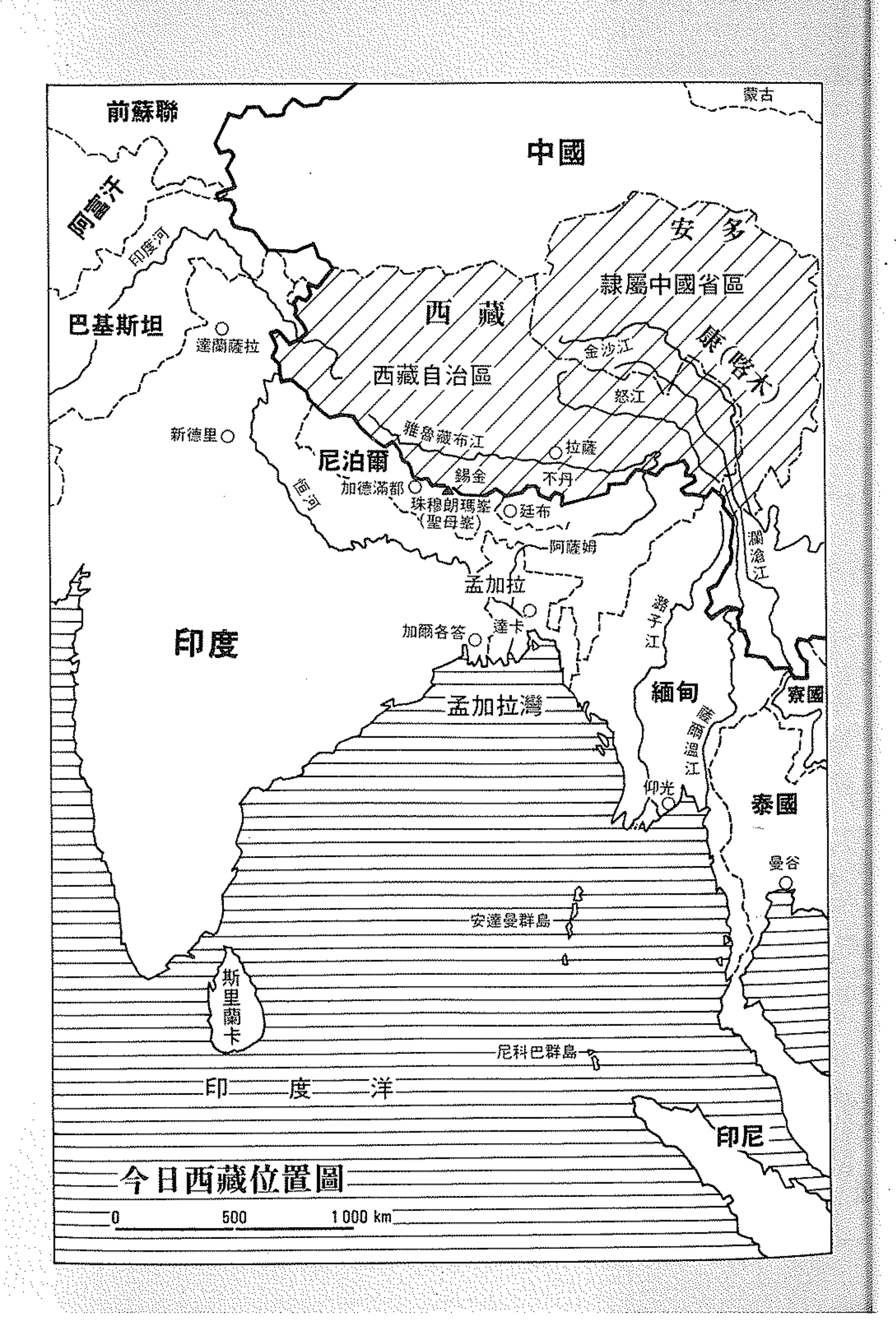
受到嚴重的內傷，西藏的心還在微弱地跳動著，然而太微弱了以至於我們幾乎聽不到。有

些過於急躁的人甚至已經準備好要開死亡證明書了。不過他們錯了。從西藏人的活神仙身上依舊煥發出搖曳不定的毫光。崇尚和平，寬容而且勇敢的達賴喇嘛很能夠代表他那處在緩刑期間的人民。跑遍全球宣揚和平，他證明他的國家還活著而且我們可以協助拯救她。人家會說這是不切實際的，是烏托邦。不是的。有些時候國際輿論可以創造奇蹟而使強壯巨大的哥利亞在柔弱的大衛之前跪倒地上。要想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個步驟是先要結束因爲不了解而產生的冷漠態度。因此，掀開西藏痛苦實情的布幔是刻不容緩的。這樣，即使我們沒有辦法讓在鬼門關前面徘徊的西藏起死回生，至少我們拒絕去做兇手的共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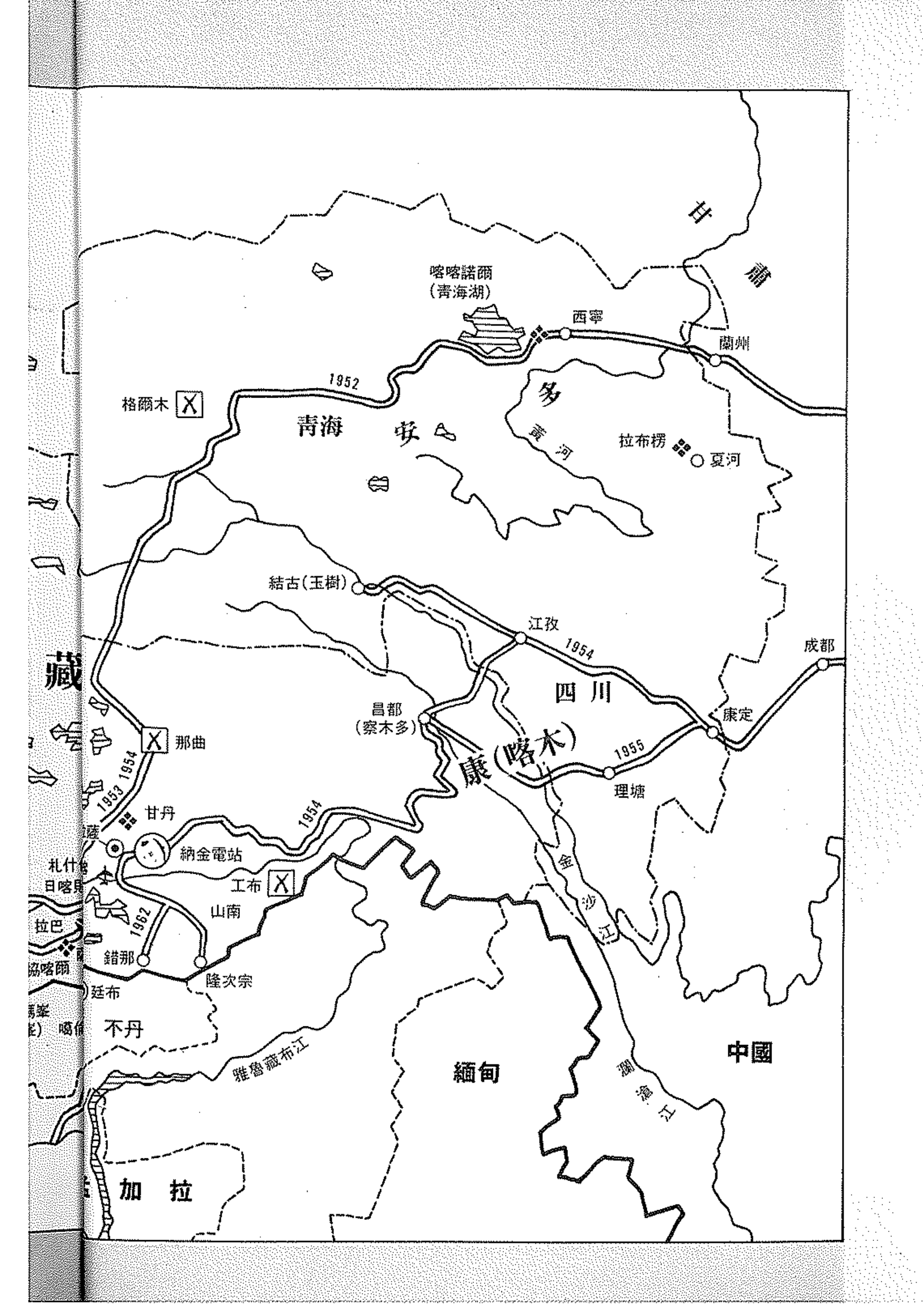
Elisabeth Badinter（伊麗莎白・巴丹德）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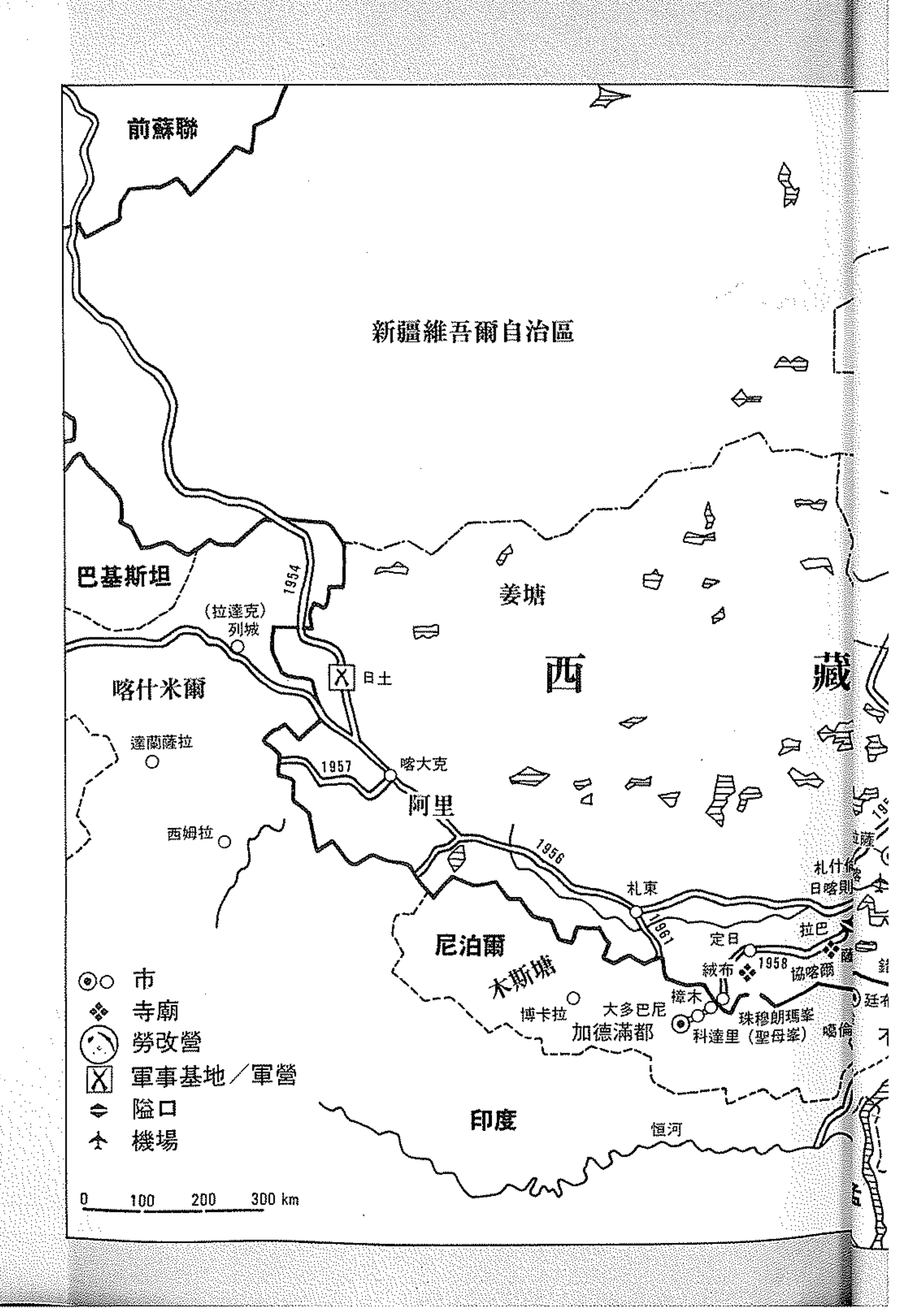
譯著按：伊麗莎白・巴丹德女士，法國名作家，曾經出書多本，爲法國前任司法部長夫人、法國現任大法官會議主席夫人。


前蘇聯
蒙古
中國
阿富汗
印度河
巴基斯坦
達蘭薩拉
安多
隸屬中國省區
西藏
金沙江
康(喀木)
西藏自治區
怒江
新德里
雅魯藏布江
拉薩
尼泊爾
恒河
錫金
不丹
加德滿都
珠穆朗瑪峯
(聖母峯)
廷布
阿薩姆
瀾滄江
孟加拉
達卡
加爾各答
潞子江
印度
緬甸
寮國
孟加拉灣
薩爾溫江
仰光
泰國
曼谷
安達曼群島
斯里蘭卡
尼科巴群島
印度洋
印尼
0
500
1 000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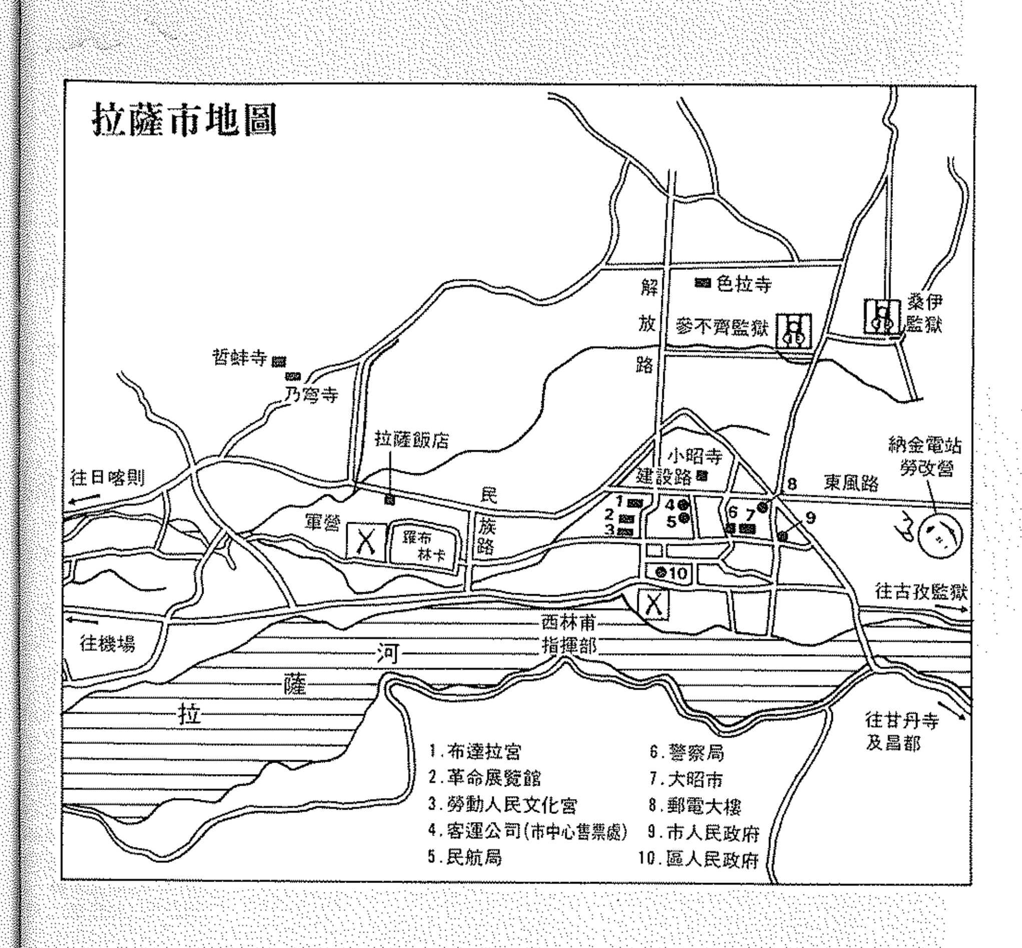
今日西藏位置圖



甘
肅
喀喀諾爾
（青海湖）
西寧
蘭州
1952
格爾木
青海
多
安
黃河
拉布楞
夏河
結古（玉樹）
江孜
1954
成都
藏
四川
昌都
（察木多）
康定
那曲
康（喀木）
1955
理塘
1953
1954
甘丹
1954
納金電站
札什倫
日喀則
工布
金
沙
江
山南
拉巴
1962
錯那
隆次宗
廷布
不丹
雅魯藏布江
緬甸
中國
瀾
滄
江
加　拉



前蘇聯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巴基斯坦
1954
姜塘
（拉達克）
列城
日土
西
藏
喀什米爾
達蘭薩拉
1957
喀大克
阿里
西姆拉
1956
札東
札什倫
日喀則
拉巴
1961
定日
尼泊爾
1958
絨布
協喀爾
木斯塘
樟木
博卡拉
大多巴尼
珠穆朗瑪峯
加德滿都
科達里（聖母峯）
廷布
噶倫
市
寺廟
勞改營
軍事基地／軍營
隘口
機場
印度
恒河
0
100
200
300 km


拉薩市地圖
色拉寺
解
放
路
參不齊監獄
桑伊
監獄
哲蚌寺
乃穹寺
拉薩飯店
小昭寺
建設路
納金電站
勞改營
往日喀則
東風路
民
族
路
軍營
羅布
林卡
往古孜監獄
往機場
西林甫
指揮部
河
薩
拉
往甘丹寺
及昌都
1.布達拉宮
2.革命展覽館
3.勞動人民文化宮
4.客運公司(市中心售票處)
5.民航局
6.警察局
7.大昭市
8.郵電大樓
9.市人民政府
10.區人民政府

死神的陰影

剛到西藏的那幾天，是我畢生最快樂的日子之一，它將永不磨滅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在世界屋脊上的第一個夜晚，我們是在一家不很乾淨又充滿著野性氣息的藏式小客棧裏度過的。然而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在高海拔的作用下，我內人的雙唇發紫。是因爲缺氧呢還是因爲情緒激動？我們的心臟好像隨時會停止跳動似的。在夜闌人靜的深夜裏，處身在海拔約四千公尺的高地，我們眞的有從來沒有離天空這麼近的感覺。閃爍在海藍似的天頂的燦爛星光，就像是在我的身邊，探手可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清晰的銀河。總而言之，我們處身在雪域，一個充滿寓言的地方，充滿神祕的地方，也是個殉道的地方。窗外，夜幕升起已多時，在失樂園的一隅正在過節的鄉村依舊歌舞悠然。我們雖然疲憊不堪，卻異常興奮。

前一天清晨，我們擠進一部什麼都載，裝滿男女老幼、禽畜百貨的老爺車離開加德滿都，輾過大雨後的泥濘，沿著蜿蜒的山路，緩緩地爬行到大多巴尼(Tatopani)，然後換乘大卡車到界城科達里(Kodari)。連日的暴雨沖走了波曲河上聯絡西藏和尼泊爾的「友誼」界橋。因此我們祇好跟隨著二位舍爾巴嚮導，安步當車地在曲折陡峭的山路上蹣跚跋涉了一整天，才抵達二十餘公里外，坐落在一山腰上離邊境最近的一個西藏城市樟木。嚮導的光脚踩在岩石上就像紅孩兒

踏風火輪般神速無比，我們咬緊牙關，顧不得揮汗一步步地向前趕，惟恐落隊太遠，迷失在深山荒野裏。幾個時辰折騰下來，我們已經筋疲力竭了。然而在山窮路轉的地方我們像發現新大陸般眺望著遠掛天邊，居高臨下的第一個西藏城市，一股無可名狀的激情從心底洶湧而出支撐著我們不再聽候使喚的肉身。樟木的白色泥房在濃霧中若隱若現，更爲我們即將要遊歷的西藏增添神祕與詩情。我們終於圓了少時夢。不過我們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遊客：說實話，在一九八五年八、九兩個月間，我是以某大通訊社特派記者的身分進入西藏採訪的。

在還沒有到加德滿都之前，我們已經先在尼泊爾的博卡拉(Pokhara)城訪問了不少西藏難民。他們大多數是在西元一九五九年反漢的流血抗暴失敗後逃到這裏避難定居的。在毛澤東的人民解放軍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拉薩市後的第九年發生了「出西藏記」。整個西藏從此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密控制。由於他們之中大部分仍有家屬留在西藏，他們很自動自發地向我們解釋我們將會看到的是什麼樣子的西藏。我擔任通訊社駐北京特派員已經有一年多了，我的任務是撰寫有關中國社會的各類快訊。在中國，我還有四年的時間，我對一九五〇年以來，西藏事件的嚴重性已經有相當的了解。然而，套用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經常掛在口頭，卻時常被他的制度所遺忘的座右銘：「實事求是」，我決定到現場觀察，研究各方面的資料來形成我個人的意見。在拉薩，地方人民政府正在準備擴大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大會。西藏升格爲地區民族自治區是中藏關係正常化的結果，也是西藏高原正式納入北京龐大行政組織的結果。

對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的西藏自治紀念日，中國政府在拉薩籌備了盛大的慶祝大會，並且派了包括黨政明日之星胡啓立和保守派副總理李鵬的中央政府代表團前往參加盛會。很早就有

謠傳說反對中國人入藏的「分裂主義分子」將會有特別的行動，以表示他們對中國人佔領西藏的不滿。因此慶祝活動都得在特殊防護的安全措施下進行。為了這些原因，幾個星期以來西藏嚴禁西方記者入境。雖然我們有從尼泊爾進入西藏的特別簽證，我還是費了番唇舌才說動邊界衛兵放行。在西藏，我們並沒有受到中國政府刻意為到北京城外訪問的外國記者所安排的招待委員會的「照顧」。這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因為沒有中國官派「嚮導」的陪同，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自行訂定行程、路線，並且和當地的居民接觸。自從一九八〇年年初中國對西藏實施半開放政策以來，我們可以說是第一批沒有官方導遊，沒有透過官方旅行社安排的外國旅客。

從樟木到日喀則的中尼公路，蜿蜒地出沒在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山群之中。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解放軍在西元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間，所開鑿的一條從舉世聞名的世界第一高峯聖母峯（藏語稱做珠穆朗瑪峯）腳下經過的戰略幹道。我們先坐吉普車然後換乘巴士，一路上走走停停，在幾天的時間內我們穿過了這一段壯麗的地區。每當車子經過村莊的時候，我們都看到飄揚在半空中的幡旗和用泥漿、木板與赭石所蓋的房舍。當然我們也看到無所不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它們就像是隨時在提醒遊客別忘了這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似的。在紅旗上的五顆黃星中，有一顆就代表於西元一九五〇年回歸「中國大家庭」懷抱的雪域。在農舍的牆上，偶爾還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統戰口號，曝光率最高的當然非「中國共產黨萬歲」莫屬。

我們在定日（協格爾）的晶光寺停下來小憩一番。在名不副實的文化大革命毀滅性的破壞之前，這個寺廟曾經住有四百餘名的喇嘛。今天的定日城破人散，竟淪落成前往探險的登山隊在

聖母峯營地的出發站而已。這一段登山熱身路線經過曾經是全世界最高的宗教廟堂絨布寺。我說「曾經」是因爲紅衛兵摧毀了這座佛寺。海拔五千五百二十公尺的拉巴隘口是萬年雪線的起點，從這裏眺望四周，可以欣賞地球上難得的奇景。在旭日東昇的時候，第一道曙光把高聳的峭壁染成金紅，隨著金烏的移轉，天空逐漸開朗，然後變得晴空萬里，不帶有絲毫的瑕疵。這裏遠離紅塵，除了呼嘯的風聲和爲行人祈福佑安的幡旗不斷扯風的聲音之外，沒有污染，沒有喧囂，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噪音。處身在如此絢麗的景色裏，我們盡情地陶醉在大自然完美的和諧氣氛裏，大夥兒沒有一個人說話。此時此刻，無聲勝有聲。

在拉巴山坳附近，就是在西藏史和西藏佛教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薩迦。自西元第九世紀吐蕃王朝崩潰以來，西藏一直陷入分裂的局面。經過長達四百多年的紛爭，喇嘛教中的薩迦派逐漸得勢，在薩迦這塊地方建立了薩迦王朝並且統一了西藏。在薩迦最引人注目的是薩迦寺。薩迦寺是薩迦派的主寺，分北寺和南寺二部分。北寺建於一〇七三年，南寺建於一二六八年。薩迦寺是世界上保存貝葉經較多的地方。所謂貝葉經，是用鐵筆在印度出產的貝多羅樹的葉子上刻寫而成的一種經書，大多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形狀與中國古代的木簡相似，但是面積較大，一般寬五厘米左右。然而這些寺廟可也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紅衛兵瘋天瘋地所造成的浩劫。其中有一院落曾經重建並且加以維修。在這廢墟上我們碰上了第一批帶著慘笑的喇嘛，也是我們入藏以來第一次感到心頭沉重。我們重拾道路繼續奔向西藏第二大城，後藏的首府日喀則。日喀則如今也祇有二萬不到的居民，是幾個世紀以來和達賴喇嘛競爭西藏第一宗教領袖的班禪喇嘛的駐錫地。雖然五世達賴喇嘛於西元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統一了西藏，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噶

丹頗章政權，然而二位精神及世俗領袖之間的爭衡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場世紀性的鷸蚌相爭中，中國老漁翁獲利最多。日喀則古建築中最著名的是扎什倫布寺。

扎什倫布寺位於日喀則城西尼瑪東山的山脚下。寺院倚山而築，宮殿重疊，毗連錯落，上端金頂林立，光芒四射。這座規模宏大的黃教寺院始建於西元一四四七年（明英宗正統十二年），歷時十二年方才落成。後經歷代班禪的不斷擴建，才成爲今天這樣一座建築面積達三十萬平方公尺的龐大建築群。

在扎什倫布寺中，最令人驚嘆的是坐落在強巴大殿裏的強巴大銅佛。強巴大殿共七層，高三十公尺，裏面供奉著世界上最高大的銅佛——強巴佛，即未來佛，也就是彌勒佛。這座強巴佛淨高二二・四公尺，端坐在三・八公尺高的蓮花座基上，總高達二六・二公尺，比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毗盧舍那銅佛（佛相淨高一八・一公尺，總高二一・五公尺）還要高大。這座大佛的中指長一・二公尺，肩寬一一・五公尺，耳長二・八公尺，腳板長四・二公尺。據記載，這座銅佛由一一〇位工匠，用了四年的時間才建成，共用黃金二九四公斤，紫銅一一・五萬公斤！一九八五年十月，喇嘛爲大佛換袈裟，他們用了各種綢緞共三一〇〇公尺，絲線十八公斤，六個人趕製了一個半月方才做成這件全世界最大的袈裟。

我們在日喀則的時候，正碰上扎什倫布寺在整修。這裏也是一樣，紅衛兵像旋風般地掃過，留下了狂熱分子的遺跡。事實上，在他們之前，人民解放軍的士卒們已經捷足先登地開始破壞這座寺院了。我們在日喀則改乘過氣的老爺巴士到拉薩。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內板凳上的西藏人不斷地用好奇的眼神瞪著我們，看著看著就驚愕地不知所措。我們學著西藏人吐舌頭向他們打

招呼，並且嘗試用中文和他們溝通。有很多老喇嘛中文說得很好——在中國監獄裏學來的。車頂上堆著包括有我們的背包的各類百貨。車子在狹窄的碎石路上沿著數百公尺高的懸崖行駛。雖然方向盤震動得很厲害，雖然煞車已經磨損得不堪想像，我們這位漢人司機卻駕輕就熟地在轉彎處化險爲夷，但我們已流下陣陣冷汗。

我們也去了西藏的第三大城江孜。位於雅魯藏布江支流年楚河東岸的江孜是西藏的一座歷史名城。在本世紀初，這裏發生了著名的抗擊英國侵略軍的「江孜保衛戰」。西元一三九〇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江孜修建了著名的白居寺，繼而建成白居塔。白居寺的中心，便是白居塔。白居塔共有九層，高達三十多公尺。塔身建築新穎奇特，五層以下，四面八角，六層以上呈寶瓶形，頂端是銅皮包裹的圓錐體。塔內擁有異常精美的雕塑和壁畫十萬尊（幅），因此又被稱爲「十萬佛塔」。在西藏，舉目盡是政治大動亂所遺留下來的傷痕。江孜也不例外，有外形壯觀的寺院，裏面卻是慘不忍睹：荒蕪的佛堂，倒塌的樑柱，被砍首的菩薩及被糟蹋的壁畫。我們並不是刻意到西藏做破壞程度的調查，祇是它們太過搶眼了。每到一個地方，一定會碰見這種情景。往拉薩的公路沿著周長超過二百五十公里的羊卓雍錯湖湖邊而行，車程也需要好幾個小時。我們的行程就祇剩下橫渡喜馬拉雅山區第一名河雅魯藏布江，然後經過拉薩貢噶機場就到了西藏第一大城，「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達賴喇嘛的駐錫地拉薩市。在這個聖城，時而跨騎鐵馬，時而腳踏實地，就這樣我們走遍了拉薩故都的每一條大街小巷。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然而每當我參觀一座優美的羅馬式教堂或是清眞寺的時候，我總能夠感覺出來在我心深處充滿著寧靜、祥和。我在台灣，在新加坡，在香港，

甚至在中國大陸上所參觀過的幾十座廟宇，都讓我有同樣的感受。相反地，在拉薩市市中心，西藏最神聖的大昭寺裏，嶄新的菩薩塑像及剛完成的壁畫卻讓我們感到震驚與不安。我們帶著苦澀的回憶離開所謂的宗教禮拜地。我們就像是置身在歌劇院的舞台佈景裏似的。倉卒地整建、翻新、維修的結果，祇是把幾乎毀滅一種文化的政治風暴所造成的破壞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註解而已。毛澤東入主後四十年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個身、心都受到嚴重創傷的西藏。任何一位西藏人永遠也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西藏。至於我們，在幽暗的喇嘛院裏，或是在藏民家中，在躲開其他旁人時的那些熱烈的、激動的談話讓我們難以釋懷。不管我們走到那裏，西藏人老是把我們當成訴苦抱怨的對象。他們很興奮終於找到願意傾心聽他們涕泗縱橫地描繪那一段悲慘經歷的聽衆。這話匣子一開，可就像長川有備一觸即發，終至不可收拾。然而在這些痛苦熱淚的後面夾帶著絲絲希望的歡顏。從西元一九七九年開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吹起了尺寸較寬的容忍之風，也比較注重實用。成群結隊的反革命分子紛紛從監獄及勞動改造營裏回來。毛澤東所釀造全國人民無一得以倖免的災難逐漸地平息。當我們談到寺院重新開放的時候，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們的嘴角唇邊綻放出絲絲的笑容。各位可別會錯了意。要中國共產黨讓寺廟再度成爲一九五〇年以前的佛教大學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放鬆意識形態的壓力則是北京領導的共識。從此，拉薩市民不再因爲早在一九五九年即安裝在整個市區的擴音機所播送的「東方紅」，從清晨睡夢中驚醒。西藏終於得以重溫昔日的自由與人生的樂趣。

從那個時候之後，我到過了中國雲南、四川、甘肅和青海各省的藏族人民居住區。我也去

過幾次達蘭薩拉(Dharamsala)。自從「慧海」——十四世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到這裏定居之後，坐落在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麓的小山鎮就被稱爲「小拉薩」。離開這裏祇有一個小時航程，在印度最北端，毗鄰後藏，在海拔三五〇〇公尺的乾旱的山谷裏的拉達克(Ladakh)和山斯卡(Zanskar)也變成了西藏難民棲息的避難所。

西元一九八七～八八年間，我人還在北京，拉薩已經進入沸騰狀態了。中國政府以爲採取新的方法就可以和西藏關係正常化。事實證明，西藏人和一九五〇年時一樣，不斷地揭竿起義，唾棄所謂的同化政策，而且每一次的反漢起義都是在中國政府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發生的。在西方的輿論裏，一般人的想法中，這些流血事件僅是在遙遠的地方有一股逆民赤手空拳地向機關槍挑釁而已。

我很早就有寫一些有關這一方面報導的打算。因此，在北京一聽到這些消息，我立刻搭乘飛機飛到離西藏祇有二個半小時航程的四川省會成都。這一趟勞而無功。自從上一次到過西藏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拉薩。每一次我申請簽證，中國共產黨當局總是很婉轉地拒絕我的要求。在北京的這幾年，我時常在想爲什麼他們老是不讓我再去西藏。難道是我對拉薩的報導不合中國政府的口味？或者是我竟然膽敢批評西藏是被侵略而不是在一九五〇年被毛澤東的紅軍解放的，因而觸怒了中國當局？我承認我是曾經因爲這些報導而受到北京外交部的警告。再不然就是因爲我在西藏結識了太多的朋友而被嫌惡？不論眞正原因爲何，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大概就源出於此。我對我自己說，既然你們不讓我到拉薩實地採訪，我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來進行我的調查。

西元一九八九年的三月，拉薩再度發出了怒吼。這一次的動亂當然也受到血腥鎮壓。從此拉薩實施戒嚴，受軍法統治。西藏再度掉進陰暗的深淵。即使北京當局刻意粉飾西藏太平，偶爾我們還是可以聽到從拉薩發出來充滿著恐懼、拘監、酷刑拷打和處決的呻吟。從一九八七年年底開始，除了一些慷慨的旅行團隨著官方導遊做指定式的重點觀光之外，西藏再度成爲外國人的禁地。獨立與自由的新聞記者已經沒有辦法寫出不摻假的報導了。這一連串的事件更使我覺得非完成我寫書的計畫不可。

這本書不是反對中國，它也不是反對西藏或是反對西方國家。我在中國住了一段夠長的日子，我在中國大陸，在台灣、香港有著太多的好朋友，以至於我不能不喜歡中國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我已經花了將近有十年的歲月在中國社會上面。我由衷地希望，在不久的未來中國能夠再度向全世界證明她的民族的智慧。可是我相信西藏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如果那一天中國共產黨政府決定要徹底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時，西藏所面臨的就是慘死的危險。西藏的滅亡將會是本世紀最大的悲劇。我們已經不能再捂著眼睛裝做不知道了，眼不見爲淨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本書並不偏袒誰也不是中立，它不是一場政治審判，也不是藏密論文，它不是一本旅遊手冊，當然也不是藏學研究報告。它祇是一個不受宗教、政治束縛的自由記者調查實錄。這本從西藏被中國「和平解放」談起的縮本「西藏奧狄賽」，是我這些年來在北京、歐洲及印度訪問調查，及對中國、西藏和國外史料研究的總結。我訪問的對象全部都是西藏悲劇的演員及受害者，包括社會各階層人士。我想藉著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來解釋爲什麼這二大文明會有如此劇烈的衝突，這個衝突的後果又會如何。因爲雖然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二大文明很可能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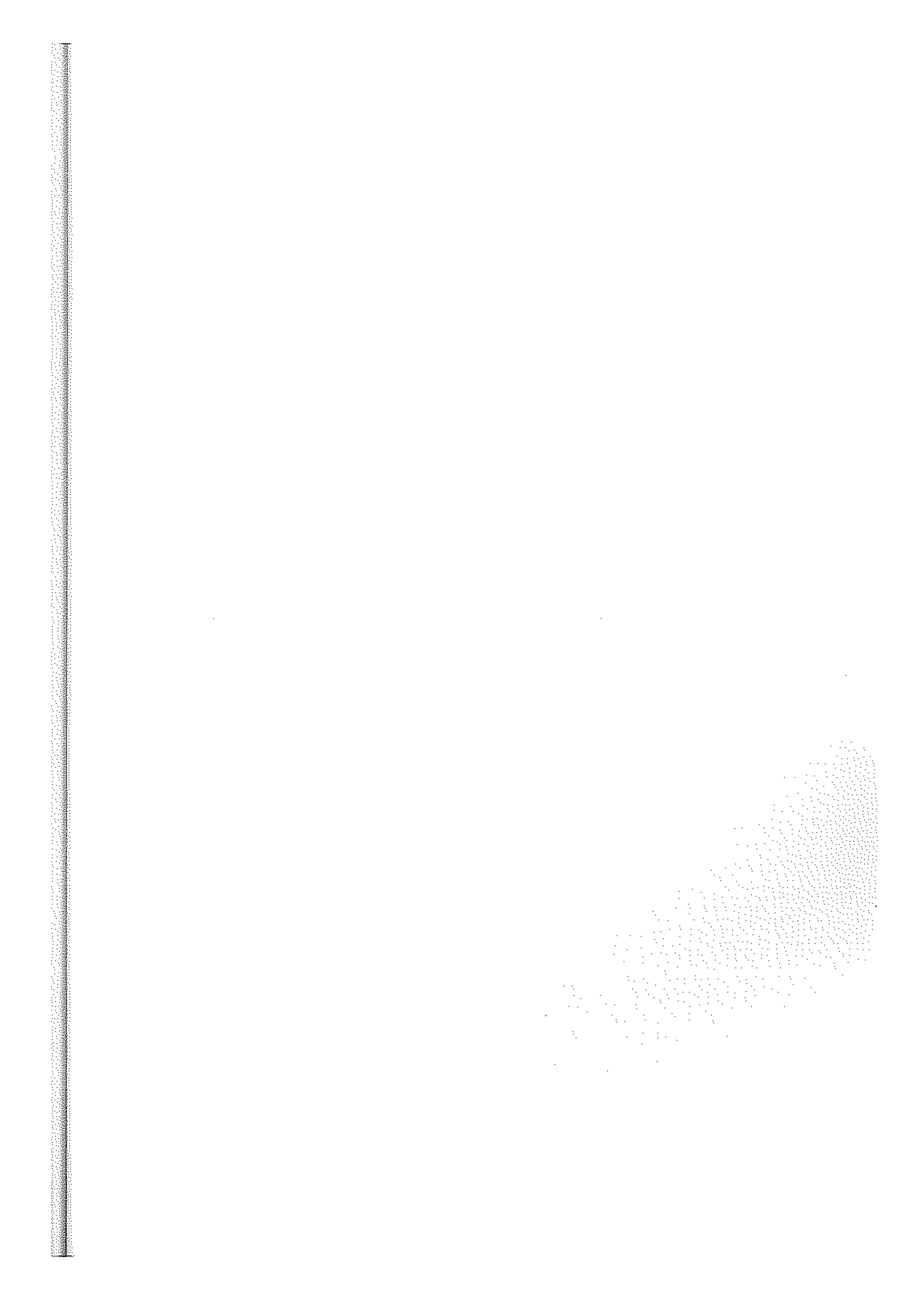
一段很長的日子需要在同一屋簷下共進共出呢。

今天在西藏所發生的事情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從世界地理、軍事的需求來看，世界屋脊乃是亞洲列強兵家必爭之地。因此西藏的戰略價值遠遠大過她的自然疆界。祇要那一天西藏問題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整個亞洲就永遠會處在衝突的狀態下。恪守佛教教義的西藏人一向愛好和平，在一九五〇年以前，民生安樂。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向中國當局提議協商對話。然而不論是在流亡國外的西藏人中，或是留在拉薩的西藏人中，已經有不少的人在高唱要採取暴力恐怖行動了。不再抱有任何的冀望，年輕的一代已經準備不惜一切地阻撓迫在眉睫的種族屠殺。至於中國，她可沒有任何要讓步的意思。從各種跡象來看，赤色中國在必要的情況下是會動用最迅速、最簡單的方法來維護其疆土的完整。尤其是目前正在執行的移民政策，很快地就會把西藏淹沒在中國人潮裏。十億的中國人對六百萬的藏人，這場戰鬥太不公平了。外國政府對西藏所發出的求援信號沒有任何的反應，不過社會民意已經開始動員了。西元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事實，再度顯示了國際間希望能夠很快地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獲獎的榮耀除了是向達賴喇嘛四十年來爲西藏和平所做的奮鬥表示致敬讚揚之外，也是在鼓勵一個民族繼續忍耐：目前共產世界正面臨著迅雷不及掩耳的劇大變動，誰能說西藏就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呢！

事實上，現在才來拯救西藏還來得及嗎？是否應該拯救西藏呢？反正西藏文明已經瀕臨垂死邊緣了。在強迫漢化之下，她的傳統，她的文化都已經消失了。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幡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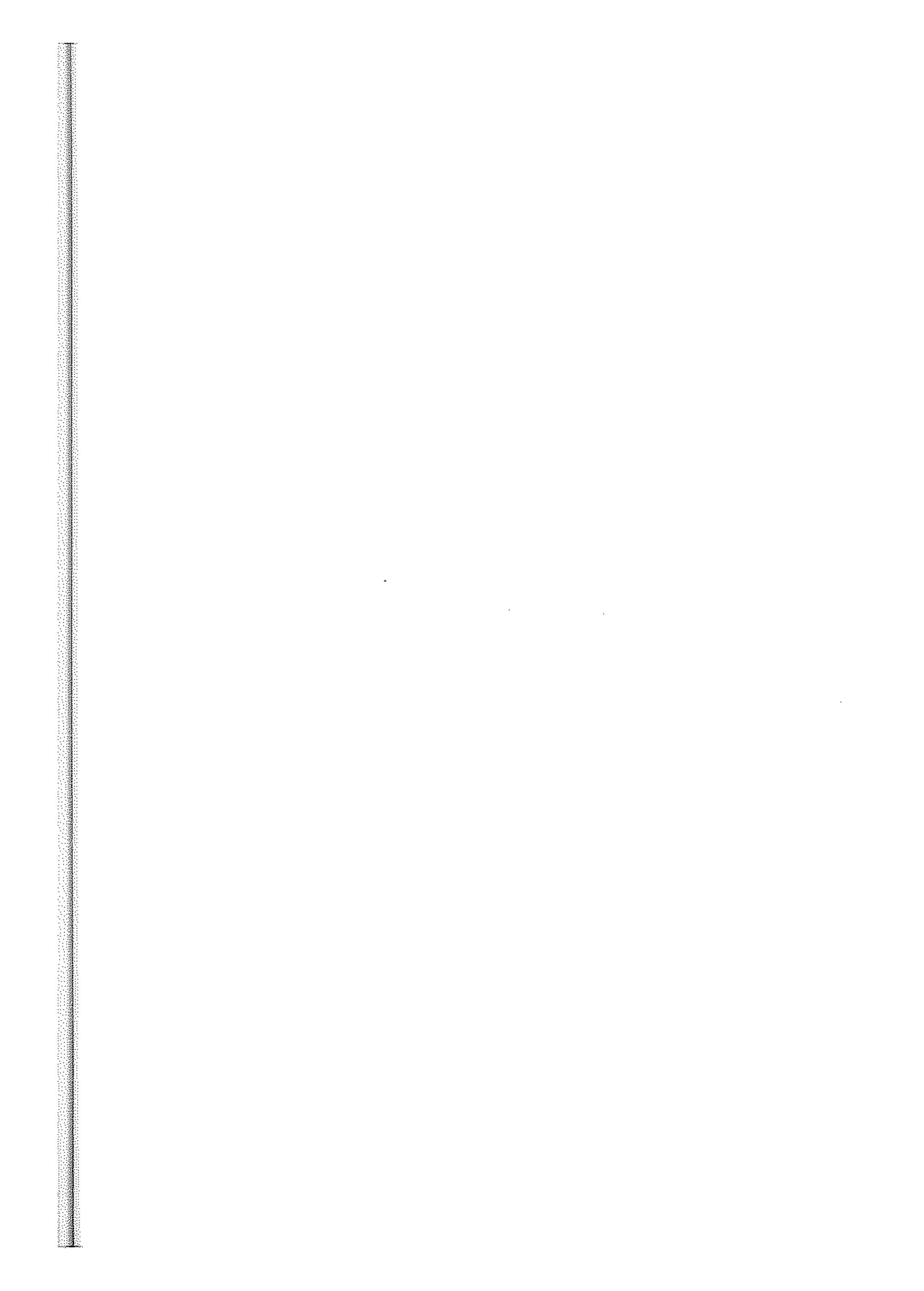
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祇，沒有菩薩，祇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經過幾個世紀的閉關自守，再加上長期的中藏紛爭，西藏已經沒有任何的選擇了：昔日的西藏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須要能適應現代的世界。話雖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一線的希望：這幾年來，一股新的藏族民族主義在喜馬拉雅高原中逐漸傳播開來。對數百萬的藏族人民而言這是否就是他們的天鵝之詠呢？或是，相反地，是精神與物質和諧並存的新西藏的萌芽呢？

在這本書裏的某些片段描述的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事實。在寫這些章節的時候，我常常擲筆自問：不了解這一地區的讀者是否會相信我所說的？一部分受到中國政府高效率宣傳所欺騙的西方人士，一直以爲中國已經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了。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夜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屠殺事件至少有個值得讚許的地方：它顯示了毛澤東之後中國的眞面目。動用部隊以機關槍掃射自己同胞的事實，在一夜間粉碎了鄧小平幾年來處心積慮所塑造的形象。從這一天開始，中國人自己也用不同於昔日的眼光去看他們在西藏所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



第一部

「東方紅」對決「雪之鄉」



第一章 中國之侵略

「我的國家，西藏，一向是和平、融洽的。在中國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從來沒有嘗過警察和現代化部隊的威力。今天，我的希望，也是我的夢想，是有一天整個西藏高原能夠變成一個充滿真正和平的聖地：一個完完全全的非軍事區，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公園或是生物園；一個所有人類不分種族均能夠和大自然完美合一的地方。」（達賴喇嘛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哥斯大黎加聖約瑟市的演說詞。）

對大部分的西歐人民而言，西藏這個名詞給人的印象就是神祕、奇妙、隱祕而不可測知的。是的，雪域離我們實在是太遠了，何況她本身又長期以來自我封閉，自我摒棄於世。僅有寥寥無幾的歐洲人，對發生在世界屋脊的慘劇的嚴重性，有粗略的概念。西藏的慘劇是：一種文明在短暫的期限內即將會像泡沫般地消逝無蹤。其實，大部分的中國人對西藏也是很陌生的。他們對西藏的了解，也僅局限於中國共產黨為了政治統戰所發布的官方報導而已：西元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和平解放」了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部分領土。

流亡國外的藏人團體及其領袖達賴喇嘛和大部分留在西藏的藏族人民，都拒絕接受這種說

辭。他們認爲應該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受到外國的軍事侵略。遵循著帝國侵略主義慣用的手段，一個政府選擇了軍事武力迫使一個鄰國屈服。

當行軍的鞋聲擦擦地響在緊鄰喜馬拉雅高原東緣靠四川的康北藏族居住地區的時候，西藏政府對外發出的求救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中國部隊是在國際間幾乎完全漠視的情勢下進入西藏的。西方政府寧願靦腆地遮住眼睛不去看中國的暴行，而讓西藏孤單單地面對人海般一波波湧入的中國步兵。西方世界和印度的懦弱爲更嚴重的罪行開啓了方便大門。從一九六〇年開始，西藏所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與迫害，比中國內地任何一個省、地區、直轄市還要嚴重。寺廟全面性的破壞和僧侶一批批的下獄幾乎滅絕了一個民族。要想了解當代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非得對歷史做一番回顧不可。

一、西藏將屬於或不再屬於中國

西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取得政權的消息，很快地透過無線電傳到全世界各個首都。然而失落在雪域，孤立在喜馬拉雅高原中心，離中國的山谷幾個月脚程的拉薩沒有電話，也沒有無線電廣播電台。甚至當消息終於傳到西藏的首都時，也祇有極少數的執政者能夠衡量這件大事會給西藏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影響。然而來自東部的威脅在幾個月內就明朗化了。從一九五〇年元旦開始，這個威脅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這也應該可以讓還在對毛澤東的意圖有所冀望的人覺醒才對。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北京電台也向各地播音：「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〇年的任務是解放台灣、海南及西藏。」毛澤東本人也向全世界宣布他要把他的統治權伸展到西藏的決定。到了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四川、青海、甘肅、西康、雲南五省境內藏族聚居地區已經全部「解放」。在中文裏，西藏意味著西方的寶藏。這個隱喻大概就注定了西藏「回歸」「中國大家庭」懷抱的命運。耀目的紅太陽照射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經過三千里長征和勢如破竹地擊敗蔣介石之後，成爲共黨中國的新皇帝，帶著勝利光環的半神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滿百日就已經昭示他對西藏的企圖了。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中國政治宣傳不斷地解釋，抨擊西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支配。北京政府警告所有可能會阻礙他的野心的國家：任何支持西藏「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及「分離主義分子」的行動，將會因爲干涉中國內政而被視爲對中國人民的敵對行爲。這個警告主要是針對印度而發。與西藏接壤的印度，是唯一有可能阻礙中國進軍西藏的國家，因爲西藏的喜馬拉雅山是這二大敵對國家之間最好的緩衝地區。西藏是可以援引其宗教源於印度以及雙方在歷史上的密切關係，來要求印度給與實質上的援助。事實上可不是這麼一回事。面臨著中國侵略西藏的問題，印度的尼赫魯(Nehru)政府在中國部隊剛開始行動的時候就採取不干涉政策。尼赫魯以爲向剛成立的中國擺出萬事好商量的態度，毛澤東就會禮尚往來地採取維持和平的敦親睦鄰政策。一九六二年中國在印度邊境發動短暫但是流血的邊界衝突事件後，印度才自覺當初是打錯了如意算盤。

在一九五〇年，聽天由命的西藏所能憑恃的自衛能力祇有雜亂的八五〇〇人，其中大部分攜兒帶眷地偵察敵情。他們的裝備非常簡陋不齊，總共也祇有五十餘門大礮、二五〇門迫擊礮

以及二〇〇挺機關槍。他們所能做的祇是憑據天險和神符，頑強抵抗入侵的人民解放軍。拉薩城外一千公里處的山谷裏，部隊調動頻繁，不斷地向前推進。上萬的部隊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就等著衝鋒號響一舉撲向西藏高地。這些部隊經過艱苦的抗日、伐蔣等民衆戰爭，個個訓練有素，人人身經百戰。因此北京認爲，這些共產黨的英勇戰士將不費吹灰之力，即可輕輕鬆鬆地解放西藏。地廣人稀的西藏對毛澤東而言是唾手可得的獵物，是上天掉下來送給他的開國禮物。在四十年來祇有幾個中國人的地區用兵，中國要如何才能自圓其說呢？北京昭示全球，西藏人民受到封建農奴制度的壓迫與剝削再也不能忍受，他們夢寐以求地等待著和平解放。

中國共產黨的年鑑中有著這麼一段記載：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後，「西藏人民迫不及待地等候人民解放軍來協助他們脫離痛苦，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和對抗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割的帝國主義分子以及分離主義分子的陰謀」。「藏族的愛國主義者在報紙上和聚會上表達他們希望中央政府儘快派遣軍隊解放西藏的願望。他們強調該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警告帝國主義分子要他們放棄對西藏挑釁的計劃。」①

然而中國一再強調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又指的是誰呢？

幾年之後，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明確地指出，事實上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住在西藏的歐洲人祇有六位：一位傳教士，二位英國無線電操作員，二位奧地利人，一位白俄羅斯人。幾十年來西藏一直就是禁止外國人進入。拉薩政府已經成功地擺脫了英國想要兼併西藏的野心。對這

塊可以控制中國、印度及東南亞的戰略地區，蘇俄當然也虎視眈眈地垂涎已有多時，但她可從來沒有認眞地考慮過要用武力攫取這塊肥肉。至於剛成立沒有多久的印度共和國，自己剛剛脫離英國的監護而獨立，共和國大業千頭萬緒，百廢待興，那來閒工夫蹚西藏這趟渾水。

爲了要自圓其說，中國共產黨援用近乎可笑的證據，說勢力範圍侷限在日喀則的西藏第二宗教領袖班禪喇嘛，曾經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青海致電恭賀毛澤東主席和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班禪喇嘛當時也祇不過是個十一歲的小孩子而已。當然，聰明才智和年齡的大小沒有絕對的關係，年紀輕並不就代表他不能在這份電報中表達他「迫不及待地要看到祖國的統一和西藏的解放」②。

中國由西康、雲南、青海、新疆四省對西藏「多路向心進兵」的戰略計畫，於十月六日完成部署。攻擊令於十月七日下達。隸屬人民解放軍第一、第二野戰軍（即著名的一野、二野）的八萬四千大軍從拉薩東部的康北東緣突破。中國部隊於當夜十點半開始，以皮船夜渡江面寬達百餘公尺、河水急湍的中藏天然界河金沙江，並且很快地在幾天之內就推進到西藏內地深處。由於一些藏軍，尤其是康巴（譯者按，藏語巴即爲人之意）的戰士，騎著馬用佩刀英勇地對抗中國的大礮，使得西藏的抵抗比中國預期的要頑強得多。然而一方面受到襲擊，措手不及，再加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這些抵抗軍很快地就被數以倍計的侵略者所呑噬。

中國入侵的消息一傳到康北的首府昌都，立刻就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昌都新任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急電向拉薩的西藏政府請示，以便在中國人抵達之前採取一些行動。他的電報石沉大海。當東部升起戰火並且威脅到整個西藏的生存的時刻，西藏所有大小官員正沉醉在西

藏噶廈政府所舉辦的一年一度大宴會裏。離開悲慘事件發生地千餘里外，西藏的高官貴族們卻在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夏宮的花園裏，盡情享樂。知道中國入侵這件事情的人決定封鎖消息，在短時間內不予公布，因此拉薩市民完全被蒙在鼓裏，不知道國家即將受到異族的統治。

根據某些說法，在中國部隊逼進到離昌都還有一天行程的時候，阿沛・阿旺晉美曾經向拉薩拍出第二封緊急電報，要求准許繳械投降。眼看著大軍壓境，既無援軍又不得投降，六神無主的總管阿沛・阿旺晉美終於擅離職守，倉皇地棄城而逃。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就斷送他錦繡的政治前途，因爲不久之後，他重新出現在選擇和中國合作的一派裏，並且成爲中國共產黨最忠誠的擁護者之一。他不但忠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翻雲覆雨般的黨領導路線，他還長袖善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批上鬥下的期間，他也是絲毫無損，沒有任何的顧慮。這在西藏政客中是很少見的。

然而部分文武官員的變節並不是造成西藏這麼容易就淪入中國魔掌的原因，眞正的罪魁禍首是當時西藏噶廈政府的噶倫們。事實上，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把國家現代化，也沒有想過要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衝破長久以來的孤立以求自重。這也難怪在一九五〇年，西藏會完全受制於中國，而任憑宰割。

在戰場上，人民解放軍的旌旗所向，望風披靡。西藏部隊的螳臂當車終究於事無補。幾天之後，中國政府即宣布：「爲了懲治反動分子的罪行和消除西藏和平解放的障礙，中央政府在十月下令人民解放軍向康北進軍。殲滅五千西藏大軍後，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昌都」③。

二、茫然孤立的國家

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全面性的勝利。在國外，印度微弱的形式抗議沒有任何的效果。一位印度高級外交人員向我吐露一段隱情。當初，猶豫的尼赫魯曾經就假如印度出面干涉中國在西藏所造成的事實問題對西方列強的態度做過試探。他們的答覆非常乾脆：「這是你們二國之間的事情，我們不會介入。」被西方國家潑得一頭冷水而洩氣的印度沒有採取任何足以引起中國反擊的動作。經過時間的推移，我們現在知道當初印度的一些政客和寬宏大量的理想主義者，但是個蹩腳的戰術家尼赫魯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沒有向中國提出任何的條件就輕易地遺棄了西藏。

至於聯合國組織，她也祇是比手畫脚一番而已，沒有任何有實質意義的行動。西藏政府最後的希望英國則止於要求聯合國大會延期討論西藏問題。國家被侵略的殘酷事實驚醒了西藏噶廈政府，也把他們嚇得茫然不知所措。國家生死存亡之秋已經迫在眉睫了，在首都拉薩，人們卻開始焦慮不安地求神問卜，絕望地求助於活佛，甚至安排降神。英國、美國、印度及尼泊爾祇發表些虛無、含糊的同情來應付西藏的求救。在這緊要的關頭，昔日的友邦及保護國猝然拋棄陷在死亡深谷中無助的西藏。

爲什麼西藏會對這個顯而易見的死期沒有任何的防備呢？爲什麼西藏會近於零抵抗地失陷呢？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產生的權力空虛，以及攝政時期就已經癱瘓的噶廈政府一直爲永

不休止的內訌、紛爭所苦。他們浪費了應該除舊布新，建設西藏的寶貴時間。拉薩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達賴喇嘛以及噶廈三分西藏世俗領導權，他們也都按照佛教教義諄諄教誨信徒要容忍、慈悲、揚棄暴力。

此外，在二十世紀前葉，西藏貴族一直無所事事地自我欺騙而不想辦法去了解外面世界的眞象，絕大部分的西藏居民還生活在中國革命前的時代。西藏的農民及牧民迷失在古老的宗教儀式及迷信之中，沒有任何作戰的準備與訓練。

最後，更嚴重的是在一九五〇年唯一可以拯救這個正要脫軌的國家的人丹增嘉措，十四世達賴喇嘛祇有十六歲。受到藏族人民無限尊敬、崇拜的政治、宗教最高領袖還祇是個足不出宮門的脆弱青少年，一個對外界一無所知，沒有任何政府經驗，沒有絲毫外交經驗，更不用談軍事策略了。

按一般傳統慣例，歷代達賴喇嘛年滿十八歲即應該親政，接管政務。然而面臨著殃天大災，丹增嘉措卻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被推出來提前三年親政。在他親政之前，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達札攝政的手裏。心中老大不願在此時此刻成爲國家的負責人，丹增嘉措在中國部隊就要進門之前，即帶著大批金銀財寶出走到靠近印度、錫金、不丹邊境的亞東（即卓木）。噶廈政府總共動用了一千多頭馱畜，每一頭載有六十公斤重的財寶，其中四千頭馱的是金子，六百頭馱的是銀子，其餘的馱畜背運的則是有數百年歷史的銀質藏幣。這批財寶被運往錫金，埋在錫金王棄置的馬廄地下。

很多流亡藏民很嚴厲地抨擊一九五〇年西藏權力圈的錯誤。他們認爲那個時候應該很明快

地採取行動以抗拒外來的侵略。我在一九八九年秋天遇見的在年輕時代即參加抗漢戰爭的倫敦西藏基金會主任平措旺杰就是其中之一。「很明顯地，西藏政府犯了好幾項錯誤。首先，在中國剛開始入侵西藏的時候，他沒有採取任何可以阻止中國軍事行動的措施。」問題是爲數祗有八千的部隊如何經得起數以十倍計大軍的猛烈衝擊呢？「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即使藏族人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我相信他們可以作戰。我們和你們西洋人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有武器，最低限度，絕大部分的藏民都有武器。很簡陋的武器，沒錯，但是還是武器。何況他們對打鬥早就習以爲常，有時候甚至是趨近於殘酷的鬥爭。一旦他們決定要幹，他們就會幹到底，那怕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說『我們的國家面臨著危險，所有的同胞必須起而戰鬥，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整個民族都會熱烈響應參加動員的。」

當提及拉薩這些可悲時刻時，義憤填膺的平措旺杰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門。是的，把西藏簡簡單單就葬送到中國人的手裏就是西藏貴族們的罪行。和尚出身的他就因此成爲在故鄉康北出沒的游擊隊員。今年五十五歲的他並沒有停止爲西藏獨立而奮鬥。他指出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中國人本身並沒有冀望很快就能奪取西藏，因爲沒有可以載運軍事裝備的公路。中國的指揮官們對西藏地形也不很了解。中國部隊沒有辦法保證源源不絕的軍需補給，而且大部分的藏民都敵視中國的入侵。「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藏政府讓他們進入西藏就是把西藏送給中國的第一步。我們當時被他們充滿憧憬的允諾所欺騙。」

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其很認同這個說法，他解釋說：「一九五〇年之前，我們西藏人眞是白痴。與其一層不變地自我孤立，不如對外開放，和對外建立外交關係。我們維持的制

度是類似你們西方在二、三百年前的制度。中國要奪取西藏是易如反掌的。很明顯地，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這一段時間去和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當然這個外國祇會是印度，中國在一九五〇年也就沒有辦法這麼輕鬆地就把西藏的主權問題給擺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印度北部達賴喇嘛駐錫地達蘭薩拉訪問他的時候，我曾窮究不捨地針對當時西藏政府的缺失向達賴喇嘛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當時我還擔心我的這些問題會激怒他。他會不會認爲這個到過中國的西洋人太不知輕重，居然要他做自我批評？事實上，他不但絲毫不帶怒意，他還心情開朗、毫無虛假而且不厭其煩地回答了我的問題。

「嗯，是的，西藏是完完全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設。然而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西元一九三五年圓寂之前已經做了很多有關這一方面的指示。可是在攝政時期，這些事完全被忽略遺忘了。我不能譴責誰。整個社會、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攝政本身都太無知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依舊以爲西藏是塊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會受到人世間各種糾紛的波及。眞是盲從瞎信。」

「我對在一九四〇年當印度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時候，西藏政府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而派遣一個最大、最重要的使節團，並且由年過七十的攝政親自率團前往祝賀這件事感到特別的遺憾。如果這件事實現了，我也會隨團前往。當時我是還太年輕了，不過至少我可以到那裏觀光，譬如說到動物園逛逛啦！我們當時是應該要這麼做的。」

三、五星紅旗飄揚拉薩

「和平解放」西藏的呼聲愈演愈烈，西元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代表達賴喇嘛和西藏噶廈政府的西藏和談代表團抵達北京應該算是這齣悲喜劇中最殘酷的一幕。中國共產黨當局早已準備就緒祇等西藏代表團的入甕。中共外交第一人，舉世聞名的談判高手周恩來總理在談判會議開幕之前，很虛情假意地以很友善、很彬彬有禮的姿態來接待西藏和談代表團。隨後，中國政府立即向仍舊要求西藏獨立的噶廈政府提出了葬送西藏獨立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從此變成了中國主權下的一個地區，相對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同意西藏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在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衆多保障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西藏的宗教、社會形態將不受改變。可是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揭示了：「西藏同胞重新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中國人的這句話說得差了，既然是「重新回到」，也就是表示當時的西藏並不是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這份資料的起草人不就是默認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的西藏是獨立的嗎？在十七條協議的第二條，再度淪爲「地方政府」的西藏政府保證「西藏攻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第八條則規定「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人民解放軍」。然而由於阻力過大，毛澤東祇得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對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表明「目前不要改編藏軍」。

中國當局則保證「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現有的政教合一制度不予改變，達賴喇嘛的權力、職務及身分不受改變，寺廟財產不予變更④，同時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西藏以犧牲可能在國際間獲獨立自主機會的高昂代價換取了中國隻言片語的保障。不到幾年之後，這些美麗的保障都消逝在歷史的置紙簍裏。

由阿沛・阿旺晉美爲團長的西藏和談代表團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和中國共產黨簽下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雙方代表均在協議書上蓋上官印。達賴喇嘛卻說中國政府仿刻西藏官印交給西藏代表以便簽字，這些印章還被當成是協議書的存證印鑑收藏起來。西藏代表團一回到拉薩就講明他們是在中國的威脅下不得不簽約的。達賴喇嘛說，「在北京談判期間，代表團不斷地受到侮辱責罵及人身攻擊的威脅。此外中國共產黨還揚言要擴大對西藏的軍事行動。中國政府也不讓他們和我或是我的政府聯繫。」⑤

中國共產黨有他自己另外一套完全相反的說辭，「協議的簽定大大地改變了西藏的歷史，也改變了藏族和祖國的關係史。這種事情使得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藏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羈絆，回到了華夏各族祖國大家庭的懷抱。」⑥

中國政府珍藏著一份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拍給毛澤東的電報。丹增嘉措在電文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⑦

這個無疑地就是中國要進一步對西藏做全面性軍事行動所需要的最後一個憑據。這個日子

很快就來臨了。「十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軍走進西藏內地，西藏人民從帝國主義勢力的威脅下被解救出來，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的懷抱。」⑧

現在，達賴喇嘛表明說那份電文的內容是他的顧問和中國的代表們唸給他寫的，其目的在於避免發生更可悲的事情。以他當時年齡（他祇有十六歲）來看，這是很有可能的。西藏的噶廈政府嘗試地要讓中國相信，他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裏能夠和中國和平共存而不願意看到干戈相向。拉薩在尋求如何避開衝突，避開中國共產黨會毫無忌憚地發動血腥屠殺的可能衝突。

中國報紙說，在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後，西藏人民就很興奮地爲迎接「解放者」的來臨而準備。除了一些堅決反對拉薩和中國妥協的西藏康巴還企圖抵抗之外，大體上而言通向拉薩的路是通暢無阻的。中國部隊對長久以來不受到強鄰威脅的世界屋脊從北方和東北的甘肅及青海，東部的四川以及東南的雲南同時多路進軍。我們可以想見得到一隊隊爲著要儘早征服西藏的中國士卒艱苦地在乾旱、荒涼、嚴寒的高原上強行軍的情景。有時候走了幾天也看不到一個人影。渡過湍急的江河，翻過陡峭的山嶺，轉進茂密的叢林，下了深峻的山谷，中國部隊在時出時沒的小路上冒著風雪緩緩地向前挺進。至於礮兵、裝甲部隊以及後勤補給的運輸則更是在不可能的條件下進行的。從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的突擊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宣告勝利成功，人民解放軍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在整個西藏高原完成軍事部署。

中國官方發布消息說，毛澤東的部隊離鄉背井熱烈地協助西藏同胞，「這些行爲溫暖了藏胞的心。他們讚揚人民解放軍，把他們當成是民族的子弟，稱頌他們是『新漢人』、『菩薩兵』」⑨。漢人是純中國人種，目前大約佔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左右。漢族把持了黨、政、軍所有

重要的職務，他們應該是要和其他國內的少數民族滿、蒙、回、苗、夷、維吾、烏茲別克等和諧共處的。

達賴喇嘛於八月的時候從亞東返回拉薩。中國的先遣支隊則是在十月二十六日進入拉薩，順利完成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人民解放軍在軍樂的引導下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及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肖像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拉薩，浩浩蕩蕩地穿過市區駐進軍營。國旗上象徵五族共和的五顆黃星至此才算形意雙合。

在中國年鑑裏有很多關於這一歷史性時刻的描述。僅抄錄片段如下：

> 「在值得慶祝的今天，人民解放軍經過長途跋涉到了拉薩。他們的抵達與奮了全城。二萬餘名的西藏僧俗人民夾道歡迎他們。」⑩

也就是說西藏人民以震天的歡呼來迎接充滿同胞愛的中國部隊。

流亡藏民的說法和中國政府的說法有很大的差異。據他們說，西藏小孩用石頭丟中國軍人，喇嘛們則在唸經詛咒這些「宗教的敵人」。然而一大群站在路邊的藏民對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面看得出神的景象，並不能顯示出這件事的重要意義。

中國政府的代表向達賴喇嘛解釋中國部隊進入拉薩的理由。他們是來協助西藏建設及對抗外國帝國主義所設計的陰謀。一旦這個任務達成了，即使達賴喇嘛不出言相求，他們也會斷然地撤軍。拉薩市民舉踵翹首地等著永遠也不會來臨的這個美好的一天。他們看到的卻是源源不斷進城的中國士兵。先遣支隊在幾個月之間擴充爲二萬大軍，等於拉薩市人口的半數。他們保

證遵循〈十七條協議〉不改變宗教制度。中國幹部向賄賂成風的西藏高官、貴族殷勤送上大禮。他們也提到拉薩及西藏現代化的問題。

一九五一年代的拉薩，在很多方面的確很像一個中古世紀的城市。達賴喇嘛的駐錫地布達拉宮建築在拉薩市中心布達拉山上，高十三層，離地面一一七公尺，紅白相間的石牆，閃閃發亮的屋頂，瑰麗動人。宮宇倚山疊砌，巍峨聳峙，雄視拉薩。然而這座「喇嘛的羅馬」卻和拉薩富麗堂皇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一樣，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排水溝。拉薩的露天公共廁所一般都是設在城郊的荒野裏。成群衣衫襤褸，痘瘢滿面的乞丐及患有癩病的狗群在街道上東蕩西晃。而窮苦人家的家裏，一片髒亂，有的甚至髒得令人噁心。

不過可別鄙視拉薩，她可不是像中國宣傳中所說的人間地獄。在那個時期到過拉薩的外國遊客都認爲聖地拉薩是個充滿著和平與歡欣的城市。即使是拉薩最悲哀的居民也絕對沒有像西方大城市中下層社會階級分子所表現出來淒慘的一面。在西藏，即使是在最窮困的乞丐群中，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餓死的，而且在地勢平均四千公尺的高原上，雖然衛生條件很差，致命的傳染疾病卻很少有。

中國保證給拉薩帶來比較舒適的生活條件。醫院、公路、學校這些都是在計畫之內。中國人一到，統戰單位就到處巡迴拍攝興高采烈的人群，然後如假換眞地說是「解放」拉薩的成果。何況爲了要攝製影片，這些「新漢人」送些貴重的禮物給窮人及乞丐弄幾張大展歡顏的笑臉是太容易了。中國政府說，經過千年封建農奴制度的壓榨，拉薩終於享受到所謂的幸福。

在這期間，人民解放軍按照北京參謀總部所擬定的計畫，一步步地駐進了西薩所有的主要

城市，譬如說在拉薩西部的日喀則和江孜。指揮部在前藏、後藏、安多、康等地區蓋起了營房。在幾個月之內，幾乎整個西藏都在中國的軍事控制之下。至此，中國在西藏的主權敲定了。

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間，爲了便利部隊的調動，中國修築了兩條由中國內地通往西藏的公路幹道。一條是以四川省成都爲起點，經過雅安，到拉薩爲終點，全長二千四百十三公里的川藏公路；另外一條是以青海省西寧爲起點，經格爾木，到拉薩，全長二千一百公里的青藏公路。這兩條穿過高山峻嶺，急流大川，耗資無數的公路，在中國戰略家的心目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因此，第三條幹道，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葉城到西藏阿里地區所在地獅泉河，全長一千一百七十九公里的新藏公路也於一九五七年通車。

這幾條戰略性公路對部隊的調動提供了非常優勢的條件，也相對地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條條公路俱是致命的傷口，西藏從此不再擁有千餘年來恃以自保的天險。中國的統戰宣傳一再強調這些公路對經濟沙漠的西藏所帶來經濟繁榮的重要性，然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在中國骨子裏，這些公路的經濟價值祇不過是附屬效益而已，唯一重要的是它們的軍事價值。

中國徵調西藏農民修築公路。他們絕大部分是年輕、無知的文盲，馴服的勞工。爲了要加速完工，中國幹部發起了個人及單位競賽。每天都有一定的工程進度要完成，比賽的目的很自然地是要超過當天的預定工程，使進度超前。每天晚上收工後，中國幹部就召開檢討會對優勝個人、單位頒獎表揚。優勝勞工得毛澤東肖相紀念章，優秀單位則獲頒錦旗⑪。

四、宗教是糖衣毒藥，毛主席萬歲！

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國領導們，馬不停蹄地著手進行逐漸腐蝕達賴喇嘛在西藏社會裏所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與精神影響力的計畫。一方面想要鞏固中國在敵對地區的勢力，一方面又想要將整個西藏融入「中國大家庭」，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從根動搖達賴喇嘛之前，先使他失去作用。中國幹部希望利用西藏和外界隔絕好幾個世紀的社會脆弱性，以及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嚴重性，來宣揚達賴喇嘛是一個從枷鎖中獲得解放重生的人。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要能夠說服西藏最貧困的階級，讓他們感覺到有必要站起來推翻所有的壓迫、剝削者：這一小撮的大喇嘛和領主的龐大財富是建築在受到迷信與宗教枷鎖毒害的平民的痛苦悲慘之上。他們解釋說，一個嶄新的制度在中國剛剛成立沒多久，在那裏，在神和菩薩之前沒有跪拜，沒有俯伏，沒有叩頭，也沒有整天要念的連禱經文。中國人民跟隨著「偉大的舵手」的引導，擺脫了民族的鴉片——宗教。

中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了嗜血成性的貴族，所以他們不再有勞役，不再有壓得令人喘不過氣的賦稅。沒有農奴，沒有奴隸，也沒有乞丐，在這個社會裏，大家一律平等。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大躍進曾經在高唱〈東方紅〉的七億中國人蹦跳的心裏燃起一股極大的希望火苗。經過一連串不休止的戰爭、屈辱與悲慘的歲月，整個中華民族在共產黨紅旗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站了起來。

以色列‧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是對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最出名的學者之一。他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無限重視與重用。他被任命為法文版《中國建設》(*La Chine en construction*)月刊的總編輯，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以色列‧愛潑斯坦於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波蘭，他從一九八〇年開始，就為中國的領導班子貢獻出全部的時間、精力。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訪問了這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家，向他請教有關西藏的問題。當他知道我是個記者後，他很尷尬地回答我所問有關最近在西藏所發生反中國人暴動原因的問題。

他於一九八三年在中國出版了一本厚達五百餘頁的《蛻變的西藏》(*Le Tibet transformé*)他在書中如此描寫西藏的解放：「在民主改革期間，上百萬的西藏農奴與奴隸，在一九五一年進入該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協助下奮起反抗。一步一步地他們從幾世紀以來一直控制他們的肉身，控制他們的思想的封建制度與神權政治領導者的手中取得了土地和牲畜。他們在西藏各地區建立了地方權力機構以代表他們階級的利益。在世界屋脊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

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拉薩後，即在市區紮營，糧餉問題也就愈來愈嚴重，因此中國軍官就說是向拉薩借糧，而徵用了一大半現有的糧穀，並且說是算在中國協助西藏工業化的帳裏。達賴喇嘛回憶著說：「在人類的記憶所及，這是拉薩市民第一次瀕臨饑荒。」⑫拉薩市民群起抗議這種造成物價暴漲的強制徵用。反對漢人的標語開始出現在市區大街小巷的牆上，小孩子則不斷地用石頭丟戴著掛有八一帽徽的軍便帽的中國士兵。

受張經武將軍節制的北京密使指控西藏噶廈政府的二位噶倫羅桑扎西和魯康娃與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勾結，他們並且向達賴喇嘛施加壓力將他們逼走。一九五三年年底，毛澤東邀請達賴

喇嘛訪問北京。達賴喇嘛是否想從毛澤東與周恩來那裏得到一些讓步呢？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說的。因此，雖然有些顧問提醒他要警惕毛澤東，他最後還是決定接受邀請前往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達賴喇嘛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一日啓程開始這趟拉薩市民認爲不妥的遠行。雖然達賴喇嘛一再向他們保證他很快就會回來，很多人都擔心他會被扣押在北京當人質。

在上百的西藏貴族、活佛的陪同下，達賴喇嘛取道川藏公路到成都，然後改搭他這一輩子的首航飛機到大漢帝國的首都，古長安，今日的西安，會合班禪喇嘛及其二百名隨從。這一趟他們是增長了見聞，認識了「文明」的「進步」。他們從西安換乘火車到北京，並在北京車站受到了一大群共青團的中、小學生按照計畫地熱烈歡迎。在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籌備這類儀式是一等一的大事。所有的正式典禮都經過詳細周全的安排。沒有任何的差錯，也禁止任何的臨時動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均被朱德總司令及周恩來總理接見。達賴喇嘛和毛澤東有過幾次會談。根據某些傳聞，中國的獨裁者對這位不是自己想要當西藏人國王的年輕人的風采大爲傾倒。

毛澤東對西藏和達賴喇嘛是說盡了甜言蜜語。他花了好幾個時辰和這位怯生生又侷促不安的年輕人大談佛教的善行。達賴喇嘛以爲可以和共產中國的主人協商出一個妥協的辦法。穿得不很講究的赤色中國的皇帝，煙不離手，在他的臉上已經可以看出他的身體狀態並不很好。

達賴喇嘛爲我敘述他和毛澤東的會晤。「他對我一直是很和藹可親，因此我對他有一股敬意，對毛主席眞誠的敬意。他說話的方式，解釋事情的方式讓人覺得他所說的都是眞的，對的。周恩來是另外一型的人。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個很冷酷無情的人。他說話的時候，眼睛不斷地轉動，讓人覺得他是個很頑固的人。他對我也是很和藹，可是過於虛偽做作。毛主席就

不是這種人。當他和你談話時，你可以眞正地相信他。有時候我們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

當毛澤東談到西藏自治問題的時候，他是不是很誠懇呢？「有一次我們在正式會議的場合上碰面。我在長長的會議桌的這一邊，他就坐在我的對面，會議桌的另一邊。在我的旁邊坐著有班禪喇嘛和幾位西藏負責人，在他的旁邊也有一群中國領導幹部。在我們之間，桌子的一端，坐著二位駐紮在西藏中國部隊的司令。我們討論著，突然，毛澤東用手指著這兩位將軍說：『我派這些將軍去協助你們。如果他們沒有按照你的意思行事，你告訴我，我馬上把他們撤走。』」

達賴喇嘛還記得在一次中國最高領導會議時，也見到了毛澤東，並且就坐在他的旁邊。「大家還在討論著，毛澤東忽然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們西藏人，你們目前是很落後。我們幫助你們。你們在這未來的二十年間會很進步。到那個時候，變成你們來協助我們了。你們的歷史是個偉大民族的歷史。』從他的這番話裏，我們可以知道他是把我們當做一個眞正的民族。另外還有一次，他突然問我，我們西藏人有沒有旗子。我回答說有。他就說：『這面旗子，你們應該要好好保存。』在另外的一個場合，他向我保證：『現在我們派中國人到西藏協助你們發展。一旦你們開發了，我們就撤回所有的中國人。』」

達賴喇嘛也沒有忘記他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會談。這次的談話是臨時決定的。當時西藏領袖正在參加中國人大常委會議。一位信差來向達賴喇嘛說毛澤東要和他談話，現在在一間會議室等他。丹增嘉措向會議主席劉少奇道了歉，忽忙地趕去見毛澤東。「我們坐在長沙發上談話。突然間，他靠過來，並且把上身靠近我，很鎮定地對我說：『你知道，宗教是顆糖衣毒藥。她可以損害一個民族的建設與發展。首先她是物質進步的障礙（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話是沒錯），再

來，她使種族衰弱。你的精神有點像科學家的精神，你是可以了解的。宗教是毒藥。』」這對我是何等的震撼！我馬上感到渾身不對勁。我一下子就了解他對我說的這句話非常重要。我低下了頭把他對我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紀錄下來。」

在離開北京之前，毛澤東建議達賴喇嘛訓練一批年輕藏籍的無線電通訊員以便兩位領袖可以隨時聯絡。「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返回西藏的。幾個月之後，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年初吧，我們接到從藏東傳來當地發生暴動的消息。剛開始，我們聽到的祇是愈來愈多的謠傳，接著，我們聽到了對當地所發生的悲慘事件的眞實描述。我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向毛澤東送出了二、三封信，向他解釋這件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不過我沒有從他那裏得到任何的回覆。因此，我的心頭浮現出串串的疑問與顧慮。」

在回拉薩的路上，達賴喇嘛經過安多藏族居住區，順道回到他出生的故鄉探訪。在那裏，他已經對中國共產黨在該地區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感到憂心重重。前來和他談話的藏人全部無一例外地像性能優良的機器一樣，重複地說幸虧毛澤東主席與中國共產黨，自從中國人來了以後，他們就變得很幸福。達賴喇嘛必然察覺到北京已經決定將這片遠離拉薩的地區大肆「改造」，做爲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基地，就像遍布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共產黨基地一樣。

統合西藏的第二步，就是成立以同化西藏和將西藏納入中國行政系統爲目的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開幕典禮的紀念照片突出了在繪有毛澤東巨幅肖像前面的貴賓席上中國中央政府代表團團長陳毅元帥的地位。在共產黨「活神仙」肖像的左右各掛有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畫像，不過小得多了就是，從而更顯示出「偉大的舵手」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地位。

一幅非常非常大的中國國旗襯托著整個典禮台。在樂隊區裏，悠悠地傳出了人民解放軍演奏的中國國歌。達賴喇嘛及其助理可從來沒有被人當成滑稽可笑的傀儡來玩弄過。

達賴喇嘛親任有行政權的壽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有兩名，一位是班禪喇嘛，另一位是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代理書記、中國駐藏人民解放軍司令張國華。阿沛・阿旺晉美擔任祕書長。由三位藏人，一位漢人所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個獨立自主的機構。然而中共在人選配合上費盡心機，設計出一套令達賴喇嘛的擁護者和阿沛・阿旺晉美的「同路人」之間有著不能避免的爭執的妥善安排。此外，阿沛・阿旺晉美也在這個時候公然投靠北京。至於班禪喇嘛，北京對他是操縱自如。很快地，這個籌備委員會的作用僅止於在拉薩推行北京的漢化政策而不會受到抵制的傳送帶而已。達賴喇嘛不但不是北京的一大障礙，相反地，他卻不由自主地成爲漢化政策不可或缺的保證人。中國很巧妙地運用了這一層關係。

被中國玩弄於股掌之間，「我們祇能討論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我們從來就沒有權力做重大的修改」。這是達賴喇嘛現在的說辭⑬。在拉薩，眞正有決定權的權力中樞是由純漢人所組成的西藏中共黨委。北京很清楚地知道，西藏的政治結構過於簡陋、脆弱，可以很容易地消化掉，成功的關鍵在於掌握達賴喇嘛。一旦掌握了達賴喇嘛，整個西藏的權力組織即陷入癱瘓。巧妙地配合詭計、威脅與微笑，很快地就可以讓達賴喇嘛失去作用。這個陰謀過後幾十年的今天，西藏的神—王說他最大的憂慮一直就是如何避免在西藏發生血腥事件。他說，中國人早就擺明了如果發生反抗的事件，西藏將會由軍法統治。雙方實力的強弱過於懸殊，萬一發生這一類的事情，我的人民永遠也沒有機會脫離這個深淵。至於西藏的貴族們，大部分都經不起銀彈攻勢，

很容易就被賄賂。

在北京，又有另外一套說法：「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四月正式成立，為該區的民族自治做準備工作。經過和西藏社會高階層的代表們協商後，一連串的公路、工廠、農場、醫院等建築計畫與商業發展計畫逐一付諸實行。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一小撮西藏高層社會的反動分子，對〈十七條協議〉陽奉陰違，極力阻撓協議的貫徹執行。他們在成立西藏軍管區的時候製造騷亂。他們迫害參加建築計畫和接受國家貸款或是到漢人診所求醫的農、牧民。」⑭

五、康巴的叛亂

憑著這一段與中國和平共處的既有經驗，達賴喇嘛已經不再抱有想要獲得一個穩固、持久的妥協希望了。他在中國內地所訪問的佛寺，座座都是祇剩下二、三老僧的空殼。誰敢上寺廟，誰就受罰，因此一般百姓看到會害人的寺廟，就像碰上鼠疫一樣，避之猶恐不及。可是，如果在西藏，像在中國一樣，宗教消失了，那不就等於是西藏文明的消失嗎？

在鄉野裏，西藏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仇恨愈積愈深。「在藏民的身上，我看到不斷加劇的痛苦及對中國人逐漸加深的恨意。在中國人身上，我看到了因懼畏及不了解而產生的冷酷與決心。」⑮

在這一階段，中國應該還可以重新掌握局勢，避免直接衝突，這樣，也許還有可能在最遲十幾年之內在西藏完成沒有抵制的漢化政策。中國不是擁有幾乎所有必須具備的條件：軍事武力、強有力的行政系統以及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所相信的意識形態？然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中

國還缺乏一個條件，也許是最重要的條件：耐心。毛澤東主義分子的行徑恰好相反。中國幹部們迫不及待地要在西藏完成偉大的思想工作。一九五五～五六年的冬天，在昌都地區爆發了第一次起義。由康巴組成的游擊隊以極其野蠻的方式襲擊中國要塞。在峻嶺崢嶸的喜馬拉雅山上，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籌莫展，康巴騎士卻來去如風，自由自在。

這次的叛亂是由中國笨拙至極的措施所引起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五年就接到命令要解除康巴的武裝，並且清除寺院的軍火庫。一些最急進的中國共產黨幹部急功好利，想要在西藏共產黨的建設中揚名立萬，因此順手摧毀康區的宗教信仰。他們向康巴解釋說宗教是人民的糖衣毒藥。他們也鼓勵民衆積極參加遺臭萬年的「鬥爭大會」，來揭發人民的「壓迫者」的「罪行」。這些戰術上的錯誤，招致了嚴重的後果。自古以來槍就是康巴鬥士最珍貴的財產，因此他們的反應也最直接：戰鬥的號角一響，所有的村莊都燃起了戰火。

康區和安多地區的各部落一向敵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卻發揮了一種作用，也就是成功地使他們捐棄舊隙，聚合在一起共同對抗外敵。上萬的游牧康巴爲著同一股衝動、同一個目的團結在一起：攻擊所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康巴鬥士在突然沸騰的藏東到處重創人民解放軍。北京無理地要求達賴喇嘛派他自己的軍隊，去鎮壓企圖破壞「民主」改革的帝國主義的走狗康巴所策動的暴亂。

前面提到過的英國倫敦西藏基金會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是這一群拿起武器反對中國人的一個成員。當時他還不到十五歲，而且還是甘孜市郊德格寺裏的和尚：「在歷史上德格寺曾經在和中國人的戰爭中被摧毀過兩次。我以前是這個寺廟裏的年輕和尚。在那個時期，德格寺還沒有

被『改革』。然而在那個地區，一齣齣的『階級鬥爭大會』的批鬥聲已經響徹雲霄了。一九五八年年初，寺裏有一些和尚決定離開寺廟加入戰鬥行列。在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槍，我們不准持有槍械。我們有八十二人一起離開德格寺，我們有八十一匹馬，可是我們祇有七支步槍、二把手槍。」

「我那個時候才十四歲半。我們打起仗來，一個比一個勇敢，因此，當我們打到『自治區』和中國的界河——金沙江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了槍，有些人甚至有機關槍。當然這些都是戰利品。我們也折損不少的人馬。我們到達拉薩那一天，我們一夥八十二個人祇剩下四十個人而已。我們祇有七個人安全到達印度。我當時實在太小了，連機關槍也抬不動。這是一場游擊戰，我們主要是攻擊中國的運輸車隊、小的車隊。我們向中國人發動了三十六次的攻擊。我們從來不在村子裏發動攻擊。每一次我們都是選擇車隊在半路上停下來加油或是吃飯的時候下手。那時候連接四川和拉薩的川藏公路已經通車了，有時候，我們也埋伏在公路附近攻擊上百人的車隊。剛開始的時候，戰鬥的情形實在很難形容。我們沒有受過任何的訓練，可是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除了這麼做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從來不在公路上停留。我們一直都留在山區裏。從高處，我們可以監視敵人的行動。有時候，我們也派當地農民當偵察兵，去打聽車隊的人數，有時候，我們自己穿上當地的服飾，僞裝成當地人去探查情況。村子裏的居民供給我們食物。他們受到中國人的恐怖統治，因此自願協助我們。在那個時期，糧食配給制度還沒有開始實行，因此中國人並沒有發覺他們給我們送吃送喝。自從糧食配給後，中國人管制了每一粒穀物。他們時常設計陷阱想要騙我們，因此，

我們祇好分成兩批。我們東躲西藏，靠挖野生的塊莖充飢。我們時常有十幾天沒東西吃。」

康巴的叛亂愈來愈厲害，以至於連公開和赤色中國敵對的美國政府也對他們感到興趣。傷亡極大的韓戰的爆發，無疑是在中美敵對關係上火上加油。為了想要以最少的花費，又能使中國腹背受敵，美國中央情報局設計了一個他們從來沒有對亞洲國家使用過的，代號叫做「花園行動」的計畫。成千上百的西藏游擊隊員在極為祕密的作業下，從印度送到美國接受密集的軍事訓練。華盛頓想要培養一批足以領導反對中國的游擊隊藏族精英。一九七三年美國記者大衛・懷斯(David Wise)挖掘出祕密行動的內幕。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個叫做立德市(Leadville)的小鎮北方二十五公里處的一條峽谷裏，有一座海拔三千公尺高的海勒營地(Camp Hale)。在中央情報局當時的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的主持下，西藏游擊隊就在那裏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諄諄教誨，苦練絕技。海勒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雪地作戰部隊的訓練營區。那裏的氣候與地形和喜馬拉雅山區極為相似，此外它地處窮鄉僻野之地，不至於招人耳目。受訓的游擊隊員都是從曾經和中國部隊有過眞槍實彈接觸，然後逃離到喜馬拉雅山外邊境國的難民中篩選出來的優秀分子。中央情報局的目的是傳授他們游擊戰的技巧，協助他們裝備現代化的武器，然後再將他們滲透到西藏內地。懷斯說：「他們有的是空降到西藏，有的則是由地面潛入，其中有一小部分進去後又離開，並且和中央情報局接上線。」不過他也說：「即使這些游擊隊能夠有效地騷擾中國部隊，他們卻沒有能力解放他們的國家。」⑯達賴喇嘛的胞兄嘉洛頓珠是這個值得商榷的計畫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這件事情之後，他移居香港，做個安分守己的商人，隨後他又出現在達蘭薩拉的政治圈裏。

美國人訓練從來沒有看過飛機的人跳傘，使用重兵器，操作無線電，然而對一九五〇年西藏所發出的求救呼聲卻沒有任何的反應。在那個時候援助西藏，可能還可以殺殺中國的威風。等到這個時候才由中央情報局出面協助康巴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更可悲的是，這個沒有明天的計畫授中國以口實，讓他們得以再度指責「分離分子」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這一次可是振振有辭，有憑有據的嚴正譴責。這件事一直拖到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祕密訪問北京之後，美國對西藏游擊隊的支援才算整個結束。季辛吉的訪問北京，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奏，第二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正式訪問北京。

六、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花園」行動

五十餘歲的奇美南結曾經是康巴游擊隊祕密組織「四水六崗」的成員。他也是最後一批被送到美國科羅拉多州祕密基地接受密集訓練的游擊隊員之一。他接受我的訪問，也答應講這一段歷史故事。這是他第一次向外國人吐露這一段眞情。

一九六二年三月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間⑰，我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裏，地圖上找不到的祕密地區接受訓練。我這一梯次總共有一百三十五位藏民。我們搭乘美國空軍的一架運輸機離開印度，經過巴基斯坦東部上空飛向美國。飛機在泰國及日本降落加油後直飛美國。飛機上的舷窗都被封起來。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要到那裏去。不過當飛機第一次降落加油

的時候，他們給我們印著有「Bangkok」字樣的清涼飲料與吸管。我們之中有幾個人稍微懂一點英文，因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那裏降落。第二次是在日本的原野裏降落，可是我們看到寫著日文的指示牌。

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計畫，我也迫不及待地要接受這個訓練，因爲對我來說，這是報效國家的方式。訓練的目的是要我們對游擊戰的技巧作一深入的研究，以便在進入西藏後可以獨當一面，立即展開行動。有了這種訓練，我們希望可以在西藏內地發展出獨立運動。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執行這個訓練計畫。我想總共大概有一千名的藏人在美國受過訓練。

他們教我們使用各式各類的裝備，我們也接受情報訓練。整個訓練計畫的內容在在要求我們能在西藏組織並且領導西藏的獨立運動。我們還受過針對如何從中國部隊在西藏的演習中獲得情報的特殊情報訓練。在訓練營的生活並不算苦。至少我們還有時間睡覺，不過訓練課程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才結束。所有的教官都是透過藏語直接翻譯教學的美國人。當然我們沒有權利離開營區。

訓練結束後，我們之中有一部分使用空降到西藏，另外的一部分，譬如說我就是其中之一，則必須由地面陸路滲透到西藏內地。當我們要進入西藏之前，他們祇發給我們一人一把手槍而已。我們非常失望。千辛萬苦到這裏來接受這麼深入的訓練，竟然祇是爲了一把手槍！其實他們計畫中的第一步，是要我們先潛入西藏組織小組。當這第一期任務完成後，我們就會收到武器。每一個小組有五個游擊隊員，並且配備有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操作

的無線電收發機。當然我們身上沒有任何的文件，因此即使失風落網，也查不出我們的身分，不會暴露其他組員。支援武器後來的確是運進西藏。我被分配到西藏南部，靠近印度北方，離緬甸邊界不遠的察隅。我在那裏停留了大約一年左右。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和當地居民取得聯繫，以便建立地下游擊網。我們有好幾個攻擊中國軍營的好機會，可是我們沒有這個權力。最高指揮部受到印度方面的命令禁止我們攻擊中國部隊。衹有空降到西藏的游擊隊員有權力和中國部隊作戰。這個命令讓我非常惱火，因爲我覺得我所學到的東西無用武之地。這也是爲什麼我衹幹了一年就不幹的原因。所有的阻撓都是來自印度。他們衹對我們出生入死所採得有關中國部隊在西藏的情報有興趣，而不願意看到因爲西藏和中國的紛爭產生中印的邊界衝突。

其實，美國方面也接受這種情勢。因爲這個計畫是由三個國家的代表共同擬定的：西藏、美國及印度。不過那些空降進入西藏的隊員們可的確轟轟烈烈地幹了一場，造成中國部隊的嚴重損失。

在被選入「花園」行動計畫之前，奇美南結是一九五八年在他的家鄉昌都，最先呼籲同胞拿起武器捍衛家園的戰士之一。他當時也祇有十七歲而已。他承認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間，他殺了「不少的中國人」。「我們這一區的康巴和另外一區的康巴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中國人。單單是一九五八年這一年，我們就摧毀了四十輛的中國運輸車，殺了大約七百個中國人。有時候我們從早上九點到午後三點，一直不停地扣扳機。當彈藥用盡後，我們就提刀衝鋒。中

國士兵可並不很勇敢，因爲他們一看到我們衝過去，就連武器也不要了，拔腿就逃。」「爲國家自由而戰的意念一直存在我的心頭。當機會來臨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再度披掛上陣。」這位傲骨十足的康巴被任命爲西藏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國會副主席。

從一九五六年元月開始，中國政府就決定使用所有可能動用的軍事武力來敉平叛亂。北京急忙地派出了十四個師，約十五萬人的軍力到康區。雖然碰上頑強的抵抗以及可怕的戰鬥，這批人潮仍舊像海潮般地洗過康區，直搗黃龍府。配備有俄製依留申Ｉ——二八式轟炸機的中國空軍，把游擊隊員炸得昏頭轉向，也摧毀了一切。雨點般從天而降的「火球」打在祇有在胸前掛著護身符的康巴，很快地就造成重大的傷亡。

七、恐怖與緘默

以血腥手段輾平叛亂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在寺廟及村子裏散播恐怖的種子。很多的人、事可以證明中國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間的暴行。中國人酷刑拷打西藏僧侶。不少的和尚被活活燒死。逃到國外的西藏難民對於和尚與尼姑被迫在中國士兵面前公然交媾的情景記憶猶新。很多喇嘛被下放到以殘酷著名的青海勞改營。他們強迫小孩毆打自己的父母。人民解放軍使用各式各樣的手段來恫嚇當地的居民：一批批的西藏人被釘死、被活埋、被斬首、被分屍。許多村莊整個被摧毀，從此在地圖上消失⑱。然而康區的游擊戰並不因此而結束。這些殘酷的暴行，事實上祇會加深康巴一致團結對抗中國的決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人民

解放軍軍營還時常受到西藏游擊隊的襲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

國外對這些暴力行為的反應如何呢？幾乎沒有任何的反應。一九五六年達賴喇嘛被邀請到印度參加佛祖釋迦牟尼二千五百年佛誕慶祝大典。中國在拉薩的代表們異常惶恐，因此在他臨行之前，對他耳提面命。他們要求他不要發布任何足以使「中央政府」為難的有關西藏內地情形的談話。他的中國「保護者」教他如何應付記者們令人尷尬的問題。身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沒有實權的虛位）的達賴喇嘛應該了解印度是個充滿各式各類反動分子的國家，因此他更需要特別謹慎，並且以「忠貞愛國的中國一分子」的身分說服和他交談的外國記者與外交人員，讓他們相信中共在整個中國對宗教問題都是採取同樣寬容的政策。

西藏能夠指望印度的協助嗎？當達賴喇嘛在新德里會晤尼赫魯的時候，西藏再度地失望了。印度政府的首腦建議他繼續朝和中國獲得和平妥協的路線努力。印度總理解釋說，印度沒有能力協助西藏脫離中國的監護。因此，如果西藏沒有辦法適應中國人進駐西藏的事實，西藏就祇能指望她自己的部隊。就在這個時候，在拉薩流傳著鑿鑿可信的傳言，說是整個西藏將同時起義，攻擊中國部隊。當時也受印度政府邀請的周恩來勸告丹增嘉措儘快地趕回西藏以平息這些念頭，否則，周恩來斬釘截鐵地說，會有一場毫不憐惜，立即回報的高強度鎮壓。在這緊要關頭，毛澤東再度表現出他那非凡的戰術才華。深刻了解到西藏成為一觸即發的戰爭敏感地區，毛澤東運用古中國戰略先驅孫子的名著《孫子兵法》中的戰術，同意讓步。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不就已經寫下了這句話：「就像拳擊比賽一樣，大家都知道，有智慧、懂得思考的拳手往往閃步後退，他那傻瓜對手才不斷地前進並且猛力揮拳，結果時常都是

向後退步的拳手贏得勝利」？

面臨著西藏大動亂的危機，等待可以利用的時機最爲緊要，然後就是進兩步，退一步：部隊已經在西藏不就是個實際的利益了嗎？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說，既然西藏人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共產的民主改革，那麼中央政府就等待著時機的成熟吧！中國明言保證將前藏的改革往後延期六年。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西藏還會有誰會被他放長線釣大魚的長期打算所矇騙呢？毛澤東所提出來的，祇是暫時的休戰而已。

一九五八年，正當西藏東部烽火連天，血流漂杵的時候，拉薩與前藏的緊張局勢也逐漸高漲。難民潮不斷地湧入拉薩。在前藏聚集了上萬以康巴爲主幹的西藏游擊隊。有些人說有八萬人。這些全由一個新的組織「保衛國家自願軍」所指揮的游擊隊，有時候就駐紮在離拉薩祇有五十公里路程的地方。達賴喇嘛和中國代表的最後幾次會談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危機愈來愈逼近，爆炸變得不可避免了。

八、達賴喇嘛出走西藏

北京在對拉薩危急的局勢做了全盤性仔細而且深入的研究之後，認爲是應該採取重大決定的時候了。中國政府的強硬派認爲不使用武力絕對不能使西藏人民屈服。北京在拉薩的代表，人民解放軍執行了這個決定。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人民解放軍的譚冠三將軍敬邀達賴喇嘛到以紅磚爲牆的軍區司令部看戲。達賴喇嘛接受了這份怪異的邀請，並且決定於三月十日前往觀

賞。達賴喇嘛還記得一個中國特使很粗暴地對他說，他必須不帶武器，隻身前往。這個要求比邀請看戲更爲怪異，因爲大家都知道，祇要達賴喇嘛一動身，一定有二十五名武裝的貼身侍衛護行。中國方面說：「我希望你徹底明白，屆時不會有你傳統的禮儀，沒有一位士兵可以像護送你到籌備委員會一樣陪著你，沒有一位士兵可以越過石橋（營區界限）。如果你堅持的話，你可以帶二、三個貼身侍衛，但是話可先說清楚，他們不准攜帶任何武器。」⑲

在這之前，達賴喇嘛從來沒有到過離他的羅布林卡的夏宮祇有三公里的軍營。此外，中國要求不得將這件事公開發表。在這種情形下，怎麼可能不讓人疑心這可能是個陷阱呢？他們不是企圖控制神—王做爲人質嗎？在幾個小時之間，荒唐無稽的謠言傳遍拉薩，並且造成極大的恐慌。活佛接受中國安排的宴會，然後下落不明的例子太多了。消息一傳出，立刻有三萬左右的藏民蜂擁似地擠向羅布林卡，圍在夏宮門口。拉薩市民想要勸止達賴喇嘛，不讓他落入這個陰謀。人群的叫聲傳到達賴喇嘛的耳朵裏。「我可以聽到群衆叫喊的口號：『中國人滾出去西藏。西藏屬於西藏人。』所有的人都要求結束中國的佔領。」⑳

中國政府不同意這個說法。按照阿沛．阿旺晉美的說法，「一九五九年西藏的武裝叛變，是被無根無據的謠言以及西藏貴族所散布的謊言所挑起來的。」㉑達賴喇嘛想要看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宣隊的表演。中國方面建議在羅布林卡的花園安排一場「文藝晚會」，可是達賴喇嘛謝絕了這個建議而堅持要到營區去觀賞。「在這一天，有一些人散播謠言說什麼達賴喇嘛及其親信被抓起來，並且用飛機送到西藏以外的某一個地方。」在另外一次談話中，阿沛．阿旺晉美保證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叛亂不是由嚴格遵守一九五一年所簽訂〈十七條協議〉的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所引起的，「相反地，是一小部分西藏高層階級反動分子的陰謀而造成的」㉒。

丹增嘉措在他的回憶錄中解釋說，他通知譚冠三將軍說他不可能前往參加他的邀請。中國軍官克制不住自己而大發雷霆。他警告達賴喇嘛的特使們說，現在中國政府的耐性已經到達極點了。從現在開始，某些不可避免的手段即將用來「輾碎所有的反動分子」。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怕了。他們擔心人民解放軍會故伎重施，採用血腥鎮壓的手段，因此他們建議改期。在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信函中，丹增嘉措向他解釋說，他在羅布林卡被一些企圖「破壞西藏和中國友誼」的事情耽擱而分身乏術。

然而這麼做也祇是爲了拖延一點時間而已，因爲達賴喇嘛要逃亡的事情已經進到最後決定的階段了。阿沛．阿旺晉美把中國想要用突襲來「解放」羅布林卡的計畫走漏給達賴喇嘛。中國的重型大礮及機關槍已經在羅布林卡公園四周高地架好陣勢準備發射了。龐大的運兵車隊也向羅布林卡開拔。一切都要快。三月十六日，二顆礮彈轟進了宮殿，但沒有造成損失。對那些還在猶豫觀望的人，至此已經不再有疑問了。最後的疑慮消逝了。由於目擊證人講述的情節不盡相符，西方的歷史學家對這一件事也有不同的闡釋。大部分的人相信達賴喇嘛是自願逃亡的，或許這本來就是他出的主意。達賴喇嘛自己也這麼說。然而有些人卻認爲達賴喇嘛太過於要和中國妥協因而變得懦弱，讓康巴戰士以爲他就要毫不抵抗地把西藏「賣」給中國。因此康巴在最後一分鐘時，將這位年輕人從中國的虎爪下搶救出來，並且不管達賴喇嘛願不願意就把他護送到印度的流亡聖地。

達賴喇嘛的夜奔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六日的夜裏在極端祕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中國當局

對此一出走毫不知情。「他們替我準備了一套軍服，一頂皮帽。當晚九點三十分左右，我退下了袈裟，換上了軍裝。穿著這一襲不習慣的衣服，我最後一次地走進了我的誦經房。我坐上了我的寶座，翻開就擺在我面前的佛經。我一直看，一直看到菩薩要他弟子們拿出勇氣來的那一段。然後我合上了經書，禮了佛，熄了燈。離開誦經房時，我的心靈是釋然的寧靜安詳。在一片死寂下，我清楚地聽到我自己的腳步聲以及時鐘滴答滴答的輕響。」㉓達賴喇嘛整裝就緒，準備踏上流亡路，這是當代史上最奇特的史詩之開端。

達賴喇嘛在幾位噶倫及議員、他的母親、姊姊、弟弟、他的兩位監護人以及大約四百名的士兵與游擊隊員的隨從下，騎馬，徒步，騎騾或坐犛牛皮做的皮船，經過兩個星期的跋涉才抵達印度。他們一行以每天平均三十公里路的速度在冰雪覆蓋的西藏高原上，躲躲藏藏地避過中國的巡邏隊，蹣跚地翻過一座座六千公尺高的山隘。如果丹增嘉措在拉薩多停兩天，他很可能不是被中國的砲火炸死，就是落入人民解放軍的手裏。因爲三月二十日凌晨兩點左右，一陣的砲彈像雨點般地打在羅布林卡公園裏危如累卵的夏宮。

「他們先是用迫擊砲及大砲從四面八方砲擊羅布林卡公園。轟！轟！那天夜裏大概有五、六千人被炸死。」目前逃亡到達蘭薩拉的一座廟裏的八十歲老喇嘛扎西堅贊回憶著那些日子的慘狀以及劇烈的巷戰。「大約在清晨四點鐘的時候，他們開始砲轟布達拉宮。那一天，砲聲隆隆不斷。他們從早到晚不停地砲轟布達拉宮、小昭寺和拉薩其他的地區。」

端坐在錦緞的坐墊上，這位喇嘛嘴邊綻露著笑容，語調堅定有力，在他的眼神裏，不帶有任何的傷感，也沒有絲毫的恨意。當他正向我們敘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半夜裏，拉薩寺廟

的金頂被礮彈炸得開花，一間間民房被燒燬，拉薩市區屍體遍野的情景時，次覺嶺寺裏緩緩響起了寧靜祥和的噹噹鐘聲。這座位於印度北部喜馬查布拉得斯省，離西藏一千多公里的寺廟，是在六十年代由上百的西藏喇嘛在山腰上蓋起來的。三十幾年都過去了，然而這些無理性的暴行在這位蒼老、莊嚴如佛的喇嘛腦海裏刻烙著永不磨滅的印記。

「進攻的中國士兵都僞裝成藏人模樣。有時候根本就分辨不出來，而且到處都是。在礮響後幾秒鐘，我們可以看到一股塵埃在礮彈爆炸的地方直衝雲霄。他們也轟擊哲蚌寺，他們動用了五門大礮，從寺院後面攻擊。色拉寺幾乎被夷爲平地。所有的僧侶都翻牆而逃。你知道，由於我們佛教的教誨，我們這些和尚從來就不想要戰鬥。我們的宗教是和平的。我們信仰菩薩，我們也相信達賴喇嘛。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打、殺這一類的事。我們不喜歡這些。在我們的宗教裏，從來就沒有要我們去打、去殺的。這也是爲什麼中國可以這麼輕而易舉地就占領西藏的原因。達賴喇嘛太年輕了沒有辦法策劃抵抗運動。逐漸地，他們來了，先是穿著便服來的。他們安頓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並且到處宣稱『我們是來協助你們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你們。』然而，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老喇嘛還說，在一九五九年，「中國人變得愈來愈殘酷。再也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制止他們要毀滅西藏的決心。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的軍力逐漸膨脹，裝備也愈來愈齊全。藏民日常談話的主題，無一不是關於這個破天荒的大變動。最近兩年來，我們都很清楚，情況是不可能會有好轉的。中國人來的時候，是說來解放西藏。然而他們言行卻完全相反。他們說從此西藏是自由了、宗教自由了。他們說現在西藏恢復了民權」。經歷過這些動盪的藏民時常向我們講述相同

的故事。一九五九年，中國人在西藏劃了一道三十年後還沒有癒合的傷口。

九、一九五九年的起義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礮群一開始吐火，整座拉薩在剎那間沸騰了。格鬥持續了三天三夜。兩萬餘名的藏民起來對抗四萬全副武裝調集在一起的中國士兵。雖然起義英雄有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雖然有著不知死的精神，雖然有著英勇的表現，雙方實力懸殊實在太大。三月二十二日，坦克部隊進駐拉薩市中心大昭寺前的八角街廣場。數百名的藏民鬥士在他們的礮火下犧牲。不久之後，中國統戰單位在拉薩全市區所架設的擴音機裏傳出了阿沛・阿旺晉美的聲音。他呼籲猶在做困獸之鬥的叛變者繳械投誠。他說中國政府已經和西藏人民簽訂了和約，因此沒有必要再繼續做無謂的鬥爭，所以也必須要繳械。

同一天，中國礮兵也找上了拉薩最主要的寺廟之一的小昭寺這個靶子。這是最後一座遭受中國礮轟的寺廟。如今也流亡到達蘭薩拉的喇嘛扎西巴登那一天剛好在小昭寺。他向我說了一些往事。「在曙光初現的時候，他們發射了兩顆礮彈。然後停了幾分鐘。他們在校正坐標。中國人很早就開始訓練他們的礮兵了。他們早就把攻擊目標測量好了，就等著攻擊令的下達。經過試射之後，在礮聲震天中，礮彈像陣驟雨地打在小昭寺。日落後，我在廟的廢墟裏看到大約五、六十具的屍體。這還沒完。在礮聲稍歇時候，中國士兵前來勘察。」

在小昭寺附近，有三名西藏警察帶著一挺機關槍。其中一名雙腿被彈片炸傷。中國人一直逼近小昭寺。一位和尚對他說：「開槍，現在！」警察回他說：「不，別急，等他們再靠近一點！」。大約有五十餘名的中國人，他們繞著廟走了一圈，離廟愈來愈近了。這位警察看準了，扣緊扳機掃射。達達達達！我看到至少有三十名中國人中彈倒地。我們都很高興。當我們發現在這一堆屍體中，赫然有一位中國高級軍官，我們更加高興。

當天晚上，中國人又回來，並且在廢墟上放把火。這幢建築物整整燒了兩天。在逃往拉薩市的路上，我第一次看到坦克車在馬路上。我躲在一位朋友的家裏。數不清的藏民被逮捕，然後被雙手綁在背後，不知道被送到那裏去。馬路上到處都是屍體。太多了，我們沒有辦法數。每走一步路，我都可以看到一堆僵硬的軀體。女的，小孩子的。

有一天，我終於被抓了，然後被解送到已經有數百名囚犯的羅布林卡公園。在那裏，我看著中國人把屍體堆積在一起，然後澆上煤油，放火燒了三天。那種惡臭真是令人作嘔。

當武器不再吵鬧時，中國部隊俘虜了四千名西藏戰犯。他們點收了八千把輕武器、百餘挺的機槍及迫擊礮，千萬發的彈藥。中國方面估計約有二千藏民死亡，不過很多消息認爲死亡人數至少在一萬左右，有的甚至說在這三天的屠殺中，至少有二萬人死亡。躺在路邊奄奄一息的傷患，沒有受到任何的醫護治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終於如旗海般地飄揚在殘垣斷壁的布達拉宮上。毛澤東的部隊以行動證明他是對的，在西藏的確是有「分裂主義分子」。

報復的時刻來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系統地搜查每一戶被認爲是「反動分子」的家庭。

他們的財產全部被沒收充公。中國人安排了幾場具有殺一儆百效果的公開槍決，至於一批批的喇嘛則被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陰森恐怖的「勞動改造營」。很多很多的人被送去爲大建築工程計畫效力，譬如說水力發電廠。

中國統戰單位的專家們開始拍攝由藏民所扮演的戰鬥境頭。其目的在製造喇嘛參加叛亂的「證據」，以便迫使那些拒絕開口的犯人招供。中國政府對外發布喇嘛正在繳械的照片。扎西巴登指天發誓說，這些照片是西藏人在武器威脅下不得不模擬的劇照。

在這同時，中國人非常仔細地清點從寺廟，從「反動分子」家庭中查封的珍貴寶物。金質和銀質的裝飾品及器皿被收放在密封後再加火漆封印的袋子運到北京。中國的卡車車隊花了三年的時間來載運屬於西藏文化、宗教財產的寶物。

如果我們根據流亡難民的講述與中國官方報紙所公布的極爲少量的資料做一個很保守的估計，在幾年之間西藏的死亡人數增加了至少上萬。引用達賴喇嘛的句子：「他們不祇是被槍決，有些還是被活活打死，被釘死，被燒死、被淹死、被餓死、被勒死、被吊死、被沸水燙死，被活埋，被斬首。」[24]國際法學委員會經過長期深入的調查後所發表的正式報告認爲中國在西藏犯了種族屠殺的罪行。當在雪域發生這些史無前例的災難時，丹增嘉措卻安全地逃到了印度。大約有八萬到十萬的藏民跟著他流亡。

一發覺達賴喇嘛逃亡，中國立刻取消已經同意延緩六年的決定，並且馬上對整個西藏地區做共產化的全面改革。這個改革計畫靦腆地自稱「民主改革」。中國官方報導說，一九五九年的叛變「事實上加速了西藏反動分子勢力的根除，使西藏得以走向新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化的道路」

㉕。毛澤東這位國家的先知，不是早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就說過：「如果西藏反動分子敢發動全面叛亂，那裏的勞動群衆就會愈早完成解放運動。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

「民主改革」對西藏鄉村做了既徹底又快速地集體化，也使所有還沒有被關閉的寺廟喪失作用。中共所控制的某一雜誌說「百萬的農奴奮起反抗」㉖，「封建農奴制度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使他們過著牛馬般的生活。西藏的農、畜牧業完全停頓，也很落後」，人民大衆生活在疾病、迫害及死亡之中。「西藏農奴剝削者的統治，撥旺了隨時都可以用巨大無比的力量來反抗的農奴們心頭怨恨的火苗。」

他們得以砸碎鎖鏈起來反抗反動分子階級的時刻不就終於來臨了嗎？這本書還說，「當叛亂被敉平後，農奴們要求確實推行民主改革。」中國政府徵收了大戶農家、領主及寺院的田產，然後配給「勞動群衆」。在此以前的所有債務全部廢止，「奴隸」恢復自由身。這個「民主改革」於一九六一年完成。「民主改革粉碎了封建農奴的枷鎖，解放了生產力，蓬勃了農、牧及手工藝業的發展。不久之後，擺脫了束縛的農奴，走上正軌奔向社會主義的坦途。」㉗

以色列．愛潑斯坦認爲中國人並沒有獨佔春風，因爲有很多隨時準備推翻前朝制度的西藏奴隸、農奴協助中國人。「祇有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才有可能根除昔日的暴政，才能在這次的戰鬥洗禮中轉變成爲自由的人，成爲自己田地的主人，成爲自己命運的主宰。」㉘毛澤東的名言「革命可不是請客吃飯」舉世皆知。愛潑斯坦也不得不承認，要想「除舊立新」，非得憑恃暴力不可，「在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六五年之間，他們展開了一連串的鬥爭大會」。說得比較直截了當一點，這是一種刑加於「人民公敵」的公開侮辱大會，通常都是以當場施以肉刑或處決爲收場。

這是「階級鬥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受害者都是千篇一律地被毆打、處死，或是爲了要提早結束身心的雙重痛苦，不然就是爲了避免被迫誣告檢舉親友而自尋短路。負責「政治工作」的中國專家們的績效特優，因此阿沛・阿旺晉美得以在一九六〇年於人民大會中說：「大多數的農民及牧民的階級意識均大大地提高。他們現在熱烈地歌頌，譬如說『毛主席是我們祖國各族之父。他比我們的父母還要親』。」班禪喇嘛也親臨會場演說，宣稱西藏的情形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中共對「鬥爭大會」及「自我批評」技術的運用，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因爲他們早在五十年代在全中國鄉下所展開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就不斷地反覆使用、修改，累積了無數寶貴的經驗。這個改革以大量地將土地重新分配給窮苦的農民開始。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要有檢舉告發，清除大地主，通常是軀體上的清除。在城市，則是利用「人民專制」來對付反對社會主義前進的人士。至於反動分子、間諜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走狗」們，則使用社會制裁。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們對這種鬥爭也是身經百戰。無論是在西藏或是在中國的其他地區，情節大體上沒有什麼差異：一群人被「邀請」參加大會。

除了共產主義大家平等的「大鍋」饅頭之外，他們還提供額外的獎品。由幾位政委所組成的「人民法庭」高高安設在主席台上，他們的角色是不論代價、不擇手段一定要得到被告完完全全的懺悔。如果有必要，他們也借助事先安排好充當「群衆」代表的職業煽手們兄弟般的協助。經過幾個小時的侮辱、威脅和動粗，一般說來都可以讓受害者屈打成招。有時候需要幾天的工夫，才能摧毀死硬派的意志。施刑者輪番上陣對被告做疲勞轟炸，他們爲了爭功，一個比

一個凶狠。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要徹底粉碎西藏，在中國也是一樣，傳統社會的團結酵素︰家庭和宗教。歸根究柢，在這種恐怖政治的條件下，除了一些最堅強的人之外，有誰能夠不出賣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姊妹，甚至他自己的親生父母呢？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西藏自治區」的成立說明了西藏已經完全被納入中國行政系統裏。中國報紙讚揚西藏登上了社會主義的天堂。這些都是政治宣傳。然而在這裏脅同行和關於西藏偉大社會主義解放者的神話後面，到底在社會主義解放者還沒有來之前西藏的城市、鄉村及田野是怎麼一個樣子的呢？西藏到底是像中國所說的是一個跌入深淵，暗無天日的奴隸地區？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註釋

①Wang Furen and Suo Wenqing, *Highlights of Tibetan History*,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4, p. 171.

②同上，第一七二頁。

③同上，第一七五頁。

④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87, p. 339.

⑤Tenzin Gyatso（丹增嘉措），*Mon pays et mon peuple*, Genève, 1984, p. 73-74.

⑥Wang Furen and Suo Wenqing，同前書，第一七七頁。

⑦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五月二三日。

⑧同上。

⑨Wang Furen and Suo Wenqing，同前書，第一七八頁。

⑩同上。

⑪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Sterling Publishers Ltd, Delhi, 1987, p. 113.

⑫Tenzin Gyatso，同前書，第七七頁。

⑬同上，第一〇六頁。

⑭*Tibet: Myth vs. Reality*, Beijing Review Publications, Beijing, 1988.

⑮Tenzin Gyatso，同前書，第一〇二頁。

⑯David Wise, *The Politics of Lying*, Random House, New York, p. 174.

⑰這些日期和 David Wise（大衛・懷斯）所說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日期不合。

⑱Michel Peissel, *Les cavaliers du Kham*, Robert Laffont, Paris, 1972, p. 114.

⑲Tenzin Gyatso，同前書，第一四五頁。

⑳同上，第一五〇頁。

㉑*China Daily*, 一九八八年三月。

㉒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㉓Tenzin Gyatso，同前書，第一六三頁。

㉔同上，第一八五頁。

㉕*Le Tibet hier et aujourd'hui*, Beijing Information, Beijing, 1984.

㉖*Tibet: Myth vs. Reality*, p.42.

㉗同上，第五三頁。

㉘ Israel Epstein, *Tibet Transformed*,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3, p. 45.

第二章 是地獄？是天堂？

中國的宣傳工作做得很好，以至於在西方一提到舊西藏，首先閃入人們腦海裏的影像，就是一個最腐敗的封建社會。事實上，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地避免做沒有經過深思的判斷，因爲在神話與現實間，是很難劃清界限的。何況對於中國入侵前的西藏宗教、社會及政治結構等的問題，沒有什麼比較嚴肅、客觀的報告。不論如何，對中國而言，事情就這樣敲定了：解放前的西藏，人民生活在比西方中古世紀社會更殘酷的奴隸制度的槍尖下。北京政府也和前一世紀所有的殖民列強一樣，援引中共幹部及部隊對西藏同胞「情同手足」般的協助來做爲他們入藏最有力的論據，說什麼他們是前往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奴與奴隸。中國的這種說法，讓人一眼就看穿她的弦外之音：漢人負有教化民智未開的蠻夷的神聖使命。中國自以爲毛澤東思想是全體人類的燈塔，她對一個沒有向她做任何要求的鄰邦自動地帶來了這個新文明燈塔的光輝。

即使是在達賴喇嘛出走之後，中國也從來沒有淡化對舊西藏的抨擊。此外，每一次達賴喇嘛建議要和中國當局商討有關西藏前途的問題時，中國政府馬上就給他扣上大帽子，指責他企圖在西藏重建封建制度。然而以達賴喇嘛爲首的流亡藏民早就不再掩飾舊西藏社會的各種缺

點。他們承認這個自我封閉的社會的確需要重大的改革。尋求衝破一九五〇年以前孤立於世的局勢，是有絕對的必要。這些西藏人已經開始拋棄傳統，走向眞正的民主，並且有著一定的成果了。不過他們否認，也不接受中國的說法。他們特別指出，在中國人到來之前，西藏是個從來也沒有饑荒，也沒有大規模戰爭的地方。我們現在就來聽聽有關方面對這一問題的說法。我們就先從中國及她的歌頌者們開始吧！

一、封建的西藏：神話與眞情

阿沛・阿旺晉美站在他那爲衆所悉的客觀立場，以他個人的經歷向我們解釋，還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燦爛大道之前的西藏是個什麼樣子。「在過去的西藏，勞動大衆生活在封建農奴制度極端的壓榨之下。祇佔西藏人口百分之五的三大領主卻擁有幾乎所有的土地和絕大部分的牛羊。絕大部分的農奴和牧奴沒有土地，也沒有牲畜，他們整天辛勤地勞動，然而卻吃不飽、穿不暖。他們沒有任何的個人自由。高度的剝削和壓迫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爲什麼西藏社會停滯不前的病因。舊西藏是勞動者的地獄。如果有人說西藏是個『天堂』，那也祇是極少數的農奴領主的看法。祇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改革之後，西藏人才能從封建農奴中解放出來，走向社會主義的燦爛大道。」①

至於有關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如是說：「在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是個封建農奴的地方。所有的生產工具都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手裏，也就是說政府、貴族和寺廟，

也是所謂的三大領主。大部分的西藏人不是奴隸，就是農、牧奴。被認爲是領主的私人財物，他們的價值就祇是日夜地工作、被賣、被交換或是被典當。如果他們不服從命令，或是做了些什麼不對的事情，他們就會被嚴刑懲罰，甚至被殺。在這種情形下，大部分的西藏人根本沒有想到過個人自由，更不用談人權了。」②

另外一份中國的官方資料也對這一類的慘事做了描述：沒錯，農奴擁有百分之三十的份地，當然是最貧瘠的土地，可是相對地，他們得向他們的領主繳納糧穀。此外，他們還得爲政府支「烏拉」（譯者按：西藏農奴對國家和地方政府負擔的各種差役，也稱「其差」，即外差），爲領主支「囊差」（譯者按：囊差即內差，主要是農奴無償地耕種三大領主的自營地，從播種、鋤草、收割入倉，完全由農奴無償的承擔）。因此，農奴們不但幾乎永遠也不能讓他們的家庭獲得足夠的食物，而且個個高築債台。債務是有錢人控制窮苦人的另外一種手段。這份雜誌解釋說：「在西藏所有的農奴主，包括達賴喇嘛在內，都是放高利貸的債主。政府領主、寺廟領主及貴族領主，每一個系統從上到下，都有他們放債的一套。」③

如果我們盡信中國出版的書刊、雜誌上所說的情形的話，肉刑在西藏是很普遍的。領主在他那豪華的莊園裏，擁有無上的權力，他們對農奴是動輒鞭笞，犯錯農奴則難免受酷刑。他們把受刑人的鼻子割了，或是挖掉雙眼，或是砍斷手脚。他們養著有世襲的職業劊子手家庭來執行此類的刑罰。在拉薩，喇叭聲一響，市民就知道又有農奴要被公開處決了。觀衆都到齊了，「好戲」可以上演了：「有些人先被剖開肚子，然後被拖著在市中心沿著八角街遊行之後，才被處死。有些人則是被赤裸著身子綁在燒紅的銅管上，然後被拖上車，沿著八角街遊城三圈後

才被處決。」④在拉薩有兩間養滿著毒蠍的黑牢，其中一間就在布達拉宮裏面。他們把罪該萬死，應該受盡折磨的人丟進去，讓他去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

中共的「歷史學家們」告訴我們，西藏社會分成三級九品。貴族、活佛及政府領導班底是「上等階級」。寺廟裏的普通喇嘛、政府機關的職員及領主莊園的管理、助手是「中層階級」。其他的人則屬於「下等階級」。最嚴厲、殘酷的刑罰是專門用在對付下等階級的人。「下等階級的人的性命，比敗絮還不如。如果他們被虐待，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利申冤。如果一個『下等階級』的人看到領主強姦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女兒，他的兩顆眼珠會被挖掉。」⑤

取得西藏的控制權之後，中國政府派了一批「模範勞工」，在極短的時間內蓋了「西藏革命博物館」。這是一棟代表西藏新制度在拉薩的權威的建築物，它不但是蓋在布達拉宮的正前方，它龐大的體積也足以互別苗頭：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到過達賴喇嘛富麗堂皇的宮殿的「西藏民眾」，可以在這座「博物館」的陳列室裏自由自在欣賞平民起義推翻舊政權的暴君們最精彩、榮耀的片段情景。在那裏，他們也可以讚嘆歷代達賴喇嘛所收藏的寶貝，其數量與珍奇之程度，也祇有刮斂百姓血汗的俄帝沙皇可以與之匹敵。此外，史館也展出一整套舊制度下所使用的各類刑具，以及用人骨所製成的樂器組。這些人骨頭可不是像我們想像的一般是從壽終正寢的人的遺骸上採集來的，這些骨頭來自被農奴主處死的農奴屍體。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座恐怖的史館是所有外國訪問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訪問團一定要參觀的地方。這段期間是中國統戰專家打擊舊政權的歇斯底里症的最高峯期。視聽影片及展覽圖片展示了一位眼中恨意橫溢的農奴，頂著暴風雪，背著他的主人在爬陡峻的山坡；一位和尚

正在把充滿了恐懼的小孩關進箱子裏，做爲宗教儀式的犧牲；或者是受過這種野蠻儀式的小孩所遺留下來的皮。影片以農奴起義反抗他們的壓迫者收尾。在這個結局圓滿的畫面上，有個年輕的西藏人用他自己的鮮血在岩石上畫了一顆鮮紅的星星，以表達西藏農奴對解放的渴求，以及對毛主席與中國共產黨的愛。中國政府好像已經關閉了這些用來教育「民衆」的罪惡展覽⑥。

然而在中國的言辭裏，依舊含有很多荒謬的事情。如果不是因爲主題太過於嚴肅，人家看了一定會大笑。怎麼可能不引用幾行以色列．愛潑斯坦的大作呢？這位出類拔萃的西藏屬於中國論的忠實捍衛者，蓄意地公然鄙視西藏密乘宗教儀式。他諷刺地說社會主義的建築師在拉薩市區所蓋的現代化建築當然並不足以證明西藏的進步，「如果當初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中國的革命在西藏取得主權，他們也很可能會在拉薩市區內蓋上幢幢大樓；國際連鎖的香格里拉豪華旅館，提供給付得起的富人家空氣新鮮、清爽，又可以眺望布達拉宮的家庭式套房。我們也可以毫不誇張地想見得到，在他們設立的遊樂設備中，有一間稱爲輪迴之舞的沙龍，在那裏一尊尊千手千眼的歡喜佛正沉湎於周公之禮；每到子夜凌晨，則盡褪羅紗使全場氣氛達到高潮」⑦。

職業女作家韓素音是另外一位中國共產黨熱誠的崇拜者。她非常能順應中共翻雲覆雨的指導路線。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她毫無保留地頌揚他，鄧小平平反了，她馬上又變成他最熱忱的擁護者。因此，很自然地，所有她有關西藏的言談，是不太靠得住的。她說要想了解在舊西藏政權下，農奴及奴隸是生活在何等的痛苦之中，「你就得追溯到歐洲中古世紀時期最黑暗的一段歷史」。六二六位西藏最高神職人員擁有全西藏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幸虧有一九五九年所推行的民主改革，「西藏結束了幾個世紀以來的黑暗與恐懼。然而這個解放是由西藏人民自己完成的，

農奴及奴隸們渴望能為革命盡一己之力」⑧。

韓素音女士也歌頌社會主義下的西藏。她寫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她到西藏訪問的時候，「在拉薩市街上的警察沒有帶槍。沒有巡邏，也沒有宵禁。所有的村子都是開放的，沒有任何的管制」。當她停下來為三名在田地裏工作的西藏農民照像的時候，「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在西藏更能體驗出幾乎可以摸得到，摸得出來的快樂，真正內心的幸福；因為這個民族受到那麼多的壓迫與剝削，他們對這一殘酷的經驗記憶猶新」。靠著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在這裏所發生的歷史性的大事，是新階級的誕生，工人階級；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在社會主義時代，他們是領導階級。今天，一個新的願望產生了：變成工人！這種新的抱負，取代了神權的恐怖。我相信，西藏人一直渴望獲得機器」。對她而言，在此之前的西藏「是個充滿著最頑冥不化的蒙昧主義的地域，因為在那裏，凡事都是用惡魔、巫術、咒語及恐怖來解釋」。此外，韓素音女士也認為，其終極的原因「是極端可怕的宗教信仰這個『恐怖』的機構，這種恐怖讓我有著當我想到神權制度時，所感到的噁心與厭煩」⑨。

有關西藏舊社會的外國文獻微乎其微。不過關於一九五〇年前幾年時期的資料逐漸增加，因此我們可以逐步地把一部分的拼圖排出來。任何一位了解西藏，因而有權力做批評的誠實的人都同意，在二十世紀的西藏，仍然保存有很多封建社會的特點。在中國，在亞洲或其他洲的其他國家，不也是這樣嗎？然而要想了解西藏，非得先看一下佛教的教義不可。

佛教本身是一種和平的哲學。佛教信徒辛苦鍛鍊，以求超脫各種慾望；慾望是痛苦的最大根源。修煉的終極目的在究竟涅槃，肉體與心靈的崇高解脫。佛學大師阿里亞・德瓦曾經說過：

心靈上的痛苦折磨上半部，肉體上的痛苦折磨下半部，心靈上和肉體上的痛苦，無止境地煎熬著這個世界。

一旦達到涅槃的境界，任何的痛苦都不存在了。涅槃的最高境界是肉身成佛。成佛即可得大智慧。不過祇有極少數的人達到這個地步。對小乘教派的信徒而言，涅槃正果是個人的事業，他們修煉的目的，在求自我解脫。大乘教派則不同，他們認爲涅槃是大衆的事業，修得正果應該大家分享；達到了佛的境界，就要造福全人類。因爲這種眞福可以協助所有受苦的人得到解脫。第三種教派就是所謂的密乘，這一派認爲要達到精神上的解脫，就必須要有很艱深的精神修煉。他們採用的方法，非常類似印度瑜伽所使用的方法：意識的集中、冥想、入靜；這些都是要求毅力和決心的高難度精神鍛鍊。

佛教傳入西藏是西元第七世紀中葉的事情，主要是大乘教派及密乘教派。佛教一經傳入，立即得到吐蕃王室和上層貴族勢力的擁護，並且竭力開展了佛教西藏化的運動。佛教大量地吸收西藏民間對自然崇拜的原始苯教的神作爲自己的神，吸收苯教的儀式作爲自己的儀式，逐漸形成一種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也就是長期以來作爲西藏統治階級唯一正統思想而流傳至今的喇嘛教。不過，因爲藏族出家人叫喇嘛，就把藏傳佛教叫做喇嘛教，是沒有道理的。「喇嘛」在藏語中，和「和尚」在中文中一樣，都是「上師」的意思。中國佛教既然不稱爲「和尚教」，也就不應該把藏族佛教叫做「喇嘛教」。

藏傳佛教發展出許多教派，主要有格魯派（因其創始人宗喀巴及其弟子都戴黃帽，故又稱黃教）、

寧瑪派（因其紅顏色的喇嘛教袍，故又稱紅教，但是不是祇有寧瑪的教袍是紅顏色的，其他各派也有紅顏色的）、噶舉派（因其祖師爺曾服白棉衣，故又稱白教）及薩迦派（因其寺院用紅、藍、白三種顏色依次排起，以紅色象徵智慧文殊、藍色象徵武勇金剛、白色象徵慈悲觀音，故又稱花教）。從西元第十三世紀開始，隨著佛教的逐漸普及，成千的寺廟蓋了起來，也成爲座座的「寺院大學」。這些集宗教、行政中心的大本營擁有大片的土地，靠著爲他們工作的農民而活，在赤巴、喇嘛、活佛和珍寶之間，有著非常嚴格的階級劃分。在西藏密宗全盛時期，有幾十萬的和尙，他們有的常住在市郊的寺廟裏，有的常住在深山的廟裏；成千不屬於任何寺廟的雲遊和尙，則沿途托缽化緣。另外有些和尙則選擇了遠離凡塵，避入窮山峻嶺中的崖洞苦修的道路。

永不改悔的女遊歷家亞歷山達‧大衛—尼勒(Alexandra David-Neel)女士是幾位寥寥可數，跑遍整個西藏的西方人士之一。她對舊西藏的情形做了些珍貴的紀錄。她強調，在西元第二十世紀初期，在西藏依舊存在著一種「不嚴重」（她的用詞）的奴隸制度。那些奴隸已經變成大戶人家的用人了。至於具有無上權力的西藏宗教，她對西藏人的影響，也祇局限於類似蒙昧主義對人的影響力而已。

西藏的農民生活在信仰及令人有無名的恐懼的迷信的世界裏。碰上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轉而求助於巫師是很普遍的事情。這些巫師與早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薩滿式苯教是一脈相承。然而在密乘和薩滿教之間的分野，時常是模糊不清。西藏人認爲有不吉祥的靈魂在人身的周圍，因此，生病不是因爲受到外邪的入侵，而是因爲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無形無影的靈魂，從地球人的身上，偷走了「氣」的緣故。

西藏的法器有很多都是用人骨頭所製成的，當然這些都是從死人身上摘取的，而不是為法器而殺人的；也不是所有死人的骨頭都可以充當法器，只有某種特定條件下死去的人的骨頭才能做法器。有些喇嘛的唸珠，是由一百零八顆不同的人頭蓋骨琢磨串聯起來的。這位巴黎女士舉了個她親眼所見的例子說，有一天她和她的乾兒子楊登在前往拉薩的路上，碰到一位苦行僧從大袍裏掏出一只半個頭蓋骨向他們化茶。

長期以來，農民都向寺廟或是動輒要用人打傘的大小貴族借貸，他們也是農民的永久債主。差役及稅捐常常將人逼入困境，甚至絕境。賄賂的觸角，席捲全國上下。當一位西藏官員在境內調動或出差的時候，他所經過地區的居民要負責供養他、他的眷屬、他的僕人以及他的牲畜。此外該地居民還得從他們微薄的家產中硬擠一些財、物出來敬獻老爺。

不過，亞歷山達·大衛—尼勒女士也說，西藏是個充滿著笑容、歡樂、節慶和宴會的地域；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在那裏從來沒有人餓死，即使有，也是在人煙罕至，氣候極端嚴酷的地方。一個充滿著傳統及異常豐富的靈修的國度。

從她對西藏日常生活的描述裏，我們可以得知，西藏婦女在西藏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結婚之前，她們可以很自由地和異性來往。政治婚姻也是有的，不過如果她覺得對方不合乎她的要求，她可以拒絕這項婚姻。如果夫妻發生嚴重口角、不和，她也可以提出離婚。一般說來，都是女性掌握財政大權，家中的一切鉅細，都是她在管理、決定。在西藏可不像在中國貴族家庭一樣，婦女要纏足。中國姊妹足不出深閨，一年難得見到幾次外人，西藏姑娘都是可以自由進出家門。她們也不像回教婦女一般，要披頭巾。長久以來的印度傳統就要求，如

果不幸丈夫先死的話，妻子要和丈夫的屍體一齊火焚。西藏社會並沒有要求婦女如此「忠貞」。事實上，西藏婦女的社會地位，比男性還要高，以至於到現在還有西藏人幽默地說，在舊社會裏，男人勞力，女人勞心，倆倆相配，天衣無縫。

不論是窮苦人或是富有人，祇要他接受佛教的因果報應說（絕大部分的西藏人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對輪迴轉世之說發生疑問），他就相信每個人都在收他上輩子播種的果。根據這個說法，他知道在下輩子他將要回應他這輩子所做的一切好、壞事。信奉輪迴的人，往往很容易感到自足。也許，這是某一種程度的逆來順受吧！在輪迴的法輪輾轉之下，嫉妒幾乎是不存在的。

從西方笛卡爾主義的眼光來看，西藏佛教發展出一種特權社會。高級喇嘛是最高利益的既得者。他們很小心地維護他們在社會上的權利與影響力。舉個很明顯的例子：西元一九二〇年代，在拉薩、日喀則及江孜所開辦的世俗學校，就是因爲受到寺廟的超強壓力而被迫關門停辦。這些學校還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認爲英國式的教育對他的子民會有所益處，而下令開辦的。然而大部分的喇嘛都堅決反對任何可能改變西藏日常生活習慣的事情，也凶惡地敵視任何從國外來的影響。他們認爲這些學校危害到宗教。一九五九年隨家遷逃到印度的貴族千金林清達鈴說：「大寺院有著崇高的權力，有時候甚至連達賴喇嘛的計畫都受到阻撓而被迫放棄」[10]。

二、達賴喇嘛：傳統與現代

至於其他享有言論自由的西藏人，又是怎麼樣的一個說法呢？我曾經就這個問題請教達賴喇嘛，以他的看法，那些是舊西藏失敗的原因。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我的問題。首先他向我解釋，從小就被冠上達賴喇嘛稱號的孩子，如何失去自由地被限制在布達拉宮裏，而和外界完全隔離；和他同年齡的孩子們，卻在街上玩耍，在牧場看管牛羊。「當我小的時候，偶爾我也曾經想到過，如果我祇是個普普通通的人，也許我會過得比較快樂一點。尤其是在冬天。因為一到冬季，我的活動範圍就被局限在布達拉宮內的一個房間裏，從早到晚，就祇待在那裏；這樣持續大約五個月的時間。尊照傳統的要求，我必須要『避靜』，並且把時間花在背誦陀羅尼（即咒語、真言）上面。我那間房間很陰暗、很冷，而且老鼠成群！房間裏還有一股惡臭（回憶起這些兒時情景，達賴喇嘛情不自禁地莞爾微笑）。白天結束了，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都從窄小的窗口向外看。黑夜逐漸地吞噬了就在旁邊的色拉寺。我感到無限地悲哀。此外我的監護人，就是後來變成攝政的那一位，外表看起來很嚴肅，不苟顏笑。他老是跟在我身邊，而且總是繃著臉。在布達拉宮的前面，我每天都看著村民早上趕牛羊到野地，一天結束了，牧人也回家了。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快樂，那麼高興。他們邊走邊唱，小調旋律悠揚，聲聲入耳。也許他們很羨慕住在布達拉宮上面的我，然而，實際上，他們可不知道達賴喇嘛多麼希望能夠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西藏是不是一個封建的社會呢？「如果您從社會制度及社會上不同的層次來看的話，西藏是屬於封建制度。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過，在事實上，大體而言，那個時期西藏群體是很祥和的，很快樂。中國人老是在提農奴與地主，實際上，地主與他們的僱傭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應該算是不錯的。時常，這些單純的人有一種屬於地主的感受，使他們對地主忠心不貳。至於

地主，不祇是一般的地主，即使是寺廟也是一樣，他們有的認爲要向他們的僕人們負責。」

「至於以政策，以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的話，社會結構的確是落後，應該要有所改變才行。不過，既然社會環境一向和諧安寧，我認爲改革是需要按部就班地逐漸推行。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屬於封建制的。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達賴喇嘛就掌握了西藏的政治。在這方面也是一樣，情勢還沒有發展到非要立即改革不可的地步。改變是需要的，不過應該要順其自然，因勢利導。以我看，當時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現代化教育制度。在現代化的教育機構中學習、研究；建立現代化的學校以及和外界溝通的聯絡網，這些都是一等要緊的事業。我們需要工藝技術。如果我們擁有了這些，改變就可以水到渠成，絲毫不帶勉強：這是進化，而不是革命。」

「就整個社會而言，因爲沒有受過教育，所以民衆都是很無知。西藏人的荒唐無知，可以從他們自以爲西藏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這一件事情上可見一斑。中國人也這麼以爲，不過至少他們有點這個味兒。然而我們西藏人，八竿子也打不到一邊！您不認爲嗎？」達賴喇嘛注視著我，同時，他突然發出一陣爆笑，聲震屋宇，繞樑三匝。他的私人祕書丹增格其也在一旁大笑不已。

丹增嘉措也很樂意地接受談論西藏當時風行的賄賂問題。我向他解釋說，根據我和許多西藏人討論的結果，賄賂之風充斥整個西藏社會，由上及下，不分彼此，甚至連寺廟也不例外。有些賄賂是直接承襲帶有封建味道的習俗。譬如說，根據西藏人的想法，當一位重要的喇嘛圓寂後，重要的是找到他的轉世靈童：一個在他圓寂的時候出生的小孩。一旦這個小孩被認定是他的轉世，他就承繼他所有的一切。尋找轉世靈童的過程錯綜複雜，時常要透過求神問卜的，

我並不是要對這種完全屬於宗教信仰的問題提出質疑；可是在西藏，重要的喇嘛都有很大的宗教權力，有時候甚至擁有不可忽視的世俗權力。當然，在理論上轉世靈童可能出生在任何一種家庭，即使是最卑微的家庭；然而經過賄賂的點撥，不少的轉世靈童是在西藏貴族的大家族中「找到」的，從而保障了他們的特權與財富。

達賴喇嘛說：「賄賂是一定存在的，就像所有其他的人類社會一樣；不是嗎？不過在西藏，民衆有些特別的管道，可以和負責調查賄賂的人聯繫。」他說，在寺廟裏，有二種不同的賄賂方式。有些喇嘛放下傳授、考察住寺喇嘛神修的事業不管，而營營追求物質財富、地位及影響力。在這些寺院大學裏的另外一種賄賂則是比較可以原諒；爲了要維持某一定程度的宗教活動，也爲了避免堪布（即住持）的長期虛空，轉世靈童的找尋與認定，都是草草了事，沒有人認眞地去查問轉世的眞實性。達賴喇嘛還提到，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在寺廟裏，還存在有另外一種的腐敗現象。佛教教條已經不是那麼嚴格地被奉行了，以至於虛懸的重要職務，都交給了不夠格的喇嘛去負責。結果是那些具有權勢的喇嘛怠忽職守，轉而從事管理家庭財富，這和他們當初的剃度宏願大異其趣。西藏的赤巴或喇嘛從他們一開始披上袈裟就得同時切斷一切家庭、朋友的世俗關係。

「在某些寺廟裏，有些高級喇嘛的職務變得和地主的一樣，而不再是一個精神修煉中心所應有的。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祇聽到西藏人的神—王一聲長嘆。這種情形已經嚴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了，因此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一九二〇年，他圓寂的前幾年，重新考核每一位高級喇嘛的修業程度。所有經測試不合格的喇嘛都被撤職。

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呢？由於環境的壓力，情形大有改善。流亡在外的西藏社會，不斷地和外國文明接觸，終於適應了這個世界，也敞開了胸懷。至於留在西藏內地的社會，由於中國人的介入以及政治的迫害，深深地動搖了舊秩序，因此情形沒有什麼大的改變。然而這麼一種特殊的宗教該如何去適應這個現代化的世界呢？很多對西藏宗教有興趣、有研究的西方知識分子認爲藏傳佛教本身就是一種向現代性完全開放的哲學。她已經不再是陳舊過時的東西，也不再是阻礙人類解放或是社會融入的絆脚石。

至於我，我和不少定居在西方的西藏人談過，他們有些，極少的一部分，對於宗教活動還是一樣地執拗。有些迷信根深柢固，難以消除。然而這些迷信卻讓年輕一輩的西藏人發笑不已，甚至變成飯後茶餘的笑謔對象。她們講了有關一位住在巴黎，綽號叫「母老虎」的西藏女士的笑話。大家叫她「母老虎」，因爲在一九五〇年和六〇年代，她很勇猛地在西康和中國人戰鬥。有一次，她參加一位西藏郎和一位法國小姐的結婚典禮，每一次她要到廚房去時，她都很怪異地閃來閃去，繞過坐在大廳中央大吃大喝的客人，而且心神不定地頻頻偷看地上。大家對她的行徑感到納悶。她解釋說：「哦！是這樣子的，那裏，你們有沒有看到地面上的陰影？是這位客人的影子。他帶了一隻他自己殺的野雞來。他殺了生。你們看看他的影子，它是很不吉祥的。它會帶來災禍。一個孽業！」「母老虎」居然怕影子！

至於達賴喇嘛他自己，即使是在西元第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他的權勢不也是和中古世紀的神權君主一樣嗎？人們以和「教皇陛上」同等級的尊號尊稱他。當然，天主教教宗及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領袖的情形也都是如此，不過對達賴喇嘛的信徒而言，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西

藏人和喜馬拉雅山區的佛教徒最常用來稱呼他的尊稱是「益希諾布」（如意寶）、「袞敦」（陛下）、「嘉瓦仁布齊」（佛寶）、「孔撒橋」（無上至寶）。他的全稱則是「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希丹增嘉措師松旺久聰巴密白德白桑布」（至尊文殊語自在賢善智慧持教海三界統治無比俱吉祥善）。

「喔！是的！有時候他們表現出磐石般不可動搖的虔信。他們以爲我是萬能的。當我接見他們時，我發覺有些人是因爲生病而來的。他們帶著無比的期望來見我。可是我就一直對他們說：『你們應該要去看醫生』。偶爾也有人要求我對他們吹吹氣。他們認爲這樣就能治病。有時候還眞管用（達賴喇嘛自己笑了起來），有時候則不靈。時常，他們對我實在是抱著太大的希望了。」達賴喇嘛說，相信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是錯誤的。不過他本人相信轉世這回事，他解釋說，由於他的前世不斷累積下來的經驗，所以他有比別人廣博、豐富的知識以及某些特殊的能力。「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有時候，我的確可以紓解某些痛苦。有時候，祇要我對他們吹口氣就可以。有時候，他們帶著裝滿水的瓶子要我吹氣，然後他們再喝被吹過氣的水。有些時候還蠻有效的。不過我不是個很特殊的人，我祇是有些特殊而已。」達賴喇嘛又笑了起來。「正是因爲這樣，我知道很多的事情。此外，我小的時候很懶。當我和科學家們或是專家們討論的時候，他們都很訝異地發覺，我所知道的並不亞於他們所有的專業知識，而紛紛向我道賀。我想這是我上幾輩子修來的正果。」

佛教和科學是否可以相容而不排斥呢？一定可以的。這二者的和諧團聚，很可能就是藏民族得以繼續生存的關鍵。「我的經驗，以及我和科學家們討論所得到的結果顯示，在某些方面，佛教與科學之間，沒有任何的衝突存在。在其他的方面，佛教先於科學，這是另外一回事，不

過，總體而言，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不論如何，佛教祇是一種精神上的修煉。目前有很多的研究員嘗試從宗教活動的親身體驗中來解釋佛教。此外，如果兩者之間發生了衝突，尋找解決之道就是我們的職責。這樣，這個世界就會像某些佛經上所說的無爭。在這些方面，我們就必須接受科學合理的解釋，而揚棄佛經。佛陀本身對這點有很明確的指示：『你們應該按照實際的操作，按照你們自己的經驗來跟隨我的教誨。祇有在你們眞正信服了它的眞實性之後，你們才可以接受它。』這樣，菩薩親自賦予我們對他的教誨提出質疑的權力，做實際考察的權力。因此，如果我們證實了科學所提出來的證據和經文上所說的相互衝突，這段經文就必須要捨棄。我向我的信徒們解釋說，如果科學家能夠在他們的實驗中證明轉世的不可能性，我們也應該放棄輪迴這個觀念。」

問題是，當達賴喇嘛提出這些具有革命性的觀點的時候，他的信徒們有些什麼樣的反應呢？他再度失笑。「每一次我去訪問寺廟，我都對喇嘛及高級僧侶們說：『我們必須要增開科學、西方哲學及西方心理學等課程。』這些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在印度，我們還沒有備齊應有的設施來推展這件事。不過這一天終究會來臨的。我向他們解釋說，與其教授諸如印度古宗教這類不再存在的哲學，我們應該要研究現行的傳統：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以及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科學。我們必須要了解對這個世界的科學解釋。不過有時候，有些上了年紀的宗教長老表現得非常固執。我還記得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那一天。他們不相信，他們很懷疑這件世紀性的大事。（房間又一次充斥了達賴喇嘛和他的祕書的暢笑聲）我深深地嘲笑他們，並且對他們說：『也許你們應該派幾個代表陪著這些太空人一起上去。從高高掛在天穹的月亮上面，你們就可以親

眼證實這個地球是圓的！』」

經過一番暢笑，達賴喇嘛的祕書丹增格其調皮地看了我一眼說，達賴喇嘛本身就是個由人創造出來的產物。到那一天，人們不再需要他的時候，他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達賴喇嘛世系就此終止。在這個時期還沒有來臨之前，現任的達賴喇嘛想要在寺廟的殿堂中，誘發出另外一種改革：他說改變達賴喇嘛遴選制度已經是有絕對的必要了。從西元一三九一年出生的一世達賴喇嘛根敦朱巴開始，遴選儀軌就沒有改變過。當他圓寂後，西藏喇嘛四出尋找他的轉世靈童。這個程序比前面所提及一般活佛的轉世靈童的尋找，認定程序要複雜的多。這些查訪一般耗時數月甚至數年，才能找到在他的「前生」圓寂時出生的小孩。為了要找尋這個轉世靈童，活佛們求神問卜，一般說來，在上一代達賴喇嘛圓寂後，高級喇嘛們根據其臨終前的某種暗示，並且請專門降神的乃均（護法神的化身）指點，派人四處查訪。初步找到的「轉世靈童」要經過各種測驗，尤其是讓孩子們去辨認老達賴喇嘛生前用過的物品。從清朝開始，則要再經過「金瓶掣籤」的鑒別，才能獲得最後的認定。清朝乾隆皇帝為了要確定達賴、班禪兩名活佛的轉世候選人，乃於西元一七九三年諭令頒布「金瓶掣籤制」。在北京和拉薩各置金瓶一只，候選人的名字用滿文、漢文和藏文書寫，同生辰時間在兩處金瓶各放一份。作了典禮儀式後，然後抽籤。假定兩瓶抽出來的籤都一致，說明候選人無誤，可以獲得最後的認定。於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西藏東北的安多（青海省）的平安縣普通農民家裏的丹增嘉措，也是在這種程序下被選出來的。不過他是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下令「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選上丹增嘉措好像是西藏人民的福氣：他非常明智，他要改革西藏社會，以便可

以繼續生存。問題是，萬一下一代的轉世靈童是個白痴怎麼辦？那將是所有西藏人的悲哀！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說過了，達賴喇嘛制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也可以到此爲止。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願。如果這種制度持續使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保留原有的傳統儀軌，還是要選用新的規矩。事實上，是有好幾種可行的辦法。其中一種可能是遴選一位經過驗證，足以取代我的喇嘛。爲什麼不呢？另外一種辦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產生一樣。當他圓寂時，最有資格的最高經師群，共同開會決定。如果我們決定採用第一種方法，我將在有生之年選擇我的繼承人。這會是一件很好的措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達賴喇嘛再一次地笑了起來）。我聽說在日本佛教禪宗寺廟的住持，在圓寂時，留下遺囑選定他的繼承人。這樣做可以使有意思角逐這個職位的候選人對他更加勤奮、忠心。不過，當我和其他的喇嘛談及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之中有些覺得非常震驚，而對我說：『哦！您不應該說這種事。達賴喇嘛承繼的方式應該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續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們大可抗議，我可不會因此作罷。」

三、漢藏關係：獨立自主與相依互存

中國人對「西方的寶藏」的覬覦由來已久，豈是一九四九年才開始的。早在中華民國創立之前（西元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西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已經或多或少地認爲西藏是中國的版圖之一，然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政府還是沒有辦法，也沒有時間在雪域行使主權。此外，我們也得曉得，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遵守她自己在一九五〇年以前一再重申的立場。中共在一九

二一年成立後不久，就在黨第一次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爲「民主聯邦」。在這種政體下，中國將成爲「中華聯邦共和國」。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大會認爲，如果不承認民族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一九三一年的時候，他們的口號更爲明顯，因爲中共中央蘇區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明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⑪。不過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槍桿子裏出了政權，把中華民國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中共就完全改變既有的說法。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在劉少奇所提出來的憲法草案中，就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統一，而且多民族的國家；所有的地區及自治區，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政府就很積極地在歷史古籍當中，企圖找出可以證明他們在世界屋脊的合法性的資料。北京的論證簡單得不可思議：西藏從第十三世紀正式投入中國的懷抱後，就再也沒有離開中國。西藏獨立的問題，是外國帝國主義爲了要打擊削弱中國的勢力，以及一小撮想要重建封建制度的西藏反動分子所製造出來的怪物。中國政府有著可以回應一切問題的答案，甚至對歷史上不明不白的事件亦然。一九八九年新華社對全世界所發布的消息，即其著例。根據這則報導，一群研究員在實驗室裏發現足以在科學上證明西藏人是屬於中國漢族的人種基因相似性。有很多身在國外，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西藏人，以及生活在西藏甘冒生命危險，而敢大聲疾呼的西藏人，都反對中國的這種說法。對他們而言，他們的國家向來就是，也永遠會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他們相信，總有一天正義之神會戰勝惡魔的：中國人將全部離開西藏；西藏人將重新和平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園。這場爭論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的悲慘事

件所引起的。如果中國和西藏沒有辦法獲得長期性的妥協，這個論戰是不可能平息的。這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以至於在敵對的雙方均迸發出偏執而不能容忍對方，甚至轉化爲暴力。我們甚至沒有辦法和中國人或是西藏人心平氣和地談論這件事。對想要了解這個問題的人來說，歷史是唯一的裁判。

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所碰到的第一個困難，卻是語義上的問題。事實上，在以前的中國和西藏，「獨立」、「主權」、「宗主權」這些西方的名詞代表些什麼意義呢？這些在亞洲不存在的觀念，是從第十九世紀的時候，才由英國殖民勢力所引進的。不過我們卻想再往深處瞧瞧。

如果那一天，你們有機會碰上中國人，你們可以問他看看，請他解釋爲什麼西藏屬於中國。一般有兩種可能：假使他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公民，我們可以打賭，您的問題讓他萬分尷尬。您可以毫無困難地看出，他根本不把西藏放在心上，而且這是個他根本不了解或是幾乎完全不了解的地區。「是的，西藏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是我們國家的少數民族之一。」：這就是您在和中國人客套之餘，對這個棘手的問題追問不捨所能得到的必然答覆。他也可能會對您說：「幾百年來，西藏就是屬於中國的；況且我們的歷史課本上都是這麼說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形，不然您是不可能再繼續問下去，也不能滿足您的求知慾。

不過幸運的您，也許會碰上第二種可能：您就像在黑暗中行走，忽然找到一線曙光：您的談論對象是個曾經對這個問題，下過一番思考工夫，而且他也知道在中國正史上，有關於西藏的記載，有很多都是虛假的。我們可以聽見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公開對他們的政府就中國對西藏的監護問題提出質疑。當然這一類的中國人爲數並不算多，不過他們已經不再是特殊分子了。

現在，有很多中國學生會對您說，西藏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民一樣，有民族自決權及自由的權利。主張如果西藏願意，她有權宣告獨立的中國不滿分子已經不再是稀有動物了。在海外華僑中，有很多仍舊堅決反對西藏獨立，不過也有不少華僑認爲，藏民族應該有民族自決的權力。

一九八九年八月的一個夜晚，我到一家定居巴黎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是藝術家的家裏做客。我抓住機會，把話題轉到西藏上面，開始和老太爺談論有關西藏的種種問題。在這裏我不能洩漏這位老先生的身分，我祇能說，他是位六十餘歲，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的歷史學權威。這位滿臉飽嘗風霜的老先生在「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才來法國的。在談話中，我突然問他：「到底西藏屬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經過片刻的沉思後，他回答說：「您知道，答案是很明顯的，西藏在歷史上並不屬於中國。官修的歷史，諸如在學校中教給大、中、小學生的歷史，在官方報章雜誌上讀到的歷史，都確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於不斷地被洗腦，中國民衆也就信以爲眞了。不過我們祇要看看事實就可以明瞭的。現在我人在法國，我的精神不受到任何的政治壓力；在中國，我永遠也不會用這種方式回答您。即使我們是避開耳目單獨相處。」

對那些堅持認爲，從第七世紀以來，西藏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中國人，我有時候實在很想提醒他們，在他們引以自豪的國家燦爛光耀的歷史上，有一時期的皇帝們有把任何一個派遣使臣或是代表到他宮廷的國家，也不管人家爲什麼，都一概以藩屬附庸對待的嗜好。在這種皇家怪癖之下，連英國、梵第岡、荷蘭、沙俄及一些亞洲國家，都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中國的附庸。

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依然大量發行「參考書」，指引對西藏一無所知的外國旅遊客，以及中國

民眾，除了對中共在西藏所創造的共產奇蹟加以歌功頌德之外，這些中共忠誠的僕人對屬於中國的西藏在歷史背景中做了些什麼闡述呢？另外，和他們唱反調的西藏人以及西方人士，又是如何引經據典地來證明當時的西藏是獨立的呢？

根據北京政府的說法，漢族和藏族從隋朝（西元五八一～六一八年）就開始建立了「友好」關係，這份關係經過幾個世紀的長足發展，變得更加穩固。最能代表中國和西藏聯盟關係的，就是西元六四一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吐蕃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民族聯姻。文成公主帶著大批的書冊（書典、術數、工藝、醫方、配劑等）、工匠、醫等到拉薩。這位文成公主為西藏帶來了「文明」。素來享有盛名的某一家中國出版社卻很令人遺憾地肯定說，從這次的民族聯姻產生了「漢、藏兩族間長時期的親密關係」[12]！

然而這個政治聯姻真的具有如此特殊的意義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的大部分歷史論文，都很奇怪地一起忘記提到，這同一位吐蕃王和尼泊爾公主的另一樁婚事。此外，這位統一西藏（吐蕃）的松贊干布至少有五位王后。更何況中國皇室的史官在史書上記載說，當時的吐蕃是亞洲勢力最強大的幾個國家之一，也是中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如果這次的聯姻能夠證明某些事情的話，它顯示出當時吐蕃王的威望與聲譽：要求和中國皇帝宗室女成親，並且得到天子的同意。

西元第八世紀的西藏，在亞洲的威望甚高，甚至在西元七六三年進兵中國，佔領唐朝首都長安（西安）：這也是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時常「忘記」提到的事件。中國官辦報紙也祇是很籠統地承認：「在漢藏關係史上，我們也偶然可以看到一些衝突，甚至給雙方極端渴望能夠和睦相

處、安居樂業的人民帶來災難爭戰。」⑬

事實上，中國在唐朝（六一八～九〇七年）是文化、藝術的黃金時代，吐蕃在赤松德贊王（七五五～七九七年，金城公主的兒子，也是派兵攻占長安的贊普）及赤熱巴巾王（八一七～八三六年）時期，則達到軍事顛峯，其勢力範圍向西越過帕米爾，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區，向北到土耳其斯坦，向南緊靠尼泊爾，在東方，中國境內的甘肅、四川曾經有一陣子被吐蕃佔領。中國和吐蕃於西元八二一年簽訂了和約。接下來就是蒙古征服者，在第十二世紀時，建造了人類史上罕見的大帝國。

蒙古皇帝，尤其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逐漸把他們的勢力擴展到吐蕃北部、朝鮮、然後到南宋的中國。中國於西元一二七七年被蒙古人征服，吐蕃則於西元一二五三年被蒙古人征服。蒙古的勢力一直擴張到西伯利亞，到緬甸北部、安南。蒙古人向西藏人學佛，並且加以發展，使佛教很快地取代了西藏高原原有的民間信仰苯教。從那個時代開始，在兩大勢力之間產生了一種可以說是「帝─師」的特殊關係。根據這個關係，達賴喇嘛變成了中國皇帝的精神導師，同時也接受中國的世俗保護。

西藏人認爲，這種關係在不久之後，就變成持續到第二十世紀的漢藏關係的基礎。這不是什麼領土主權，也不是什麼軍事征服，這種關係主要是精神上的關係。不過西藏還是被元世祖忽必烈所征服，然而很快地又於一三五〇年脫離蒙古重獲自由。雖然如此，西藏和蒙古在宗教上，一直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從某些方面來看，在元朝（一二八〇～一三六七年）時，這種特殊的「帝師」關係仍舊存在，不過到了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三年）時，就不能夠說雙方之間還有這

種關係的存在。

對這一時期的歷史做一深入的研究，是有絕對必要的，因爲中共的史學家們，把西藏屬於中國祖國的證據，追溯到元朝的入侵。「西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統一中國，建立了元朝。隨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採取了一連串重要的措施，以強化西藏的行政制度。」按照北京對歷史的詮釋，西藏就這樣永遠地歸屬中國。把蒙古人說成是中國人，本身就是很虛假奇怪的事；何況忽必烈一直到最近幾年才被中共升格，奉爲「民族英雄」。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知道，雖然中國已經在一九六〇年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主權，北京政權可從來沒有放棄整個內、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想法⑭。

他們也解釋說，中國皇廷在西藏設立了驛站與軍營，並且派了天朝官員入藏。元朝派遣了部隊和巡撫到西藏，以管制「地方政府」及西藏行政人員。這種關係在明朝時，不但繼續存在，而且更加地強化。他們尤其強調這一點：「根據明代禮部的統計，在一四五〇年代，每年約有三到四百名西藏人到北京向皇帝獻貢，在一四六〇年間，其數目達到三千到四千人。」

可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卻宣稱，所有的這些，在西藏的史籍上並沒有任何的記載。對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而言，中國所說的這一段漢藏關係史，充滿著胡言與妄想。他們說，在明朝的時候，漢藏關係非常冷淡鬆弛，中國皇帝對西藏也沒有什麼興趣。不過在明朝敗亡，滿清建國（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後，在精神上的關係，卻相當密切。清康熙皇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率先邀請一位達賴喇嘛到中國訪問。漢人的中國和西藏有數百年之久不相往來，藏人和滿人卻互相尊重、好奇。

這次歷史性的訪問，並不是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史上所說的一樣，是西藏領袖來朝入覲中國皇帝，是騎士來到領主的城堡裏下跪。中國天子本人也沒有任何的意願，要他的貴賓像普通臣民、外國使節一般地向他行三拜九叩首。相反地，爲了表示清廷對五世達賴喇嘛的敬意，中國皇帝親臨遠離北京二十公里的地方迎接。當五世達賴喇嘛於一六五三年（順治十年）抵達時，康熙皇帝下御座親迎賓客。兩位君主平起平坐，飲茶論事。總而言之，這次的訪問，是「帝—師」關係很優雅的示範表演：一種存在於精神導師和弟子之間的關係，前者提供了精神上的和平，後者提供了世俗上的保護。

一七二〇年，清軍進入拉薩。根據流亡藏民所言，這些士兵一方面是來驅逐入侵的蒙古人，一方面是來保護七世達賴喇嘛的。不過他們是伴著一批被派來負責重新組織西藏行政制度的中國朝臣。北京認爲，這一段史實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由噶廈及噶倫所領導的西藏新政府，受到北京宮廷的二位代表——案辦（即駐藏大臣）所節制。此外，清廷也派遣了數百名的駐軍，長期鎮守拉薩。駐軍人員有時候甚至達到千人。

丹增嘉措反駁地說，這些駐藏大臣的主要任務是把西藏的情形傳送給滿清皇帝。達賴喇嘛還說，對北京的宮廷而言，這項措施旨在「監督」西藏的防衛，尤其是對蒙古人入侵防患於未來的必要措施。在第十八世紀末葉，中國的駐藏大臣逐漸演變成噶廈政府的顧問，從而履行高坐北京的皇帝對達賴喇嘛及其子民在世俗上的保護責任。然而他們從來也沒有直接參與噶廈政府的各項工作與決策。

相反地，中國現在的政府卻認爲，從一七九三年開始，中國清廷的代表賦有很大的決定權。

他們的地位不但是等於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位於噶倫們的上首；而且直接指揮這些噶倫。他們在西藏的外交政務上，也同樣地擁有無上的權力；噶倫們沒有和外國列強私人通信的權力，他們來自國外的信件，全部都經過駐藏大臣的郵政檢查。此外，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及一些重要活佛轉世靈童的選擇，必須要經過北京天朝的認可才算數。

要一位外國的觀察者在兩個世紀後的今天，在獨立自主與相依互存之間釐清一條界線，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一七九二年，當清乾隆皇帝（一七三六～一七九六）揮兵入藏趕走入侵的尼泊爾軍隊時，西藏的外交政策，好像是暫時由北京所控制。滿清政府在西藏推行了一連串重要的行政改革；他決定西藏和外界的關係，造成了一個世紀來，西藏的門戶閉鎖，禁止外人入境。在乾隆晚年，西藏幾乎是完完全全地跟著中國亦步亦趨。中國宮廷甚至在拉薩鑄造以漢文、藏文書寫「乾隆・五十七」字樣的銀幣。很奇怪的巧合：在流亡藏民中，找不到這些銀幣。

麥克・凡・瓦特・凡・布拉格(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曾經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國際公法顧問。以他這種身分所發表認爲，當時的滿清帝國在西藏擁有「霸權」的說法，應該是不會被批評爲親中國的言論。不過他緊接著說，西藏可從來沒有因此而失去獨立的主權。「從一方面來說，西藏政府接受清廷皇帝廣泛的霸權，而且由於皇帝的威勢，有些駐藏大臣在拉薩很有影響力。從另外一方面來說，西藏人自己並不認爲他們臣屬中國皇帝，也不直接受命於他。他們對於中國駐藏大臣干涉西藏內政的問題非常敏感、忌諱。」[15]對於中國和西藏關係史上這一段敏感，但具有決定性的時期，梅林・郭世丹(Melryn C. Godlstein)也發表了一些意見。這位美國歷史學家兼人種學家對西藏有特別的研究，他的看法對我們是很有幫助，也很有意義

的，因爲他的言論時常遭受到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及其擁護者的批評，他的說法應該不會被打成反中國的言論才對。他認爲，即使是在第十八世紀初葉，清朝最強盛的時期，「中國的宗主權從來沒有形式化過，而且也沒有任何的條約或是其他和談來確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他解釋說，在那個時代，「西藏成爲中國的保護國，然而西藏的官員是用他們自己的法規來治理西藏；他們向西藏人民負責。」這位歷史學家還說，在這之後，「滿清政府的勢力，在第十八世紀以降，每下愈況；而且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攻擊而自顧不暇，她在西藏的霸權也就變得愈來愈是單純性象徵而已」⑯。

隨著乾隆皇帝的駕崩，北京政權開始急速衰敗；滿清朝廷不想，也不能履行對西藏保護的責任。從這個時候開始，清兵再也沒有到西藏援助受到鄰國，尤其是尼泊爾侵犯的達賴喇嘛。駐藏大臣也變成祇是象徵性的虛職；中國常駐拉薩的軍隊，也變成祇是象徵性的虛職；中國常駐拉薩的軍隊，也很快地祇剩下數百人而已。其中大部分是在西藏出生的漢藏混血兒。北京在西藏的權力變得徒有虛名的空殼，而讓西藏人重新取得在拉薩的全部政權。

在第十九世紀末和第二十世紀初期，西藏成爲中國、英國及沙俄三大敵對勢力競爭的賭注。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一八七六～一九三三）在一八九四年時，從滿清政府手裏取得了精神和世俗的完整權力。英國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以「商業任務」的名義，在西藏南部發動短暫但是猛烈而且喋血的軍事攻擊。由三千名英軍組成的「護衛隊」，於八月三日攻進拉薩；北京並沒有理睬西藏的求援。中共的歷史學家認爲，當時的中國政府在保衛「自己」疆土的義務上嚴重失責。北京的御用史學家們承認「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開始互相猜忌，從而使北京和拉薩

間的關係嚴重惡化」[17]。

西藏部隊很快地被英軍打得潰不成軍，西藏政府終於在英國政府的脅迫下，於九月七日和英國簽訂了條約。這是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大事件，因爲〈拉薩條約〉是個純雙邊條約。倫敦承認西藏實質的獨立地位，拉薩則保證，在要和其他外國列強簽訂條約之前，先得到英國的同意。滿清朝廷外事局拒絕了英國所提出要中國在這份否認中國宗主權的條約上聯署的要求。北京提出抗議，並且發表宣言：「英國人不應該直接和西藏簽約，因爲此類條款侵犯了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

經過一段漫長的協商後，中國和英國終於在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簽訂了協約，即〈中英續訂藏印條約〉。這份協議即不承認中國的主權，也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所獲得的祇是不列名在需要經過英國允許，西藏才能與之簽約的外國列強名單之中。此外，協議書也同意中國皇帝有權力維護西藏領土的完整。在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英國和沙俄所簽訂的〈英俄彼得堡協定〉中，則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倫敦和莫斯科互相保證不侵犯西藏領土的完整，也不干涉西藏的內政。簽約雙方必須經過中國，不然不得直接和西藏進行任何的磋商。

一九〇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廷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千名川軍侵入拉薩。當時的幫辦大臣溫宗堯保證清兵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然而中國的史學家們卻說「川軍進入拉薩後，大肆擄掠，並且把整座城市弄得天昏地暗」[18]。這件事造成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逃離西藏，往印度安身。幾個世紀以來，所有北京的武力干涉，沒有一次是違背西藏的意願，而悍然出兵的。一九一〇年的軍事行動是滿清政府對西藏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

次武裝侵略。不過他們沒有時間在拉薩安頓下來，因爲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推翻了滿清。對西藏而言，這是斷絕所有和北京關係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西藏這麼做了。

西藏政府的第一步，就是在一九一二年夏季驅逐包括案辦在內的所有居住在西藏的中國人。最後一名中國士兵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離開西藏的首都。二月十三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正式宣告西藏獨立，並且要求把這個消息傳達給西藏全國上下：「我們是個宗教性的獨立小國。爲著要能適應外界，我們必須要自衛。鑑於最近幾次的外國侵略，我們的人民很可能還會遭遇到某些困難，我們不能畏懼這些困難。爲了保障與維護我們國家的獨立，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堅忍不拔地辛勤奮鬥。」⑲

一封封尋求國外支持的信函送往印度、英國及沙俄。此外，西藏亦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一日和甫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告獨立的外蒙古簽訂〈友好同盟條約〉。十三世達賴喇嘛還下令鑄造屬於他們自己的錢幣，發行他們自己的郵票；這些一直通行到一九五九年。西藏也有她自己的國旗。

從一九一一年開始，西藏所發行的錢幣上祇鑄有用藏文書寫的「西藏政府」字樣，而不再有任何有關中國的資料。隨後，西藏也發行紙鈔；早期紙鈔上的編號，是用手書寫的。雖然西藏早在一九一二年就開始印行郵票，然而她卻沒有加入國際郵政組織，因此，他們的郵票祇能在西藏國內使用；要寄到國外的信件，必須要到印度邊界，貼印度的郵票。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中國、英國和西藏三方代表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Simla)，舉行爲解決中、藏長期以來邊界紛爭的協商會議。由於這個協商，西藏在邁向獨立大道的歷程上，再

度向前跨進一大步。三方面的代表團，都是由各國政府的全權代表所率領。英國全權代表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提出可讓中、藏雙方保留面子的妥協：中國保證尊重西藏的完全「自主」，中國在西藏依舊擁有「宗主權」。中國在西藏所擁有的，將不再是「主權」了。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三方代表終於簽訂了草案。

西姆拉會議把西藏分成兩個區：在東北的「內藏」，即康區，和在喜馬拉雅高原中部及南部的「外藏」。中國可以在內藏繼續擁有某些影響力，可是必須要避免干涉外藏的行政問題。中國在拉薩祇能有一位最多祇能有三百名護衛隊的代表。英國方面則賦有直接和西藏談判有關於邊界和商務問題的權力。北京代表簽了草案，但是中國政府在第二天就拒絕這份草案；一直到今天，中國政府仍然宣稱西姆拉條約無效。

下面是中國正史有關這一段史實的片段記載：「在一九一一年，中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腐敗的滿清政府。這些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西藏人）利用中國中央政府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管理邊疆地區的機會，犯下了叛變中央政府及阻礙全國統一的罪行。他們驅逐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代表，無情地謀殺了一大部分爲了捍衛國家統一而辛勤奔走的藏族愛國人士。」

達賴喇嘛向我講了一個他認爲可以完全證明，西藏在一九五〇以前是個獨立國家的證據：在西藏史上，後藏從來沒有向北京政府繳納過任何一分錢的稅。中國境內的其他地區以及臣屬於中國宗主權的藩屬，則有納稅的義務。「在西藏，有些受中國行政管理的地區有向北京納稅；不過以面積而言，佔地最廣的中部西藏，則從來沒有納過稅；在將近二千年之間，從來沒有納過稅。我認爲這個意義非常明顯。」達賴喇嘛很扼要地解釋。

他繼續說，在歷史上，廣大的西藏曾經遭受過不少嚴重的內訌，每一次內訌，中國都坐享漁利。「有時候由於沒有中央權力，西藏同時有好幾個藏王。這種情勢造成了某些地區的喇嘛迫不及待地向中國皇帝投懷送抱，以便取得高位，或許還可以得到一些賞賜與支持！」達賴喇嘛接下去說：「不過就藏族人民而言，所有的人民都認爲，他們是藏族團體，而不是中國團體。他們和中國是不同的種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即使國民黨政府遭受到先是抗日，接著是剿共的連年戰亂而衰弱不堪，她可從來沒有放棄中國在西藏擁有主權的原則。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十三世達賴喇嘛本身，以及在他圓寂後的攝政與噶廈政府，也從來沒有停止對外宣告西藏獨立。

西藏政府於一九四二年宣布成立外交局。爲什麼會拖到這麼遲呢？西藏政府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能夠運行的外交機構，正顯示出西藏政府的主事者，缺乏經驗，輕易地放過了千載難逢，也是中國武裝侵略前的最後一個可以讓外國政府承認西藏獨立的機會。一個所有成員均持用西藏護照的西藏商務親善代表團，於一九四七年離開拉薩，前往印度，然後飛到美國。華盛頓在接待代表團的同時，表明了美國政府無意讓自己的做法危害到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代表團於次年抵達英國，受到英國政府的盛大歡迎。

這是西藏政府想要和外界建立積極外交關係的最後衝刺。不過，面對著缺乏經驗，又因爲沒有政治意識而令人困擾的西藏行政制度，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都猶豫不決。可是西藏已經沒有時間走出離群索居的生存方式了。因爲西藏已經是強鄰壓境。不到一年的時間，毛澤東即率領

著共產黨的戰鬥部隊，打進了北京市中心的長安大街。幾乎是在同一時刻，北京無線電台宣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外國的侵略均不能忍受；藏族人民是中國民族不可區分的一部分。所有拒絕承認這一點的侵略者，將會遭到人民解放軍鐵拳的當頭猛擊。」

至於我們，我們對於許多藏人認爲西藏是獨立的爭論不予置評。我們認爲應該讓看過上述史實的讀者們，來判別孰是孰非。不過有一點我們還要做一補充說明。就是即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正式承認西藏的獨立，然而在一九一一年時代的西藏，擁有獨立國家所享有的各種主要特權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此外，儘管美國政府的官方態度猶豫不決，美國中央情報局有一份在一九九二年才被列爲非機密文件的祕密報告中卻承認西藏在歷史上具有獨立國的特性：「從歷史上而言，西藏是獨立的。這是國際法學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對西藏在法理上的地位所做的調查報告中所承認的事實。獨立這個遺產，以及西藏國家地位的強烈意識，構成西藏地下抵抗軍的潛力。」佛士哥‧馬海尼(Fosco Maraini)則認爲，漢族和藏族這兩種民族，「在史前時期具有相同的根是不容否認的」，然而「在我們所能知道的將近十五個世紀的西藏歷史過程中，除了某些特定的時期之外，這兩個民族在文化上、宗教上，尤其是在政治上的差異不斷地擴大」。這位義大利藏學專家下結論說：「終於發展到目前的情形。二種外形與語言極爲相似的民族，在想法上，在人生觀及世界觀上，總而言之，在所有構成一群人、一種人種、一個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財富上，沒有絲毫的雷同之處」[20]。

註釋

①*Le Tibet hier et aujourd'hui*, Beijing Information, Beijing, 1984, p. 19-20.

②*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Beijing, 1989, p. 38.

③*Tibet: Myth vs. Reality*, Beijing Review Publications, Beijing, 1988, p. 38-39.

④同上，第四〇～四一頁。

⑤同上，第四一頁。

⑥John F.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Wisdom Publications, London, 1985.

⑦Israel Epstein, *Tibet Transformed*,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3. p. 35.

⑧瑞士雜誌 *Femina* 記者採訪，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⑨Han Suyin, *Lhassa, étoile fleur*, Stock 1976, p. 34.88,115,116.

⑩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1970, London, p. 71.

⑪Pierre Gentelle,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in L'Etat de la Chine, La Découverte, 1989, p. 287.

⑫*Pékin Information*, 一九八三年六月。

⑬*Le Tibet hier et aujourd'hui* 同前書。

⑭根據內蒙古中國祕密警察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所發出的通報，內、外蒙古甚至蘇俄的布里亞地都是屬於中國蒙古地區。路透社曾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刊登部分通報。

⑮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87, p. 19.

⑯ Melvyn C. Godlstein, in *The Dragon and Snow Lion: The Tibet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⑰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同前書，第一七頁。

⑱ Wang Furen and Suo Wenqing, *Highlights of Tibetan History*,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4.

⑲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同前書，第四九頁。

⑳ Fosco Maraini, *Tibet secret*. Editions Arthaud, p. 324.

第三章 毛澤東主義者之狂亂

一九五九年中國在西藏所採行的高壓手段，產生了毀滅性的作用。然而禍不單行，更慘的事接踵而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是西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一九六六年，當毛澤東受到懷疑，而且在中共中委會中，眼看著就要淪爲少數派的時候，毛澤東發動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利用中國年輕人，再度取得了失去的權力，中共的破壞行爲，在往後的十年動亂中，達到頂峯。西藏遠遠比中國其他地區遭受到更嚴重的摧殘。這個破天荒的災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偉大的舵手」死後，依舊餘波頻頻。如果文革對中國而言，是個破壞性的暴風雨，文革對西藏來說，卻是一場針對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全面性的戰爭。這個衝擊是如此的劇烈，以至於西藏及其人民可能永遠也不會再度陷入類似這種切身經驗的慘狀。在毛澤東死後十八年的今天，文化所造成的恐懼，還是很明顯地可以感覺得出來。一波波成千的紅衛兵，有些甚至祗有十五、十六歲，瘋狂般地攻擊西藏的宗教與傳統，整個西藏幾乎被他們葬送。西藏是瘋狂、致命的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拿文革的事去問問您的朋友，或是您所認識的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藏人，您一定可以從他們的反應中，看出他們是多麼地憎恨文革。大部分的人不是親身經歷過，至少也看過幾

樁極爲恐怖的場面；祇要沒有證人在場，他們認爲有責任，也很樂意向您一一細數。年過不惑，住在城裡的中國老百姓，幾乎每一個在文革期間都受過或多或少的苦痛。有好幾次，我在有意無意間被文革期間家庭慘遭折磨的中國人，當成證人般地大吐苦水。大部分的情形是他們向我訴說他們最痛苦的回憶，間雜著幾聲大笑；您知道，中國人碰上尷尬的事情，或是很爲難、不自在的時候，總是會乾笑兩聲打發過去。

中共或是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所做的聲明，並不比他們的官方報社的報導要坦率。以政治局爲首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是中國政治路線的機構；他們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對毛澤東的豐功偉業做一重新評估。他們批評毛澤東在晚年期間，犯了一些「嚴重錯誤」。北京政府承認文革是中國全國性的大災難，把整個國家搞得亂七八糟，並且在已經落後多多而且困難重重的經濟發展的坎坷道上，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然而在公開承認文革爲害的程度上，中共則依然遮遮掩掩。西藏及中國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區所遭受的迫害與破壞尤其劇烈。中國政府控制的大衆傳播工具，一向就是祇零星地報導有關文革期間的惡行。除了一些充滿著統戰口號的言論之外，很少有對文革在中國及西藏的迫害與破壞程度的論文。在中國，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公審還沒有開始；然而這庭公審卻可以一勞永逸地驅散糾纏依附在北京及全國各省、區權力圈的惡魔，西藏則更不用提了。

鄧小平政權把毛澤東的遺孀江青判了死刑，不過很快地又減爲無期徒刑。因爲在中國，除了極爲少數的特殊例子之外，即使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失勢領導人，也不會遭受到像小平民一樣的命運。在官官相護之下，他們都被妥善安排，住進金監獄安享餘年。雖然自身也是毛澤東

的受害者，鄧小平及其同路人可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要放棄毛澤東主義思想。因為他們了解得太清楚了，一旦毛澤東主義思想消失了，中共在中國的權勢以及影響力，即將隨之雲消霧散，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岌岌可危，前途難卜。他們想要掩飾文革最黑暗醜惡的一頁的強烈意願，促使他們硬是用嘴套套住為數不算少、想要挖掘事實的中國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使他們發言不得。這些人都在文宣審查的時候，被打得滿口碎牙。就這樣，即使有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支持，著名理論家嚴家其所寫有關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大事評論的書，也被限制祇能在黨內高級幹部之間傳閱而已。嚴家其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後，即逃到法國。

在文革後，正當中國人民聲聲要求洗刷恥辱，重建民族光榮顏面的時候，中共政府卻大錯特錯地採取不敢面對事實的鴕鳥政策。中國的主政者從來沒有完全否認毛澤東，也沒有否認毛澤東思想，甚至連他的所做所為，也沒有給與完全的否認。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接受義大利記者歐里阿那・法拉西(Oriana Fallacci)訪問的時候，就明白表示「我們不會對毛澤東做出赫魯雪夫對史大林所做的事」。他還說，毛主席的遺像將永遠懸掛在紫禁城天安門的門楣，俯視天安門廣場。紫禁城地處北京市中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中心。這位老獨裁強調說，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將仍然會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以及「社會主義道路」等構成中國正統意識形態的四大堅持之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思想的整副構架被再度提出來，運用到經濟、社會、政治、藝術、文學等領域上。此外，在最近十幾年來，中共不顧一切障礙地認為，在文革期間，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各省及地區，所遭受到的厄運都是一樣的。這個說法和所有比較嚴肅一點的證據並不符合。

一、一九六六年之前的裹脅同行

毛澤東主義的暴力和破壞力，並不是在文革時期才開始在西藏發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年後，正當中國人愜意地生活在災禍似的「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饑荒來臨之前的安樂日子裏，正當上億的中國人重新拾回人性的尊嚴，甚至大部分的中國人仍舊沉醉在毛澤東所鼓吹的眞正理想的平等時，大規模系統化的暴力行爲，從一九五九年粉碎了拉薩街頭的騷動之後，立即在西藏展開。達賴喇嘛已經流亡到印度，和平共存的政策又已經破碎，至此，所有討好西藏人民的做法都變得毫無意義，也毫無價値了。對毛澤東而言，使用暴力逼迫西藏很快地融入中國懷抱的時機成熟了。因此，從一九五九開始，中國政府在西藏積極地進行大量的淨化工作，以便剷除根深柢固的宗教等級制度和貴族制度；同時也在於淸除已經變得微弱不堪的不滿情緒，也爲著孤立西藏民衆，以利於控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摧毀「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災禍性的鬥爭會在前藏，在安多，在康層出不窮。

西藏的安多和康這兩個地區整個地從西藏行政區內，被歸併在中國鄰近的省份。大約有一半的西藏土地被劃入中國的四川、甘肅和青海各省。雖然西藏的安多地區，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有一部分被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劃入新設立的青海省；可是這一次，在中國的地圖上一畫，西藏就在一日之間喪失了半壁的大好江山。從此西藏祇剩下二百萬的人口，其他三到四百萬的藏族人民，淹沒在中國邊界幾省的中國人海裏。今天，您們可以查查看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發行的地圖，您們再也找不著康和安多。

所有在安多與康區的城市，或是鄉野擁有一點勢力的人，都是中共要清除的對象。人民解放軍在寺廟裏大肆逮捕，並且帶著厚厚一疊的黑名單挨家「拜訪」。隨著政治清洗的進度，中國邊區的「勞動改造營」，逐漸地被不斷解押過來的西藏「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間諜」、「階級敵人」以及「不良分子」所塡滿。

坐落在青海及甘肅兩省的勞改營，是中國所有的勞改營中，以艱苦而聞名的。在那裏，荒涼、乾旱、嚴寒、一毛不生的廣大無際的沙土，被改裝成巨大無比的「古拉格」。這個中國式集中營裏的世界，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沒有一個西方記者曾經訪問過這些勞改營。數百萬被判處強迫勞動的苦役犯人，都變成了中國政府的義務勞動工人，並且聽其高興隨意支使。其中有不少的「犯人」再也沒有離開那裡。根據一位生還藏民的證詞，僅僅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間，就有大約七萬左右的西藏人被關在甘肅省省會蘭州北方的那些勞改營裏；其中有三萬五千人餓死。即使天生就是筋強骨壯的西藏人，到了這些死亡營中，也很快地變得和骷髏一般。他們餓得祇好吃自己的衣服及皮件，而且是撕成碎片，慢慢地吃，以便可以拖得更久一些。最幸福的人，則可以找到一些蠕蟲、昆蟲或是樹葉①。

在這同時，第一批寺廟被關閉，其他的寺廟則被摧毀。今天，中國政府承認，這些破壞行爲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開始，而不是像一般所說的一樣。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普窮次仁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解釋說，在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前夕，在西藏自治區內，祇有五五○座寺廟開放；在一九五九年時，則還有二七○○座有宗教活動的寺廟。他也指出，

在一九五九年時，有十一萬四千名的僧侶住在自治區的寺廟裏；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時候，就祇剩下六九〇〇名而已②。這些破壞行爲並沒有放過在安多和康區的西藏影響力範圍地帶的寺廟。位於安多地區的拉卜楞寺，在五〇年代之前，常住有三千僧侶，統轄五十餘座規模較小的寺廟，其分布之廣泛，甚至達到北京。這座寺廟於一九五六年，因中國政府之命令而被關閉；所有的僧侶不是被逮捕，就是被遣散返鄉。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國宣告完成西藏的土地改革。從領主、領主助理、富農、富牧手裏取得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貧窮的農民與乞丐；二十萬份印著有毛澤東肖像和五星紅旗的土地所有權狀，發給了社會主義的新地主。

班禪喇嘛就憑著這些成果，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在北京的人民大會上，發表報告說，從今以後，西藏在毛澤東主席所指引的充滿著燦爛光輝、偉大的道路上勇敢而且熱烈地前進。「總而言之，西藏目前充滿著很奇妙的狀態。在鄉野，在城裏，到處可以看到繁榮、勞動與生產的景象。這些就是我們西藏勞動民衆最主要的傾向」，他以爲可以冒險地說這些話③。事實上，在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六一年間，一個非常嚴重的饑荒，餓死了好幾百萬的中國人。這「黑色的三年」是「大躍進」失敗所帶來的必然惡果。這次的饑荒在西藏也造成了數萬具的餓莩。然而，由於中國的糧食恐慌，雪域一下子變成了中國「內地」同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穀倉，因此，這次的糧荒在西藏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三年。在流亡藏民團體間，充滿著這次饑荒所造成的令人心驚的證詞。如果因爲沒有東西吃，做母親的祇得用自己的鮮血摻進水裏，來餵養孩子的話，我們是很可以想像，在勞改營裏面的藏族人民，是怎麼樣的一種命運。法國人包若望（巴士卦里

尼-Jean Pasgualini）是最先站出來對勞改營做見證的人之一。他在他所寫的《毛的囚徒》(*Prisonniers de Mao*)一書中敍述，他如何近百次地瀕臨餓死邊緣；如何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某一天，由於沒有足夠的食物供給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囚犯們所領到的「代用食品」卻是紙漿④。

無情的歷史在嘲弄著：正當班禪喇嘛大言不慚地對西藏發表極爲樂觀的演說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卻突擊他在西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扎什倫布寺是西藏少數幾個還沒有嘗到「民主改革」的鐵拳滋味的寺廟之一。到目前爲止，中國的領導者一直在花苦功，來掌握班禪喇嘛。想法觀念和達賴喇嘛不一樣，班禪喇嘛不是早就很明顯地對共產黨的權力表示臣服了嗎？他不是中國在西藏推行漢化政策成敗關鍵的同盟者嗎？然而在人民解放軍把扎什倫布寺翻了過來，逮捕了他的四千僧侶的這一天，北京摘除了免戰牌。這些僧侶被控告陰謀圖反，準備背叛中國；有些被處死，有些則被解押到勞改營，和其他寺廟的喇嘛會合。至於扎什倫布寺，則遭到軍隊的大肆破壞。

也許就是這些原因，使得班禪喇嘛否定了他自己所採取的合作政策。他在一九六一年的年底，犯下了他的第一樁「罪行」：批評毛澤東所定的政策的罪行，即使是非常含蓄的批評。他被西藏慘不忍睹的饑荒，以及寺廟被大規模破壞的情景嚇壞了，趕緊提筆，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長達七萬言的陳情書，呈送給「偉大的舵手」手覽。他很天眞地要求毛澤東修正在西藏城市及鄉野裏所犯下的暴行。他也請求這位中國的獨裁者履行北京答應西藏的自治。毛對這封信非常不高興。一九八八年班禪喇嘛在北京所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透露說，這封信是他失寵的開

端。然而他卻漫不經心地在一九六四年的時候，再度犯了更嚴重的「錯誤」：公開地否定他和中國領導的聯合。他在大昭寺所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傳召大法會上，向上萬名的藏民發表演說。爲期兩週的年度傳召大法會是西藏最大、最重要的宗教節日。中國人要他在會上抨擊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奮臂高呼，堅決地表達了他對西藏神—王達賴喇嘛和西藏獨立的支持。

「今天，趁著我們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的機會，我必須表達我對西藏即將重新獲得獨立的信心，對達賴喇嘛重返寶座的信心。達賴喇嘛萬歲！」⑤中國政府馬上把他軟禁。他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審判，是由一群充滿仇恨的共產黨幹部所主持的；這個審判持續了大約三個星期。在受審期間，他受到無禮的動粗與羞辱；最後被判決煽動武裝叛變的罪名。接著，他和他的家人與親近，突然間全部消失了。從十二月開始，他被北京政府列爲「反動分子」；周恩來自己幫他貼上這張標籤。一直到文革結束後，班禪喇嘛才重新出現於政治舞台。他在北京被關，或是被軟禁了十五年之久。

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正式設置的「西藏自治區」，是西藏被納入中國行政系統的最後一步。新成立的自治區的主席，不是別人，就是阿沛・阿旺晉美。他是西藏舊政權中，最後一位重要的親漢合作者。西藏中國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則易名「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張國華將軍被任命爲區委會第一書記。這個全部由漢人所組成的區委會，是西藏唯一握有實權的機構。在西藏自治區成立大會的演講辭中，張國華將軍如是說：「這代表著黨的地方自治政策的空前勝利。民族地方自治是人民民主獨裁的一部分。就西藏而言，這意謂著勞動階級、農民、牧民

以及其他的愛國人士和所有支持社會主義人士，全部在黨的領導下，爲著建立一個民主的與人民的自治區而團結奮鬥。這個就需要獨裁，對反對社會主義改革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資產階級、資產反動分子及其代言人獨裁，對參與騷亂者及其他敗類獨裁。西藏自治區的正式成立，象徵著鞏固的人民權力的延續。」⑥

二、文化大革命這口喪鐘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口喪鐘」響徹了全中國；同一天，《解放軍報》呼籲，向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分子發動攻擊。對在毛澤東身邊掌握領導赤色中國命運大權的思想激進分子而言，文革就是要掃除所有舊的思想、文化、習俗與傳統，以便迎接洶湧澎湃的革命暗潮。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宣稱：「在幾個月之間，上千萬武裝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人、農人及軍人，還有絕大部分的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響應黨中央委員會及毛澤東主席的戰鬥號召，掃除了一大部分在思想意識及文化上根深柢固的劣根性。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一下子粉碎了長期以來剝削階級所強加規定的鐐銬；他們也完完全全地修正了『專家』、『學者』、『權威』及『中產階級思想導師』的傲慢與驕矜。」⑦

文化大革命的戰火，是由八月十一日所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點燃的；這次會議號召對黨內外加入資本主義路線分子，展開戰鬥，並且要求非將他們輾碎，絕不罷休。在這同時，也必須要和從舊社會承襲下來的習俗戰鬥，至於黨的目標，則是要盡可能地強化左派勢力，打

擊右傾分子，從而聚合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與「好」的積極分子或是願意修正自己錯誤的積極分子。八月十八日，一百萬的紅衛兵，人手一冊《毛語錄》，在天安門廣場，在他們的偶像毛澤東前面，以整齊昂然的分列式隊伍遊行。這根本就是一齣幾乎是宗教狂熱與風靡的場面。一百萬的中國狂熱分子高聲歡呼，興奮得熱淚滾滾，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獻給他們心目中最崇拜的神的獻歌：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爲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救星。
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領導人；
爲了建設新中國，領導我們向前進。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那裏，那裏亮；
那裏有了共產黨，那裏人民得解放。

在北京，文革的暴行從八月二十日開始。紅衛兵的狂熱，受到首都歇斯底里般的氣氛所感染而變得白熱化；他們攻擊所有被懷疑認爲是反對共產黨的人，以及所有他們心目中認爲是中產階級的餘孽。一群群主動聚合在一起的紅衛兵，得意洋洋地扛著毛澤東的肖相，在中國首都的大街小巷中竄來竄去，上門捉拿他們的受害者。在這期間，他們犯下了無數殘忍的凶殺案。上了年紀的老人家們，被他們從家中拖到馬路上，當衆接受「人民」法庭的「公審」。被發了瘋的年輕小伙子打了幾個小時後，很多老年人都支持不住而倒地不起；其他則選擇了自戕一途。

一些紅衛兵驕傲地挺著胸膛，很得意地展示著還染著他們受害者鮮血的手，在北京城市大搖大擺，晃來晃去大聲叫嚷：「我剛剛教育了一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

年紀較大的紅衛兵竟然在暴行現場，當衆調教後輩。打著「除四舊」（舊的思想觀念、文化、習慣及風俗）的旗號，也爲著要讓中國擺脫五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數以千計的房子被洗劫一空。紅衛兵瘋狂地摧毀了所有可以令人聯想到被淸除的過去的東西：照片、書籍、私人用品等全部被沒收充公，藝術則被破壞。被嚇壞的小孩子，一臉迷惑地看著家畜被無緣無故地殺了。

他們砸了鋼琴、古董以及無價的宗教神器。北京所有的教堂、佛寺、道觀全部被關閉，不久之後，幾乎全部遭到破壞。中國的傳統，尤其是婚禮、春節拜年以及葬禮等，被毫無妥協地廢止。蓄長髮的學生，全部被迫剃成光頭。外國人的墓園也遭到褻瀆。至少有一個星期之久，北京街頭的凶殺與迫害層出不窮。

然而，正當毛澤東個人崇拜逐漸形成的時候，這些世界末日般的情景，以愈來愈殘暴的方式，在全中國持續著好幾個月。在最激進的毛澤東思想分子的大本營上海，毛澤東的新戰鬥員所造成的紅禍，和北京比起來，那北京人可眞該謝天謝地，感謝毛主席的恩寵。在一九六七年期間，中國各地都發生了「革命委員會」和軍隊或是工人之間非常劇烈的對抗。在某些地方，甚至在一家工廠裏，就有上千的傷亡。這些敵對團體都自稱是「革命派」，而指責對方爲「反動分子」，從而互相殘殺。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年輕的紅衛兵到處抨擊地方政府，大肆攻擊被認爲對毛主席不忠及妨礙革命的人。

幾個月下來，中國逐漸變成了無政府的狀態。在一九六八年的時候，「革命委員會」甚至威

脅到共產黨本身的存亡，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派兵，以血腥鎭壓這些北京認為不再有利用價值而且危險的紅衛兵。毛不再需要這些天眞無知的年輕小伙子了，這些讓毛得以再度取得政權的青年，被他們的主子，心目中的神，在談笑翻臉間背棄了。軍隊在好幾十個城市裏進行掃蕩，數以千計的人在這個世界中消逝了。連續有好幾個星期，在中國南部廣東省的珠江，不斷地湧出肢體不全的浮屍，隨著滔滔的江水，一直漂流到香港的海灘。毛澤東主義下的中國，變成了在鐵幕另一端的屠宰場。

在西方擁有無數信徒的文革這個大騙局，在人命上所造成的損失，即使是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五十萬人。這些人都是酷刑拷打、精神虐待、無審判處死或是自戕的受害者。在這些之外，還得加上幾十萬葬送一生的知識分子、藝術家、詩人、音樂家以及年輕人。五千年的中國文化遺產，就這樣被砸碎、糟蹋、摧毀而終至消失。在毛澤東死的時候，中國是個剛剛結束一場慘烈的內戰的災區。驚弓之鳥般的百姓，極力地企圖磨滅深深烙印在腦海的殘忍影像。

一般人認為，毛澤東的殘暴行為，和西元前第三世紀，第一位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不相上下。然而毛澤東自己卻說：「嗯，秦始皇帝到底做了些什麼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他也祇不過是活埋了四百六十個儒士而已，我們卻坑了四萬六千個。我要這樣回答那些民主人士：如果你們以為，拿秦始皇來和我們比較，就是在侮辱我們，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我們比秦始皇強過百倍！你們認為我們是秦始皇，你們認為我們是暴君；我們很樂意接受這些恭維，我們祇是很遺憾，你們並沒有把眞正的實情弄清楚，還要我們自己來補充你們的評論！」⑧一些研究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〇年中國史的專家們估計，至少有兩千萬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思想下

喪生；他們不是在勞改營、在監獄或是在「人民法庭」被處死，就是在幾次的大饑荒下活活地餓死，再不然就是寧願縮短受苦的歲月而自裁身亡。在中國的「古拉格」中，被關長達十九年的吳宏達認爲，在最近四十年來，「至少有五千萬人」被囚禁在中國勞改營裏，目前大概還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六百萬人左右⑨。漢學家約翰—路克・多門那克(Jear-Luc Domenach)在他所寫有關中國監獄生涯的《中國，遺忘的群島》(*Chine, l'archipel oublié*)一書中強調：「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有好幾千萬的中國人被關在這個群島裏，過著慘不忍睹的生活；目前還有數百萬人。」他認爲，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間，大約有四百萬到五百七十萬的人；在一九五五年的時候，大約有九百六十萬的人。至於「雪域」，這位法籍專家認爲：「我們大可相信，在八十年代後期，西藏至少還有數萬名的囚犯。總的來說，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在西藏被囚禁的人數不會少於三十萬。」⑩多門那克還說：「一些值得採信的證據顯示，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間，大約有六萬五千名藏人被殺，另外有二十萬被關。」

三、北京的說辭

埃迪安伯(Etiemble)強調說，文革是「有史以來沒有一位暴君得以成功地貫徹施行的最殘酷的蒙昧主義」⑪。這種殺傷力極大的意識形態洶湧浪濤，是如何地衝擊著西藏呢？雪域又是如何地在這場狂熱火焰中，幾乎冰溶雪散呢？對最擁護中國政府的西藏人阿沛・阿旺晉美而言，「文革把整個中國帶入痛苦的深淵。西藏受到這股風潮的沉重打擊，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既得的成果。

中國溫和派分子所鼓吹的『考慮到西藏實際情況』的原則，被指責是放棄在西藏的權力。『逐漸發展西藏』則被打成是要重建資本主義。尊重西藏的民族特性，尊重西藏的宗教，聯合藏族人民加入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方針，被愚蠢地放棄了。出身西藏舊社會中生活優裕階層的宗教界人士、愛國人士，被說成是殘忍、凶惡的人，是惡魔；被認爲是腐舊迷信的殘渣的寺廟，則大部分被摧毀。尤其是在一九六九年之後，在西藏強迫執行置生產力於不顧的人民公社。這些決定使得西藏的農、牧民不再有工作熱忱，以至於生產量銳減，造成了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低落」⑫。

阿沛．阿旺晉美再也沒有對這幾年的惡夢，做更深一層的批評；不過他卻也說，西藏人民時常抱怨：「我們很討厭兩端」；這兩端指的是，在一端的舊制度和在另一端的文革與人民公社。這句話表明了，可以批評文革的最大限度；因爲文革再慘，頂多也是和舊制度一樣而已。

對於文革在西藏狂飆的情形，我們可以在受中共宣傳部直接轄屬的官方報章雜誌中，看到一些報導：「在十年的文革時期（一九六六～七六），所有正常的宗教活動都遭到禁止；很多的寺廟被關閉，或是被摧毀。這個全中國的災禍，在西藏的影響特別嚴重，因爲幾乎所有的藏民都是佛教信徒。」⑬「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的文革期間，由於『左傾分子』的錯誤，中共的宗教政策非常紊亂。很多的西藏寺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不過這個問題，不是祇有在西藏才是這樣；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寺廟也是一樣受到破壞。現在這個災禍解除了，黨對宗教自由的政策也實行了。」⑭

中國的新世界出版社則更含蓄：「在解放後，尤其是在民主改革之後，西藏向前大躍進。

雖然西藏和全中國一樣，在十年的文革所造成的災難中受苦，她還是以比舊西藏時期的進步還要快的脚步不斷地前進。在最近二十年來，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之後，西藏有著燦爛輝煌的成果。」⑮即使我們上列所引用的三本官方書籍印行的目的是要讓他們的讀者對現代的西藏有一概括性的了解，但書中有關文革在西藏的章節，就祇有這一些而已。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就把文革所造成的千古大災難點化過去，消失在一九五〇年以來偉大的進步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媒體都確定西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居住區，在文革期間並沒有比中國其他地區遭到更嚴重的損害。譬如有一本討論中國少數民族的書說：「一般稱爲『文革』的十年浩劫。是中國所有民族的災難，包括少數民族及漢族。漢族教徒和其他的少數民族人民一樣，不得從事宗教活動，在服裝上也受到嚴格的限制。漢族男性必須要穿色彩暗淡的灰色、藍色或藏青色的長衫，如果漢族女性穿裙子就要受罰。如此，少數民族和漢族，在『文革』期間遭受到相同的命運。這個時期的大動亂，不是因爲種族的衝突，而是因爲林彪和江青所領導的兩股反革命分子勢力，向所有華夏各族的人民發動總攻擊的結果。」⑯

因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建立比較正確的觀點。這些謊言在以色列．愛潑斯坦的筆下，則變成了對歷史的污辱。在他少數有關文革情形的描述中，他寫下了這些話：「『四人幫』在十年動亂中所進行的破壞，以及由他們所培養、支持的極左派分子所造成的結果，在『世界屋脊』，就如同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一樣，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其中有些是全面性的，譬如說在教育方面；其他牽涉到種族和宗教性的問題，則是地方性的。然而由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直接關照，由於當地政府機關的鞏固性與持續性，再加上地處偏遠不在破壞區域之內，西藏所遭受到的影響，

遠遠比其他的民族自治區要小，要輕微。」[17]愛潑斯坦這位毛澤東的忠實僕人，永遠也不會被抓到小辮子的；因爲在他那本厚達五六六頁有關西藏的書裏頭，再也沒有其他任何對文革有微辭的言論。在這本書裏，到處都是對中國政府的歌功頌德，要不然就是對西藏宗教與傳統的詛咒；此外，書上還附有站在共產紅旗下面，歡容滿面的西藏青年的照片，眼光朝向燦爛前程的模範勞工勤奮工作的照片，做爲歡樂西藏的明證。

除了這些官方的統戰與宣傳文章之外，在中國還是存在有不少的批評。我們確信，如果在中國有言論自由的話，這些批評會多得像恆河之沙。在一片讚揚聲中，大部分的荒腔走調都被迫閉嘴；不過還是有一些在銷聲匿跡之前，吊了吊嗓子。譬如在後文中我們還會談到的斑禪喇嘛，他在圓寂前不久，曾經毫不掩飾地對共產黨在西藏所造成的黑色歲月做了一個總結報告。至於在失勢後死於一九八九年四月的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則是勇氣十足。我在外交場合中見過他幾次，都是在他等待重要外賓的時候，偶爾我也和他談談。這位身材矮小、矯捷的總書記，是中國政治圈中，唯一以黨與中國政府的名義，對中國在西藏所犯的錯誤，提出來做自我批評的人。他在北京的很多同僚，永遠也不會原諒他。當他在一九八七年元月被免職後，他對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所做的批評，被點名認爲是他的「意識形態薄弱」的幾個例子之一。

四、紅衛兵的滔天大罪

少數民族居住區是最容易受到從中國內地吹起，具有毀滅性的風暴所攻擊。和漢族區的居

民比起來，他們保留著固有的習俗與特有的文化特色。在北京的眼裏，這些都是構成「反動分子」的理由。此外，由於他們使用另外一種語言，而且偶爾公開批評、反對中國移民的落籍定戶，他們一直被懷疑是「分離分子」。因此，在清朝時被命名爲新疆，但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回族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紅衛兵熱衷不懈地破壞清眞寺。他們還逼迫回教徒養豬，吃豬肉，以便有效地打擊他們的宗教。很自然地，西藏是毛澤東統治下的「新中國」處心積慮要去除的「四舊」之首。事實上，在毛澤東思想分子的眼裏，西藏殘存有最過時的信仰、習俗。總而言之，西藏離開完全「解放」還有一大節的路程。最早的一批紅衛兵，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就降臨了拉薩。緊接著，文革八月在西藏登場。在拉薩成立的中共「八中全會」第十一次會議的「西藏造反派」，爲文革敲鑼，開始清掃「資本主義分子」。

紅衛兵的矛頭首先指向拉薩市中心的宗教聖地大昭和小昭寺。避走達蘭薩拉的日布特活佛親眼看著大昭寺被洗劫。「在一九六六年藏曆的第六個月的第二十天（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好幾百名十八或二十歲的漢籍與藏籍紅衛兵，在漢籍幹部的陪同下，猝然闖進大昭寺。您知道，在大昭寺裏有好幾百座佛堂；除了兩座沒有遭到破壞之外，其餘的全部被搜刮、糟蹋。所有的佛像、佛經及祈禱法器，不是被破壞，就是被帶走。我們數百名的喇嘛和經師，手無寸鐵，無能爲力，祇能含著眼淚眼睜睜地在一邊觀看。紅衛兵在漢籍幹部的監督下，高聲吼叫口號。祇有擺在大昭寺入口的釋迦牟尼雕像沒有被紅衛兵破壞，因爲這尊雕像，是唐朝文成公主和吐蕃王松贊干布締結婚事時，從中國帶來的。這尊佛像也是漢、藏關係的象徵。破壞行動持續了一個星期。接著，大昭寺變成了中國士兵的營房。他們把大昭寺的一角闢成茅廁，我們可以看見他

們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則被改成牲畜屠宰場。」

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漢人把在附近寺廟裏洗劫的寶物，都堆在大昭寺裏；紅衛兵把所有他們能找到的法器聖物聚在一堆，放火燒了。這把火足足燒了五天五夜！藏族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在轉眼間全部化爲灰燼。西藏守護神十一面千手觀世音菩薩的大雕像，被紅衛兵打得破片橫飛。紅衛兵在大昭寺及拉穆寺圓滿達成任務後，轉而直撲羅布林卡離宮。所有的宮殿都被很仔細地搜刮一盡。在那裏祇留下雕像的破片、斷首的菩薩。從此，「除四舊」的鬥爭運動，擴展到西藏首都以外的地區。整個西藏祇有布達拉宮及其他十三座寺廟，在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下，受到軍隊的保護，而沒有遭到紅衛兵的毒手。現在的中國政府及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爲，這就表明了周恩來當時想要保護像北京故宮一樣的中國文化中最重要古蹟的苦心。

拉薩市的路名，全部都改成富有革命氣息的名稱：解放路……。紅衛兵指責藏民家中供奉佛像，擺設神壇，然而他們卻散發了幾十萬幅的毛澤東肖像。拉薩所有的辦公室、民宅都掛著毛澤東的像。紅衛兵在中國各地攻擊他們認爲是反對毛澤東，及反對革命的黨的負責人。整個中國在白熱化的權力鬥爭下動盪不安。

一直到秋天，西藏黨委會還能控制得住紅衛兵的各項花招。到了十二月，紅衛兵的人數大幅增加，於是，五十餘隊的紅衛兵，自認爲勢力夠大，而在拉薩電台宣稱，他們即將取得政權，並且控告張國華將軍及其黨羽背叛革命。中國將軍落荒而逃，直到一九六七年十月才返回西藏。這些叛逆的紅衛兵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佔領了《西藏日報》。四月的時候，八千名中國內地的紅衛兵串聯到西藏，使當地紅衛兵的數量急遽增加到至少有二萬人。他們下定決心，要清除拉薩權

力機構裏的叛徒。很快地，各派系間發生衝突，而演變成市區的巷戰，並且從十月開始，逐漸蔓延到日喀則、江孜及那曲等西藏的大城市。在拉薩，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所發生的派系械鬥，使拉薩憑空多添數百副的白骨。

西藏的無秩序狀態愈來愈嚴重，使得整個自治區的通訊系統從一九六八年元月底開始，完全癱瘓。部隊之間也是一樣，他們隨著所支持的派系不同，而互相傾軋。在西藏的某些地區，終於再見饑荒。

在中國二十九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殿後的西藏和新疆，終於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員會」。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才在兩股敵對的趨勢中，找到了脆弱的折衷辦法。在西藏的漢人在這場風暴中遭殃是無庸贅言的。可能有數千名的漢人在械鬥中喪生。然而漢人所受到的痛苦，是不是能夠與和這一場意識形態鬥爭完全無關的西藏人所受到的痛苦相提並論呢？

就以日布特活佛來說，他經歷了三十五場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七十高齡的他，帶著微笑對我細說他痛苦的回憶：

> 在鬥爭會時間，我必須要戴長長尖尖的帽子，我也必須要披上袈裟，好讓群衆知道我是屬於黑五類。他們在我的袈裟上，掛上各式各樣的法器、徽章來愚弄我，曾經有兩次，我在喇叭、銅鑼與紅衛兵嘲笑聲的引導下，被迫在拉薩市區遊行。鬥爭會一般是在下工後，晚上八點到十一點間舉行。白天我得做工：我被指派參加建築工程和敲石頭。控訴我的人

很自然地是個漢人，他叫郭祥志。我記得非常清楚。他是我居住那一區的負責人。他控告我和達賴喇嘛有祕密聯繫，和「外國反動分子」接觸，圖謀組織西藏的獨立運動。他們逼著我當衆低著頭爬在地，然後對我施行批評與毆打。有一次，他們用槍托在我的右耳上，狠狠地撞擊，以至於到現在爲止，我還有聽覺障礙。經過毒打後，我祇看得到那些劊子手的腳而已。事實上，我是拉薩喇嘛中，受罪受得最少的一個。我現在還活著能夠爲這件事做見證，就是一個證據。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的信念。她協助我度過了這些屈辱與痛苦。此外，我們相信，這種情形不會持續很久的。我們眞希望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能夠做一些事情，好讓西藏再度獲得自由。

日布特活佛現在已經是「珍寶」了。這是對最有學問、最有功績的喇嘛的尊稱。心裏是否充滿著對中國人的仇恨呢？還是尊照菩薩的教誨以慈悲爲懷呢？「我當然恨他們。苟延殘喘度過這麼一段艱苦的歲月，我怎麼可能不怨恨他們呢？慈悲和這件事沒有任何的關係。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文化。他們躲不過我們對他們的恨意的。對他們，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問題。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國採取了自由化政策，他們也嘗試用甜言蜜語誘惑我們，還說要給我們加薪。不過這些都是白費力氣的，因爲藏族人民再也不會被騙第二次了。事實上，我寧可離開西藏，因爲我心中的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在一九六六年的時候，所有的宗教活動都是禁止的，沒有任何例外。西藏的慶典和民間節日也是一樣。甚至連西藏的傳統民歌也被禁止。因祈禱被抓到的人，都受到殺雞儆猴的懲罰。

紅衛兵把所有在村子裏、在路邊、在隘口的西藏祈經幡旗，都換成紅旗。數萬本的《毛主席語錄》免費分贈廣大民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在一九六八年年底爲止，整個中國大約發行了七億四百萬本的毛語錄。在城裏、在幹道交叉口、在村子裏、在辦公室、在工廠，毛澤東的肖像無所不在。每個家庭至少懸掛有一幅毛澤東的像，不然就會有很大的麻煩。老大哥不請自來。

西藏不分男女所紮的髮辮，被認爲是「骯髒的奴隸辮子」而被迫剃掉。和中國其他的地方一樣，所有的家畜都在剎那間被宰殺。藏人必須要穿漢式服裝，不過由於布匹的匱乏，使得很多的藏人還繼續穿戴他們的傳統服飾。上萬的藏人被逮捕，有時候連續地被幾個營區輪番逮捕。時常，一個藏人從一座營區釋放出來，另一座營區馬上又來找他的麻煩，並且以最不人道的方式侍候他們。很多這一類不幸的人就此失踪，再也沒有回來。地主和貴族這些出身不良的孬種藏人，都受到紅衛兵的迫害。

隨著中國紅衛兵派系鬥爭的愈演愈烈，他們對西藏人的懲罰也愈來愈殘忍。懲罰的程度完全要看他們的頭頭當時的暴力衝動而定。根據流亡藏人所言，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有時候甚至是小女生。很多婦女被迫脫光衣服，站在冰凍的湖面上。在整個西藏高原上，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的粗暴行爲、酷刑觸目皆是。他們對受害者的處置不一，剁手、劓、刖、割舌，花樣百出。受刑的人有時候被迫在處死前先爲自己挖洞。派駐在西藏的部隊一反中國內地部隊維護秩序的作爲，時常支援紅衛兵的暴行。

這種狂亂的情景，在當時小孩子的腦海中，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在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裏，有一位學生對我追述了文革初期，他在拉薩的童年。當時他祇有五、六歲而已，

然而他什麼也沒有忘記。

那一天，我和一些小朋友在玩耍。我在路上撿到一張相片，我就把它帶回家。那是一張毛澤東的相片，上面被畫了一個紅色的×。我可不知道那個紅色的×代表著什麼意思。我很想把那張相片展示給我的家人看。因此我拿給我祖母看。然而她一看到紅色的×，就像中了邪一樣。她要我立刻把那張相片放回我撿到的地方。所以我又把它塞回路旁的牆縫裏。不久之後，一位小女生發現了。她受到了懲罰。有人看到她拿著那張相片，因此她被控告在毛澤東的像上畫上紅色的××。他們召開了「鬥爭會」。他們把小女生的父母也叫來。她已經蠻大了，比我們，我和我的小朋友們都大。她被當成殺一儆百的教育工具。她在大庭廣衆下被毆打。我當時還太小，沒有眞正去注意這件事。不過我記得很淸楚。

五、被扼殺的文明

除了這些讓中國政府到現在還不承認的對人身的殘暴行爲之外，中國紅衛兵在西藏還幹下了中國更不能承認，甚至在毛澤東死後，也還得要隱瞞的罪行。中國獨裁者的打手們，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對西藏文明做了深思熟慮、有計畫、有步驟的全面性摧毀。這個摧殘行動一開始，被認爲是反革命中心的寺廟，很自然地首當其衝。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在西藏大約有六千座的寺廟，在一九六六年，已經有一大部分被摧毀、嚴重破壞或是被關閉。其他完好無損的寺廟，

則在這次的行動中，悉數被毀成爲瓦礫。文革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時候，紅衛兵展開了這一波的廢墟行動。爲了能夠更有效地破壞，紅衛兵帶著西藏寶物的清册，上面記載著中國人來不及掠奪轉運到北京的寶藏名目。

有一部分鑲金、鑲銀或鑲寶石的藝術品，以及最古老的唐卡（藏語，藏族繪畫藝術中，富有獨特風格的一種繪畫形式）很幸運地逃過了這一劫，被裝在大漆封口的袋子裏，運往中國的首都。在一九八三年的時候，有一組西藏代表，趁著吹起自由化的風潮，到北京尋回一部分屬於他們民族財產的珍寶。他們發現在北京市中心的故宮裏面，至少堆積著有二十六噸的西藏宗教聖器。這些雕像及禮儀法器，總共裝成一六三只木箱，被運回西藏物歸原主。另外還有六噸的宗教聖物，則是在北京的孔廟裏被找到；這些也裝成上百的木箱運回西藏。他們總共動用了六百個木箱，把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尊的佛像運回西藏[18]。

然而這些也祇不過是被偷或是被打壞的寶藏的一小部分而已。這個西藏代表團團長日布特活佛說，大部分的西藏宗教聖器都被銷燬。純金或純銀的佛像、法器不翼而飛。至於銅、錫或其他金屬製成的佛像、法器，則被賣到北京、上海、太原或別的地區的金屬銷煉廠。位在北京東部五公里處的稀有金屬熔煉廠自己就買了六百噸從西藏寺廟搜刮來的金屬物品[19]。熔銷西藏珍寶的行爲，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三年，被兩位中國高層領導幹部李先念和烏蘭夫知道後才停止。

很多很多其他的禮儀器具與佛經，就在寺廟旁邊，被一場大火所吞噬。紅衛兵還很得意地「敬邀廣大民衆」，參與他們充滿爆炸力的破壞行動。佛堂、寺廟的建築材料，被拆掉拿去蓋公共廁所，蓋牛羊畜棚，或是被拿去鋪路。這些行爲已經超出可以忍受的限度，而不能算是去除

宗教的神聖化的行爲了，這根本就是一種汚辱的行逕。他們的目的，是要盡可能地對宗教打上最低賤可卑的烙印。就這樣，神聖的佛教經書被拿去當草紙。一旦佛堂與寺廟被清理乾淨，西藏人民在槍管的逼迫下，身體力行地參加了寺廟的拆除工程。寺廟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難。對某些深牆高院、固若金湯的寺廟，紅衛兵還動用了炸藥和大礮。在某些情形下，他們甚至有轟炸機支援。幾個月下來，瘡痍滿目，一座座的寺廟，祇剩下開了天窗的屋頂，殘缺的牆，變形的鋼板、一堆堆的石塊，以及不可辨認的廢物。經過這一場浩劫後的寺廟，讓人回想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歐洲被礮彈夷爲平地的城市：沒有生命的鬼城。

離開拉薩約有四十餘公里達孜縣境內的甘丹寺，是黃教祖師宗喀巴於一四〇九年創建的黃教第一座寺院。這座寺院是西藏最大的寺院之一。在此之前，常住有數千的喇嘛；這場人禍過後，也祇成爲一堆白煙裊裊的廢墟。日布特活佛說：「以前，西藏有數千座的寺廟。絕大部分在一九五九年前後被摧毀。中國人認爲寺廟是西藏文化生命的中心，是西藏地下抵抗軍的藏身處，是妨礙社會主義前進的絆脚石。在文革之前，他們還保留幾座寺廟的完整，以便爲西藏的宗教自由做見證。這是他們的戰術之一。然而這些沒有遭受到破壞的寺廟，在文革期間，全部受到相同的厄運。甘丹寺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甘丹寺的拆寺工程，從藏曆一九六六年第九個月的第十三天開始（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他們先從全寺喇嘛聚會念經的措欽大殿開始拆，然後一座接一座地把全部的僧舍都拆掉。爲了要加速完成拆除工程，他們使用炸藥。他們把藥包塞進每一面牆裏，然後一起引爆。接著，一組組的人群，用十字鎬把整座甘丹寺夷爲平地。當地的村民成功地把宗喀巴的雕像藏了起來，這是甘丹寺中，唯一沒有遭到摧毀的東西。

其他所有的一切，全部被掃光。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事先被搬走，用卡車載到拉薩，然後運到中國。甘丹寺於一九六九年的時候，又一次地遭到破壞；甘丹寺的建築材料，全部被分發出去。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說，甘丹寺不留一石一木。」

西藏的其他寺廟和喇嘛院所遭受到的破壞，大體雷同。隨著寺廟的被摧毀，西藏幾個世紀以來的建築也消逝無踪。這一場「漢災」對西藏人而言，無疑地是個極端沉重的打擊；對整個人類共有財產的損失，是很難給予定個數目，但一定會是個天文數字。整個西藏變成了集破壞、劫掠、蹂躪於一台的恐怖劇場。香拔拉（藏語，西方音譯為香格里拉；為佛教密宗修煉者嚮往的北方極樂世界）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被捲入這一場意識形態鬥爭的大風暴當中；神祇之鄉充滿著永無休止的恐懼與死亡。

雖然有政治、軍事與警察的恐怖鎮壓，儘管佛教教義禁止暴力行為，很多的西藏人，仍然繼續和從平地不請自來的「嘉米」（藏語，即中國人）做殊死戰。在文革期間，發生過多少英雄式的行為，又伴隨著幾多的傷心事。這些事跡很少在外界傳揚，因為西藏就像對外界完全封閉的牡蠣一樣。然而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新華社卻報導了西藏叛亂分子，從西藏原野到拉薩，到處進行「破壞」、從事「犯罪行為」以及「分離活動」的消息。在西藏首府拉薩的街頭巷尾，時常可以看到要求西藏獨立以及打死毛澤東的標語。這些都是在強大軍警的監視下，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成果。

在一些傳到西方，而且被證實的消息中，有一則是關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青年和中國軍隊在拉薩發生衝突的事件。在這次的意外事件中，軍隊接到要求支援後，逕自向沒有武

裝的「暴民」開槍，造成了十幾名死亡、五十餘人受傷的慘劇。高高躲在喜馬拉雅山區上的西藏地下抵抗軍，其中大部分是康巴，逐漸地重新整合，並且又有能力出擊在人數、裝備上都比他們強上千百倍的敵人。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在「西藏自治區」的六十一個地區中，有六十個地區都發生了戰鬥的事件。

局勢有了急劇的大轉變：阿沛．阿旺晉美的親生兒子阿沛晉美現在竟然公開地反對他父親，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就非常賣力去做的中國西藏政策。定居在美國的他和其他的人一樣，對於迄今尚鮮為人知的西藏文革，提供了不少的寶貴資料。他的見證特別能使我們了解，西藏地下抵抗軍在六十年代末期，也就是正當整個中國還沉陷在深度恐懼當中的時候，所進行的可歌可泣英雄風範事跡。最近他又透露說，一九六九年，在拉薩西郊的尼木地區，發生了千人聚合的反抗行動。在一位尼姑的領導下，這些騷亂分子突擊了一座警察局，他們突破支援部隊的包圍，順利地逃到山區。最後她還是被抓，並且被拖到拉薩「審判」後槍決。

自從這次暴動之後，就有很多的逮捕行動。不少藏人被關進監獄，或是押送到已經人滿為患的勞改營。阿沛晉美說：「所有的監獄，所有的勞改營都被擠滿了。甚至在中國，也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六九年的這件暴動案子。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九年之後，大部分住在西藏自治區及青海、甘肅、雲南和四川的藏民家庭，不論是貴族、是農奴、是喇嘛或是普通的老百姓，幾乎每一戶都失去一、二位家人，他們不是被關在監獄裏受到監視，就是逃到國外。」他還說：「如果把在文革期間受苦的人也算上的話，我想每個家庭都喪失了好幾個人」⑳。

從一九七〇年開始，中國當局展開了另一場新的統戰，以便剷除這些春風吹又生的叛亂家

庭。北京的統戰直轟達賴喇嘛，把他比喻成是「土匪與叛徒」，或是「靠人民血肉爲生，雙手沾滿血腥的屠夫」。在西藏的軍、警指控他們是「叛徒、謀反者、破壞分子、罪犯」或是「壞分子」。做爲教育「大衆」的公開處決接連不斷，同時，拉薩的監獄也愈來愈擠。

就像是這幾年的災禍還不夠似的，另一場災難緊接著侵襲了已經是奄奄待斃的藏族人民。這就是毛澤東賴以成名的另一件法寶，已經在中國內地雷厲風行的「人民公社」。這是農業、畜牧業完全收歸公有政策的關鍵。人民公社變成了毛澤東政權下的一個新的行政單位。所有農村的土地、牲畜、器具全部充公，成爲人民公社公有的財產。每一個人民公社下分設幾個生產大隊。家庭生產制、私有土地制全部被廢止。被中國的領導幹部們譽爲「走向社會主義天堂的金橋樑」的人民公社，於一九五八年就開始在中國正式實施。正在進行漢化的康和安多地區，也已經擁有好幾個公社了。西藏人天生是個人主義，崇尚自由，尤其是牧民。當外地實施人民公社的情形一傳到拉薩藏民的耳朵裏，馬上勾起了極度的反感。對他們而言，人民公社無異於監獄和勞改營。

理論上，人民公社具有經濟、行政、社會和教育等的多元功能。它同時也是赤色中國控制農村的有效方法。家庭就像其他農村裏的權力機構一樣被打散。唯一的，也是絕對的主人，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幹部。西藏農民也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任何超出居住、工作範圍區的行動，都要有特別的許可。在中國內地，有的人民公社統轄有五千座的村莊。在西藏，單位比較小，一般統轄一百到兩百戶家庭。到一九七〇年夏季爲止，西藏已經有上千的人民公社了。在反對土地公有最劇烈的地區，都派駐有部隊鎮壓。西藏的土地公有制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

人民公社的總數幾近兩千，幾乎全部是在西藏中部的「西藏自治區」。

和在中國一樣，在晨曦初綻之前，公社的擴音機就已經播放〈東方紅〉，開始了人民公社一天的勞動。由於政治的因素，從一九五九年開始，西藏和中國屬於同一個時區，因此，當艷陽在北京當空照耀的時候，雪域還沉睡在深深夜暮裏。在田地裏疲憊不堪地做完了一天預定的勞動之後，晚上還得參加沒有人可以倖免的政治學習。由於公社黨委會把每個人從早到晚，都盯得死死的，因此沒有什麼私生活可言。午飯不是在田野解決，就是在公社的食堂度過。一天中唯一可以不受到政治控制及洗腦的時刻，就是就寢前在家中的晚餐。

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國幹部就強迫在西藏種植小麥。在此之前，西藏人一直是種植比較能適應喜馬拉雅山高地貧瘠土壤的大麥。他們也規定，每年要有收成。在西藏，習慣上是兩年一耕，好讓土地有充分的時間攝取需要的養分。由於中國人的這些錯誤決定，土壤很快地枯竭了，造成了年年的歉收，糧穀生產量因而直線下跌。一九五〇年以前號稱穀倉的西藏，在幾年之間，不但被搞得翻倉無米，甚至在某些地區還發生嚴重的饑荒。六十年代末期，中國積極備戰，使得這種情勢更為嚴重。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及其政府確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由於中國在地理環境上，受到蘇俄及其同盟國的箝制，毛澤東認為不能再浪費時間，必須要馬上積極地備戰才行。在五穀的分配上，中國部隊永遠是被列為第一優先。在漫長的中印邊界上，駐紮有數萬的中國部隊。

要談西藏的文革，就必須要提到，中國對西藏的另外一個很能夠顯示中國企圖的措施：北京的中央政府下令派遣上萬的中國人移民到西藏。在六十年代期間，已經有不少的中國人在康

及安多地區了；然而在後藏，除了中國的部隊之外，中國的幹部還屬少見。中國眞正的大量移民，是在一九七五年開始的。從那一年開始，在西藏的中國人數，就像是滾雪球似的不斷地快速擴張。一九八二年中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當時有九萬六千名的中國人在西藏。當然這些數字祇包括那些有正式登記的中國人。此外，還得再加上被他們接到「世界屋脊」的配偶、子女和其他的親人。在拉薩大約有五萬藏民，然而卻有十萬的中國人！他們傍著傳統的藏式城市，用水泥蓋了個外形單調、難看，專屬於他們的新中國城市。

從西藏「流亡政府」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來看，單單是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間，就至少有六十萬的中國人在後藏定居。駐紮在西藏人民解放軍的人數，一向是最高機密，當然也就不包含在上列的統計數字之內。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衝突之後，中國的駐藏部隊大幅地增編。關於中國入藏部隊的人數，專家們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他們估計約有二十萬到五十萬的部隊，分別駐防在後藏、康及安多。在一九一二年，西藏噶廈政府驅逐最後一任的案辦之後，在後藏就沒有中國人；在一九八〇年的時候，平均每四個人裏，就有一個中國人。在康及安多地區，中國人和藏人的比例差距就更爲縮減；在某些地方，藏人甚至變成了少數民族區裏的少數民族了。

經過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後，在西藏怎麼可能還會有人相信中共所許下的社會主義天堂的諾言呢？然而，在一九七六年，阿沛·阿旺晉美卻不顧族人的恥笑，對這些年來的恨意和殘暴，做了一次個人彙報。他說：「我今年已經六十餘歲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西藏人如此幸福，意志如此堅定……。即使是我的敵人，也得承認這一點。像西藏這樣，一個民族在四分之一個世

紀內，就從極端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進步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情形，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㉑以目前共產世界分崩離析，理想世界壽終正寢的天下大勢來看，阿沛．阿旺晉美先生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祇能引人發笑。可惜的是，這種言辭依舊不停地掛在那一群統領中國的八十老翁的嘴邊。

六、百萬冤魂？

一九八〇年，也就是文革結束後的第四年，丹增嘉措應中國政府之邀請，派遣其胞兄圖登諾布率領視察團到西藏。被所看到的情景嚇呆了，他感慨萬分地追述他的感受。「在我離開西藏的時候，那裏還有很多的寺廟、喇嘛院。甘丹寺曾經是全國第三大寺，擁有三千和尚，現在卻是廢墟一堆。哲蚌寺，西藏最大的寺院，曾經住有一萬名的和尚，如今也祇是一座鬼城。中國人對我們說，那裏還有兩百名和尚，我卻祇看到六、七名穿著袈裟的人。色拉寺也是一樣地被摧毀殆盡，現在祇剩下幾個和尚而已。所有的西藏寺廟，全部被摧毀化爲廢墟或是半廢墟。」布達拉宮在文革結束的時候，還是屹立不墜，然而裏面的東西很多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卻是仿製品。

他回到安多的故鄉，附近的昆布寺已經被改稱爲塔爾寺了。圖登諾布所聽到的，無非是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間所遭受到的痛苦故事。「當我問他們有關目前生活狀況的問題時，他們祇是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他的人則向我訴說，他們的家人、親友，如何被殺、被囚監、被解

押到勞改營、被殘體或是被弄成殘廢。有些人被木棍打成聾子，有些則變成瞎子。另外有些人則被迫像馬牛一樣，去拖拉重物，把身體扭曲得不成人形。很多人被迫在「鬥爭會」上出現，其他的人則被迫去拔他們的頭髮。數以千計的人，由於缺乏適應能力，吞不下昆蟲、廢料、死狗的骨頭，和豬爭食而活活餓死。他們也告訴我說，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間，所有的男人全部被逮捕，裝上卡車，運到勞改營；你所能看到的，放眼盡是婦女、小孩及老年人。」

此外，他還說：「以前的西藏，是山羊、羚羊、鹿、熊、犛牛及野馬的天堂，現在則所剩不多。至於生態的破壞，不提也罷。一座座的森林，被砍伐成濯濯的童山。本來就很貧瘠的土地枯竭了。至於教育，除了一些特權階級外，已經有三十年小孩子沒有上過課了。一小部分懂得看和寫的人，也祇會中文而已。」有不少圖登諾布碰到的藏胞，都在他的耳邊說「絕對不要相信中國人，絕對不要！」或是「告訴達賴喇嘛不要回來！」中國人膽敢宣稱，他們把西藏從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西藏人一直就是中國人。藏人不是，從來就不是中國人。西藏到現在還是被佔領區。雖然國家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飽受創傷，西藏人並沒有因此而被征服，也不會因此而變成中國人㉒。

在缺乏眞實數字的情況下，一個外國觀察人員也祇能夠說，在文革期間，有幾十萬非自然死亡的藏民消逝在人間。達賴喇嘛及流亡藏民則認爲，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六年間，至少有一百萬的藏胞死亡。也就是說，在這二十六年間，每五個或六個藏人中，就有一個因爲非自然因素而死亡。根據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新聞處最近所發表的統計數字，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三年間，有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名藏人死於監獄或是勞改營；九萬二千七百

三十一名藏人死於酷刑；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八名藏人被處決；四十三萬二千七百零五名藏人死於和中國人的抵抗戰鬥；三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名藏人死於饑荒；九千〇二名藏人自戕。在中國佔領西藏、康及安多的頭三十三年之間，總共冤死了一百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七名藏族人民！鑑於這個統計數字，達賴喇嘛及其政府控告中國在西藏施行種族滅絕。中國政府當然否認這些他們認爲很可笑的數字；他們宣稱，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在西藏總共也祇有一百萬的藏族人民，目前則將近有二百萬人。然而北京從來也沒有統計過，在康及安多有少的藏民。他們也從來沒有發表過，到底有多少的藏族「同胞」成爲血祭文化大革命大旗的犧牲品。

不少的觀察人員在研究這些事件之後，認爲毛澤東以爲這樣就可以對西藏做一致命的打擊，西藏的問題也就可以因此迎刃而解，一勞永逸。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毛澤東死後十七年的今天，這一切都是錯誤的打算。即使在一九五〇年時代，毛澤東那身經百戰的部隊，勢如破竹地席捲了整個西藏，然而，不論是一九五九年開始的「民主改革」，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大躍進」，甚至延續到一九七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沒有眞正徹底地深入到「雪域」的根部。毛澤東是可以利用國際輿論和正義罔存之秋，一時地把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然而他並沒有征服，也沒有馴服，更不用說是讓西藏人順服歸宗了。

在「偉大的舵手」斷氣的那一天，藏民族的靈魂不但沒有散亡，反而比以前更堅強。紅衛兵那些慘無人道的屠殺及破壞，造成了不分拉薩、康或安多地區的藏族人民之間的神聖大聯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西藏，由於部落、宗教派系及地方貴族的相互傾軋而四分五裂。在藏族的近代史上，他們從來沒有像六〇年代末期那樣同心一志。毛澤東以爲他扼殺了藏傳佛教，磨滅了

西藏文化，他所得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其實，如果當年中國讓西藏眞正的自治，並且維持她所採取的和平互助的政策，她是很有可能說服藏族人民根深柢固的老舊傳統，從而把藏族融合到「中國大家庭」之中的，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卻爲西藏的民族主義打下了深厚穩固的基石。

註釋

① John F.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Wisdom Publications, London, 1985.

②見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Update*，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

③ John F. Avedon，同前書。

④ Jean Pasqualini（包若望），*Prisonnier de Mao*（毛的囚徒），Gallimard, 1974.

⑤ John F. Avedon, 同前書。

⑥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87.

⑦ Jacques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Payot, 1972, p. 365.

⑧《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一九六九。

⑨ *Testimony for the 4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Geneva，一九九二年春季。

⑩ Jean-Luc Domenach, *Chine, l'archipel oublié* Fayard, 1992, p. 29,498.

⑪ Etiemble, *Quarante ans de mon maoïsme*, Gallimard, 1976.

⑫ *Les Tibétains à propos de Tibet,* Editions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Beijing, 1988, p. 187-188.

⑬ *Le Tibet hier et aujourd'hui,* Beijing Information, Beijing, 1984, p. 33.

⑭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Beijing, 1989, p. 59.

⑮ *Une enquête globale sur le Tibet,...*

⑯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5, p. 73.

⑰ Israel Epstein, *Tibet transformed,*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3, p. 37.

⑱ Ribhur Trulku, *The search for Jowo Mikyoe Dorjee,* The Office of Infor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Secretariat, Dharamsala, 1988.

⑲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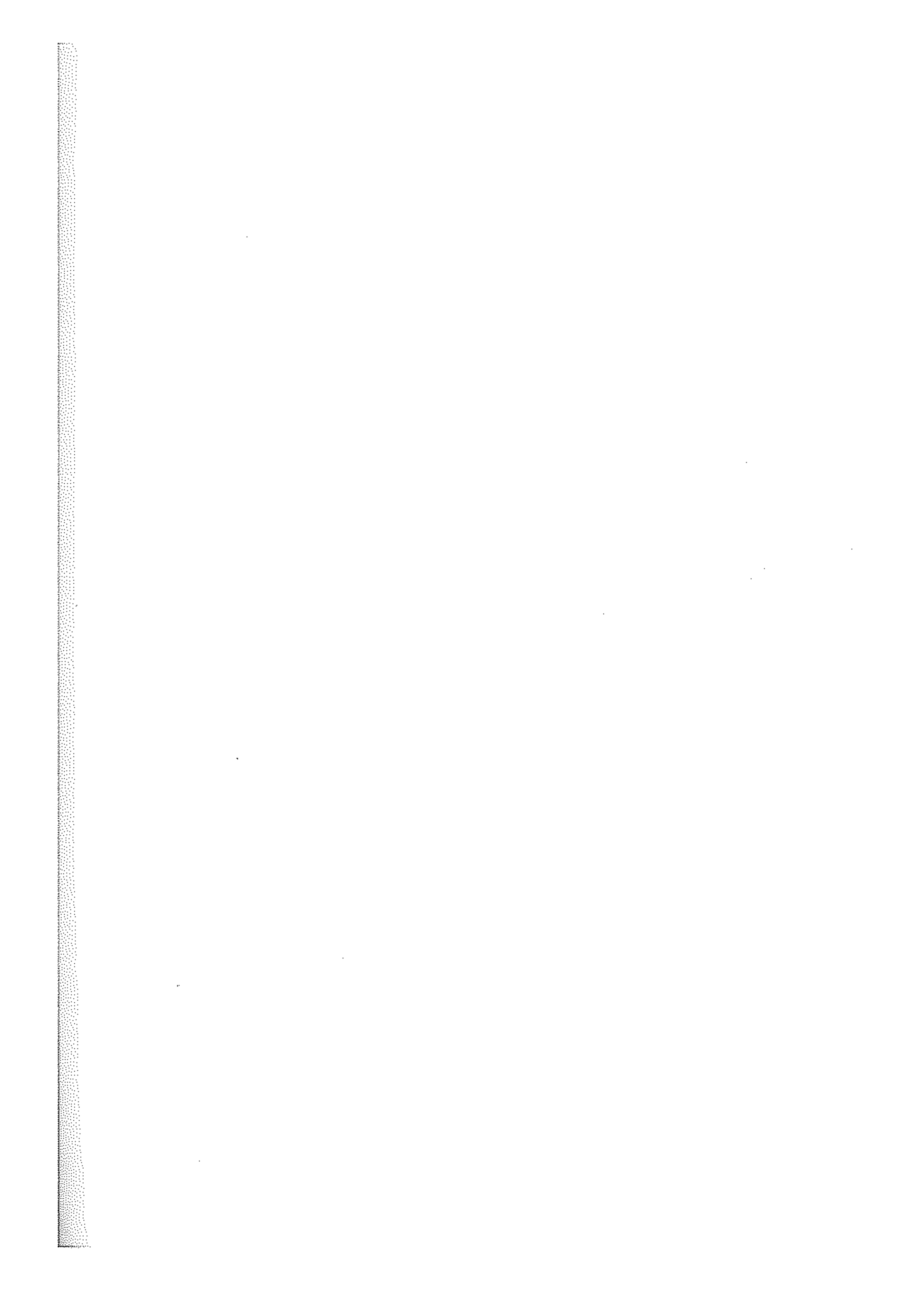
⑳ *Emancipation Monthly,* Hong kong，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㉑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㉒ Thubten Jigme Norbu, *Tibet is my country,* Wisdom Publications, London, 1986, p. 274-275.

第二部

烏雲籠罩著「世界屋脊」



第一章　新民族主義的興起

毛澤東去世之後，停靈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供萬民瞻仰。然而，當存放在玻璃棺中的遺蛻，依舊釋放出陣陣防腐劑幽香的時候，中國已經在思想領導路線上，做了一個急轉彎了。隨著獨裁者的消逝，以及「四人幫」的鋃鐺下獄，中共新的領導階層，是應該在毛澤東思想的破產中，汲取一些教訓的。在這批人的統領下，中國是個被國際孤立的地廣民窮的國家。身爲第三世界老大哥的中國，曾經異想天開地，要用狂妄的主義、理論來闡揚人道。然而在歷史嚴肅的考驗下，她卻爲施行奄奄待斃的制度所造成的慘狀，做了無奈的見證。中國不但不能聲威遠播，連昔日的藩屬也一個個地不齒於與她往來。算算總帳，追求共產主義的結果，卻造成了共慘的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三十三年後的日子裏，中國至少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盲，八億的農民生活在極端的貧困之中。在全國最落後的安徽和甘肅省境內，連年的災荒造成了累累的餓莩。儘管毛澤東不斷地嘲弄美國祇不過是一隻「紙老虎」罷了，他自己夢寐以求的強大赤色中國，充其量，也祇是一條假龍而已。

此外，在西方世界，對中國「古拉格」的指證愈來愈多，終於掀開了中國集中營制度的殘

酷內幕。蘇俄的「古拉格」沒什麼值得嫉妒的。外國「貴賓」以及被騙而促進「人民友誼」的華人團體，也不再這麼容易就被中國宣傳的簡陋陷阱所矇騙。同時，西方的觀察人員們，即使是一向即爲北京喉舌的那些人，也群起而攻之，指責毛澤東時代的屠殺行爲。至於法國境內的毛澤東主義分子，以及對「偉大的舵手」歌功頌德的人們，則面紅耳赤地快快收拾文房四寶，草草結束不再有內容的革命論戰。

面臨如此嚴重的脫軌，黨的指導路線一定要有大幅度的修正才成。北京當然不會放棄馬克思主義。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老經濟學家陳雲，就已經感覺到太過於自由化的危險了：「群衆想要掀開鍋蓋。一旦鍋蓋被打開，我們的權力就面臨了危機。」對權力圈而言，他們祇是要改革共產黨，以便可以在競爭激烈和比賽「進步」的現代世界中苟延殘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召開的「三中全會」中，以剛剛獲得平反的鄧小平爲首的改革派獲得勝利。

一、中國改弦易轍

在一個清爽的早晨，整個中國逐漸地從睡夢中清醒，睜開惺忪的睡眼，驀然發覺東方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所欽定的血紅了。《人民日報》解釋說，階級鬥爭與揪反革命分子已經不再是第一優先了，從現在開始，要把所有的精神和力量投入實現農業、工業、科技及國防四大現代化。「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變成了中共百萬忠貞幹部新的政治信條。

以前被統戰捧上天的毛澤東主義的模範勞工，變得一文不值，大家轉而嚮往「萬元戶」。這

些「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新英雄們萬歲！在鄉村，他們賺錢又快又多，方法卻非常簡單：在人民公社公共造產的時候，一個個懶得像條蟲；土地一旦發還私有，一個個勤奮得像條龍！政府再度鼓勵家庭生產，很快地，人民公社變成了痛苦的回憶。所有的報紙，所有的地方電台，談的都是要打破毛澤東時代，不管勞動量，不管能力高低，大家等酬的「鐵飯碗」。毛澤東式的平均主義，曾經風騷一時，星移斗轉，現在則是鄧小平式的不平等萬歲！這種實際政策，很快地就看出結果：五穀的生產量，有著戲劇化的增加；從七〇年代的三億噸，跳增爲一九八四年的四億七百萬噸。這個紀錄到現在是高高在上。中國人終於在肚子餓的時候，又有東西可以吃了。

至於城市，情形也是一樣。從一九八四年十月開始，中國實施了野心勃勃的「都市改革計畫」。這個計畫的策劃人，當時的中共「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慘案後，流亡法國。工廠裏的「大鍋飯」制度被優秀勞工獎金制度所取代。被毛澤東王朝臭罵了三十餘年的人類剝削的代表作——私人事業，現在卻變得合法化了。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走的那一年，手工藝生產者與商人等「個體戶」，祇有三十萬；到了一九八八年時，卻有二千多萬戶。在某些地區，一些私有工廠甚至擁有上千的職工。整個中國再度發高燒：向錢進。新中國的工業城，再度引用童工，不，應該說得正確一點，剝削童工。在文革時期會被判處死刑的賄賂，現在卻是沒有了它什麼事也甭想做。由高幹子弟形成的新階級，逐漸取得了中國的主宰權。這群得天獨厚的紈袴青年，時常在路人羨慕的眼光下，騎著極爲豪華的摩托車到處兜風。

從前毫不猶豫傾倒在毛澤東腳下的西方，又開始熱情洋溢地到處讚揚「小鄧」。被某些西方的雜誌評選為「當年名人」的鄧小平，志得意滿地不斷重複他那句具有魔力的諺語：「不管貓是黑是白，會捉老鼠就成。」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誇張地認為，這是中國新的經濟革命。甚至有些不動腦筋的人，認為中國成為了民主國家。另外有些人則預言，中國會走回資本主義的路線。然而國家大事，敗壞到這種地步，中國除了改弦易轍之外，難道還會有其他別的辦法了嗎？在這種情勢之下，一個主政者，不再頑固地死命抱著已經是千瘡百孔的惡劣政策，這有什麼光耀，有什麼勇氣值得如此大肆地吹噓呢？

然而，即使是當權政府，不得不發動幾次「反精神污染鬥爭」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界而言，「開放政策」多多少少還是有狂風大雨的暴風眼的作用。有幾次，政府幾乎控制不了。說真的，二十年來，中國官方媒體和大學，從來沒有這麼大膽，這麼自由地討論思想問題。當然權力圈也毫不遲疑地，把能夠對他們造成威脅的反對人士一一下獄。他們之間，最為出名的一位，就是魏京生。他是最先在「北京的春天」時，為了批評鄧小平而付出慘重代價的幾個人之一。祇是為了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他從一九七九年起，就被祕密地關進足以令他發瘋的黑牢。在那個時候，他有位名叫梅亞美的藏族女朋友。從那個時候，這位高幹的女兒就移民德國，住在慕尼黑。還有很多其他的不滿分子，被經過草率的政治審判後，即被押監。

在宗教方面，中國政府宣稱，一定會遵守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傳教行動，還是受到嚴密的監視；不過在城市裏，不少的佛廟、清真寺及教堂重新開放。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其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北京強調：「中國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不過他們並不反對別的人有宗教信仰。他們並不贊成用強迫的方式來廢除宗教。」①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這又是一種戰術上的改變，但是基本目標還是不變，因此相信中共會不再繼續朝清除所有的宗教而努力，是太過於天眞的。中共一向認爲，宗教是妨礙解放，妨礙把個人融入物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有害的迷信。了解到單單是靠壓力，是沒有辦法達成目的，中國新的領導者認爲，隨著經驗及社會的進步，宗教會自我淘汰，根本不需要操心。工業先進國家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大體上說來，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這一段時期，算是一個受了創傷的民族，休養生息的時期。在這十年間，新的改革路線，新的開放政策，讓十億的男男女女，有時間包紮傷口，重享人生的樂趣，衡量到底他們自己的國家窮到那一種地步，也讓他們有機會看看，他們之間絕大部分人，連想都沒想過的外界。在這同時，中國也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她終於摸清楚，她經濟的落後程度。從此，企望不再是個妄想。

二、胡耀邦愧極淚下

這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對西藏意味著什麼呢？西藏的經濟改革，是從中國對在「雪域」所犯下悲劇性的錯誤，所做的自我批評開始的。這個自我批評還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〇年到西藏視察時的手筆，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幹部，是這麼坦誠地對待西藏的悲劇。胡耀邦是個充滿著活力而且聰明的人，也許也是個誠實的人，至少他是個眞正有勇氣敢大聲談論在北京被列爲禁忌的問題。曾經參與北京權力圈內部運作的阿沛晉美對胡耀邦和萬里副總理，看到西藏處於何等困境時的反應記憶猶新。他說：「當胡耀邦和萬里蒞臨西藏的時候，最讓他們震驚的是西藏的貧窮。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表情中看得出來。三十年來，中國在西藏做了不少的努力，也投資了幾十億元的人民幣，然而西藏人民和西藏還是停留在極端的貧困當中。那個時候，拉薩連一棟現代化的建築也沒有。胡耀邦淚流滿面地問：『中央政府花了幾十億在西藏，你們是怎麼花這些錢的？全部都丟進雅魯藏布江了嗎？』他發現西藏的經濟，已經不再像當年，可以自給自足了；現在的西藏，必須完全仰賴中國大陸。」根據「中國少數民族中央研究院」西藏系主任，曾經是胡耀邦的顧問王堯教授的說法，在視察的時候，胡耀邦還說過這些話，「我們認爲，我們的黨撒手不管這些人。我覺得非常悲痛。我們工作了將近三十年，西藏人民的生活，卻沒有任何明顯的改善。難道我們不應該受責罵嗎？」②這些眞實性不容懷疑的聲明，相當於中共領導人自己，對中國政府於一九五〇年以後，在西藏的政策做了正式而且全面的譴責。

阿沛晉美還說：「所有的消費品，包括食品，都是進口貨；西藏則輸出一些礦產、草藥及木材。如果中國大陸停止送貨，西藏的經濟將整個癱瘓崩潰。胡耀邦說了一些在中國到現在爲

止還沒有人敢說的話：『這些』，是典型的殖民主義。』他意識到西藏受到了極爲嚴重的損害：所有的西藏人，不分僧俗，都受到嚴重的創傷，漢人和藏人的緊張關係，已經到達劍拔弩張的地步了。胡耀邦每到一個地方，就痛罵漢籍幹部，讚揚西藏人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高度的文明；讚揚他們的活力，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的勇氣。」③

胡耀邦視察西藏的第一個直接的影響，就是把共產黨的區黨委會書記任榮免職，另外起用於一九五〇年開始，就一直在西藏的部隊首長陰法唐。他也採取了一連串嚴厲的措施，期以挽救回天乏術的西藏：西藏的農、牧民免稅三年，百分之八十五的漢籍幹部，均得離開當地；加強西藏的自治。胡耀邦說：「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西藏的實際需要不能配合，西藏有權利拒絕、送回或修改。」在西藏的漢籍幹部馬上批評這些決定，並且寫信向北京報告，申訴黨領導人的錯誤。阿沛晉美認爲「胡耀邦是個有度量、坦率而且誠懇的人。他承認錯誤。他的新政策軟化了緊張的局勢，也許也避免了另一次大規模的種族衝突。如果我們從中國長期利益的角度來衡量，胡耀邦的政治決定是明智的。」

三、中國的祕密武器：人口

雖然在北京還是有一些中國領導者，對西藏頗有好感，也比較了解實際的情形，然而中國可絕對沒有想要放棄她在西藏的主權這個念頭。此外，胡耀邦的命令，在執行上受到被稱爲「大漢沙文主義分子」的中國幹部們的頑強抵制而困難重重。在胡耀邦所決定的衆多措施中，至少

有一件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正面效果，反而帶來了相反的負面影響。撤走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幹部這個決定，受到極大的抨擊。很快地，在北京沒有人再提這一件事。事實上，由於對願意移民到西藏的人，在其薪資中加發津貼，使得在西藏的中國移民人數不斷地增加。一位在西藏的中國幹部所拿到的薪餉，往往是比在中國內地的同僚要高出三倍。這些津貼是有必要的，因為一位中國人是不會眞心願意離鄉背井千里迢迢地跑到西藏那個塞外蠻荒去的。唾手可得的利益，引誘了更多的中國人到這一片荒涼的地方。西藏城市裏，有很多的行業全部換了人：由於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競爭，很多西藏人開的商店和手工藝品攤，都撐不下去而關門大吉了。

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新聞處最近發表統計數字認為，有七百五十萬的中國人定居在西藏的前、後藏，以及被劃入青海、甘肅、四川以及雲南的藏人居住區。很可能有二百萬的中國人在前、後藏，至少有二百五十萬在安多，三百萬在康；然而祇有一百九十萬的藏人在前、後藏，八十萬在安多，三百三十萬在康。「流亡政府」新聞處下結論說：「中國移民在西藏的數量，已經達到令人恐慌的地步了。我們有十足的理由擔心，一旦中國目前在西藏的政策成功了——所有的跡象均顯示她是成功的——藏族人民將在他自己的領土上，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數民族。發生在滿洲人（三十五個漢人對一個滿人）、突厥人（三個漢人對一個突厥人）和蒙古人（五個漢人對一個蒙古人）身上的歷史，即將在西藏人身上重現。這個政策的目的，在於使用大量的，而且是不可逆轉的移民，靠著實力來『解決』中國要把西藏收歸版圖的企圖。」④

中國政府認為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實際上的情形，是一群群受過技術學習與訓練的漢人到西藏去協助發展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然而由於高原的氣候，以及當地人民的態度，

他們都是按期輪調。原則上，在西藏工作幾年後，就調回內省。」⑤北京引用一九九〇年六、七月間所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說，在「西藏自治區」有二百十九萬六千居民，其中祇有八萬一千二百十七名漢人，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三．七⑥。根據這個普查統計，在十一億三千三百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零一個中國人中，漢人佔了百分之九十一．九六，其他的「少數民族」，主要是回族及藏族，則佔百分之八．〇四。這些數字顯示了西藏的人口，以及在西藏的漢人的人數都有增加。因爲中國政府於一九八六年年底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中，在「西藏自治區」有二百零二萬四千人，其中漢人七萬三千人。當時在「西藏自治區」有一百七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名藏人，在四川省有九十二萬二千零二十四名藏人，在青海省有七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四人，在甘肅省有三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人，在雲南省有九萬五千九百十五人。根據北京的數字，生活在全中國各地的藏人數目不斷地在增加，他們的總數，從一九六四年的二百五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人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人，一九八六年的三百八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七人，到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結果的四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人。

對漢人在西藏的人數問題，觀察入微的人都會說，這些祇是在「西藏自治區」的漢人的統計數字而已，可沒有包括在康及安多地區的漢人，何況在這兩個地區的漢人佔有絕對壓倒性的多數。除此之外，中國的統計數字，和往昔的一樣，並不包括在西藏的駐軍。根據最近的估計，中國在西藏至少駐紮有三十萬的大軍。我的同行雅士倍．貝克（Jasper Becker）引用中國政府一九九〇年七月的一份「機密報告」說，包括武裝警察在內的中國部隊人數祇有四萬，印度則在邊界駐有二十四萬部隊。印度駐軍裝配齊全，擁有三個軍、九個師、二十四個旅、十一個空

降連、四百架飛機和九十輛坦克；面臨著印度如此強大軍力威脅的中國部隊，祇有兩個山區步兵旅、十三個工程團以及六十五個單位的武裝警察。在拉薩祇有一個機械化步兵團⑦。我卻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份所謂的「內部資料」的文件，大大地低估了中國武裝部隊的眞正兵力。首先，它祇提到「西藏自治區」，而不包括鄰近各省的廣闊藏人區。再者，我認爲這份爲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人民解放軍參謀總長遲浩田視察西藏而準備的「機密」文件，並沒有披露祇有極少數中國領導幹部才知道的眞正數字。中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也沒有包括商人、工匠、廚師及其他到西藏做私人生意的個體戶。我們還認爲，被政府派往西藏的中國幹部人數被大幅地低報。這些壓低的數字還不包括他們的眷屬。在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淸查報告中，有六百萬的藏人，在中國的人口普查報告中，祇有四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人；這其中的一百四十萬六千六百七十名的藏人跑到那裏去了呢？我們可以確定，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都在玩數字遊戲，而虛報和事實有著極大出入。

至於胡耀邦所提，強化西藏自治區的問題，據阿沛晉美說，也是變成一紙空文。「不少的藏籍幹部都升了級，不過他們還是一樣祇負責一般性的日常業務；漢籍幹部仍舊是老大。這種情形不會有什麼改變的，以後也不會有所改變，因爲自治本身就沒有實體。在「自治區」和國內的省之間，沒有任何的區別。此外，關於對中央政府的決定的否決權問題，「我時常在想，胡耀邦是不是在一時衝動的情況下，說了這些話。誰敢否決？」免稅也許是唯一成功的措施。它不但被確實執行，而且三年到期後，還再延長兩年。然而陷入萬丈深淵的西藏，並不是這種細微的財務刺激，就可以起死回生的。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西藏和中國大陸之間，生活水準的差距

愈來愈大。

無論如何，我們是要擔心，總有一天，所有的少數民族居住區，都會一個接一個地成爲中國人口膨脹的犧牲品。這種情形已經在新疆發生了。英文版《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報導說，北京當局已經選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喀什地區，做爲因爲「三峽水壩」工程淹沒家鄉而被迫遷徙的約有五十萬湘北人的新居。該報明確指出，如果水壩計畫正式通過，馬上就有十萬的中國人要遷徙到喀什縣。規劃完成後，該縣可以容納四十八萬的中國人。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就已有大量漢人湧進該地區，這一類的移民，一定會給當地帶來很嚴重的不平衡。

四、與達賴喇嘛的早期會談

對西藏的開放政策，也可以從中國權力圈嘗試和達賴喇嘛的親信進行對話上看出來。一九七八年，一個鄧小平的特使，在香港和達賴喇嘛的胞兄嘉洛敦珠會面。特使解釋說，鄧小平希望結束二十年來的懷疑，也希望重新建立從一九五九年暴動後開始中斷的合作。嘉洛敦珠被邀請到北京和鄧小平見面。鄧小平趁這個機會承認中國在西藏犯了「錯誤」。他提議要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爲西藏及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步而努力。言下之意：他必須要放棄所有西藏獨立的念頭。

對和中國會談的時機問題，經過多方面的考察之後，達賴喇嘛同意了，並且向中國政府建

議，派遣西藏預備使團到中國。由他的另外一位胞兄羅桑桑天所率領的第一個西藏代表團於一九七九年元月抵達西藏。預計總共會有四個代表團。他們的任務是對西藏的情勢，做一個總結報告。第一個代表團所到之處，藏民夾道歡呼。一大群的藏人迫不及待地在路上，在村子裏，在都市和他們見面：歇斯底里式的場面層出不窮，使得中國的陪伴人員惶惶不可終日。一些淚水汪汪的藏民問達賴喇嘛何時返藏，其他的人則相反，要他不要回來自投羅網。

第二個代表團於一九八〇年五月訪問西藏。他們在拉薩的期間，造成了無比的喧囂，一九五九年痛苦的回憶，再度像幽魂般地纏繞著激動的人心，以至於中國政府心寒膽慄，而決定中止他們的訪問。同時在西藏的第三代表團，也同樣地提早收拾行囊離開西藏。第四個代表團於一九八二年抵達北京。這個由達賴喇嘛內閣中的三名重要成員所組成代表團的任務，是和中國特派代表共同做個初步的研究，以便爲正式的談判鋪路。這個任務完全失敗。一九八四年到北京的第五個代表團也是一樣，趁興而去，敗興而歸。

中國人是不是眞正地有誠意呢？還是祇是在玩拖延戰術？他們眞的決定要讓步了嗎？還是祇是想要把達賴喇嘛騙回中國，然後把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伎倆，依法炮製，使達賴喇嘛失去作用？八十年代後期，在達賴喇嘛內閣中擔任多年外交部長的洛地嘉日是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團的團員。一九八八年十月，在他達蘭薩拉的家中，他向我解釋這幾次訪問的情形：

> 經過兩次訪問後，我的感受是：他們眞正有明確的意念，可以提出來討論，或是由於內政的因素，使他們面臨困難的處境而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政策。或者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這

種打算？他們也祇不過是在玩弄遊戲，來拖延我們，以便得以繼續他們在西藏的人口侵略政策。我們相信，很不幸的，這就是中國人對西藏問題最後的解決方法。

在這兩次的訪問，中國代表團都是由中共黨政委習仲勛、楊靜仁和伍精華負責。伍精華在不久後，即被任命爲西藏共產黨的頭子。中國很巧妙地運用大衆傳播工具，在西藏和中國人民間，製造這幾次訪問目的的假象，而使西藏代表團有被騙及被利用的感覺。譬如說在第二次訪問的時候，事先並沒有說好，在會談期間會有記者參加；有一天，西藏代表團突然被擠進一間坐滿中國記者的會議室。掉進陷阱的西藏代表團，趕鴨子上架似地和中國代表團合影。中國代表團向記者們解釋說，北京政府寬容地允許達賴喇嘛回國；事實上，如果從現在起，達賴喇嘛的品行良好的話，政府將允許他繼任人大副委員長。

洛地嘉日還記得，這些「很自然地，讓所有注意我們的人，有一種感覺，認爲在我們的備忘錄上，除了達賴喇嘛要返回中國的問題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事情。再者，中國人把我們當小孩子一般地教訓：『你們要知道，如果你們夠乖，如果你們不再犯以前的傻事，我們就讓你們回來。』」

五、西藏開放觀光

在北京試探和達賴喇嘛達成低盪的可能性的同時，中國政府採取了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措

施，一項中國政府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會造成如此重大影響的措施：開放西方觀光客到西藏旅遊。從一九五〇年開始，除了特殊情形之外，祇有一小部分的蘇俄顧問以及「中國之友」有機會到西藏觀光。一九八一年，西藏被定爲旅遊開放區。祇要有「旅行證」就可以買去拉薩的飛機票。數百名走運的人，急急忙忙地花了一大筆錢參加旅行團到西藏走一圈。

到西藏旅遊的人數直線攀升，而達到了一九八七年的四十三萬人次。單單是一九八七年這一年，中國就賺取了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約三千五百萬美元）。在拉薩的中國旅遊事業發展的辦事處——旅行社，對外國旅遊客可能會爲中國國庫帶來的財富充滿著美麗的憧憬。一九八五年的時候，西藏旅遊部門的漢籍負責人對我說，根據官方的預測，在一九九〇年的時候，西方旅遊客的人數，將會高達每年五十萬人次！在拉薩、日喀則及其他的城市裏，人們開始狂熱地在極短的時間內，蓋了一批批西藏人聞所未聞的豪華賓館。他們從中國內地徵調勞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前方，蓋了一棟標準化的「拉薩賓館」。是否有必要指出，這棟大樓的建築設計和西藏格格不入？我們相信，中國建築設計師們把這棟樓的所有房間，都設計成不朝向布達拉宮這件事，絕對不是偶然的。相反地，他們設計了一間貼有史特龍海報的「藍波酒吧」。

爲了更能滿足這些「外國友人」享受異國情調樂趣的要求，他們也加緊進行整修某些寺廟的計畫。他們在草草整修的寺廟的門面、廊柱上塗了嶄新的油漆。空蕩蕩的佛堂，擺上了嶄新的石膏佛像。這些新的旅遊勝地，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中國政府宣稱，到目前爲止，他們已經在重建和整修不止一千四百座的寺廟和佛堂上，花了四千三百萬元人民幣。根據他們的說

法，中國也已經決定撥款四千萬元人民幣，分期整修布達拉宮⑧。眼看這些事實，非常高興能夠重建他們的民族財富，西藏人也多慷慨解囊，共襄盛舉。西藏的藝術家們，還毛遂自薦要重繪壁畫，要把廟頂重新上金。

大部分的中國人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爲什麼，怎麼西方人士會這麼嚮往西藏，爲什麼西藏能夠這麼容易勾動他們的情感。不過在北京，他們認爲，既然是這樣，那好吧。就把西藏改造成這個世界上有錢觀光客的新銷金窟吧！讓那些飲食過量、大腹便便的美國人到西藏去花他們的美金吧！

我們也可以懷疑，在中國的策略中，是否有其他的打算：很多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對西藏的觀光侵略，遲早可以把西藏的傳統衝磨消失。大量的觀光客，可以完成在文革打打殺殺之下，沒有辦法完成的任務。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能夠在被成千上萬的觀光客踐踏之後，依舊完整無缺？尤其是這一群群的烏合之衆，經常毫不尊重當地的傳統與習俗。中國的主宰者相信金錢的力量，以及西方物質的誘惑，到頭來終究會腐蝕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倔強的社會。中國大量印製廣告，向西方觀光客吹噓「永恆西藏的精華」、「世界屋脊的寶藏」，並且索價極昂。行程中包括到西藏幾天的中國旅行團的費用，很少是低於兩萬法國法郎的（大約折合九萬台幣）。

在美國、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到處吹起了西藏風。有時候，這些觀光客還爲了到香拔拉旅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上了年紀的人而言，從巴黎或紐約溫暖舒適的套房，事先沒有經過任何的熱身運動和緩衝適應期，直接坐飛機長途跋涉，飛到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空氣稀薄、氣候寒酷的西藏高原，並且在那裏停留幾天，是非常劇烈的體能活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承受

得住的。每個夏天，中國的飛機都要從拉薩將一副副的靈柩運回北京。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西藏也開放個人旅遊。逐漸地，西藏的其他城市也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開放城市的名單。西藏成爲背著背包環遊世界尋求新刺激的年輕人的最愛之一。不論有沒有許可證，這些不屈不撓的青年男女，從加德滿都過來，沒有翻譯，不帶導遊，走遍了西藏的每一個角落，有的甚至在西藏來來去去旅行了好幾個月，拜見了座座的神山聖湖，也領教了僻野窮鄉。從來沒有見過白皮膚、藍眼珠、金頭髮的西藏人，在驚愕之餘，熱情款待。很自然地，也很快地在這些外國人和當地居民間，建立起友誼關係。看了那麼多在西藏的破壞行爲，一個身心正常的西方人，怎麼可能不同情藏民族呢？

經過官方安排到西藏觀光的旅行，祇能留下短暫的回憶；個人旅行卻可以和藏人建立起眞正的關係。兩個互不相識的種族，一邊是西方白種人，一邊是藏族人，破天荒地面對面、眼對眼，深深吸口氣互相打量著。在寺廟破爛的大殿裏，躲開了可能有耳朵的隔牆，喇嘛們極爲樂意地向這些訪客詳細解說西藏的情形。他們的說法，當然是和中國旅遊部門所印行的簡介上面所說的大異其趣。爲了維持這一段珍貴的緣，數以百計的小喇嘛開始勤奮地學習英文。

在民房裏也是一樣，圍坐著酥油茶，細聽他們訴說中國人是如何讓他們忍無可忍。祇要不是聾子，那一個西方遊客沒有聽到過這句話「中國人不好！」呢？比較好奇的遊客，則蒐集一些有關三十年來動盪不安的第一手資料證據。面對著一九五〇年以來，第一次對他們心存好感又肯細心聽他們說話的人，在沒有中國人的場合下，他們都情不自禁而且毫不保留地向你訴說他們的痛苦與期望。儘管西方記者受到他們中國陪同的嚴密監視，西藏人還是很成功地頻頻向

他們傳遞有關違反人權事件的訊息。當您和一位西藏人握手的時候，他會當著中國官員的面，神不知鬼不覺地塞一個紙團給您。

經過數十年與外界的隔離，藏族人民終於找到了證人。這些遊客相信他們。這也是第一次西藏悲劇在西方報紙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回響。至於中國，她也察覺到她被西藏的開放政策狠狠地倒打一耙，不過卻也為時晚矣！

六、死灰復燃的宗教

在一九七九年所採取對宗教給予較大容忍的政策，也在西藏實施。如果我們就因而像中國政府在矇騙國際視聽一樣，說在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那是言過其實了，要不然就是完全錯了。中共領導幹部完全沒有放棄要掃除人民的鴉片——宗教的想法。閱讀中國官方資料，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宗教是一種唯心主義論的意識形態。她是和科學以及辯證唯物主義完全相對的。」「她不能一次就被廢除。要削弱她的影響力，需要長期的、細心的和反覆不斷的教育。在還沒有發展到某一程度的共產社會之前，宗教是沒有辦法完全廢除的」⑨。中國要廢除所有宗教的想法，在此一覽無遺。

隨著重建和整修西藏主要寺廟計畫的進展，「雪域」好像又尋回昔日的宗教生活。中國新聞媒體說得天花亂墜，唯恐天下人不相信在西藏一切如昔：「到處可以看到燒香的青煙，成螺旋形地在寺廟中裊裊升空，隨風而散。菩薩像前的油燈日夜不斷。絡驛不絕的善男信女，繞著寺

廟唸六字眞言，俯爬在路上祈禱。大部分的藏民家裏，均設有供佛的壁龕，佛經也公然地擺在桌上。」「中國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西藏的喇嘛教徒可以自由地從事宗教活動。他們可以在家裏安設祭壇，或擺置誦經台，他們也可以每天祈禱。他們還可以到各地的寺廟去祈禱、去奉獻。各項的宗教慶典也都是允許的。」根據北京的報導，在西藏的寺廟中，大約有三萬四千的和尙，年紀最輕的祇有十六歲。⑩

不可否認地，中國政府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大大地放鬆了思想上和治安上的枷鎖。中國幹部以爲放鬆韁繩，就可以控制這個有限度的自由化過程。這是沒有把藏族人民對宗教的迷戀，以及他們精神上的飢渴算在裏面的如意算盤。宗教仍然是文化的酵素。中國佔領西藏二十年了，卻沒有能夠動搖他們的信念。政策一開始轉變，成千上萬的藏族人民老的、小的；勞心的、勞力的；城市的、鄉下的；游牧的、定居的，又開始我們認爲不可思議的行爲。

在拉薩大昭寺的前面，我看到一群群的朝聖者，以無比的毅力和虔誠，連續祈禱了好幾個小時。看著這些人不尋常的行爲，我是疑問重重。一個虔誠的信徒，必須雙手合十放在頭頂上、面前、口，然後跪下向前撲倒，腹部著地，兩臂向前伸直，額頭著地。站著的人，則不斷地手搖轉經輪、口中不停地唸著「唵、嘛、呢、叭、彌、吽」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咒。有些朝聖者，更沿著「小八角」繞著大昭寺跪拜一整天，有的甚至選擇「大八角」路線，繞著拉薩市跪拜。他們下跪，爬在土灰上，然後再站起來；膝蓋、手肘磨得鮮血淋漓，手裏緊緊握著念珠；如此不停地重複著好幾公里。從遠道徒步而來的鄉下人，胸前都掛著各式各類的護身符。盲從？狂熱？封建遺毒？各位看官自己評斷。不論如何，至少這些證明了，社會主義的魔爪並沒有成功

地擄掠西藏。

和一九五〇年以前一樣，不少的藏人又開始賣血換錢來買油奉獻；甚至有些家庭因爲買油而破產。這些油點亮了西藏各個寺廟、佛堂的油燈。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的暴動之前，有些寺廟又成爲一九五〇年以前的宗教大學，當然在規模上是不能夠同日而語的。中國政府不准他們接受新生。喇嘛和經師的數量，不到一九五〇年以前的十分之一。雖然受到中國政府的管制，這些和尙又開始研讀佛教經典。喇嘛們爲了測驗自己對經文的了解程度而設立的你問我答、我問你回的辯經情景，又一一重現。

一九八二年，班禪喇嘛從一九六四年以來，第一次獲准返回西藏。他的公開露面，造成了一幕幕不可思議的場面。一九八五年八月，當他第二次到拉薩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不少的西藏人，一看到聳肩縮頸穿著用金黃色錦緞配飾的褐色袈裟的宗教領袖時，就不由自主地抖動了起來，並且進入一種類似鬼神附體的狀態。他一到拉薩，消息就傳開了。當地居民知道他將於次日在大昭寺爲信徒降福後，趕著在夜裏就排起隊來，到破曉時分，已經是一條有好幾公里的長龍了；配備有電棒的中國警察，則在一旁心神不寧、緊張兮兮地監視著。縱使班禪喇嘛選擇接受和中國合作，他在西藏的宗教影響力，並沒有因此而削弱。

在西藏的每一個地方，大家都想要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祇要有個外國人在村子裏出現，馬上就有一大群小孩子圍過去，用熟練的英文嚷著：「達賴喇嘛照片，達賴喇嘛照片。」送一張給一位喇嘛，馬上他就把照片放在頭頂上，然後放在嘴唇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上煥發出幸福的神態。每一座寺廟、佛堂的祭壇上，都供奉有丹增嘉措的照片；班禪喇嘛與其他活佛的

照片，很自然地被擺在第二位。有戒心的中國領導幹部，應該注意到這件顯而易見的事實：二十年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損害達賴喇嘛的威望；相反地，更加受到讚佩。共產黨及其領導者對他的抨擊，並沒有對他的人格造成任何的中傷。他以前是，現在還是所有西藏人的神—王。不少他的臣民，指責他近年來對中國的開放做法；可是每一個藏人對他都存有無限的尊敬。這也是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洗腦的一大失敗。

宗教在西藏的重生，是另外一種現象的具體表現，祇是北京了解得太遲了：她表露出一種徹底更新的西藏民族主義。看起來，中共指揮部好像從來就沒有了解過，顫動西藏人心弦的民族主義的實質力量。中國幹部的鄙視與傲慢，他們根本缺乏了解這個民族的精神的能力，給他們帶來了另一件新的煩惱。

在一九七八年後，取得政權的共產黨改革派當中，有不少具有眼光的領導幹部，希望能夠重修漢藏兩族人民間的互信；其中有些甚至還期望能夠達成歷史性的協議。可是派駐在西藏的中國幹部執拗地反對這一類的想法，使得這種事情變得不可能。北京政府不止一次地批評西藏的「左派勢力遺毒」，在共產黨的術語裏，指的是在文革期間調升的幹部，而且在遠離北京的地方，頑固地抓緊他們在西藏地方黨部及政府職位不放的人。一九七九年以後，在中國曾經發動幾次掃除太過於耽戀毛澤東時代的幹部的清黨運動，可是都沒有波及西藏。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拉薩，正在醞釀一場大風暴，可惜中國對此卻一無所知。

七、一九八七年的反中國暴動

第一幕：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達賴喇嘛在舉世注目之下，抵達美國做十天的訪問。第一次被邀請到美國參、衆兩院組合的國會，達賴喇嘛就在那裏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說，他建議和中國對話。這就是著名的〈五點和平計畫〉：

1.把西藏轉化成爲一個和平地區。讓佛教的西藏恢復和平的傳統，重新扮演隔離地區性列強的緩衝國的角色。

2.中國放棄移民西藏的政策。

3.尊重西藏的人權與基本自由。中國政府應該就此釋放數以千計的政治、宗教犯。藏族人民有在思想開闊、企圖和解的環境下，決定他們自己前途的自由。

4.補救及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部署核子武器和儲存核子廢料的計畫。

5.開始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中國與西藏兩個民族間的關係進行坦誠的會談。

八名美國國會議員對達賴喇嘛的這項建議，正式地發表他們對它的個人支持，並且聯合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向他施加壓力。達賴喇嘛在美國的巡迴訪問獲得廣泛的支持，使得中國政府極爲惱火。他們強烈指責美國國會公然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表了一

篇冗長的聲明，表示對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在美國本土上從事政治活動的行爲未加以制止的惋惜及深度的不滿。

第二幕：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國政府在拉薩籌劃了一場令人髮指的公審。一萬五千名的西藏人被召集到拉薩市的「西藏體育館」，參加審判大會。當天，有八名被判囚監，二名被判死刑。其中一位，格桑札西被當場當衆就地處決，一槍斃命，另外一位，索南堅贊也在兩天後被槍決。北京宣稱，這兩名被處死刑的犯人是殺人凶手。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則說，他們是爲活動西藏的獨立而犧牲性命。在體育館裏公開審判，是中共認爲最具有民衆教育成效而不斷運用的一貫手法。許多的西藏人認爲，這個審判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訪問美國的回應。有很多的人認爲，這件事是即將展開的暴亂的發動信號。

第三幕：

一九八七年九月底，在拉薩的政府辦公樓及民宅的牆上，貼出了一張張的標語、海報。根據一些值得採信的資料顯示，這些都是外國人所貼的。這些標語、海報抄錄了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美國衆議院人權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並且控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是一九五〇年以來造成西藏百萬冤魂的元凶罪首。

結局：

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發表演說後的第六天，拉薩公審後的第三天，拉薩發生了令中國政府大感意外的嚴重事件。在這個陽光煦煦的美麗星期天早晨，大約在十點鐘左右，十幾位西方的觀光客正優哉游哉地在拉薩市區裏觀光，其中大部分正在出神地注視著大昭寺的珍藏。數百名從西藏各地坐巴士，坐卡車，騎馬或是徒步而來的朝聖藏人，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拉薩舊市區的中心廣場。突然間，二十六名手持著代表自由西藏的藍、紅、白、黃旗幟的喇嘛，穿著茶色的長長袈裟,繞著大昭寺跑了起來。「雪山獅子旗」上畫著兩隻在三座大雪覆蓋的峯頂（代表西藏、康及安多）前面咆哮的獅子，以及藏傳佛教的法輪。然後在一群呆若木雞的人潮前面，他們開始高聲喊叫：「西藏要獨立！」「中國人，滾出西藏！」這一小撮的人，沿著環繞大昭寺的八角街遊行了五圈，然後走向「西藏自治區」的「人民政府」辦公大樓。這次示威遊行，前後加起來還不到一個小時。

剛開始的時候，中國警察手足無措，經過一陣猶豫不決之後，他們開始干涉，並且進行逮捕示威遊行的人，平常並不報導中國國內種族糾紛問題的新華社，在三天後發布了這一示威遊行的報導：在西藏人的記憶中，這一類的事件，從文革結束以後，就沒有發生過。第二天，阿沛．阿旺晉美以中國人大副主席的身分，發表談話，認爲「這些擾亂治安的騷動分子，祇是一小撮人，孤立的，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虎頷捻鬚，並且高聲疾呼對自由的渴望，的確是需要有相當膽量的。這些示威遊行的人，事先一定也很清楚地知道，他

們的行爲一定會受到中國以叛變罪犯的名義，而施予嚴刑峻責的。然而這個第一次的警報，也祇不過是另一次大規模暴亂的前奏而已。

在這件騷動結束後不到一星期，還沒有完全消化的北京領導，再度受到一次更爲沉重的打擊。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中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八週年。這一天是國慶，因此是不上工的國定假日，北京顯得一片寂靜。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習慣上這一天是政府幹部好好利用國庫公帑大擺筵席，互相慶祝大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日子。然而一九八七年的十月一日，對北京卻是個可怕的夢魘。相形之下，在拉薩，這一年的這一天，卻是令人無比振奮的大好日子。聯結中國最高指揮部和地方的紅色電話，從一大早就響個不停。

早上九點時分，好幾百名的西藏人和平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的廣場。也像平常日子一樣，朝聖者沿著大昭寺繞行，口中喃喃地唸著「唵、嘛、呢、叭、嘛、吽」。其中有幾位穿著紫紅色袈裟的喇嘛，也有一些全身積滿散發出陣陣惡臭的污垢、皮膚上長滿痘瘢的乞丐。當然也有一大群的西方觀光客，他們對事情發生始末的說法一致。突然間，在喇叭聲中，四十餘名的喇嘛每人手持一面小型的「雪山獅子旗」，從大昭寺走出來，口裏大叫反對中國在西藏的口號。他們繞著大昭寺高喊：「西藏是個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一次，中國警察不再遲疑，立刻行動。幾分鐘後，大部分示威遊行的人都被拖入就在附近的警察局。這是一棟三層樓房，居高臨下地監視著這個廣場。

人群中馬上掀起一股極大的喧嘩。很快地好幾百名西藏人，聚集在警察局門口。一陣陣狂風暴雨般的石塊砸向警察局。一百餘名中國警察火急般趕來支援，其中有五十餘名配帶著ＡＫ

—47式衝鋒槍。這是中國製造，行銷全球的仿俄式衝鋒槍。在西藏，維護治安並不是普通警察的任務，而是全責交付武裝警察。所謂武裝警察，就是專門保衛政府機關、外國大使館及外僑住宅區的特種警察。雙方僵持了好幾個小時。局勢愈來愈緊張，不過治安單位堅持不放人。

在警察局前面，武裝警察和群衆對峙；敵對兩邊僅僅相隔著幾公尺的緩衝區。面對著中國的武裝警察，數千名心懷新愁舊恨的西藏老少男女，高聲辱罵中國人。恨從心頭起，惡就向膽邊生。小孩子猛朝頭頂著鋼盔的武裝警察丟石頭。一個小孩撿到一把中國警察落荒而逃時遺留下來的槍，突然，這個小孩手握著槍管用力朝地上打，一直打，打到木製的槍托破裂成片。面對著這幅不可置信的情景，中國武裝警察一動也不動地僵在那裏。臉上流露出畏懼的神情，中國警察感覺到一場嚴重的暴亂就要來臨了。他們在警察局的四週，安置了十餘部車子來加強防護。

西藏人將車子放把火燒了起來。幾分鐘後，一股濃厚的黑煙直衝萬里無雲的藍天。不久之後，警察局本身也起火了，很快地，長長的火舌從窗口翻捲了出來。治安人員握緊了衝鋒槍，接著，整個廣場充滿了自動武器所發出來的噠噠噪音。一開始也祇是朝頭頂上的幾次警告性射擊而已。是那位守在警察局屋頂上，配有手槍的警察，首先直接朝群衆射擊，他可是全神貫注地在打活靶。接著，衝鋒槍也開始向人群直接掃射。前面幾排的人倒了下去，鮮血開始染紅了地面。

有些被關在著火的警察局裏的西藏人、喇嘛，趁亂翻窗而逃。其中有幾個人像兎子一樣被射殺。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來的觀光客威廉•科爾（William Kerr）說：「我看到三個人死在大昭

寺前面：一個青少年背部中彈，一個男士心臟中彈，第三個則是頭部中彈而亡。」來自克里斯特內哈（Kristnehamn）的瑞典籍觀光客拉斯．彼得遜（Lars Perterson）說：「我看到一個男人頭顱破裂倒在地上，鮮血不斷地從他的頭部湧出來。」倫敦來的萊恩．查得柏（Leon Schadeberg）指出另外有一位年約十五、十六歲的男孩頭部中彈，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我看著他死去。大量的血不斷地從他的口中流出來。」此外，一位不願意表明身分的旅客說：「一位婦女走向我，並且把我帶到鄰近的一條小巷子裏。她用中文對我說，有一個人被打傷，馬上就要死了，她希望我能拍幾張照片。他躺在一部運貨的馬車上。這是位二十五歲的男人，胸膛上有個彈孔。他的鼻子、嘴巴不停地嘔出大量的鮮血。人群自動地閃開讓我照相。我正在照的時候，他死去了。我照了幾張。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太多了。」

屠殺一開始，大昭寺附近馬上亂得一團糟。中國武器所發出的清脆響聲，在西藏人群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作用；人數頓時少了一大半。不過還是有一群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留在那裏。憤怒到極點的西藏人，把守在大昭寺廟頂上，正在用錄影機拍攝暴亂情形的中國便衣警察狠狠地揍了一頓，並且把他的錄影器材砸得稀爛。人群把一具西藏人的屍體擺在木板上。高抬過頭，走向紛紛退避的警察。很多西藏人要求外國旅客做證，請他們照相並且向全世界發表這件事實。一個西藏人對西德籍的觀光客說：「我們和中國人戰鬥到底。」另外一位觀光客說：「很多的西藏人對我們說，他們很高興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在附近的商店裏，西藏人看到中國人就臭罵一頓。暴亂很快就侵襲了整個拉薩市的藏人居住區。石塊仍舊不停地打向警察局，而且持續好幾個小時，救火車沒有辦法靠近。警察局的火勢不斷地蔓延，到午後一時許，在一陣轟隆的

撞擊聲中，屋頂倒塌了下來，博得人群的陣陣掌聲。警察局繼續燒了一整個晚上。

死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青少年有個名叫羅桑丹增的弟弟，他現在也逃到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我在他的學校裏見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的是個在外國人面前怯生生、眼光不敢抬起來的小孩。他身上穿的依舊是那一套磨得破舊不堪的中國式衣服。這次的訪問談話氣氛相當沉悶，因爲，據他的主任說，他還沒有在打擊中平復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羅桑丹增。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十一歲。

——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一九八七年，幾月我就記不得了。

——你能不能對我說說，你哥哥被殺死那一天，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看到所有色拉寺的和尚都來了。他們人數很多，也許有兩百個吧。

羅桑丹增停了下來。我們可以聽到他的同學們，利用課間的時間在玩耍的叫喊聲。

——你知道你哥哥是被子彈打中而死的嗎？

——是的，我知道。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事情發生在示威的時候。我哥哥也參加了示威。我哥哥的一位朋友和中國人打架。他們拳打腳踢地打來打去。我哥哥嘗試著把他的朋友拉開，不要和中國人打架。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頭被子彈打到。他幾乎是當場死亡。

——他幾歲？

——我哥哥卡薩大約有十八歲。

——你也丟了石頭嗎？

——我和我自己的那一群在一起。我們也示威。我看見一輛摩托車，我們把它放火燒了。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帶著有火柴。幾個人從油箱中倒取汽油，隨後我們就把這輛車放火燒了。我們大約有六、七個人。那時候中國人還忙得很，因爲他們正在盡力地想要驅散示威的人潮。摩托車就被丟在那裏。

——你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年紀較大的朋友說，所有屬於中國人的東西都要燒掉。所以我們就把摩拖車給燒了。

——你認爲你們這樣做對嗎？

羅桑丹增無言以對。

——當你哥哥被子彈打到的時候，他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他幾乎當場死亡。他的頭被打到。我們把他放在擔架上，抬回來準備火葬。中國人並沒有反對我們這麼做。

——當你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的感覺如何？

——我很傷心。

——你的父母親呢？

——在西藏。

——中國人有沒有爲這件事道歉呢？

——沒有。

——你在這裏愉快嗎？

羅桑丹增沒有回答，他點了點頭。

——你長大以後，想要做什麼呢？

——我要當和尚。

——你爸爸在拉薩做什麼？你有收到他的信嗎？

——他是個農人。我沒有收到過他的信。

——你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嗎？

——有。我有一個哥哥在比爾（在達蘭薩拉附近）。他有二十幾歲了。他在那裏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偶爾會來這裏看我。我很喜歡他。

——你在這裏上些什麼課？

——我學藏文、英文、數學、科學。

——是誰帶你來這裏的？

——我爸爸把我帶到樟木（和尼泊爾接壤的邊界城市）。我們遇見了尼泊爾人，他們把我裝扮成尼泊爾人，並且把我帶到尼泊爾。我有一位叔叔在尼泊爾。是他把我帶到這裏來的。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你恨中國人嗎？

——是的。我憎恨他們。

——你想要報仇嗎？

——要！

在暴亂當天，中國政府幾乎把所有聯繫北京—拉薩的電話線、傳真線都切斷。駐在北京的各通訊社特派員，沒有辦法知道在拉薩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中國政府的目的達到了。不過從第二天開始，就有些記者又和拉薩搭上線了。雖然從拉薩傳來的消息證據鑿鑿，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否認警察向民眾開槍。暴亂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新華社宣稱，西藏示威者奪取警察的槍枝，並且向警察開槍。隨後，一位西藏地方政府的漢籍發言人承認「一些不會使用自己的武器的警察，不小心讓槍枝走火」射向示威的人群。不過他也說，當初下達的是對天射擊的命令。星期五的半夜，拉薩市的牆壁貼滿了反對中國人的標語：「才死二十個，還差得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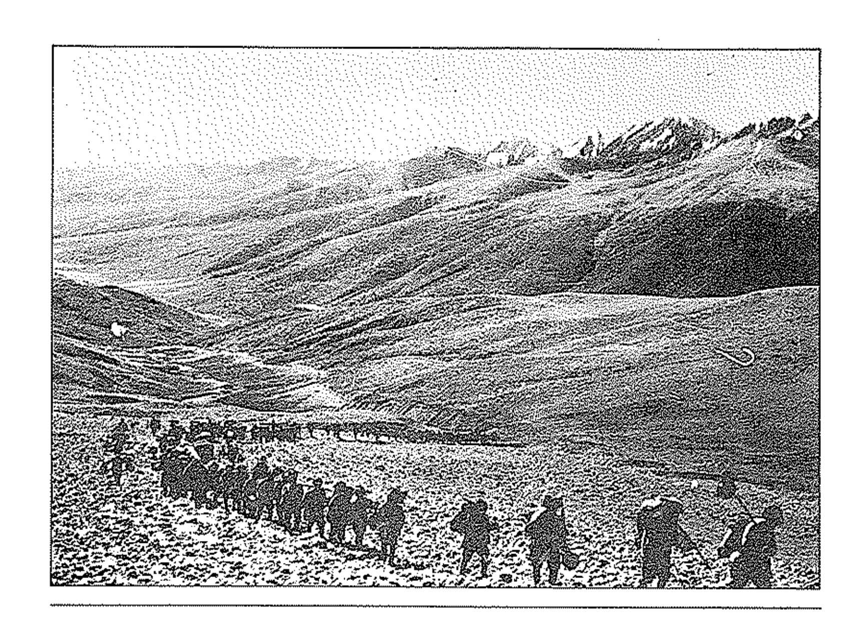
或是「把握我們的機會。中國人，滾回中國！」不久之後，新華社改變了說法，「在混亂中，響起了幾聲槍聲」。她解釋說，暴亂是由達賴喇嘛的擁護者所「策劃、煽動的」。「暴亂被認爲是達賴喇嘛，從事分離祖國活動的直接結果。」《新華社》繼續說，在暴亂開始的時候「有些暴亂分子沿著大街小巷挨家挨戶敲門大喊：『達賴喇嘛宣布西藏獨立，我們都應該跟隨他。誰拒絕參加示威活動，他的房子就會被摧毀。』」這一天的英雄人物，應該首推江巴丹增喇嘛。這位四十九歲的和尚表現出來的勇敢行爲，使得他一舉成名：他不顧熊熊烈火，毫不猶豫地衝進警察局，把被關在裏面的西藏同胞救了出來。全身有幾處嚴重燒傷的他，被人群抬起來在拉薩市區做凱旋式的遊行。在他那張風靡全球的照片中，我們可以在他握拳高舉象徵勝利的手臂上，看到灼傷的疤痕。這個和尚隨即被捕下獄，幾個月後，由於班禪喇嘛的說情而被釋放。他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夜裏離奇死亡。根據地方警察的說法，他死在大昭寺禪房裏的床上：綁在一隻床脚上的一條細繩纏繞著他的脖子。警察下斷論說是自殺。根據其他的消息來源，自殺的說法是不足取的。江巴丹增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理念，祇要有機會，他也不斷地和外國觀光客接觸，告訴他們西藏的眞正情形。他被地方警察謀殺，是不容置疑的。⑪

中國政府發表了一份祇有六人死亡的傷亡報告：全部是警察。西方觀光客所提供的消息則說有十三人死亡，六名中國警察，七名西藏人，另外還有十餘名受傷。大部分受傷的西藏人都不願意到醫院治療，因爲他們怕被抓去坐牢。星期五、星期六連夜趕到拉薩的外國記者，祇看到十幾個西藏人在砸警察局，並且翻箱倒櫃地大肆搜刮。雖然地方政府在星期日半夜裏頒布宵禁令，雖然受到警察的嚴密監視，然而在星期一的時候，拉薩的主要寺廟如哲蚌寺、色拉寺和

甘丹寺等還是很順利地把他們向聯合國求援的信息傳給了西方的記者：「中國人在我們的國土上，建立了暴力的統治，我們要他們離開西藏。我們籲請聯合國及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支持我們的正當要求。我們在受苦。我們西藏人永遠都承認達賴喇嘛是我們的領袖。我們希望那些高喊要維護人權的人士，能夠親自到西藏來看看。」有些標語則呼籲民衆「繼續鬥爭」。星期一，在北京發行的英文版《中國日報》繼續攻擊達賴喇嘛，並且說拉薩的流血事件，激起了「西藏人民的強烈反感及受到中國地方政府的譴責」。這份報紙還說：「達賴喇嘛置中國政府對他的寬恕與善意而明確的忠告於不顧，仍然堅持以西藏獨立的辯護人自居。他的陰謀注定要失敗的。」同一天，中共發言人吳興堂，指責外國人支持西藏的獨立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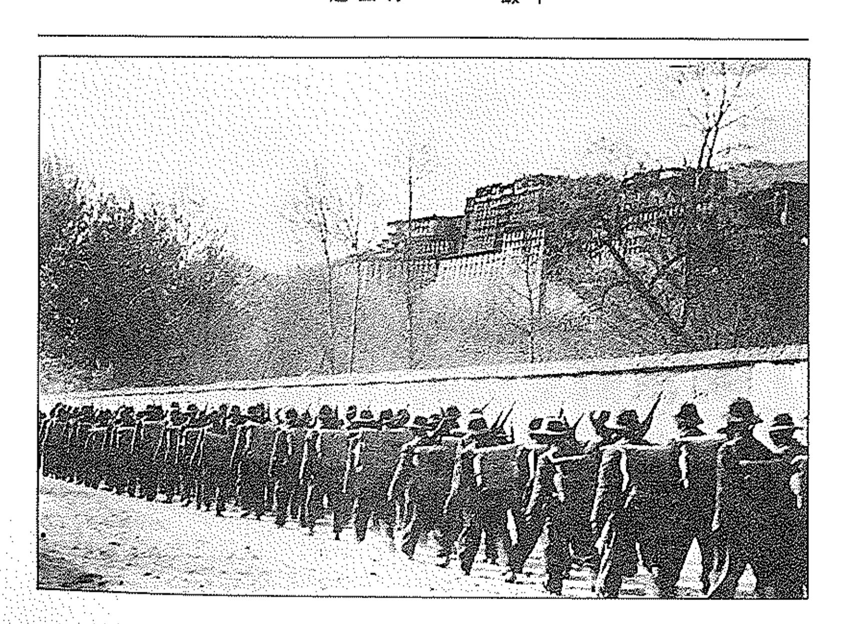
中國政府確確實實是毫無警戒，措手不及。暴亂的第二天，我在成都訪問該市藏族事務局的主任格桑嚢杰。他向我透露說，事情發生的當天，不但是西藏共產黨書記人不在拉薩，連西藏人民政府主席也不在。西藏眞正的強人黨書記伍精華，從九月就到北京參加黨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至於自治區的主席，中國政府在喜馬拉雅高原的代表多吉才讓，早在兩個月前就住進北京一家軍醫院做療養了。大部分在拉薩的重要幹部，也都趁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八年紀念的機會，回到「內地」。權力層峯的癱瘓，在突發的危機下，一發不可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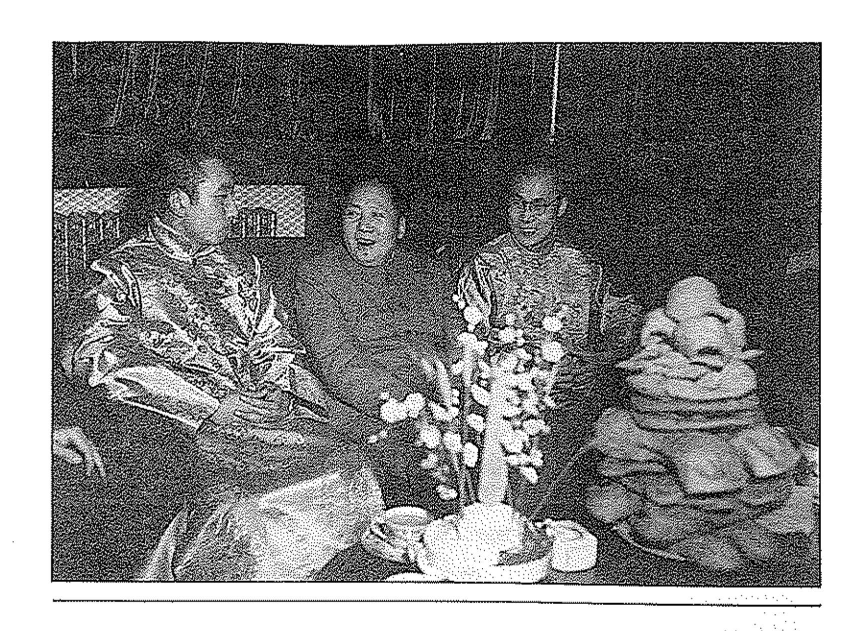
雖然他自己也是藏人，格桑嚢杰直截了當地說，那些暴亂分子都是「反革命分子」，中國政府有義務對他們施行「階級鬥爭」。毛澤東死後的十一年，許多人以爲不再存在的政治術語，再度出現。「在某些情況之下，階級鬥爭在中國還是存在的。像拉薩暴動這一種情形，我們是應該對少數想要分裂國家的西藏分離分子，施行階級鬥爭。他們是『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〇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跋涉在高山峻嶺，向西藏前進。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拉薩布達拉宮。





▲達賴喇嘛(右一)、丹增嘉措和班禪額爾德尼·却吉堅贊(左一)在北京舉行盛大宴會，慶祝藏曆木羊年新年佳節。節日宴會前，毛澤東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交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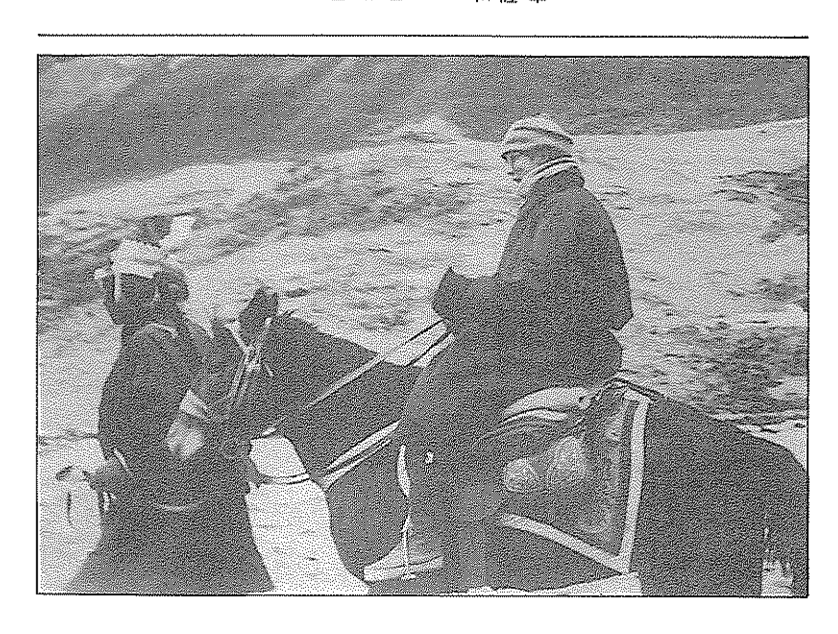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拉薩，除視察駐西藏軍隊外，也安排了一些親善活動。圖爲代表團人員參觀拉薩農業試驗場，陳毅團長（前排左二）把從北京帶來的蘋果樹苗種植在農場試驗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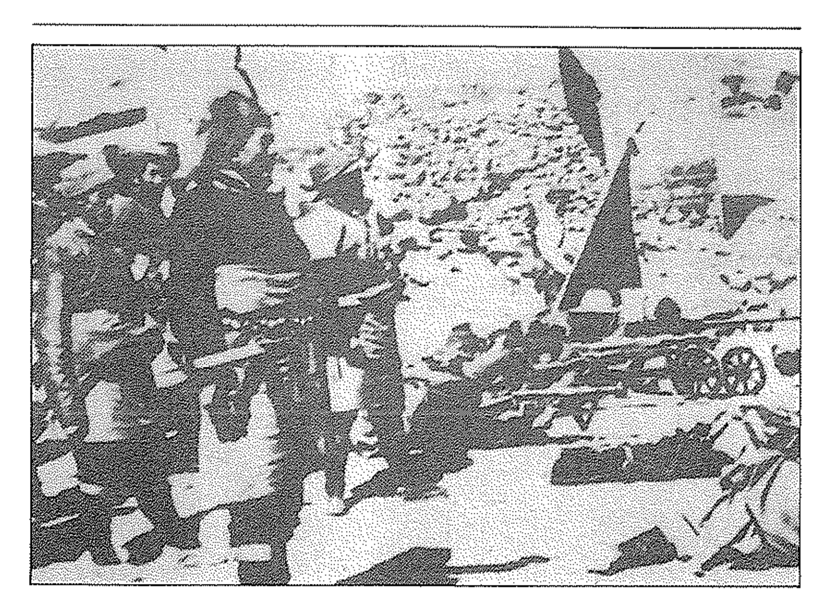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宣傳員向拉薩市民講解政策和散發宣傳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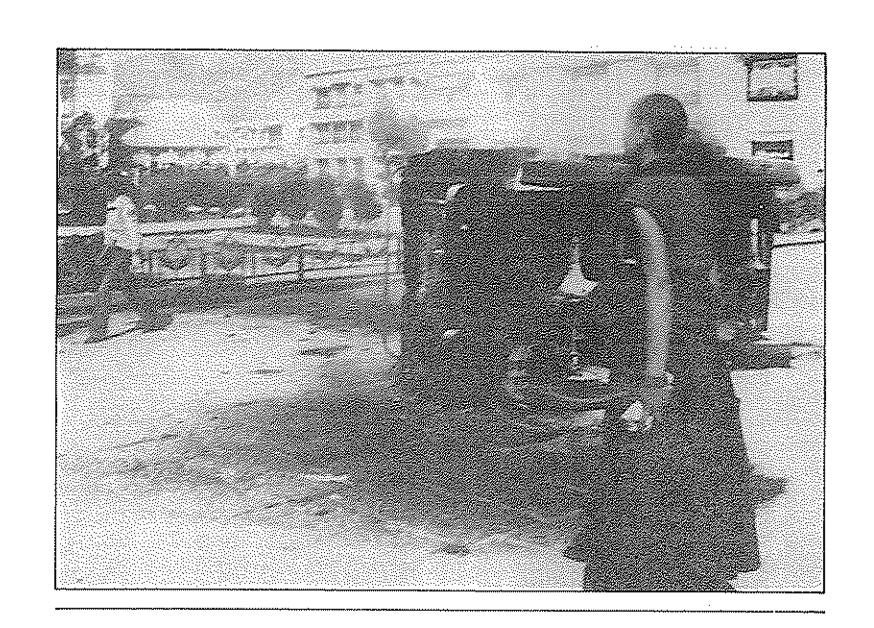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在流亡路上。（西藏流亡政府）





▲▼六〇年代康巴抵抗軍訓練情形。（西藏流亡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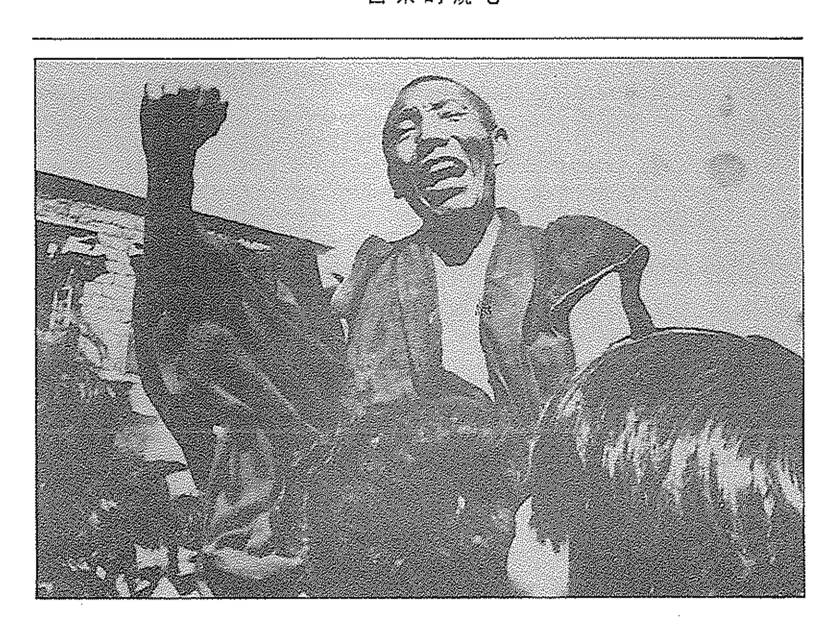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反中國暴動。示威者的主要攻擊目標——警察局。（法新社）





▲▼拉薩一九八七年十月：在火燒警察局中受傷的一個喇嘛被群衆高抬起來。（西藏流亡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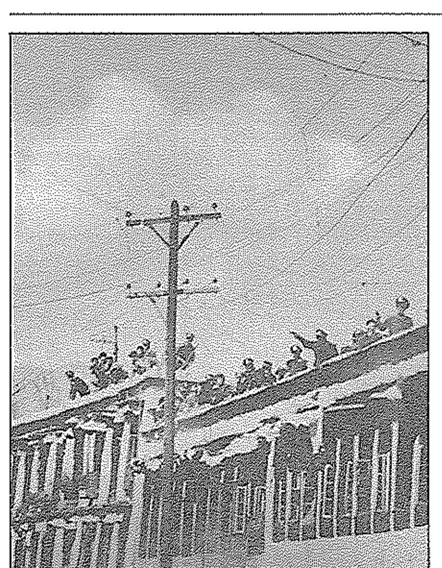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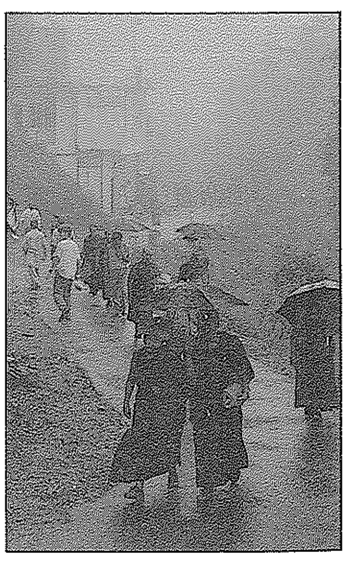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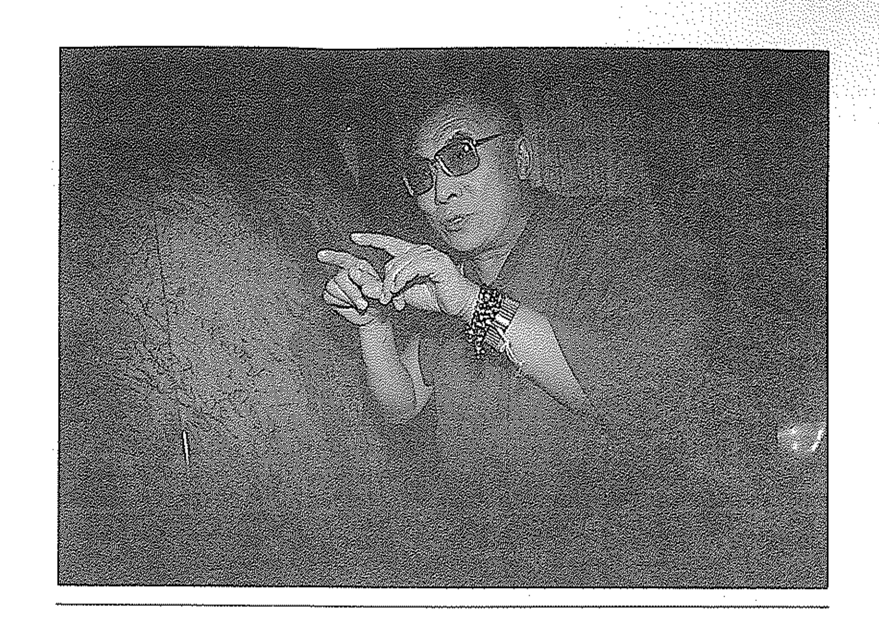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山城達蘭薩拉，海拔雖高，氣候卻像熱帶雨林。在這裡，到處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喇嘛及其他藏人。（葉清芳攝）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反中國暴動。示威者的主要攻擊目標——警察局。（西藏流亡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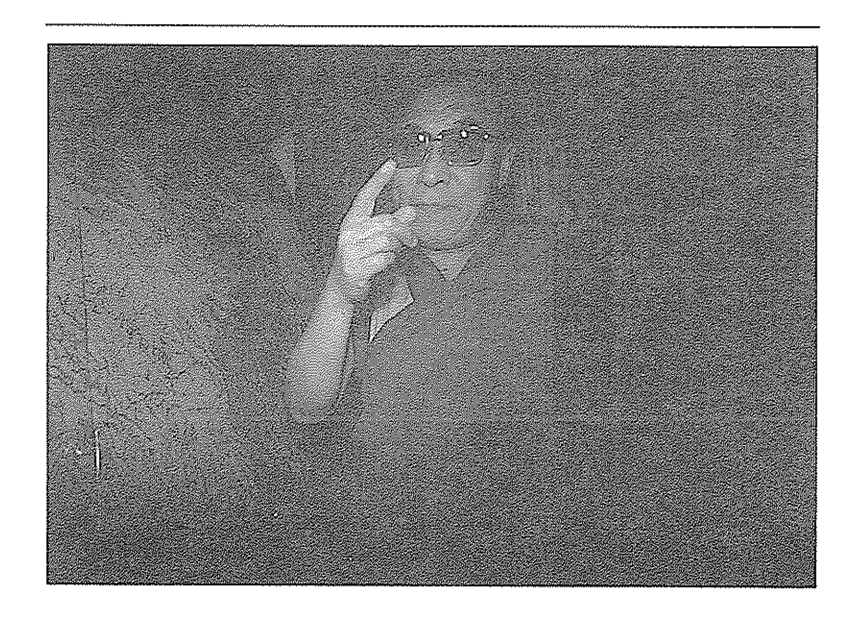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拉薩再度暴亂，警察向民眾射擊。（西藏流亡政府）







▲▼達賴十四指著中國地圖，談論西藏的面積範圍。（葉清芳攝）



暴亂後的第五天，我看到中國外交部新聞處的二位重要幹部坐在經過成都，聯接北京到拉薩的飛機裏。其中一個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負責人劉汝才。他們對我說，他們是要到拉薩去「了解情形」。中國人民航空公司從星期一就接到命令，到拉薩的機票不准賣給外國人。該航空公司的一位職員說：「這些是爲了不讓你們發布有關西藏的消息。」停留在拉薩的西方人士，連續幾個晚上都聽到在拉薩藏人區的街道上不時響起的警察哨聲。至於在拉薩中國人區，店鋪早早就打烊了。被嚇壞了的中國人，太陽一下山就閉門不出，躲在家裏。在藏人區的大逮捕，從半夜一直搞到凌晨二點。一輛輛沒有掛車牌的小卡車，停在西藏人家的門口，載著一群西藏人離開，去向不明。據說警察有所有參加或被懷疑參加示威的西藏人的名單與照片。

星期日，二架飛機抵達拉薩機場，每架載有上百名的警察和軍官。另外還有一架在星期一降落。這一天，加拿大電視台的攝影隊看到一列十二部載著武裝警察的卡車車隊，從機場駛向拉薩市區。暴亂的第二天，三十餘名便衣警察，又上了大昭寺的廟頂佔好了位置；武裝警察則在大昭寺附近安頓下來。戴著頭盔的武裝警察毫不掩藏地在廣場附近樓房的屋頂上監視，祇要有狀況，隨時可以行動。好幾十名警察在哲蚌寺、色拉寺及甘丹寺的前面，架起了路障，並且禁止人群進入。同時，由便衣警察和中國幹部所組成的「工作組」，則駐進寺廟裏。從此，開始了和尚們長期的「再教育」。清除鬧事領導人的追逐戰還在進行。從第二個星期開始，幾部架著擴音機的小卡車，整天在拉薩市區裏跑來跑去，呼籲「加強祖國統一」及「告發分離主義分子」。在貢嘎機場，武裝警察嚴密地監視每一個離開西藏的人。除了往機場的道路外，武裝警察在所有被封閉的幹道上，設立了哨所。

儘管有這麼龐大嚴密的鎮壓部署，新的示威還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發生了。六十餘名哲蚌寺的和尚，改穿民服騙過警察的耳目，在午後離開寺院，向市中心移動。他們滿懷希望能夠到地方政府辦公大樓，請求釋放被關的喇嘛。其中三十餘名和尚，在拉薩市的入口，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面被捕。西方人士是他們受到中國警察暴力虐待的證人。警察用槍托及木棍毆打他們，然後丟進卡車載走。其他的和尚則順利地到達門口停有十餘部軍用卡車及背著衝鋒槍的武裝警察的地方政府辦公大樓。他們也是全部被毆打後被捕。十月八日，十二名留在拉薩的外國新聞社通訊員，接到命令限期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西藏。「西藏自治區」外事局主任余武眞，指責這些記者違反外國通訊員在中國工作條例的第十六條規定。這一條文規定如果外國記者要到北京城外的所有地區做採訪活動，最遲在十天前要通知中國的當地執事單位。我自己可以做證，幾年來，中國政府從來也沒有引用過這一條文。很明顯地，他們是要擺脫這些礙手礙脚的證人。這不就是中國傳統上所謂的「關門打狗」的做法嗎？

警察限期參加示威活動的西藏人在十月十五日之前自首，即可既往不究，法令嚴刑祇用來對付其他的人。十月八日，尼泊爾發布中國封閉邊界的消息。同一天，泰國政府拒絕給達賴喇嘛簽發參加佛教的一個專題座談會的入境簽證，可是他們又宣稱，絕不向中國的壓力讓步。

十月十二日，中國新聞社發表了他們對這些事情的「正式」說法。底下是其中的一段：

在十月一日的暴亂期間，有十一台照相機、三台錄像機被摔破及破壞；十一部汽車、四輛摩托車被燒燬，二十七部汽車被破壞。估計約有二百多萬人民幣的直接損夫。在暴亂

中有三百五十名警員被石塊打傷，九名受重傷，六名死亡。自治區的一位負責人解釋說：

「一小撮的人煽動不知情的民衆，與在遠處指揮的達賴喇嘛配合，分化祖國。他們的陰謀，永遠不會成功的。」

這是一份很特殊的善後清理報告，它先報物質的損失，然後才提人員的傷亡！也許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在中共統治下的制度，對人命價值的看法。這份報告對西藏的犧牲者隻字不提。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鄧小平第一次公開談論西藏事件：「達賴喇嘛和幾個美國國會議員，給我們製造了一些小麻煩，不過這些並沒有危及我們正確的整體局勢。相反地，這些祇表現出他們的無知和他們的狂妄，這些也表明了他們眞正的本性。」幾天後，達賴喇嘛則宣稱對這件事表示哀傷。不過他也說：「我很高興中國政府找到我，把我當成是西藏人民示威的代罪羔羊，就像他們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瘋癲及混亂怪罪『四人幫』一樣。我呼籲所有的人權組織，希望他們能說服中國政府，停止執行死刑，釋放無辜被關的人。」

三個星期之後，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生存史上最重要的幾個階段之一。十三全對於由黨總書記趙紫陽掛帥的改革派而言，更是個生死關頭。中共從建黨以來，就一直被黨內部無情的權力鬥爭所折磨。改革派想要利用這一次的全代會，一勞永逸地打跨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從一九八七年元月黨魁胡耀邦，曾經大力支持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國大專院校大規模的不滿情緒，而被保守派施壓力罷黜之後，一般看法比較傾向於保

守派。西藏的暴亂正好可以加強革命時期殘留下來的這幾個活化石的立場。的確，他們可以說，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是構成西藏大亂的唯一原因。西藏事件的發生，除了在國際視聽上，對中國的形象產生了不良的反響之外，不也是個讓中國其他少數民族有兎死狐悲的感受而心寒的例子嗎？

從北京權力圈幕後流出來的少量消息顯示，西藏危機確實在中共中委會及政治局中，造成了激烈的爭論。表面上看起來，改革派好像是在全代會中佔了優勢。到了十月底，就看到不在少數仍舊沉迷在毛澤東思想的老幹部一一地退休了。中國的開放政策，再度得到肯定；經濟改革也是一樣。然而，在西藏已經犯下了難以補償的行爲。用衝鋒槍向民衆掃射的事實，將會以兩種民族不相了解的痛苦象徵而留存史籍。

八、一九八八年，拉薩的火與血

中共的官僚特別喜歡「開會」。會議接二連三地開，眞正需要開的會卻是少之又少。開會是一般中國幹部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把開會刪除，他們就無所事事。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在北京，爲了拉薩事件，召開了多少的會議。經過一段漫長的遲疑、考慮後，北京政府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年初，同意在拉薩舉行「莫朗青波」(傳召大法會)。拉薩的傳召大法會是西藏最大的宗教節日，過去每年藏曆新年過後，從正月初三到二十五在大昭寺隆重舉行。屆時，虔誠的佛教徒們整日盤坐在釋迦牟尼佛像前面，讀經祈頌，頂禮膜拜；拉薩附近各寺院的數萬喇嘛紛紛應召

下山。大昭寺裏，達賴喇嘛講經，宗教答辯，推舉「格西」（黄教的最高學位，等於是博士），二、三萬喇嘛同聲誦經祈禱，祭神驅鬼，場面莊嚴，氣勢磅礴。最後幾天則是餘興。傳召法會是黃教祖師宗喀巴於一四〇九年所創立的，一九六〇年代被禁止，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又被准許舉行。一九八八年的時候，北京希望利用普天同慶，僧俗俱歡的節日，使西藏人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同時也想藉此機會向全世界說明，西藏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又是歌舞昇平。北京想要重整家業。

所有防備可能再度掀起民族主義熱潮的措施都準備好了。二月十五日，北京政府控制的「中國佛教協會」向西藏百姓提出警告：「在這期間，所有的辱罵、毆鬥必須停止，大家應該互相尊重，好讓佛光照耀世界屋脊。」從二月中旬開始，成千的朝聖者陸陸續續地抵達了拉薩，到了二月十五日已經有二萬人了。然而市區內的平靜，也祇是狂風暴雨來臨前的先兆。很多的信徒被擋在拉薩城外，尤其是一向就名列黑名單榜首的康巴。

所有的汽車必須要有通行證，才能在拉薩市區內行駛。特別的鎮暴部隊抵達拉薩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了，其中有些安頓在大昭寺附近的房子裏。根據某些消息，至少有六千名的警察處於備戰狀態。到處都是便衣警察和線民。配有錄影機和精密的轉播器具的警報系統，在大昭寺廣場前的一棟建築物上，夜以繼日地監視著。在寺院裏，「工作組」加緊召集和尚，向他們解說西藏的歷史，愛國主義以及分離主義的危險。此外，從一九八七年十月開始，西方的觀光客就很不容易拿到允許進入西藏的簽證。至於派駐在北京的外國記者，所有要求到西藏的申請全部被拒絕。

二月底的時候，中國政府很大方地邀請了五位外國記者，參加已經開始好幾天的傳召大法會。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中國政府是如何志得意滿地認爲，傳召大法會無疑地會是十分圓滿地結束。十萬火急趕到成都的我，也曾經異想天開地想要獲得這份從天外來的「恩寵」，而到拉薩去採訪。和地方政府經過幾個小時的折衝後，我才知道，在不受歡迎到西藏的名單中，赫然有我的大名大姓！在五名雀屏中選的記者當中，有一名是法國新聞社、二名路透社、一名洛杉磯時報的通訊員。

一直到傳召大法會結束的前一天晚上，一切活動都很順利地按照計畫進行。政府官員已經開始相互道賀了。所有的活動是如此有條不紊地進行，以至於五位被邀請參加的外國記者中有四位興趣索然，認爲沒有什麼看頭，而提早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他們的報導當然也就是錯誤的。三月五日，祇剩下法新社的通訊員巴狄克・雷思克（Patrick Lescot）一個人。《洛杉磯時報》的記者也於當天淸晨搭機離開拉薩。幾個小時之後，拉薩槍聲大做，血花四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星期六，大約是早上九點五十分的時候，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數百名喇嘛，把整座廣場映染成一片紫紅帶金的潮海。二萬五千名虔誠的信徒，也在寺前凝神佇立。傳召大法會的最後一天。祇有一個「迎強巴」的節目。大昭寺裏的強巴佛像，被請出來，裝上木輪車，由幾名喇嘛擁護著繞大昭寺遊行一周。按照節目表，今天應該是以賽馬和跳舞圓滿收場的，可是喇嘛們有他們的想法。在轟轟的祈禱聲中，忽然在年輕喇嘛的行列中，數十隻握緊的拳頭朝天高舉。他們蜂擁而上，搶了慶典主持人的麥克風。整個廣場迴盪著從數百跳動的胸膛中擠壓出來的高叫聲：「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獨立。西藏要

獨立。西藏要獨立。打倒中國的壓迫。打倒中國的壓迫。打倒中國的壓迫。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

這些喇嘛心裏有數，他們被中國治安單位照了像。他們也知道，他們是逃不過警察的控制的。他們還知道，他們打的是一場不可能贏的仗。他們當然知道，有六個軍營包圍著拉薩。他們更知道，不管他們有多麼英勇，有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可以像秋風掃落葉般地敉平所有的叛亂活動。

緊接著，一陣暴雨般的石頭砸向大昭寺附近的警察。幾分鐘後，好幾百名的喇嘛開始繞著大昭寺移動。馬上就有數千的藏胞加入他們的行列，並且高唱民族主義的歌曲。爬上大昭寺頂的喇嘛，朝著武裝警察的車子及在現場轉播傳召大法會的拉薩電視台的採訪轉播車丟了大量的石塊。二十分鐘後，十九部警車匆匆地趕到現場。二千名戴鋼盔、拿盾牌、帶警棍的武裝警察，花了十幾分鐘擺好了陣式後，發射催淚瓦斯彈驅散了廣場上的人潮。百餘名的喇嘛被抓進卡車。午後，治安人員終於找到了法新社的通訊員，並且警告他要他馬上回旅店。他一回到旅店就被監視，禁止外出。所有的電話線，傳眞線都被切斷，拉薩和外界完全隔離。

過了一陣，四處響起了自動武器特有的連發槍聲。一開始，中國政府是想要避免使用武器的，因爲在早上，警察都沒有攜帶槍械。六千名藏人和警察對峙相持了一個下午，很多中國人開的商店被搶、被燒。示威人群對「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的辦公室及警察局特別眼紅。不少的警察被打，私下處死。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報紙是如何描述這些事情：

中國新聞社說：「這些歇斯底里的騷亂分子大叫：『摧毀所有屬於共產黨的東西！』喇嘛和被煽動的民衆，衝向大昭寺附近的重要地形，企圖使用石頭攻擊沒有攜帶武器的警察。」

《人民日報》則說：「三月五日夜晚，一群流氓衝進位在北京東路上的『極樂園』飯館，把所有的桌椅搬到馬路上燒燬。這些流氓破壞了飯館裏的所有設備。很多其他中國人開的飯館、商店都遭受到相同的命運。當這些騷亂分子開始把汽車掀翻過來，並且放火燒的時候，他們高喊：『打壞所有屬於中國共產黨和漢人的東西。』」

平常祇歌頌中國「少數民族」間兄弟般永恒友誼的中共官方報紙，在想辦法盡量醜化騷亂的鬧事者。然而中共有沒有想過，他們這種做法，祇是給漢族人民一次機會，讓他們去衡量到底絕大部分的藏族人民有多麼地憎恨他們？

晚上，拉薩市再度響起AK—47式衝鋒槍所發出來的淸脆響聲。整個拉薩市的藏人區，都起來反對中國人。在這裏，人群中有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喇嘛，拿起一塊石頭朝著抱頭鼠竄的民警背後，用盡力氣丟過去。在那邊，另外一個更年輕的和尙，朝公安警察丟石頭，然後眉心中彈倒了下去。有三個人看到一位民警用手槍瞄準，射殺一位青少年。不管老的、少的都加入了這場暴亂，婦女們則在旁邊搬運石頭。北京宣稱，這些喇嘛祇是一撮孤立、不得人心的肇事者，事實上，數以千計的藏人積極地支持喇嘛。早上，當警察開始衝進大昭寺逮捕喇嘛的時候，民衆在寺廟後面架了梯子讓喇嘛們逃跑。

星期日凌晨二時許，離開拉薩市中心兩公里外的地方，依稀可以聽到警笛的鳴叫聲。幾個小時後，法新社的通訊員，在治安人員的「陪同」下到貢噶機場，被趕回北京。拉薩發生了前後十六個小時的流血衝突。

西藏人說，他們損失了八個人。中國政府的善後報告說，有一名警察死亡，三〇九名受傷，其中有二十九名重傷，沒有任何一個字提到西藏方面的傷亡。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班禪喇嘛的態度比較坦誠。他說有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三三〇位警察受傷。他說騷亂一開始，是由一百餘名的喇嘛所引起的，隨後有數千藏民附和。如果把在一旁圍觀的人也算進去，大約有一萬人左右。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星期日，「拉薩無線電電台」說，一些分離主義分子製造了可憎的場面。這些小部分的分離主義分子對人民及整個地區犯了新的罪行。他們在光天化日下所製造的事端，再度顯示了他們企圖但是失敗地想要分裂祖國，及破壞國家統一的非法陰謀與犯罪目的。事實再度證明了惡勢力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星期一，《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描述一位警察如何從樓上被丟出窗外而摔死的情形。這個可憐人的一位同事，在醫院口述這殘忍的一幕。這幾行讓數百萬中國讀者毛骨聳然的口述，把藏族人民對反抗中國人的怨恨所爆發出來的暴力行為表露無遺：「一開始，他們還祇是對我們丟石頭而已。我的臉被打到幾次。」武警戰士楊玉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說。他當時躲在一間廁所裏，「他們打破房門，向我們砸石頭，並且用棍子毆打我們。他們把我們的鋼盔扯掉。一個年輕小伙子在我的臉上及背上捅了好幾刀。其他的人不停地用石頭砸我們，用棍子毆打我們。他

們想要把我從二樓的窗口丟出去，不過我用手死命地抓住窗沿不放。我的班長袁石生雙手已經受了傷，抓不牢，被四、五個人從窗口丟了出去」。《人民日報》還指出，「武警戰士袁石生被送到醫院時，已經停止呼吸，經多方搶救無效死亡」。

新華社也在同一天發出一篇要求對騷亂分子採取嚴刑重懲的文章。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共產黨權力圈子裏煩躁、激動的情形：領導幹部們「認爲人民政府對這些人太過克制、太過忍耐、太過寬容」。

三月十日，班禪喇嘛在拉薩電台發表談話：「如果西藏獨立了，藏族人民一定會因爲西藏內部的分裂和紛爭而遭受禍害。正因爲這個緣故，要求『西藏獨立』是對祖國的叛亂行爲，將會破壞兄弟民族間的統一，並且危害到西藏人民的眞正利益。」他還說他絕對不會放棄他的「四個愛」：對中共的愛，對祖國的愛，對藏民族的愛以及對他的宗教的愛。

從騷亂的第二天開始，中國警察又下達了夜間搜索令，把拉薩市鬧得人神不安。近千名的藏民被帶到拉薩監獄「問話」。很多的西藏人都說他們在那裏受到了刑求。按照西方的估計，在幾天之間，有三百到一千餘名的西藏人被關入監牢。班禪喇嘛在四月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有兩百人被捕。在同一個招待會中，阿沛・阿旺晉美指出，殺害警察的兇手「將按法律規定判處死刑」。五月一日，西藏「流亡政府」宣稱，有二千五百人被捕下獄。然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儘管全城已經是風聲鶴唳，十五名西藏尼姑於四月十七日，再度到大昭寺前面示威，並且高喊「達賴喇嘛萬歲！」「友愛」。心裏明白將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後果，她們是背著小包袱，有備而來的。他們立刻就被逮捕。

一般說來，中國對於犯人的判決和處刑是很迅速的。然而在拉薩，幾個月都過去了，對謀殺警察兇手的審判，卻遲遲不敢開庭。情勢太過於緊張，大家都怕火上加油，再度引發衝突。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九日，拉薩法院終於批下了判決書。這是個非常寬容的判決。把武警戰士袁石生推出窗外致死的犯人羅桑丹仁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觀察兩年，索南旺堆被認爲是他的共犯而被處無期徒刑。羅桑丹仁是西藏大學的畢業生，他可能被關在察不齊監獄一段時間，也被祕密地在手脚上了銬鏈，關在潮濕的小牢房裏長達十八個月。由於受到無端的折磨，他的身體狀況變得非常不好。從小牢房中放出來之後，他也可能是趁著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四月一日訪問監獄的時候，企圖交給他一封抗議酷刑拷打信函的二位政治犯人之一。這封信很快就從大使的手中拿走。從此羅桑丹仁好像就被轉到林芝波密監獄。至於索南旺堆，根據一九九二年二月的消息，他在察不齊監獄中遭受到長期的酷刑拷打，已經在死亡邊緣做最後的掙扎了[12]。二十五名其他的藏民被判處三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三名被認爲犯了「輕罪」的藏人，則被判無罪開釋。中國政府企圖和藏族人民及達賴喇嘛取得協議。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派再度取得優勢。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企圖妥協的低姿勢動作：在秋末冬初的時候，北京領導班底中最開放對話的幹部之一，胡錦濤替換了伍精華被任命爲西藏黨委會書記。祇是在拉薩的局勢已經不允許任何的妥協了，在那裏，有的是不可動搖的決心。

九、中國丟人現眼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初，北京積極地籌備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紀念大會。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慶祝過十二月十日的宣言紀念。然而今年，她卻決定要大肆鋪張好好表現一番。一個星期以來，中國報紙上所講的，無非都是中國對於尊重人權的承諾。這當然又是北京想要在國際間，重新塑造優良形象的一種手法。就算我們相信她的誠意吧：對某些最溫和的中國領導而言，這可能是他們眞正想要在這從來沒有作爲的地方，尋求一些改善。可是西藏獨立主義分子卻決定要拆他們的台，並且順手給中國政府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

幾個星期以來，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西藏獨立的旗幟和傳單高高貼在拉薩市的牆上，而且是愈貼愈高，使得在被撕掉之前，有更長的時間，讓更多的人看。拉薩市西藏大學的牆上，從十二月初開始，連續幾天都被人用粉筆畫了批評中國幹部到西藏祇是爲了自肥的諷刺畫。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肥胖的中國幹部和他那重得要用起重機才吊得動的財產。這幅畫還有題字解說：「乾癟癟地來，胖嘟嘟地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早上快要十一點的時候：幾十個喇嘛在一群聚集在一起的虔誠信徒前面，突然地從他們寬大的袈裟裏，拿出了西藏民族主義的旗子。這些人知道他們做的是自殺性的行爲。示威運動一開始不到幾分鐘，數百名隸屬鎭暴單位的警察就趕到現場，並且在示威者前面約二十公尺的地方，擺好方形的鎭暴隊形。最前面一排約有十二名左右頭戴鋼

盔，手握AK—47式衝鋒槍的警察，突然跑向示威群衆，停在離開他們約祇有幾公尺的地方，沒有警告、沒有鳴槍示警就朝站在他們前面的活靶開槍掃射。槍聲連續響了好幾分鐘。就在他們的眼前，西藏人倒了下去。二十六歲荷蘭籍的「瑞士紅十字會」的翻譯員柯里斯達（Christa Meindersma）小姐，當時正好在三十公尺處外，肩部受槍傷。從槍聲一響，人群即十分慌亂地到處亂鑽，然而鎮暴警察還是節節後退；因爲儘管受到驚嚇，儘管人群亂奔，整個廣場又被石頭轟炸。二個小時之後，警察還不斷地在廣場附近的街道上投射催淚瓦斯彈以便驅散人潮。

這一天，警察使用槍械的結果，造成了十二人死亡，數十名受傷。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由於鬧事者不聽勸阻，反而向値勤民警及公安警察扔石頭和酒瓶，警察警告無效，被迫鳴槍示警。混亂中有一喇嘛死亡，十三人受傷」。所有的目擊者，外國人或是西藏人，都說這是虛僞的報導。實際情形是中國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人群開槍射擊。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一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羅．史瓦茲（Ron Schwartz）在柯里斯達小姐及一位英國籍記者的陪同下，在香港「新聞俱樂部」敍述他在拉薩所看到的事實經過：「十二月十日，我們三人和其他所有在拉薩的外國人，看到一群沒有武裝、和平的示威者，舉著一面旗子在拉薩市區遊行，然後轉入鬧區八角街繼續遊行。我們看著他們在沒有任何挑釁行爲的情形下被射殺，而且是，根據我們的看法，無緣無故地被殺。跟隨在這面旗子後面遊行的這些年輕人眼裏流露出一股極端畏懼，卻又堅定不可動搖的決心的特殊神情。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他們也知道他們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他們知道某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在我們這一群，當時在拉薩現場的外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有想到會發生我們所看到的事情。」

在發生慘案的那一天，柯里斯達小姐在西藏前後已經住了十四個月了。她的見證是很重要的：「這些年輕的和尚大部分祇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他們爲他們自己到目前爲止所經歷的事情而鬥爭。他們不知道一九五九年以前是那一種制度。他們並沒有任何企圖要復辟些什麼。他們嘗試地爲著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他們的基本自由而戰鬥。他們生活在無邊的疑懼當中，他們害怕他們所說的一切，也害怕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隨時會被囚禁，他們隨時會被酷刑拷打。我認爲事情已經到了不僅僅是和尚，連藏族人民也了解到局勢根本沒有得到眞正的改善，中國政府在紙面上所承諾的事情全部都是謊言。正因爲如此，西藏人民團結的程度，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事情也變得非常緊急。我想西藏人民已經感覺到，他們快要被中國人完全消滅了，他們也感覺到他們應該做些事情，讓全世界的人曉得，他們爲自衛，不惜犧牲寶貴的性命。」

雖然受到嚴重的打擊，藏族人民還是連續幾天都到血跡斑斑的慘案現場去上燭火、幡旗，獻哈達（西藏人的禮物，用來敬佛或餽贈。類似披巾，以薄絹爲之，有紅、黃、藍各色；色別與長短要看受禮人的階級來定）。許多含著眼淚祈禱的西藏人，請求「西藏的保護神」（達賴喇嘛）把「從東方來的野蠻人」驅逐出「雪域」。所有的外國人，都被限制在他們旅館的房間裏，等待著被驅逐出境。

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七十位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在北京天安門附近示威高喊：「他們殺了我們的同志。」在拉薩，恐怖的行爲並沒有使人們喪失勇氣：十二月三十日，五百餘名的西藏大學生，不知道示威遊行已經被明令禁止，遊行到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大樓，要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他們指責十二月十日的「冷血屠殺」。這一天，警察沒有任何的干涉行動。另外一個顯示出西藏反對分子沒有被輾碎的證據：一

九八九年三月七日，一面藏民族的「雪山獅子旗」在大昭寺頂上飄揚了好幾個小時。這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警察也沒有反應。到日落的時候，旗桿下蓋滿了白色的哈達。三月二十日，「雪山獅子旗」及傳單在大昭寺附近的十六個地方出現。今年不再舉行拉薩傳召大法會。然而，騷亂依舊……

十、拉薩戒嚴

西藏最後一次的暴亂事件，是文革結束以來，血流得最多的一次，也是後果最爲嚴重的一次，因爲它逼得中國政府在拉薩頒布了戒嚴令。從此西藏一片沉靜。這最後一次的騷亂是從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開始的，它的情形和以前幾次大同小異，無非是一個被殖民主義壓迫得忍無可忍的民族，站起來反抗的傳統形式。數百名喇嘛及拉薩居民膽敢在大昭寺前的石梯上，高喊「西藏獨立」向中國挑戰。上千的藏人攻擊中共及地方政府的辦公大樓、警車以及中國人開的店鋪。這一次由絕望所迸發出來的暴亂，在血腥鎮壓下再度消散。中國政府成功地隔離了幾乎所有的外國記者。然而這些悲慘的暴力行爲，並非沒有任何的目擊者。大約有二百名西方觀光客剛好在拉薩，其中有數十名眼睜睜地看著事情從頭到尾的演化。他們的說法完全一致：中國警察又一次地沒有鳴槍示警，毫不遲疑地直接向沒有武裝的群衆射擊。再一次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沒有受到警告就在拉薩市街上被槍殺。這一次，中國政府認爲找藉口掩飾是多餘的事情：新華社說，「警察被迫開槍，因爲沒有其他任何的辦法可以制止騷亂分子」。這不就是中

國政府很明顯地承認，藏族人民決定要和中國鬥爭到底的堅強意念，以及中國政府將會不眨眼地，採用所有的必要手段來粉碎這些叛變行為嗎？

根據北京公布的傷亡名單，三月五日星期日，有十位藏人、一名警察死亡，一百餘名受傷。旁觀的目擊者則說，傷亡比這還要嚴重得多。一直到當天晚上，街上依舊滿布屍體。星期一，拉薩進入恐怖屠殺的第二天。「拉薩電台」發出了警告：「騷亂分子絕對不會有好的下場。歷史和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看看一九五九年，由西藏反革命分子所帶領的叛變是如何結束的？過去的一些騷亂的下場又如何？難道他們的下場還不夠清楚嗎？如果分裂主義分子敢再起來和人民意願作對，造成社會不安、發動騷亂、進行打鬥、破壞、搶劫及縱火，人民民主獨裁的鐵拳將會給他們粉碎的一擊！」數千名的藏人，分成一群群四、五百人的示威隊伍，拿著「雪山獅子旗」在拉薩市到處遊行，一到晚上，藏人區就變成夜間戰鬥場。新華社說，有些騷亂分子手上拿著武器，然而沒有一個不受到中國政府管制的消息，曾經證實這個報導。拉薩中國銀行辦事處、四個警察派出所及一些政府辦公室都受到攻擊與破壞。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的記者雅士伯・貝克 (Jasper Becker) 提到了一個手裏祇有石頭的西藏人面對著載滿武裝警察的卡車的例子。包括回人在內的中國人都受到石頭的攻擊，商店、飯館被焚燒，可是沒有一家被搶劫。一位二十九歲的美國人柯立士・海姆 (Chris Helm) 說：「那一天，很多外國人都看到不少的中國人受傷流血。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位中國人，他的後腦勺有個極大的傷口。」有一位香港的中國人剛剛抵達拉薩，不知道有騷亂。他這一輩子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北京路上被騷亂分子抓住時的可怕情景。一位三十六歲的美國婦女如米・畢克里 (Zumi Picreldi) 說：「他

在北京路上東張西望地尋找『犛牛旅店』,他不得不拿出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來證明他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當天晚上,在藏人區發生了多次的格鬥。一過半夜,中國警察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清掃行動。住在藏式小旅店裏的外國觀光客,聽到警察用槍托撞擊藏人房門的聲音,然後就聽到槍聲及慘叫聲。許多西藏人說,警察在好幾個地方,一進門就用衝鋒槍掃射,大人小孩一起殺死。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星期二。拉薩進入了幾乎是造反的第三天。很多中國人在收拾行李,準備在一九五九年反抗中國人的暴亂的三十週年紀念日來臨之前,離開這座社會秩序亂到難以形容,而令人膽寒的城市。星期二子夜零時,中國政府決定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即使是在一九五九年及文革期間局勢最緊張的時候,也沒有採行的措施:在拉薩實施戒嚴。爲期不定的戒嚴令是國務院總理李鵬所決定,並且簽署的,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發布。自治區人民政府所頒定的戒嚴具體措施大略如下:

——戒嚴期間,嚴禁集會、遊行、罷工、罷課、請願及其他聚衆活動;

——出入戒嚴區的人員、車輛均須按規定辦理出入手續,並接受治安檢查。

——對非法持有的槍枝彈葯一律交繳;

——對製造騷亂的嫌疑分子和可能隱藏罪犯的處所及其他可疑的地方,公安機關和執行戒嚴任務的人員有權進行調查;

——對於抗拒或煽動他人抗拒執行戒嚴措施者,依法從嚴懲處。

同一天，《人民日報》在北京指出，西藏獨立主義分子「準備在不久再度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一次解決他們和中共的擁護者之間的糾紛」。星期三，拉薩進入戒嚴。星期二晚上，子夜的鐘聲一響，數千名（北京說是二千名）進入備戰狀態的戰士，開進拉薩，並且在戰略性位置附近擺好戰鬥姿勢；譬如說大的十字路口，政府辦公處所等。安裝在軍車車棚頂上的擴音機，開足音量不斷地播放戒嚴令上面規定的措施；在這同時，拉薩市到處迴繞著警笛尖銳的聲音。

二十七歲的法國人雅各・羅納（Jacques Launey）從拉薩打電話敍述他在清晨所看到的情景：「到處都是軍人。我至少看到一百名。祇有幾個小孩子在路上玩耍，偶爾有一些脚踏車從被西藏人燒燬，還在冒煙的商店及飯館前面經過。」我們再看看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星期三，新華社的一份「緊急」電文說些什麼：「現在，戰士和武裝警察在全城各地的崗哨值勤。配備有手槍、衝鋒槍、火箭筒以及無線電通信設備的戰士，夜以繼日地保衛著這座全世界最高，早晚氣溫相差非常大的城市。部隊接到命令停留在拉薩直到戒嚴令解除。」

中國警察到處公然抓人。逮捕行爲引起了婦女絕望的慘叫而辱罵戰士。西藏百姓躲在家裏足不出戶。幾十輛的軍用吉甫車及卡車，有些還架著重機槍，在拉薩市街上轉來轉去。星期四，一位被拒絕進入拉薩市的法新社通訊員，在離開拉薩七公里的一個崗哨看到下面一幕情景。一位頭髮黑黑捲捲，穿著中國藍布衫的男人，被幾位人民解放軍的年輕戰士，把手扭到背後綁起來。一位軍官用槍托打他。幾位戰士把他推倒在瀝青路面上，把他的雙脚也綁了起來。另外一些戰士則用脚踢他。這個人的表情驚嚇多於畏懼。最後，他被丟進一部吉甫車裏。沒有人知道爲什麼，他會被二十幾個配有AK—47式衝鋒槍的戰士修理。這些皮膚古銅色，吃得壯壯的戰

士們，好像一點也不為西藏的風霜所苦。三天的騷亂在地上留下了五、六十具的屍體，外帶數百名的傷殘。在拉薩，成百的藏民被拖入古孜監獄。

三月八日凌晨三點左右，中國警察闖入了外國人住的旅店，限令他們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拉薩。「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布了第四號政府令，規定外國人在拉薩的居留條件：經「西藏自治區」有關部門同意在拉薩停留的外國客人、外國專家以及由旅遊部門組織的已到西藏旅遊的外國人旅遊團組，必須憑自治區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或公安部門簽發的通行證出入戒嚴區。現在拉薩市的外國遊客，必須在公安部門規定的期限內離開拉薩。

從三月九日星期四開始，中國的政治宣傳部門開始譴責達賴喇嘛。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說：「達賴集團永遠也不能分化中國，妨礙國家統一。」根據一份正式公報，騷亂分子攻擊、損壞或損毀「政府二十四張辦公桌、九十九家私有商店及飯館、二十餘輛汽車、幾十輛的單車」。印度在前一天晚上自稱很「關心」，不過她馬上又重申說，她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倫敦說，她感到「很擔心」；美國則對中國警察的暴力及使用武器感到「失望」。

至於達賴喇嘛，他在印度達蘭薩拉宣稱：「任何一種鎮壓方式，即使是粗野和暴虐的方式，也不能扼殺自由與正義之聲。」面對這些暴力行為，達賴喇嘛還在繼續鼓吹現代化：「對藏族人民而言，採行武力鬥爭的路線，將是自殺的行為。中國人很容易使用粗暴的方式來反擊。即使是在機關槍的火海掃射下，示威遊行的人也永遠不應該使用武器，因為這一種情形北京比較沒有辦法控制。我很擔心拉薩會變成一座屠宰場。」不過這個演說對事件的變化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北京已經做了決定：突然再度關閉西藏大門。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認為西藏

受到了「應得的懲罰」,不過她同時也承認「某些西藏人永遠也不能理解爲什麼會有這種應得的報應,有些人則表示反對」。在香港,中文報紙譴責西藏騷亂分子。三月八日的《新聞報》以〈西藏人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爲標題說：「沒有人會允許蘇格蘭從大英聯合王國中脫離，也沒有人會同意加利佛尼亞州的獨立。這是個原則問題。任何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她的政府有權力採取任何她認爲必要的措施，來消除分化國家的行爲。因此，倫敦和華盛頓大可不必表示他們的惋惜。他們所表示的惋惜，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惋惜！」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媒體，祇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很清楚，他們是老調重彈。三月十一日,「拉薩電台」說：「從解放開始,在中國及在國外的分裂主義勢力沒有一天停止過他們想要重建舊西藏的犯法行爲。然而他們最後不是都被粉碎了嗎？在未來，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堅定不移地領導在西藏的各華夏種族人民，期使西藏的統一、文明和繁榮能夠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繼續前進。中國共產黨將繼續領導在西藏的各華夏種族人民對任何膽敢妨礙藏族人民前進，膽敢從事分裂活動或企圖重建舊西藏的人，給與致命的一擊……。我們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英勇人民解放軍以及爲祖國爲人民效忠的人民武裝警察。他們讓分裂主義分子心驚肉跳。有了人民軍，人民就有一切。」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是一九五九年大暴動三十週年紀念日，新華社說：「在最近幾天，一直有人打電話到黨委會及『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向他們表達全人民對服勤部隊的嘉許。充滿著感激的信函，也透過各種管道，送到軍官及服勤單位戰士們的手裏。」

三月底，西藏軍區的政治委員張少松將軍在中國人大會發表報告時說，從一九八七年秋季

開始，在拉薩所發生的二十一次「意外事件」中有「六百餘人死亡」。這份報告和官方發布的二十八人死亡，受傷人數不詳的資料，在人數上有極大的差距。十年的容忍時代過去了，拉薩的外國人也愈來愈少，西藏再度陷入黑夜的陰影裏。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少有從拉薩傳來的消息。九月中旬的時候，中國政府宣布逮捕了九名高喊「西藏獨立」反動口號的尼姑。他們表示她們目前還活著。

一九八九年十月的時候，路透社駐北京通訊員吉•丁摩（Guy Dinmore）到了拉薩。他在西藏首府停留期間，掀開了目前在拉薩鮮爲人知的情形其中的一小部分祕密。當然，從一九八七年開始，總共被三次驅逐出西藏的他，是第一個獲得中國外交部允許而到西藏採訪的外國記者。自治區公安部門發言人王乃文向他透露，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騷亂之後，有四百餘人被捕下獄。六十三名藏人及二十名藏尼姑沒有經過審判就被送進勞改營，期限長短不等，最久的是三年。大約有三百二十位藏人被釋放，另外還有四名在等候判決。這位發言人排除所有在短期間內解除戒嚴令的可能，他承認，如果沒有部隊的鎮壓，警察「很可能沒有辦法」控制拉薩的局勢[13]。

這位記者偷偷地造訪一位西藏民族主義分子，他告訴他說，至少有一千名的西藏人被關在拉薩的三大監獄裏。這位藏民把衣服脫掉，讓吉•丁摩看他身上被拷打殘留下來的疤痕，並且對他說：「他們用電棒刑求，要我說出策劃示威遊行的人的名字。」拉薩的居民，並不因爲這種威嚇而不再開口。當這位記者由官派導遊陪同去訪問色拉寺的時候，喇嘛們毫無顧忌地對他說有多少的和尚被抓。他們也當著導遊的面，一點也不遲疑地向他表示，他們非常高興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拉薩的戒嚴管制比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屠殺後的北京戒嚴，要嚴格的多了。在中國求學的一位西方大學生，不就把北京的戒嚴比做是「星期日的野餐」嗎？然而，即使是如此，還是沒有辦法消除西藏人對中國人在西藏的深惡痛絕的特殊表達方式。因爲，一九八九年秋季還是發生了幾次示威遊行。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西藏日報》再度報導，五名尼姑被判處「勞動再教育」。該報說，她們歇斯底里地，瘋狂地大叫「西藏獨立」以及其他的反動口號這一類的騷動也可能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人地區發生過，因爲從一九八九年夏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部隊的政委帶領著「工作組」匆匆忙忙地進入了藏人寺廟及喇嘛院，進行「愛國主義思想」的國防教育⑭。

十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

看到中國部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當著全世界攝影機的前面，血腥輾碎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的野蠻行爲，我們就可以想像到，在沒有目擊證人下的西藏，他們是使用些什麼樣的方法來對付西藏的不滿分子。被中國宣傳魔鏡所愚弄的上億西方人士一直以爲他們在開放政策時期，找到了中國制度的本質，天安門屠殺讓他們徹底地覺醒了。這個慘案在國外所產生的幾個正面的影響之一，就是讓國外人士知道，有幾個昏庸的老人，隨時隨地都會不擇手段地維護他們的權力。此外，當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屠殺之後，中國政府爲了要朦騙輕易就相信的外國政府，以及在農村及都市的廣大民衆之間毀謗要求民主的學生

與工人，而在全國各地及海外發動大規模的假宣傳，我們完完全全有理由懷疑所有北京發布有關西藏消息的眞實性。

就這樣，正如中國政府所宣稱的，武裝警察從來沒有在西藏直接對著西藏示威遊行的人開槍一樣；她說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任何人死亡，而且總計也祇有三百名的中國市民及警察在「混亂」中喪生。然而人證鑿鑿，所有的目擊者都說：在六月三日到四日的夜晚，有好幾百名中國人，也許有一千到三千人在北京死於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槍和衝鋒槍的無情掃射下，有些則死在坦克車的履帶下。除了殺一儆百的公開處決之外，很多中國工人及不滿分子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在北京近郊盧溝橋旁邊的刑場被祕密地處決。數以千計的中國人被逮捕。很多人失蹤，下落不明。逍遙在外的知識分子，不是被套上嘴套，就是被迫參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鎮壓行爲敲響了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年以年一直想要付諸實現的開放政策的喪鐘。這對一個鄰近國家一直在進步的國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拉薩和北京都在實施戒嚴。中國的統戰宣傳在對這兩個地方所發生的流血事件所做的描述同出一轍。成千的西藏示威遊行者，被中國共產黨御用報紙說成是「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企圖破壞祖國的統一」。數十萬的中國不滿分子也被說成是「少數不法分子企圖顚覆中國共產黨」。同樣地，在拉薩的西藏抗議者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抗議者全部都被打入「反革命分子」一類。在拉薩和北京的和平示威運動，在中國政府的嘴裏，變成了「騷亂社會秩序」和「危害國家穩定」的破壞行爲。在拉薩就和在北京一樣，示威者被中國政府指責是「流氓」，是「土匪」

到處「對無辜的公民大肆掠奪、偷竊和衝擊」。如果我們相信中國官報上所說的，「絕大部分的藏族人民堅決反對」西藏不滿分子的行爲，我們就得相信，在北京「絕大部分的人民都堅決反對」中國年輕人要求更民主的運動。警察和軍隊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和六月，分別地在拉薩和北京光榮地制止了暴亂。在這二個情況中，軍隊嚴守紀律，非常克制。在北京，在拉薩也一樣，中國政府警告地說，和這些不法行爲的鬥爭還沒有結束。

以上這些，引出了一個令人憂心重重的問題：在北京，有一群的外國人和記者，我們可以知道在那裏發生些什麼事情。然而在拉薩呢？自從實施戒嚴以來，在西藏的首府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儘管中國的血腥鎮壓，儘管中國的嚴密監視，尤其是在寺廟內，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示威遊行還是不斷地發生。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在拉薩總共大約有過四十起的示威遊行。僅僅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在拉薩就發生了四次要求西藏獨立的示威遊行。不少的示威遊行者、和尚以及尼姑馬上被抓⑮。一九九二年六月的另外一次示威遊行中，有十二位尼姑被捕⑯。此外，西藏的不滿情緒，好像已經遍及整個西藏。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的同仁藏族自治州已經有示威遊行的人被判刑了⑰。「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羅布在一九九二年元月發表演說的時候，承認在西藏鄉間存在著不滿的情緒。他譴責獨立主義的積極分子企圖在鄉間及牧區中爭取支持他們的獨立運動。他也同時要求共產黨在鄉間和牧區，對分裂主義分子發動鬥爭⑱。已經有好幾十個和尚，在拉薩以外的地區被逮捕。

很明顯地，西藏的不滿情緒，很難一下子就被消除。我們祇能冀望，在北京一些願意坦誠

對話的領導的想法，有一天能夠戰勝那一批與世脫節的老人們腦袋裏麻木不仁的想法，並且付諸實行。因爲在西藏，就像在北京，甚至整個中國一樣，政府的暴力、監獄的酷刑以及處決並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地，這些祇會帶來更嚴重的、可怕的政治後果。就西藏的局勢而言，我們可以認爲，除非有一個持久、穩固的政治妥協，讓西藏有高度的自治，不然就是另外一種絕然相反的辦法，在極短的時間內把整個藏民族消滅，否則，中國永遠也沒有辦法推行可以讓他們走出經濟、社會、政治未開發的泥淖的開放政策。

十二、新疆亦然

在中國西北端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偶爾也可以聽到憤怒的吼聲。伊斯蘭人和不信神的漢人，這兩種差異很大的種族要共同生活在一起是相當困難的。新疆的居民是由好幾種不同的種族所構成的。他們也和西藏一樣，在抵制漢化政策。爲數約有六百萬的維吾爾族人數最多，約全居民的百分之四十六。大約有一百萬的哈薩克游牧人（土耳其人的遠祖）主要是在新疆北部、天山山麓的伊犁河谷以及阿爾泰山南麓一帶活動。另外還有十二萬的吉爾吉斯人在喀什城附近，六十三萬的回族人，二十六萬五千的塔吉克人在帕米爾高原，十二萬的烏茲別克人在塔里木盆地，以及數千名的韃靼人在新疆北部。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漢人僅佔新疆人口的百分之六而已；八十年代後期，卻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在新疆的幾個大城市裏，譬如首府烏魯木齊，漢人已經占大多數了。中國在一九七九

年開始推行一個孩子的人口管制政策，新疆的非漢人居民卻不受限制。然而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開始，一條新的法令規定，住在城裏的夫妻最多祇能有二個孩子，住在農村的夫妻則最多可以有三個孩子。這條法令的目的，在表面上說，是要「控制地區人口的過度成長和提高出生嬰兒的素質」⑲。根據多方面的消息顯示，這條法令在當地居民中，引起非常強烈的不滿。

新疆和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蘇俄國協及外蒙古接壤，長久以來一直就是俄皇及蘇聯覬覦的對象。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新疆發生了幾次反對中國人的活動。哈薩克人的不滿於一九六三年中俄剛斷交的時候爆發，六萬名伊犁地區的哈薩克人避走蘇俄。八十年代初期，農民在白沙瓦的縣政府所在地，發動武裝暴動反對中國人。中國軍隊趕來支援鎮壓暴動，造成多人傷亡。一九八一年的時候，喀什因爲反對中國人的暴動，而整個癱瘓。這一類的意外事件，幾乎從來沒有在中國的報紙上報導過。如果沒有西方人士的目擊，絕大部分的意外事件，是不會被外界知道的。最近幾次的意外事件顯示出不僅當地居民和新來的中國人關係愈來愈惡劣，而且還表明在新疆存在著一股民族主義的情懷。甚至有一部分的居民，爲爭取新疆的獨立而戰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二千名到三千名的伊斯蘭學生，在烏魯木齊街上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在新疆試爆核子彈。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輪到六百名維吾爾學生示威遊行，抗議規定他們一定要和中國學生住同一宿舍。一九八八年夏季，在伊犁地區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意外事件。有關這次意外事件的消息少得可憐，而且也不清楚。不過根據北京消息靈通人士的說法，好像是中國警察接到蘇俄情報局提供的消息，而逮捕不少在邊界兩側活動，正在祕密集會的哈薩克不滿分子。一九八八年開始，中國報紙透露了北京的憂慮。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烏魯木齊無線電電台」播放了「新疆協商委員會」主席——北京派到新疆的強人——王恩茂的一篇令人心慌的演說：「有些人說，反對漢人的就是英雄，和漢人聯合的就是叛徒。這種說法不但是荒謬，而且是非常反動的。當然祇有少數，極爲少數的人有這種想法……。有沒有反對漢人，要他們回到中國內地去的人呢？有，是有，不過不多。祇有一小部分，極少的一部分。漢人是反對這些人的，維吾爾人和所有其他的少數民族的人民也是反對他們的。這些人破壞國家團結，是和所有民族的人民的基本利益作對……。說少數民族從三十多年來就是奴隸，是眞正反動，非常反動的說法。」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烏魯木齊電台」又播放了一篇新疆黨委會副書記賈那布爾到沿著蘇俄邊界長達七百五十公里的伊犁地區視察報告。他特別指出：「除了好的事情之外，我們也應該謹愼地體察到有一部分人在國內，在國外，心懷叵測地蓄意破壞國家團結，企圖分化祖國的統一，毀壞穩定的政治局勢和地區的統一。我們應該對這些非常注意。」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新疆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新疆經濟情形和改革的評論。該文指出新疆的改革受到「全國，包括在新疆的所有民族的人民」的支持。「不過，有極少數的人，在新疆天然資源的開發上面大做文章，一直抱怨說新疆的原油朝東流，新疆的棉往外送，大量的商品離開新疆，卻祇看到很少量的貨物進門來。他們甚至建議禁止開採新疆的自然資源。他們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這篇文章也指出，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七年間，中央政府撥給了新疆高達二百七十三億五千九百萬元人民幣的補助金。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王恩茂在上海的一家報紙《報刊文摘》中指出，設立在國外的

祕密組織，尋求新疆獨立，並且派出特務到新疆進行破壞行動及「分裂主義」活動，企圖顛覆中國的主權。七個非法組織已經被查明正身，其中包括一個「東土耳其斯坦國家拯救委員會」，一個「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陣線」和一個「世界伊斯蘭聯盟」。

在中國的回教徒對刺激非常敏感：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數千名的伊斯蘭青年在北京街上遊行，高喊「懲治中國的魯希迪（Rushdie）」，抗議出版他們認爲汚辱《可蘭經》的書。五月十六日，大約有三萬名回教徒在西安示威遊行。出問題的書——《性習慣》，用很大膽的文字描寫伊斯蘭教的宗教習慣和活動：譬如說這本書把清眞寺比喻成勃起的陰莖。這本書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被查禁。所有已經發行「褻瀆宗教」的書都被燒燬。根據西方的遊客的目擊報導，最嚴重的意外事件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發生在喀什城北方古「絲路」上的阿克圖。這一次當地居民和治安警察發生的種族衝突，至少有六十名百姓和十一名警察死亡。中國政府承認發生暴動，因爲新疆地方電視台證實在四月五日和六日，在離開喀什南部七十五公里處的巴仁所發生的「武裝反革命暴動」中，有十五名民衆、六名警察及一名伊斯蘭公務員喪生[20]。阿克圖和巴仁都是隸屬緊鄰昔日的吉爾吉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吉爾吉斯自治州。現年九十高齡的玉蘇・伊薩・阿布特青是「東土耳其斯坦自主共和國」的前任總書記，他從一九五四年就流亡土耳其，定居於伊斯坦堡。雖然還在不停地批評中國在新疆的過分行爲，這位土耳其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卻選擇了土耳其國籍。他在中國新疆維吾爾人之間的聲望，是不能和達賴喇嘛在西藏人間所擁有的無上權威相提並論的。

註釋

①*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Beijing, 1989, p. 50.

②i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第一八頁。

③*Emancipation monthly*, Hong Kong，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④*Bulltin du Bureau d'information du gouvernement tibétain*, Zurich, 1989.

⑤*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同前書，第五四～五五頁。

⑥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轉報拉薩電視台十一月八日所播報之資料。該數字係中國國統局所發布之數字。

⑦*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

⑧*Tibet, aperçu général, La liberté de croyance religieuse au Tibet.* Editions Nouvelle Etoile, Pékin, 1991.

⑨*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p. 165.

⑩*Tibet, aperçu général, La liberté de croyance religieuse*，同前書。

⑪*Tibetan Bulletin*，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月，第五頁。*Tibet Press Watch, pp. 7,8.*

⑫*Political Prisoners in Tibet*, Asia Watch and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join report，一九九二年二月。

⑬路透社(Agence Reuter)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⑭《解放軍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⑮*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⑯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一九九二年七月二日、三日。

⑰法新社，一九九〇年四月九日。

⑱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

⑲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⑳法新社，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二章 控制與解體

除非是有一場高傷亡的戰爭，把中國打得爬不起來，不然是很難想像中國會自動放棄她堅持認爲她在西藏這個戰略地區所擁有的主權。從世界地緣政治均勢的角度來看，有那一個中國政府，不管它是不是共產主義，會在沒有高強度的壓力下放棄西藏呢？有史以來，我們就從來沒有看過，有那一個國家曾經自動地放棄她所征服的土地。我們也不需要冀望會有那一個國家，會祇是爲著要表現寬懷或是人道主義而無償地放棄一塊土地。何況任何一個做了這種決定的中國政府，終有一天會被敵對政黨控告叛國。一九四九年隨著忠於蔣介石將軍的國民黨部隊，退守中國大陸東南方台灣島上的民族主義政府，也和北京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樣，堅持地宣稱西藏是中華民國神聖不可侵犯的完整領土的一部分。關於台灣的政權，政治氣候在最近幾年間有著非常大的變化，並且是大步朝向眞正的民主前進。台灣已經成爲包括新加坡、香港在內所有華人世界的民主榜樣。因此，我們可以期待，國民黨的西藏政策，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有所改變。一九九二年六月，台灣當時的政府發言人胡志強向我解釋說，如果有一天必須要討論到有關西藏的新模式時，「很明顯地，我們不能強迫西藏人」。此外，西藏人還可以指望得到公開爭取台灣獨立並且擁有百分之三十選民的民進黨的支持。該黨負責國際關係的外交部主任楊黃美

幸女士毫不避諱地說，她的黨「贊成西藏民族自決」，而且「支持西藏獨立的想法」。

如果中國眞正地走向民主，而且如果西藏還沒有被完全漢化，我們可以從台灣的例子中看到，在中、長期之後，一個影響深遠，足以改變西藏地位的思想演變，譬如說成立一個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中國聯邦」。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屠殺之後避難到法國及美國的中國不滿分子，組成了一個類似流亡政府的「中國民主聯盟」。當時的主席嚴家其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底宣稱，中國擺脫目前在北京掌握政權的共產黨「集團」的時候，西藏將可以加入一個地位還有待討論的「聯邦」。這種建議和達賴喇嘛關於中國和西藏「邦聯」的想法不謀而合。

然而爲什麼北京會如此固執地毫不讓步呢？我們看看地圖就知道：對中國而言，西藏是一個戰略地區，也是經濟、人口及軍事擴展的重要地帶。因此，在最近幾年，中國毫不放鬆地在西藏推行融入政策。和毛澤東的暴力政策比起來，這種融入政策是比較不引人注意，也比較陰險，不過卻有相同的驚人效果。很多的西藏人認爲，一九七九年以來的中國新政策帶有所有種族滅絕的特性：最後的結局，藏族人民不是被完全的同化，就是完全消失。此外，就經濟方面而言，如果要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在西藏四十年的所做所爲做一總結，資產收支表上一定顯示負債累累。現在的西藏依然是中國各省、各地區中最落後、非常落後的地方：儘管中國的政府宣傳不停地對我們說得天花亂墜，藏族人民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要比中國部隊到達之前要好還是很値得商榷。

一、失樂園

西藏地處喜馬拉雅山脈高原地區，爲區域性列強競爭的重要賭注。全世界祇有十四座海拔超過八千公尺的高峯，在西藏就有十座，其中標高八千八百四十六・一三公尺的珠穆朗瑪峯是全世界第一高峯。崑崙山脈分別在西藏的北部及西部連綿不絕。西藏以崑崙山脈和巴基斯坦爲界。岡底斯山脈的主峯岡仁波齊峯是波羅門教徒和佛教徒的神山。對波羅門教徒而言，它是「破壞再生神」濕婆修行的地方；對佛教徒而言，它是極樂世界，也是西藏的守護神。虔誠的佛教徒們繞著他走上八圈，每圈有五十二公里，就可以洗除孽障，若是繞上一〇八圈，就可以達到「涅槃」的境界。在六〇年代初期，有一半以上的西藏「人種」疆域被劃入一些中國鄰近省份的「行政」疆域之內，不過平均海拔超過四千公尺的「西藏自治區」還是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比法國還要大二倍，比台灣大三十三倍。

西藏和喜馬拉雅山脈是東南亞及其數十億人口的水源地。全長二〇五七公里的布拉馬普特拉河——在西藏的一段叫做雅魯藏布江——發源於冰天雪地的西藏高峯群，橫穿西藏高原再灌溉，時常也氾濫中國、孟加拉和印度的河谷及平原。印度河的源頭也是在西藏，然後從北到南貫穿巴基斯坦。印度的聖河——恒河，也是靠喜馬拉雅山脈。縱切緬甸的伊洛瓦底江，斜劃中南半島，灌溉寮國、泰國及柬埔寨的湄公河——在西藏的一段叫做瀾滄江——還是從西藏源遠而來。長江，全世界最長的河流之一，發源於喜馬拉雅山脈東端的康區附近，在當地稱爲金沙

江。中國的另外一條大河——黃河，則發源於西藏高原的北部。

在天險自成的西藏高原上，中國部隊取得了可以控制廣大地域的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二千五百公里由群山峻嶺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保護中國不受敵對或未來的敵對強鄰，如印度、蘇俄國協等疆土擴張的威脅。除了在西藏、安多與康駐紮著數十萬的大軍之外，中國還逐步地利用了大量的義務人工，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在山區開鑿了一道包括有地下軍營、彈藥庫、補給站及聯絡隧道的高密度地下戰鬥網。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很不容易被西方的間諜衛星所視破的。

中國部隊在極端的祕密下，徵調了中國籍戰士建築了一座核子飛彈發射基地。這個工程在中國人難以適應的高海拔地方，艱苦地進行了好幾年的時間。中國在一九六四年時，成功地試爆了她的第一顆子彈，凱旋式地步著美國、蘇俄、英國和法國的後塵，堂堂地進入了「原子俱樂部」，和火箭、飛彈、衛星一樣成爲軍事研究中心的掌上明珠，中國人的驕傲。核子工程在毛澤東及周恩來的特別眷顧下，跳出了內部政治鬥爭的輪迴，也逃過了文革這一浩刼。中國希望憑著這一支可靠的打擊力量，保證她在美國和蘇俄兩大超級軍事強國之間的獨立，因此核子武力一直被列爲絕對的優先，從來沒有受到一九七九年以來軍事預算縮減政策的影響。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新聞處、印度及台灣情報局的資料，中國在西藏至少有五個核子飛彈基地，分別設在工布林芝、波密札木、那亞、日土和格爾木。某些消息顯示，在拉薩北方二百四十公里處的那曲鎮，從一九六七年開始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核子飛彈基地。不過這個消息很難給予證實。然而落難在外的西藏人都說，在那曲鎮附近沒有任何西藏住家。這個地方嚴禁西藏人和中國百姓進入。在西藏的這些基地總共配備有至少八枚的洲際彈道核子飛彈（I

ＣＢＭ），七十枚的近程彈道核子飛彈（ＭＲＢＭ）和二十枚的中程彈道核子飛彈（ＩＲＢＭ）。這些飛彈從西藏高原居高臨下對準印度及蘇俄的主要城市和工業中心。根據其他的消息，中國在西藏至少設置了十七座雷達站、十四個軍用機場。在西藏祇有一個在拉薩東南八十公里的貢噶機場開放供民航使用。也許就是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大部分的西藏領空都是禁止國際民航班機飛越。

不久前，人民解放軍的報紙提到了在一九八八年八月的時候，在西藏舉行了為期十天的演習「測試剛研製成功的裝備」以確保「高山地區每個角落的化學戰防衛系統」。這篇報導指出，這些演習「大大地提高了化學防衛系統的協調措施」①。在同一個時期，北京也發布了有關空降部隊在西藏訓練的消息。她解釋說：「中國空降部隊的一個單位在青海及西藏完成了空降及求生的訓練。這個訓練的成果顯示這個單位是有能力用降落傘在高山地區安全著地。」②

避難在外的西藏人也指責中國在西藏試爆核子彈、存放核子廢料。很自然地中國對這些予以全盤否認。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中國從來沒有在西藏布置核子武器，也沒有埋放核子廢料。西藏的自然環境沒有受到核子污染。」③至於西方的專家們，他們認為中國最大的核子武器試爆區是在新疆大戈壁裏的羅布泊。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在這座極機密的基地中，試爆了為數不在少量的核子彈。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西德和中國曾經接觸，討論有關民間使用的核子設備問題。對未來可能要購買核能中心的技術及設備的付款方式，中國方面曾經建議一個非常特殊的方法：把西德的核能廢料埋放在中國西部人口稀少地區的地下！經過周密的研究之後，波昂政府及德國公司ＭＢＢ擔心引發醜聞，以及在德國愈來愈有政治影響力的綠黨劇烈反

對下而作罷。不過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的時候，中國和日本還是簽訂了共同研究高輻射的核能廢料存放系統的核約。這條約規定雙方在存放核能中心剩餘廢料的器材安全性測試方面做共同研究④。不過條約上沒有說明可能存放廢料的地方。除此之外，問題並不祇局限於核能廢料；西藏也有可能成爲開發工業國的垃圾堆。一九九二年三月，美國的一份報紙指出，巴爾的摩市和一位加利佛尼亞州的掮客簽定一項以一百四十萬美元的代價，把二十萬噸的城市垃圾運往西藏的交易。這個市場其實是另外一項合約的下游交易而已。在這項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一家中國公司——海南孫立特（Sunlitt）集團公司、加利佛尼亞州掮客的貿易搭檔所簽定的主合同中，規定西藏接受一百五十萬噸從美國來的城市垃圾⑤。

喜馬拉雅山脈和西藏是全世界中僅存的最後幾片處女地區之一。在那裏有成群結隊的野獸及罕見的花木：已經統計出來的就有五千七百六十種植物。至於野生動物，較爲人知的就有喜馬拉雅山猴（長尾灰葉猴）、雪豹、藏羚羊（應該稱爲羚「牛」才對，因其體形大如牛）、麂、野犛牛、雪豬、雲豹、大頭角的盤羊、黑頸的西藏鶴、分泌麝香的麝、產開司米毛線的羊、羌，以及重達數公斤的大犀鳥等。西藏及喜馬拉雅山脈的草木隨著季節的變化、河水的漲落而榮枯輪替地生長在五千公尺高的雪線上下的河谷。在西藏有幾座廣大的處女林，是重要的地球肺之一。西藏、蒙古及滿州的林區號稱中國三大林區。根據中國政府最近的調查報告，僅僅是在「西藏自治區」的林區，就有六百三十二萬公頃。

西藏高原上湖泊星羅棋布，爲數繁多，約有一千五百多個，個個湖水晶瑩清澈。這些大小湖泊基本上分成兩類，藏北高原上的，多數是鹹水湖，藏南山地裏，則多淡水湖。西藏也有個

地下寶庫，礦藏資源非常豐富。已經知道的重要礦藏有金、銀、銅、鐵、煤、鈾、鋰、鎢、石墨、硼砂、硫磺、硫化物、重晶石及油頁岩等，其中鈾、硼砂及鋰的蘊藏量是全世界總藏量的一半。中國報紙指出，在青海（安多）有八條正在開採的金脈，其中有二條在果洛的瑪堆和白瑪。淘洗金沙將會為開採者帶來「財富」⑥。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一九九一年青海（安多）的產金量達到了一百七十七公斤，比一九九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⑦。事實上，在西藏及藏人區早就已經大量開採地下礦產了。根據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調查，一九九〇年間，就從「西藏自治區」提煉出十萬噸的礦產，其中有七萬噸的鉻。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間，總共開採出五十萬噸的鉻。九十年代的目標是年產九萬噸的鉻⑧。至於鈾礦，中國的地質學家在「西藏自治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川（康）、甘肅（安多）、青海的柴達木盆地等地發現了大量的鈾礦脈，其中有些已經開始開採了⑨。儘管在西藏礦坑動用大量的免費勞工（勞改營的犯人），中國還沒有可以讓她大量開採的技術，不過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的，並且在必要的情況下，利用西方的外資外才。西藏的水利、地熱、風力及太陽能等的資源也是非常富足的。根據統計，全區天然水力能的蘊藏量約為二億多千瓦，其中雅魯藏布江的水能量就有一億一千多萬瓦，僅次於長江。在西藏，已經有六百多處出現地熱，著名的羊八井熱田的熱能發電潛力約達十五萬千瓦。一條由羊八井通往拉薩的巨大地熱輸送管，已經鋪設完成。

喜馬拉雄山脈和西藏具有綺麗的高原風光，複雜的高原氣候，珍稀的高原動植物以及獨特的高原地質地貌。這個天然寶藏是全體人類的生態財富，不應該成為「文明」的新垃圾堆。然而在二十年前依舊完整無損的生態環境，現在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了。有些破壞已經是無法補

救了。我們知不知道前面列舉的一些稀有動物已經面臨絕種的威脅？除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間被人民解放軍用機關槍大量宰殺之外，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偷獵者也是動物逐漸絕跡的原因。在西藏和尼泊爾，一座座的森林被濫砍濫伐。整座山腰被砍伐得童山濯濯，有的是要開墾成梯田，有的則祇是要賣木材。現在的森林景觀和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國人埃德蒙特・希拉里(Edmund Lillary)和他的舍爾巴嚮導丹增・諾爾蓋(Tenzing Norgray)首度登上世界「第三極」時所看到的森林，已經是大異其趣了。

然而，在西藏，濫伐森林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四日在巴西里約「地球高峯會議」的時候，發表了一份有關西藏生態的環境報告。這份題名爲《西藏：一九九二年的環境與發展》的報告有一部分是採用中國政府的正式統計數字。它指出百分之四十在「西藏自治區」、康及安多（四川、雲南、青海、甘肅）藏人居住區的處女森林，從五十年代就開始砍伐。森林的總面積從一九五〇年的二千五百二十萬公頃（約占全區土地的百分之九），縮減到剩下百分之五的一千三百五十七萬公頃。這些大部分是在西藏高原東部沿著黃河、長江、瀾滄江、薩爾溫江，以及布拉馬普特拉河的河谷生長的樹齡達二百年的針葉林。這些砍伐取得了九十四萬立方公尺的木材，但也毀掉到一九五〇年時代可用材積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六。這些木材被運到中國內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外銷，爲中國政府賺取了一筆五百四十億的美金外滙，從一九八五年又開始砍伐。地形的險惡和交通的不方便遏止了砍伐的速度，不過新的產業道路已經鋪設完成了。「西藏自治區」中比較不受到砍伐影響的工布和波密札木等地，目前大約有二萬餘名的人民解放軍和西藏的犯人在大肆砍伐⑩。這些森林的砍伐很少

是有重新補種，因而造成了西藏野生動物的大量消失（其中有些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土壤快速的流失與侵蝕，地形的滑動，以及黃河、長江與布拉馬普特拉河流沙的沉積，而使該區包括印度和孟加拉河水氾濫的強度大幅增加⑪。英國籍的西藏生態專家，皇家地球協會的會員布雷勒得雷．羅維(Brudley Rowe)認爲，一九八五年來在西藏森林區的砍伐，破壞了百分之七十位在四川及雲南鄰省的西藏森林⑫。

數十年來，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注意過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問題，而把許多中國城市弄得像五十年代的西方工業中心一樣不能住人。那裏的空氣不堪入肺，水則充滿著可以致人於死的病菌及細菌。新的住宅區犯罪累累。得癌症而死的比率愈來愈高，生活環境愈來愈差，使中國終於在最近幾年察覺到，她爲她的後代子孫所準備的未來竟是如此令人擔憂。中國是貧窮的，工業發展很自然地被列爲優先，這就很難預測中國社會的未來了。還好中國報紙已經開始刊登令人心慌的報導了。雖然有反污染條例，限制污染最嚴重的工業，然而保護自然環境的成效遠遠不能和日本、南韓或西方國家相比。許多專家認爲，幅員廣大的中國如果再繼續做全面性的環境污染，在幾十年後，整個世界將要爲她的錯誤付出慘重的代價。

至於西藏，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之外，所有有關這一方面的報導都是查禁的。不過在一九八八年年底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有關西藏森林破壞的意義深遠的文章：「西藏的處女林是我國保存最完整的幾個林區之一。不過我們感到很羞愧，近十年來，這座森林也被濫砍及火災嚴重破壞。祇要了解西藏森林的人都看得出來，一大片的森林消失了。所有愛護我們國家財產的人，都會感到遺憾。我親自到米林縣邑去訪問，在那裏，木材堆積得到處都是。不管

是國營的或私營的林場都在砍樹。甚至年輕的樹也被砍去賣。在那裏，非常浪費。一大堆一大堆的大樹被遺棄在地上，因爲沒有辦法載運。縣邑南部的森林，整個被剃光。在西藏每年有好幾次森林火災。上萬公頃的森林就此消失。我們希望有關單位能夠採取有力的措施，以保護西藏的森林資源」⑬。

至於西藏的湖泊，鄰境新疆與青海的湖泊所遭遇的命運也威脅著一些西藏的湖泊。英文版《中國日報》的一篇文章讓我們看得出來情形多麼糟糕。中國最大的湖喀喀諾爾原先屬於藏人居住區，後來被中國改稱爲青海湖。她的水位每年降低一〇・八厘米。其實，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她的水位總共降低了三・三公尺！在新疆的湖泊早就乾涸變成鹽床了。四十年來，中國移民在這個地區的人數大幅增加，農作地區增加了三倍。人口爆增和農作物灌溉的需要，是西藏湖泊所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⑭。其中有一個湖受到的威脅特別實際也特別大，就是在拉薩南方約一百二十公里的西藏第三大湖。羊卓雍錯湖面海拔四千四百四十一公尺，湖水面積六百七十八平方公里，是西藏第一大淡水湖，不但有「西藏魚庫」之稱，也是西藏著名的牧場之一。然而她的湖水很快就要被用來發動一座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建造的水力發電廠了。中國工程師在這裏勘測設計，準備在分隔雅魯藏布江和羊卓雍錯湖的甘巴拉山開鑿一條長六公里的引水隧道，引湖水衝動在落差八百四十六公尺下的一萬五千瓦的泵。這座水力發電站到西元二〇〇〇年的時候，將會有總功能高達九十兆瓦的六部主機。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有一部分的水將會在低谷期間回收引回羊卓雍錯湖，因此湖水降落的速度可以減少到每年七・六厘米。很多的西藏人卻擔心泥漿水回流到清澈湖水裏的情形，以及這個計畫對環境所帶來的破壞。班禪喇嘛生前就

是對這個計畫反對最力的人之一。最近北京承認派出了一千五百名武裝警察特支隊以確保發電站的工程⑮。

此外，大量的遊客則污染了喜馬拉雅山區。在某些地方，他們所造成的污染程度令人咋舌錯愕。大家都知道，中國在西藏的旅遊觀光計畫是非常具有野心的。從一九八七年年底開始，由於拉薩的騷亂，才使觀光事業的脚步放慢。一九六〇年在尼泊爾有十萬的遊客，到了八十年後期則每年有二十五萬的觀光客。根據尼泊爾政府的預測，到了西元二〇〇〇年時候，觀光的人數會增加四倍。毫無疑問地，這些觀光客會改變當地的經濟，當然也會慢慢地腐蝕千年來的脆弱傳統。我們可以確定，如果沒有「現代化」，這些傳統是頂不住「新潮化」的衝擊的。

二、落後國家的落後地區

一九八七年年底，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正式訪問法國的時候，法國的新聞界不斷地就西藏的情勢向他提出問題。法國的輿論對拉薩的暴亂和其粗野的鎮壓事件非常敏感。這位心中惱火的八十老人，泰然自若地用他那蒼老顫抖的聲音回答說，在中國軍隊抵達之前，西藏祇有野蠻人。絕大部分的西藏人不都是貴族、寺廟的農奴嗎？西藏不是還處在中古世紀嗎？面對著這種局勢，中國不是有干涉的義務嗎？他強調西方人在批評中國之前應該先想一想。中國在西藏祇有一個崇高的任務：提供「文明」。李先念，中共最保守的領導幹部之一，也許祇看到和他談話的人尷尬的表情？法國人知道李先念的談話影射著法屬阿爾及利亞，或離西藏更近的法

屬中南半島。

北京所援用的理由無恥至極，然而從一九五〇年到現在，卻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說法。如果我們看看，四十年間在「社會主義文明」下西藏應該有的經濟進步成長，事情就更明顯了。每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看到總結報告都會被嚇得目瞪口呆。因爲如果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貧困的人之一，西藏人則應該算是完全被發展進步所遺忘的一群，與世隔絕的一群。西藏是未開發國家中的未開發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她的鄰近國家之間，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了。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在中國約有七千萬到一億的農村居民年平均所得低於二百元人民幣（約折合二百法國法郎，相當於九百台幣）。中國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任義農透露說，在這些甲級貧戶中，有一千萬的少數民族。他說這些人缺乏糧食，生活品質非常低劣[16]。前中共中委會少數民族事務的負責人閻明復明確指出，事實上有三千三百萬少數民族的生活比窮人還不如。根據中國的定義，所謂的「窮人」，指的是吃不飽、穿不暖、沒有房子、不識字的人[17]。班禪喇嘛還曾經提供一則補充消息：整個西藏的個人年平均所得祇有三百元人民幣[18]！

有沒有必要指出參加旅行團到中國，下榻豪華賓館的西方觀光客，永遠也看不到極端貧窮的這些人？一方面他們很不容易接近，一方面他們被排斥在觀光路線之外。

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和印度的情形差不了多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徹底打垮的日本，國民生產毛額超過二萬三千五百美元；在被國民黨的「反動分子」統治下的台灣，也高達七千五百元；在南韓，五千美元；在香港，一萬一千美元[19]。除了用制度的破產

來說明之外，應該要如何解釋中國國民生產毛額一直停滯在四百到五百美元之間的事實呢？鄧小平最重要的目標，是要在西元二〇〇〇年的時候，把國民生產毛額提高到一千美元。很好，問題是，即使他圓了這個美夢，到那個時候其他鄰國又已經高到那裏了呢？中國領導們永久使用相同的解釋：中國幅員廣大，不容易管理，而且天災連連。可是中國公司的效率是全世界最差的幾個之一。全國經濟環節中，唯一具有朝氣的是私營事業。中國本身的情形已經是這個樣子，如果我們拿西藏的生活水準來和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或是正在工業化的國家比較，那就眞的有天壤之別了。這種比較與分析變成是對北京的一種侮辱。

毛澤東主義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饑荒也許已經在西藏消失了，可是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卻愈來愈大。中國政府表明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間，她已經撥給了西藏至少一百二十億元人民幣的財務支援。在同一時期，中國政府也對西藏基礎建設的計畫投資了三十四億三千萬元人民幣。此外，還有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中央」政府撥給西藏五十九億一千萬元人民幣的各種救濟措施⑳。然而，像胡耀邦一樣，我們也可以很合理地自問，這些錢都跑到那裏去了？還好由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在農業方面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使這幾年的穀類生產量激增，而達到一九八七年的四十六萬七千公噸，按人口比例來算的話是年平均每人生產二百三十三公斤。一九九〇年的生產量創下了五十六萬公噸的新紀錄，約爲中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〇・一三㉑。雖然每人每年的穀類生產量已經提高到二百五十三公斤，可是這種成績仍然大大地低於全中國每人每年生產三百三十五公斤穀類的平均值。

如果我們看看工業部門，成績是一樣見不得人。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一九八八年八月份

的西藏工業生產額爲一千一百萬元人民幣，約爲全中國生產總額的萬分之一，比中國最落後之一的甘肅省的生產額還要少一百三十倍！此外，雖然有著十年的經濟改革，西藏經濟的起飛不會是最近的未來。因爲根據同一份官方統計，在百廢待興的西藏，一九八八年八月份的工業成長率和一九八七年同期比起來是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二。整個中國同期的工業成長率是百分之十八・三。在同一時期，香港鄰境的廣東省，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六・一；朝鮮半島對岸的山東省，成長了百分之二十八・一；中國大陸南方，越南半島對面的海南島，成長了百分之四十二・四㉒。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情勢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改善，因爲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一九九〇年西藏的工業生產額是二億三千五百萬元人民幣，和一九八九年比起來增加了百分之六・三；可是這個生產額仍然維持在整個中國工業生產額的萬分之一（二兆三千八百五十億元人民幣）㉓。至於和外界的商業貿易，一九九〇年的交易額是二億四千五百萬元人民幣，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〇・五還不到㉔。如果我們把用高價進口供外國觀光客使用的各種設備算進去的話，西藏很可能不但沒有利潤，而且還是外貿赤字。

就這樣，經濟改革在中國有二種脚步，中國沿海一帶地區很可能會變成其他地區的經濟帶動區，西藏則很明顯地祇能在悲慘中打轉。

在教育方面，情形也沒有比較高明。中國的政治統戰部門大量地印發了有關在西藏教育的非凡成果。他們大肆渲染說，西藏在一九五〇年以前，除了剝削階級的貴族及大喇嘛之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文盲。好，可是如果我們再回頭看看中國的報紙，情形並沒有好轉。因爲四十二年後，在西藏依舊有一百四十萬，約百分之七十的藏人不會看也不會寫㉕！根據中國政

府掩飾不了悲慘情勢的婉轉措辭，在西藏的教育設備還是「很少」，教員人數「不足」。最近，一份西藏的報紙甚至指出，西藏居民的文盲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㉖。整個中國平均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文盲。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在西藏的文明任務完成些什麼進步？有什麼事情可以列入中國的成績單？

在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間，中國可能在西藏的教育上，花了七億元人民幣。一九八七年這一年，大約花了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這一些錢想要讓西藏的小孩子就學是大大的不足。根據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一年公布的數字，西藏有二千四百六十九座學校，其中有四所大學、十五所中等專業學校、六十八所普通中學以及二千三百所的小學，總共有十七萬七千名學生，就學率達百分之五十四・四。此外還有森林學、生物學、生態學、太陽能、天文學、醫學及藏藥學等科學研究學院㉗。我們還得加上在中國內地求學的藏籍學生。在一九八七年的時候，他們的總數約為五千二百七十八人。按計畫，到了西元二〇〇〇年的時候，將會有一千五百名西藏大學畢業生，一萬零四百名專業技術學院畢業生㉘。第一所西藏大學於一九八五年七月成立於拉薩。西藏大學設有十七門學科，由十七名教授及助教負責授課。在八個系中有三個系教的完全是西藏的文化遺產，譬如說藏文、藏醫學等。這所大學的第一批二百四十六名畢業生於一九八八年七月離開學校。以上這些祇是政府的統計數字，實際上的情形，可就沒有這麼神奇了。

北京承認，在「西藏自治區」有一半及齡就學的藏族兒童沒有就學㉙。這個統計數字好像是太過於樂觀了一點。在青海省，昔日的安多，有些地區的藏族及齡兒童的就學率祇有百分之十一・二；其他的地區則有百分之二十一・六。就學率最高的地區達到百分之八十八。該省副

主席白瑪丹增說：「由於財力和物力的不足，省的基礎教育還是處於落後狀態，省各地區的教育發展非常不平衡。」㉚這種情形在西藏更是糟糕。西藏人或是這些年來走過西藏鄉野的中國人都看到令人傷心的情景。

在村子裏，祗有小學，這些學校一般都是用幾片木板，外加一片瓦楞鐵皮當屋頂湊搭起來的，沒有一張課桌椅。「老師們」憑著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猜時間。學生們經過四年的「教育」後，理論上應該要轉到鎮上的學校繼續另外一段四年的教育。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繼續升學。鎮上的學校一般離村子都很遠，有些要走上二、三天才行，農家也猶豫把可以下田幫忙的孩子送走。更何況他們也沒有辦法了解，學校裏所教的知識有什麼用，因爲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形之外，這些學校也祗不過是中國的統戰宣傳站而已。

事實上的確是如此。學校是中國在西藏用來宣傳漢化政策，深入不毛的利器。在有些地方，小學就開始教中文。歷史課及其他的學科，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好把一九五〇年中國和西藏統一的好事完完全全地滲透到天真無邪的小腦袋瓜裏面。舊制度很自然地被極度醜化。與其說是去求學，倒不如說是去被洗腦。在學校幾乎沒有教西藏的文化與傳統，所做的全部都是中國的文化知識。除了蓄意對西藏文化的漠不關心而可能造成年輕一代的西藏人藐視自己的文化之外，藏文的自然淘汰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至於西藏的紐帶——宗教，在學校不是被醜化，就是根本不存在。

四十餘年來，中共處心積慮地想要在西藏培養一批完全站在中國方面立場的藏族精英。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從五十年代他就開始把成千的西藏學生送到北京、成都、西安、蘭州、上

海及其他城市的中學和大學接受教育。這些離鄉背井的年輕人，在幾年之間就被刨了根，這是政治包裝必要的先決條件。中國政府有意培養這些漢化的藏人成爲西藏明日的幹部。如果這個政策成功了，中國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全世界宣稱，西藏是由西藏人所統治。可是從這幾年來的騷亂情形衡量，這個策略顯然是失敗了。北京沒有辦法要他們死心塌地地效忠。很多這些知識分子甚至是堅決的民族主義分子，反而繼續其對中國在西藏統治的反動。他們在西藏領導層中的職位，反而強化了西藏民族主義的影響力。

三、漢化的武器

前西德綠黨領袖彼得・凱利(Petra Kelly)很明確地指出：「在世界屋脊上舉行了燔祭（譯者按，猶太教徒祭祀時把祭品全部燒掉的儀式），然而自由世界卻依舊不予注意。西藏的情勢讓人難以接受。在西藏約有五十萬的中國部隊以及四分之一的中國軍火庫。」㉛

中國政府的說法則恰恰相反。可是任何一個以公正的眼光看目前在西藏所發生事情的人，一定會看到這件惹眼的事實：中國在極端隱祕之下，進行持久的西藏漢化運動。藏民族的大本營被包圍亦久矣，現在已經面臨著要棄城投降的威脅了：她再也撐不了多久了！然而中國政府卻口口聲聲辯稱無辜。中國報紙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明文規定尊重及保護所有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藏族的傳統文化及珍貴的歷史遺產並不例外。」他還說，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行爲確實是造成了不少無可挽回的損失，可是這些暴力是「左傾」分子所策劃的，而且已經被修正了。

事實上，「一般人時常把『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所造成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和中國人民政府在解放以來一直遵行的正確政策混淆在一起」。對不明就裏的人，他還加上：「西藏傳統文學及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政府對他們非常重視。」㉜

按照上級的指示，「漢籍幹部必須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學習他們的語言，藏籍幹部則必須學習漢語。漢籍幹部必須隨時注意自己，不得有漢族沙文主義的思想，少數民族的幹部亦得檢點自己，不得有地方主義思想。對民族問題，所有的幹部都應該嚴肅地學習馬列主義，並且繼續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和思想水平」㉝。

事實上，西藏「和平解放」後四十餘年的今天，中國的戰略目標並沒有任何改變。目標是要克服西藏的傳統與習俗。這個目標的積極目的則是要粉碎帶有敵意的社會，征服所有的異別意識。

要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和爭取中國獨立，也許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勝利的最主要原因。從今天來看，這是他們唯一不容否認的勝利。毫無疑問地，這是值得讚揚、尊敬的，然而如果現在中國知識分子要找個原因來感激中共的革命及其老戰士，為中國獨立而奮鬥將是唯一的理由。中國理論家嚴家其解釋說：「一九四九年並不是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共能不能奪取政權還是個疑問。隨著社會結構的衰壞，共產黨的勝利水到渠成。可是當中共組織政府的時候，他們跟隨著王朝式的傳統邏輯。他們建立了獨裁制度㉞。和越南及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一樣，中共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力，而且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得到人民熱烈的支持。自從登上王座

以來，北京的領導們就一直被中國分裂的幽靈糾纏著。隨著地區間差異的增大，以及目前世界局勢的演變，這個幽靈的威脅愈來愈真實。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領導們從來沒有如此毛骨悚然過。由於中共控制權的急速腐蝕，再加上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充滿著一股強勁的離心風潮。

因此，在少數民族佔大多數的地區推行同化政策，成爲北京當前之急務。根據中國人口學家和人種學家的調查，在中國邊陲地方住有五十五種不同的人種。這些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大約有六千七百萬人，僅佔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六．七，誠爲漢海中的一粟。然而依戀著自己的習俗，這些人都揚棄無端加諸於他們的共產制度，從而對北京構成了叛亂與分裂的永久性威脅。這些地區的漢化，也就益形重要。祇要看看四十年來，中國人如何猛烈地摧毀他們的傳統，他們又是如何盲目地墜入異族文化的激流裏，我們就可以預知西藏全盤抄襲中國的悲慘命運。如果我們把西藏想像成當年的美國印地安人一樣，中國政府在這毫無價值的保留區，寬大爲懷地免費供應酒精類飲料，以便加速藏族人民的大限，這應該不算是過分的誇張。

在西藏，水果已經長蟲了。中國政府已經公開或非公開地使用了好幾種不同的方法來推動「西藏漢化」運動。其中一種我們已經見識過了，就是普及教育和使用中文揚棄藏文。使用中文是藏籍幹部的必要條件，因爲他們的漢籍同事會講藏語的少得就像鳳毛麟角。慢慢地，西藏人要到城市裏或大鄉鎮裏的商店買東西，也要會講中文才行。有上學的西藏孩童之間，用流利的中文交談，在家裏和父母都說得一口破藏文。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藏文很快就要變成一種方言了。就像客家話一樣，甚至像山地話一樣，祇有蹲在門口的老人才會講。

一九八七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宣布藏文是「西藏自治區」的第一正式語言。她建議漢籍幹部學習藏文。這條條例的起草人也許有值得嘉許的意圖，然而這個建議從一開始就被認爲是一個大笑話：中國居民茶餘飯後大肆公開嘲笑。另外一條則規定從一九九〇年年底開始，自治區各級國家機關下發的行使職務的公文，如果沒有藏文，下級機關可以拒絕接受。很多人認爲這一規定同樣是個惡作劇。好幾年前就規定，所有的正式文件，行政大樓指標必須要使用雙語（先用中文後用藏文）。這個規定很少有人理睬。多少的西藏犯人祇看到一紙一撇也不識的中文文件？藏文版《西藏日報》自發行以來，也有二十餘年了，然而它祇向西藏的勞動大衆宣告中國政府的規章而已。更嚴重的是有一部分中國政府培養的西藏新貴族，寧可使用中文。這批依附於中國政府的藏籍幹部，認爲說中文可以顯示出身分的高貴。

西藏漢化的另外一種措施，就是開放西藏旅遊。中國政府從來不覺得有必要否認他們想要利用西方觀光客來削弱西藏傳統的意圖。我們可以在中國政府所發行的一本刊物上找到證據。西藏旅遊部門的負責人之一阿沛仁靑在這本刊物裏說：「旅遊業鼓舞著思想的開放。西藏長期的自我孤立造成了許多落後及保守的想法。隨著外國旅遊客的大量來臨，他們的生活、思想、判斷方式一定不會不對這個很古老的民族的想法帶來影響。思想上的進步將帶動社會的進步。」[35]這種利用外國第三者進行顚覆活動的策略，從某些角度來看，已經成功地動搖了拉薩及其他列入開放旅遊城市的習俗與生活方式。

戒嚴令的實施，延緩了西藏旅遊發展的計畫。根據中國政府的正式統計，在一九九〇年一月到四月間，祇有一千三百六十二位外國旅遊客到西藏，一九八九年同期則有一萬人次[36]。人

潮又開始逐漸增加，不過還沒有回復到一九八七年以前的數目。然而，如果那一天，每年五十萬人次觀光旅遊的目標達到了，我們可悲的拉薩：每年有五十萬背著照像機，手上拿著可口可樂的鋁罐，嘴裏嚼著口香糖的觀光客，在祇有五萬藏人的城市裏逛來逛去。在拉薩城裏每十個外國人才有一個西藏人！在旅遊旺季的時候……。已經被在拉薩有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擠得很不舒服了，再加上拉薩外圍又被龐大眾多的軍營圈住，現在又多出比他們多十倍的外國人，這些可憐的西藏人，很快地就會變得像生活在野生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在這些條件下，神祇之城怎麼可能不失去她的靈魂呢？

漢化也靠著中國消費商品對西藏市場的大量傾銷來傳遞：衣服、布匹、熱水瓶、家庭清潔用具、罐頭食品、瓶裝飲料和其他各式各類的日用商品從中國內地，用卡車、用飛機源源不斷地運到西藏高原。這些商品全都是由來自四川或鄰近省份的中國商人所控制。除此之外，走私風行。從印度、尼泊爾來的商隊，載著便宜的衣服及各種商品，在邊界衛兵親切的目光下，很可能是因爲手短嘴軟，浩浩蕩蕩地進入西藏。這些都在西藏造成了新的需求。這個目的就是要不費吹灰之力改變西藏的生活方式，動搖古老的習俗。在西藏已經到處有人不再穿傳統色彩豐富的衣服，而改穿顏色單調、暗淡的中國制服，便宜而且從不缺貨。在城裏，在鄉下，到處都是戴中國綠帽，穿水藍色或橄欖色的棉襖的小孩子。合成纖維及化學色素取代了天然質料和色料。婦女們比較不受到這種物質侵略的影響，然而除了喜慶節日之外，已經有很多人不再穿傳統寬大的藏袍，不再圍著幫墊，頭髮上也不再繫著各種顏色的扎秀。

同樣地，時常可以看到西藏人爲了區區幾十元人民幣，就把他們的珠寶、佩刀、祈經輪及

護身符賣給外國觀光客。當天晚上，他們就把這些錢用在挺著大肚子的中國商人開的小酒店裏買醉。看到輪廓粗獷、充滿野性、驕傲的康巴騎士解開長長的黑髮辮，取下了傳統的綠石和珊瑚，換取幾張十元鈔票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在大昭寺附近的街上，前幾天還堅決漢化的這些康巴門士，如今卻投入外匯的黑市交易。他們走近觀光客直截了當而且大聲地問：「換錢？」他們和北京、廣東的小本投機分子一樣，加倍收購外滙券。外滙券是搶手貨，有了它就可以在特別的「友誼商店」購買好的中國商品及進口貨。有時候，西藏的工藝品也被運到西方以高價脫手。就這樣地，在文革洗刼之後，慢慢地，西藏人把他們自己所剩下的珍藏寶物給消磨精光，另外用仿製品或次級品來頂替。

〈時裝到西藏〉是新華社的一則電文標題。訪問了一群藏族青年之後，新華社透露說：「所有在中國本地流行的服飾很快地就傳到了拉薩。」一位少女說：「我比較喜歡穿寬大的套頭毛衣出門。但是如果是要跳舞的話，我就得穿最漂亮的衣服。」一位年輕男士說：「以前的西藏人有穿戴比較耐用的東西的習慣，可是現在他們卻寧願要比較吸引人注意的東西。」西藏人毫不猶豫地花大筆錢購買中國衣服。一位西藏少女要想趕得上風潮，就得要有一整衣櫃各式各樣的西式衣服。即使是裁製西藏傳統服裝，西藏裁縫師也開始使用化學纖維及色料。傳統手工的「松巴」鞋，無人問津。新華社指出，拉薩一家商店有二百餘雙不同樣式的網球鞋，每雙售價一百六十元人民幣，值一個多月的薪資，然而在四天之內銷售罄盡[37]。拉薩北京路的服飾商人都是從中國服裝中心杭州、上海及廣州批貨。該文指出，有三分之一的拉薩居民在服飾業工作。

中國報紙並沒有誇大其辭。對心懷疑雲的人，我們補充地說，在拉薩的中國人區和藏人區

已經可以聽到在西方流行的熱門音樂了。登上排行榜的歌曲，最遲二、三個月後就到拉薩。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期間，時髦的西藏年輕人在半夜到布達拉宮附近的夜總會大跳搖滾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運動並沒有能夠遏止喜馬拉雅山中心地帶荒唐的迷戀。每個星期六晚上，在拉薩的「豪華」迪斯可舞廳都可以看到洋化的象徵。中國樂師們和四位西藏樂師在舞台上演奏搖滾音樂。他們使用日本最新的音響設備。每個星期六晚上，在幽暗燈光下的幾個小時，西藏人和中國人遺忘了他們之間的差異。不過他們很少在一起跳舞。婆娑起舞的，不是一對對的中國人，就是一對對的西藏人。

即使是在青海的偏僻地區，遺棄傳統的現象也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另外一份官方刊物透露說：「除了一些牧區的牧人之外，在青海的藏人很少繼續穿他們的傳統服裝。西裝筆挺在共和縣政府供職的藏籍青年周寶用流利的中文說：『我比較喜歡西方的服裝，它們比較實用。在過去我們的節日的時候，我還是穿傳統服裝。』」這份雜誌也說，由於和漢人接觸，青海最原始藏族之一的果洛族，也放棄了他們用來割毛線及挖土的石頭器具。從「解放」後，他們才看見象徵進步的自來水和電[38]。另外還有一份雜誌很荒謬地刊出一篇題為〈活佛變成了公司主任〉的「專題訪問報導」。這個怪誕的故事描寫一位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一個喇嘛從商的傳奇。「人家稱我是穿袈裟的商人，或是喇嘛商人。人家也許會認為我所做的二件事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對我而言，這二件事是息息相關的：我依舊是虔誠的佛教徒。」[39]我還看過一篇報導說，扎什倫布寺設立了一個進出口公司。「進步」要來的時候，什麼也擋不住的。

西藏大地方的飯館及食品店幾乎全部都是被中國人控制。由於失業率高漲，西藏的勞工充

足，中國人不愁找不到員工。藏籍顧客並不在乎花錢。西藏人很會享受，他們喜歡吃吃喝喝，在飯桌上高聲聊天。不少的西藏人在這些飯館裏吃掉了身家。就像當年上海租借地的餐館禁止狗和中國人進入一樣，有些拉薩的高級飯館也拒絕西藏客人。西藏人家裏也開始變化。傢俱換成中國式的傢俱，床也是。一般的家庭都有電視機，赤色中國最好的宣傳工具。中國政府很狡詐地一天復一天地把唯物主義以及消費競爭的觀念灌輸到西藏家庭。爲了要讓這個大規模的思想灌輸能夠發揮最高功能，中國花了一大筆經費設置了接收經過衛星轉播的中國電視節目的地面接收站。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在拉薩就可以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了。這個試驗性的節目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因此電視網很快地擴展到西藏各地區。到了一九九〇年，在西藏有二座無線電廣播電台，十四座中、短波發射站，七十四座鄉鎭有線電廣播電台、二座電視台、九十八座電視轉播站以及一百六十三座接收衛星轉播的無線電和電視節目的地面接收站。託這個還會繼續擴展的網路之福，百分之二十一・八的藏民可以收聽以中波長播送的無線電節目；百分之三十四的藏民可以收看電視節目㊵。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對電視及無線電武器的政治價值有很高的期望。「西藏自治區」無線電及電視部門主任，一位高級領導，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拉薩電視上說：「在國外的敵對勢力認爲廣播節目是破壞社會主義的唯一利器。」「從這個事實來看，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覺，也應該要了解無線電和電視在政治鬥爭和社會、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我們應該要把自治區的無線電和電視工作儘快地搞好。」㊶一般來說，祇要一個村子一通電，地方黨委員就會給這個村子送上一台電視機。傍晚田裏收工後，農人們聚集在一

起屏息靜氣地在觀看與當地生活、民情不搭調的京戲節目。就好像電視殺了西歐農村的傳統與生活的情形一樣，電視又將要謀殺西藏的文化。不過西方並沒有在這場無線電廣播戰中置身度外，袖手旁觀，因為從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美國之音」(VOA)每天以藏語發音廣播十五分鐘。雖然雜音很多，這個播放有關西藏在國際間的各類消息的節目，在西藏擁有眾多的忠實聽眾。

西藏的建築也受到決定性的轉變。一個不明就裏的外國觀光客第一次到拉薩都會大感失望，怎麼一大半的市區和其他地區的中國城市一般模樣呢？還沒有到拉薩的城門，在路上遠遠就看到十七世紀時期建築的達賴喇嘛的故宮，布達拉宮纖細優美的金頂以及雄偉的紅宮。然而當我們一進入拉薩，城市的變遷顯得非常耀目。到處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國樓房取代了傳統房子。在舊市區裏，到處都是建築規劃地區的排水溝。白杜藍窗的低矮藏式建築消失了，一落落的水泥大樓平地而起。新華社說：「虔誠的西藏教徒以前習慣上是在繞著大昭寺的泥濘路上唸經，現在他們可是在六百公尺長鋪有花崗石和瀝青的八角街上誦經長叩。」㊷這就是為教徒服務的社會主義。

中國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間，花了四千萬元人民幣「翻新老房子」。一千三百戶住在拉薩歷史中心八角街的家庭，從一九七九年開始逐漸離開「破舊危險」的房子，搬進有自來水，有衛生設備的新房子。這是傳統房子中很少有的㊸。這筆經費和一九八九年以後進行拉薩城市轉形的花費比起來，祇是九牛之一毛而已。為了要慶祝西藏重返中國的〈十七點協議〉簽訂四十週年紀念，在一九九一年第一季的時候就進行了大規模的「翻新」工程。為了要加寬

街道，許多房子被拆除。如果想要對拉薩城市改變的深度有一點概念的話，就得知道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拉薩可居住的面積增加了十二倍，達到了總面積三百萬平方公尺。雖然這些新的建築物有些外貌看起來有點像藏式建築，它們可全部都是用水泥蓋的中國式樓房。還沒有見識過中國推土機威力的拉薩眞正藏式地區祇佔全城市面積的百分之二。從此，在三名武裝警察的護衛下，中國的五星紅旗飄揚在神聖的大昭寺前面整個重新規劃得很「現代」的廣場上。此外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一年五月的時候，下令在拉薩新城的中心擺了二座象徵金犛牛的巨大紀念雕像。新華社解釋說：「擁有一千三百年悠久歷史的拉薩，是西藏經濟、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以前這祇是個沒有公路，沒有工廠的小城。祇有幾個小的手工業製造廠。城市的面積祇有二平方公里，人口也祇有三萬人不到。現在擁有十二萬人及三十四平方公里的拉薩，發展成爲一個有新的賓館、影劇院、醫院、一個兒童文化中心和一間藝廊的現代化城市。」在西藏、安多以及康的其他重要城市的情形，和拉薩一模一樣。在這些城市裏，憑空冒出一座屬於漢籍幹部及其眷屬的新城，而且隨著漢人的逐漸抵達而愈來愈大。

甚至在寺廟裏，藏民族象徵的最後堡壘，漢化運動和大雜燴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青海省靠近新疆的塔爾寺裏，中國政府把在西安，古長安，秦始皇陵中挖掘出土的陶燒秦俑兵、馬的複製品和西藏祭典法器擺在一起！這些俑兵是漢族的第一個象徵。在這座寺廟裏當然還有用彩色酥油捏成表現藏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結婚的小塑像。除了這些強迫西藏喇嘛接受的不倫不類的事情之外，我還在甘肅省的拉卜楞寺裏的一間經過修整的陳列室中，看到用酥油塑成的北京故宮大門的巨幅複製品。中國社會主義寫實派的「藝術家們」還恭恭敬敬地在大門門楣上

面畫了毛澤東的像，以及兩幅從五十年代就寫在天安門城牆上的政治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類大團結萬歲」。西藏特殊的酥油雕，可以追溯到第十三世紀。在這間陳列室裏，在西藏喇嘛的法器旁邊，我還看到一座毛澤東的胸像，以及中國共產黨當前領導們的酥油塑像。如果有人以爲這些祇是離開北京一千三百公里的寺廟裏，令人不感興趣的插科打諢的話，拉卜楞寺的一位官方導遊會告訴他，這些「藝術作品」是「藏族人民的愛國精神」和他們對新中國表示忠誠的象徵。

四、侵犯人權

這是個很棘手、痛苦、令人難以忍受的問題，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迴避，更不能保持緘默。享有自由的人和自由國家的政府有干涉的絕對義務。針對西藏的案例而言，這是一種協助瀕臨危險民族的義務。如果在拉薩的監獄和在巴黎的客廳裏，「侵犯人權」有同樣的涵義，有同樣標準的話，我們就得承認，在西藏侵犯人權的事件層出不窮、反覆不斷而且非常嚴重。在可能的範圍下，每一起侵犯人權的案件都被掩飾，鮮爲人知。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xandre Soljenit-syne）說，在西藏的中國共產主義制度是「全世界共產主義制度中，最粗暴，最沒有人性的制度。」[44]

中國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批准了聯合國的〈國際反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及可恥的待遇與懲罰公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員高燕萍女士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正式照會聯

合國祕書處，中國已經簽署了這條公約，她同時指出「由於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在禁止酷刑拷打及其他不人道待遇及懲罰上，中國還有很多要做」。這種坦誠是值得讚揚的。

身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也簽署了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所表決通過的《國際人權宣言》。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說，「像隔離，種族滅絕，奴隸買賣，難民迫害以及恐怖行動等不人道的行爲應該要受到國際的譴責。其他國家反對這些犯罪的行動不能被視爲『干涉』行爲」㊺。然而這份報紙卻認爲，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少數民族及婦女兒童的保障，以及對刑事罪犯的懲治屬於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事實上，中國一向就否認外國組織和外國政府對他們侵犯人權的指控。尤其是有關西藏的控訴，更是完全拒絕。她一再重複地說，他「不能容忍外國政府或組織對完全屬於中國內政問題的西藏事件，假借任何理由予以任何的干涉」。

北京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摘略如下：「資產階級與一些不謹慎的人，以人權爲後盾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帝國侵略主義分子和西方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停止利用人權來攻擊和毀謗中國，他們也沒有減低他們對中國做思想侵略的努力。西方的宣傳工具繼續歪曲中國對人權以及社會條件所做的努力。他們硬是說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違反所謂的人權。有些甚至藉口推展人權而支持在中國進行非法行爲分子……。任何一位沒有先入爲主觀念的人，都可以看到憲法上所規定的中國公民權利，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個人人權觀念還要理想。當然一個國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權利首先取決於他的社會制度及經濟、文化和其他的客觀條件。因此，在一個像我們的國家一樣在社會主義開發中的國家裏，完全地實施公民應有的權利是需要一段時間。」㊻換句話說，勇

敢的同志們，忍耐點吧，明天會更好！

對中國政府而言，在西藏從來沒有過，將來也永遠不會有侵犯人權的事情發生。所有在國外對侵犯人權的指控，都被認爲是外國所散播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謠言」、「謊話」、「虛構」以「助長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八年間，中國官方報紙怯生生地但是確實地嘗試著追求更大的「透明度」而努力。這些嘗試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血腥鎮壓學生示威活動後，就被擱置下來。然而不管是在這之前，或是在這之後，在一個不受到控制的觀察員眼中，有權力發布聲明的中國領導和對他們的說法不經過任何思考就照本宣科的新聞界，從來就不猶豫地爲著「國家安全理由」而撒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來，在中國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可以證明。一九九〇年七月中共新總書記江澤民視察西藏，從該年的秋季開始，中國政府改變了他們在西藏的政策，一方面企圖減低中國在國際視聽上的不良形象，一方面也在加強已經是很不惹眼的鎭壓方式的效率。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七日在拉薩召開的「公安治安基層基礎工作會議」上決定的機密文件〈二十號通報〉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條換湯不換藥的新戰術[47]。中國政府期望在這種新的政策下，能夠改善和外國公共關係的品質。他們所採行的措施之一，就是准許幾個外國代表團，尤其是外交人員及議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到西藏拉薩訪問，即使他們口口聲聲地說要到西藏實地考察人權的問題。有些代表團甚至還到經過精心安排布置的察不齊監獄看「一下」。然而北京望穿眼的成效並沒有達到，因爲即使受到中國陪同的人監視，這些代表團還是看出西藏人悲困的程度。就拿澳大利亞代表團的例子來說吧。一九九一年七月澳大利亞政府派遣了一行由國會議員及大學教授所組成的十二人代表團到拉薩，他們返回澳大

利亞後下結論說，一九九一年五月解除戒嚴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他們強調：「拉薩名義上解除了戒嚴，但是仍然停留在事實上的軍事管制下」。經過這一次的訪問後，這個代表團認爲，「絕大部分沒有跟著政府流亡的西藏人都反對中國控制西藏，尋求獨立以及達賴喇嘛的返國」㊽。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由四位瑞士交外人員所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察不齊監獄，在訪問期間，有一群犯人在他們面前齊聲高呼支持達賴喇嘛和西藏獨立的口號㊾。至於美國駐北京大使詹姆士・李雷，他在結束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日的拉薩訪問後發表聲明說，在察不齊監獄中給他看的「和三元美鈔一樣假」㊿。丹麥、挪威和瑞典駐北京大使們也都參觀過察不齊監獄。

在西藏，侵犯人權的事件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大類：

——警察和軍隊的虐待，沒有經過審判的公開處決和監獄裏的酷刑拷打；

——殘暴的生育控制政策和婦女的強迫墮胎與絕育；

——在日常生活、教育及行政主管職務上，實施漢藏種族隔離。

很幸運地，國際上維護人權的主要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和「國際人權總會」等都非常注意西藏問題的變化。有關中國政府以及她在西藏的政策執行者所犯下的暴行報導，多得不勝枚舉。我們已經看到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就是不經審判的處決和對囚犯的虐待。即使是在一九七九年對宗教、社會有較大寬容的開放政策實施以來，這一類侵犯人權的事件變得比較少，但可沒有消失。從一九八七年十月爲爭獨立的示威運動之後，酷刑拷打的事件成幾何級數增加。在拉薩附近至少有五座監獄及「拘留中心」。最著名的三大監獄就是拉薩東北幾公里處的古孜、在色拉寺附近的察不齊以及桑伊。除了在青海省的勞改營之外，在「西藏自

治區」至少有四個大型的勞改營：在拉薩市郊的拉薩河邊的納金電站，在西藏北部柴達木盆地上的格爾木，同樣在北部的硼砂廠以及在南部森林裏的工布。中國政府從來就不讓外國記者訪問這些地方。他承認在「西藏自治區」有一座監獄和二個「勞動改造營」。他表示囚犯不過九百名。這是非常不可靠的數字，它應該要乘以十或二十才行。根據北京的說法，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年初，總共有一百二十一名騷動鬧事分子被判刑，一〇二五名被逮捕。「亞洲瞭望」(Asia Watch)和「西藏消息網」(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的一份共同報告都列出了有三百六十名西藏政治犯的名單，其中有二百四十名到一九九一年九月爲止還在坐監。這二個協會強調說，這份名單衹是西藏監獄居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已[51]。

五、酷刑拷打、強姦、電棒

《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通訊員丹尼爾·邵世倫(Daniel Southerland)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初，蒐集了相當數量有關該年三月五日被逮捕的人在監獄裏所受到的待遇問題的證據。一位不願意透露身分的拉薩居民被關在古孜監獄。他和其他七名西藏犯人一起被關在衹有幾乎六公尺的牢房內達三個多月：「三月五日被抓來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打的……。他們用所有他們有的東西來打我們」——拳頭、棍子、電棒。對付犯人最常用的方法是「中國吊刑」：「我看到不少人被兩手綁在背後懸空吊起來。在我所看到的這些人當中，有二位由於身體重量的牽拉而使肩膀脫臼。被吊之後很多人都失去知覺。」犯人中最被虐待的是尼姑。最凶野粗暴的不是中國人，

卻是西藏守衛。這些守衛嘲笑被他們問話的受害者。他們把爭取西藏獨立的口號反過來嘲諷她們：「我馬上就給妳們，妳們要的獨立。」一個月一次，三、四個穿著警察制服的中國和西藏人來給犯人上課，向他們解釋爲什麼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他的西方人士則採集到有關用電棒電擊犯人的舌頭、腳趾、胸部以及生殖器的證據。電棒甚至塞進西藏尼姑的陰道裏。有些尼姑的臉被香煙頭燙傷。一九八八年三月，一位年過半百的西藏婦女向法新社的一位通訊員說：「我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第一次的騷動中被捕的。我朝警察丟石頭。在監獄裏，我被他們用電棒毆打。我們總共有十三個女人，分成二次被逮捕。其中一位孕婦腹部被打後流產。在監獄裏，他們不停地對我們說獨立是個夢想。他們說我們是達賴喇嘛的分裂分子。」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英國電視台第四台播放了一部在西藏偷拍的訪問十二名被電棒電擊的西藏男女的紀錄影片。一位毫無掩飾的尼姑哭著說：「他們把我戴上手銬帶到警察局，把我推倒在地上。他們踩我的臉，用電棒電擊我的胸部，也用腳踢我的胸部。他們把我們的衣服全部脫掉。有三、四個人帶著電棒強姦我們。」另外一位尼姑補充說：「我們被七、八個人不斷地強姦。我們一絲不掛。他們對我們說，因爲是共產主義的反對者，我們將會被處死。」一位西藏男士解釋說，他太太如何在第二個孩子出世後被強迫絕育。其他的證人則說被迫墮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強烈抗議英國電視台沒有掩飾證人身分。英國電視台卻反駁說，他們是在了解情況下自願做證的。多麼奇怪的新聞工作方式！我們衷心希望這批英國同業不會有和被他們拍攝的可憐人相同處境的一天。

義大利羅馬的《消息報》（*Il Messagero*）的記者瓦雷里歐・貝律沙里（Valerio Pellizzari）也

於一九八八年採訪到類似的證人。一位西藏男人向他說：「警察把我帶到古孜監獄。他們把我的雙手雙腳都綁起來，然後用木棍和鐵棒打我。接著他們用電棒電擊我的生殖器。我馬上就昏了過去。他們用冷水把我弄醒，然後把我綁在一張床上，從頭繼續開始。」

剛逃到達蘭薩拉的一位三十二歲的西藏犯人以賈揚的身分接受訪問。他對法新社駐新得里的一位通訊員說，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和十月的騷亂之後，他企圖逃亡。他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在離尼泊爾邊界一百公里的定日被逮捕。「我知道警察有我的照片，而且從十月四日就開始要抓我。我於八日離開拉薩。五天後他們抓到了我，把我的雙腳綁起來，腳跟抵住臀部和大腿；雙手也被反綁在背後。幾天幾夜我都是維持這個姿勢，我的腿因爲冷和沒有鬆動而麻痺。」晚上的時候，這位不幸的人就睡在「鋪有一床被子的水泥床上」。一個月又十天之後，他被送到法院「偵訊」，問他西藏獨立運動領導人的名字。十二月初，他和一些囚犯被譴送到山上撿材。那時候正是雪季，天氣非常寒冷。趁著守衛不注意的時候，他開溜了。徒步跋涉過邊境後，幾個尼泊爾工人搶了他身上所剩下的東西。他遺棄了在西藏的妻子和四個兒子。

很多西藏人對我斷言說，最先起來反抗的西藏高級大喇嘛格西洛桑於一九八七年在監獄裏死於酷刑。雖然在一九五九年被逮捕後吃盡了苦頭，這位殉道者並沒有改變他的初衷。一九七九年出獄後，沒幾年再度被逮捕。他的中國行刑者大概認爲他實在是無可救藥，不然不會讓他「完全解脫」。中國政府說，他雖然經過多方治療，終究無效而病死。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印度治安單位接到地區牧人的通報，尋獲了七具想要逃到拉達克(Ladakh)的西藏人屍體，其中有一具女屍，一具小孩子的屍體。這些彈口累累的屍體是在拉

達克的首府列(Leh)西南一百五十公里的卻斯胡勒(Cheshul)地區發現的。這件說起來應該算是地方新聞的事件卻表明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前，中國邊界守衛接到的命令是逮捕逃亡的西藏人，然後再看他們當時的心情也許痛打一頓，也許關入監牢，有時候甚至無事放行。從此以後，他們好像換了遊戲規則，比較喜歡用「寓教於樂」的遠距離獵殺選擇逃亡的西藏人。約翰・阿克利(John Ackerly)和布雷克・凱爾(Blake Kerr)在多次訪問西藏後，做了一份有關酷刑的完整報告。根據這一份報告，一般說來祇要是有「分裂主義分子」嫌疑的犯人，在被逮捕後一律被打。電棒的使用也很普遍。另外還有幾種在西藏使用的酷刑更殘忍，更令人擔心，尤其是：在冬季把犯人衣服剝光，赤裸裸地丟進冰水裏，把犯人倒吊起來，強迫吃人中黃、放狼狗及注射藥物。據某些證人說，一針下去就是沒有變瘋，也是精神不平衡[52]。有關這些酷刑的證言，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由於西藏難民的抵達印度而不斷地增加。

如果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能讓人相信的話，下面這一段是一位西藏婦女阿得喜・達貝女士的自白。她在中國監獄被關了二十六年，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才被釋放。第二年她就逃到尼泊爾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她在哥本哈根由「丹麥西藏後援委員會」所舉辦的「西藏討論會」上說：「我被用鏈子鎖住，被酷刑拷打，被強迫觀看我姊夫的處決，被中國守衛輪姦，一直到我什麼都承認爲止。」她在以丹麥左、右兩派國會議員爲主體的聽眾面前補充說：「他們幾乎沒有給我們東西吃。爲了生存，我們祇得吃草、樹根以及蟲類。」

如果有人對這些見證的眞實性有所懷疑的話，不要忘記由於一些不畏惡勢力的記者們的努力，在最近幾年來，中國報紙也登刊了幾篇有關警察局或是「拘留中心」裏讓人咬牙切齒的酷

刑拷打的報導。我們就舉個例子吧：一九八八年十月，《青年日報》在第一版以全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一位中國警察的故事。整個晚上他在迪斯可音樂的伴奏下，用電棒，用圓鍬柄，用鐵棒毆打一名被繩子吊起來的人來消磨時間。一群守衛輪番上陣，打累了就換人；他們祇有在停下來吃東西、喝茶的時候才沒有打。儘管全身，包括生殖器被打，這位受刑人頑強地拒絕承認他沒有犯的罪。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死了。該份報紙也刊登了這個人女兒的照片，小女生的眼神裏充滿著絕望。《青年日報》的這二位記者的確是夠膽量，夠堅韌，不然沒有辦法在百般威脅報復下完成並且發表他們的調查成果。警察根本就不把這件事當成一件事，一直到這件事被報紙披露而且鬧到北京後，他們才覺得情形不太妙。中國領導部門終於感覺到不「做一些表示」不足以平息「眾怒」。一個法院判了這些警察幾個月的徒刑。我們可以打個賭：這些警察們早在刑期結束前就先出來逍遙了。因爲在中國，地方警察，尤其是在鄉下，一直握有無上的權力，包括施用酷刑以及處決的權力。

我們也可以提醒健忘的人，中國政府從來就不爲國際輿論的譴責與羞辱而操心，因爲他們居然膽敢向可能會到中國設廠的外國公司提議，使用勞改營犯人的廉價勞工。瑞典汽車製造廠商富豪(Volvo)公司就曾經碰上這檔怪事。富豪一聽詳情，立刻拒絕「奴隸的工作」。其他的工業界人士也曾經碰上過相同的提議。中國政府甚至向他們保證絕對不會有問題，因爲中國守衛將會在廠內維護安全措施。西方的合作者可以獲得很大的優待，他們祇要以一般中國勞工三分之一的工資就可以打發這些「勞工」。原籍中國的比利時人齊查理(Charles Chi)在布魯塞爾的好地段上開了一家善德(Chinter)公司專門從事這方面的交易。

如果中國在一九八八年釋放了一部分的西藏犯人，這可不是中國政府「寬大爲懷」，而是西方政府及人道組織向他們施加壓力的結果。在我居留在中國的期間，時常有中國人來請我向「上級單位」講講話，以便平反警察不公正的行爲或警察所造成的過度的損害：我曾經訪問過北京的「一號監獄」和一座在北京近郊的「勞動再教育營」。不過這些都是「對外開放」的模範單位，也就是說按照政權宣傳的需要而布置的特殊單位。沒有一位外國人曾經被准許去看著名不滿分子的牢房，至於黑牢也就甭提了。在從監獄裏活著出來的中國人對我所做的描述中，我們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一座充滿肉體和精神暴力的地獄。毛澤東主義時代的「古拉格」也許在一九七九年開始就被開放政策所取代，然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國的監獄很可能又會被政治犯人擠得水洩不通。

在西藏，這些問題都被中國報紙視爲禁忌。不過偶爾也會有消息流出來。一九八八年年初，在《西藏日報》上所公布警察應該「避免」的行爲的單子中，酷刑拷打赫赫在列。另外還有一起難得一見的供認：西藏監獄的一位不願意透露身分的主管承認在西藏有政治犯人㊸。此外，「拉薩無線電電台」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宣布成立一支專門對付「分裂分子」騷亂的武裝警察。這支直屬西藏武裝警察指揮部的「第二支隊」「應該在發生意外事件的時候，隨時和公安機關協調行動，以便對破壞國家統一與中國民族間團結的分裂主義分子給予致命的打擊」㊹。至於官方對有關西藏監獄情形的報導，有時候實在會令人發笑，如果它所牽涉到的問題不是那麼嚴肅的話。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過西藏年的時候，新華社解釋說，囚犯和守衛的關係非常和諧融洽，以至於有些犯人在刑滿的時候還「不想」離開監獄。在新華社的記者所訪問的監獄裏，囚犯們

「無憂無慮，就和他們在外面一樣快樂」。在監獄當局所舉辦的藏曆新年同歡會中，「囚犯們和外賓一樣愉快」，當天的伙食也「異常可口」。該社斷言說，「獄卒從未毆打囚犯」。「每六到十名囚犯」一間牢房，牢門祇有天黑以後才關起來，這些牢房「像極了大學宿舍」。一九九一年二月同一家新聞社又刊登了幾篇歌頌西藏監獄的快報。據新華社說，在西藏「唯一的監獄」裏，「如果不是有獄牢規章公布在牆上，人家是不會知道這是一座監獄的」。囚犯每星期勞動五天。上診療所的囚犯，一般是為了治療痢疾或是流行性感冒。至於佔監獄人口十分之一的女囚犯，她們受到「特別的照顧」，「她們在洗衣服或看電視的時候，時常縱聲大笑」㊺。

六、強制墮胎與絕孕

在藏族人民居住地區「大力」推行節育政策，也是侵犯人權的重要環節之一。到西元二〇二五年中國可能有十二億，甚至有十五億張口要養，中國是承受不了這麼重的人口壓力的。中國人口持續地以爆炸性的方式膨脹著。這是毛澤東在六十年代估計錯誤所帶來的嚴重惡果。所有中外專家都同意，如果中國沒有辦法遏止人口的增長，她就絕對沒有辦法脫離貧困的枷鎖。根據最近的預測，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出生的中國人，將會把經濟開放政策下農工業生產的結存完全消化。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雷厲風行地執行他們所決定的節育措施了。在鄉下，傳統是根深柢固的：一家有十個孩子是繁榮的象徵。不過在一九七九年公布節育政策的同時，北京聲明最窮困的農區以及少數民族居住區不受節育政策限制。不過這個給予少

數民族的特殊待遇即將就要被廢止了，因爲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二年一月的時候，宣布把節育政策的實施範圍擴大到包括藏族的農、牧地區。拉薩的人民政府副主席吉甫平措解釋說，「西藏自治區」的人口已經達到二百二十萬了，到了西元二〇〇〇年將會超過二百六十萬人。他表示政府會「逐漸把家庭計畫擴展到目前不受節育限制的自治區和牧區」[56]。

一個外國記者想要到自治區以外的西藏農村去採訪是很困難的，因爲幾乎全部都是禁止外國人進入。不過證據已經有太多了，令人不能不懷疑這種駭人聽聞的暴行沒有在那些地方發生。一九八八年，我從甘肅省省會蘭州市驅車在該省南部、以前屬於西藏安多山區裏的甘南自治州訪問。我想要看看宏偉卻已經沒落的拉卜楞寺。在鄰近的村子夏河的時候，我利用每一個躲開司機監視的機會，詢問當地的居民與和尙：節育政策在地區實施的情形。每一次他們都向我表示藏族人民對這個問題的極度憂慮。他們告訴我，中國「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在全中國十九個市、省、區裏都有分隊和辦事處負責執行從中央政府下來的命令。對北京而言，名義上一個孩子的政策並不在西藏推行，祇有黨的藏籍幹部或是藏籍行政幹部才要「以身作則」。然而在地方，事情卻不是如此。

地方政府的任務是在少數民族居住地區，即使是最遍遠的地方，嚴格執行節育政策。那一組幹部在他們的責任區內的出生人數低於規定的數字，就可以獲獎升級；達不到規定標準的幹部就會受到申斥或降級。因此，在甘肅有上萬名藏人的這一地區，一組組受過訓練的中國人在藏人村裏不停地跑來跑去，祇是爲了要找懷著第三個或第四個孩子的孕婦，有時候甚至是懷著第二胎的孕婦。這些孕婦一旦被發現，就被拖到診療所墮胎。強迫絕孕的事情比比皆是。當然

沒有任何的統計數字，不過他們向我描述孕婦在村子裏被追逐，然後像一袋地瓜一樣被丟進吉甫車後座的慘叫情景。在這些診療所裏，衛生醫療設備簡陋異常。墮胎手術時常併發炎症，不少的藏族婦女因而死亡或是就此一生殘廢。其他的藏人消息則說，在青海、四川和西藏自治區的某些地方也發生同樣的事情。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同仁市數百名少數民族中學和師範學院的學生會合從青海東部的同仁寺來的和尚，連續示威了好幾天，抗議這種做法，並且高喊「打倒計畫生育」！

在藏族人民早就變成少數的青海、四川、雲南、甘肅等靠近西藏自治區的地區上（在青海省，藏人祇有八十一萬，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這一場戰鬥根本就是一個絕望的戰鬥。種族滅絕的問題出現了。

我採訪了三位剛從西藏逃出來的年輕西藏和尚：二十一歲的洛桑嘉措、十八歲的洛桑成邦和二十一歲的杰巴嘉措。我們是在沒有旁觀者的情形下用中文交談的。三個人都對我肯定說，在他們的地區強制絕孕和墮胎是很平常的事。

原籍青海的洛桑嘉措說：「節育政策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在一九八六年才開始對藏族人民生效的，早在一九八三年就開始了。我不知中國內地的情形。然而在所有的藏人居住區，所有已經有一個或二個孩子的婦女原則上必須要做絕孕手術。在必要的情形下，是強迫手術。地方醫務人員負責絕孕手術。從一九八四～八五年開始，他們強迫藏族婦女到醫院或診療所接受絕孕手術。在當時，這些手術是免費的，現在還得付錢。價格就要看地區了。如果一個婦人不是自行到醫院接受手術，她還會被罰款七百或八百元人民幣。除此之外，官方還沒收她們的糧

票和居住證。」

別的地區呢？

籍貫四川的洛桑成邦則說：「在我們那一區，阿壩藏族自治州比青海要富庶。我們那裏的政策是最多二個孩子。不過一些有錢的漢籍或藏籍的幹部寧願花點錢，多要幾個孩子。藏人還得到處送紅包，不然中國人不接受。在我們那裏也有強制絕孕的事情。」

有沒有婦女在手術後死亡或生病的呢？

洛桑成邦說：「我知道有幾位在手術後死亡。很多婦女在手術後，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她們變得很虛弱。」

中國當局對這指控全盤否認。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美國就取消對「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的財務分攤費以抗議中國的這種行爲。在那個時期，美國衆議院通過二個決議，認爲這些行爲構成「侵犯人道罪」。「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沈國祥女士表示，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祇做大方針的指示：「我們的政策是嘗試鼓勵少數民族實施計畫生育。有關孩子人數的限定，是由地方政府全權決定。」當然她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任何有關沒有得到當事者的同意，而強迫絕孕與墮胎的行爲：「據我所知，有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人民居住區，沒有任何有關計畫生育的計畫。中央政府祇是要求向屬於少數民族的人民解釋計畫生育。有關計畫生育的特別法令是由地方政府決定。」[57]

一般說來，中國全國性的報紙很少報導節育政策在藏人居住區實施的成果。不過有一份地區雜誌發表過一篇文章說，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間，青海省（安多）的人口自然成長率明

顯地降低，尤其是在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口成長率從百分之二一・一一降到百分之一〇・〇七。該文作者張偉補充地說：「事實證明少數民族的民眾都決定實行節育，這是關係到所有家庭，所有個人的大事。」㊳其他的中國資料則說，在一九九〇年時，在西藏自治區有一萬八千名婦女自願絕孕，約佔育齡婦女的百分之三，另外七千名則選擇避孕㊴。中國的移民藏人區更加深了人口的不平衡。在這一點上，證人愈來愈多，中國政府的否認聲明也就相對增加。「國際支持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組織的主任約翰・阿克利和漢學家蘇珊・哈維克(Susan Hatwick)女士曾經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和七月間，到如今隸屬於四川省的甘孜和阿壩的藏人區，對中國移民現象做一評估。根據他們的調查報告，有百分之七十一住在這些地區接受訪問的中國人說，他們從一九八〇年就來了。他們大部分開商店或飯店。其他的飯店老闆則是早期和人民解放軍一起被派到西藏，或是在五十～六十年代修築公路後留下來的勞工。五十年代祇住著有西藏人的這些地區，如今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根據中國的人口統計調查，甘孜和阿壩二縣在一九八二年的時候，約有百分之五十八的西藏人。現在他們卻變成了少數居民。這份調查報告強調說：「不管是在做實地調查報告或是漫不經心地觀察，都可以看到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口的比例在東西藏大幅激增。」㊵

七、漢、藏種族隔離

侵犯人權的第三種方式比較散而且不明確，可也確實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住在中國內地的

漢族中國人對西藏人不是漠不關心，就是鄙視他們，另外還帶點好奇。有一大部分的漢人自認爲是文明、是進步，西藏人則是還被中古世紀時期的宗教所束縛的半野蠻人。至於住在西藏的漢人，他們的感覺就更尖銳明顯了，而且經常公開歧視西藏人。我還記得一個中國人，一個十八歲的年輕小伙子。我問過他有關他在西藏生活的情形。當時我們是在大昭寺附近的自由市場。當我問他在西藏生活是否愜意的時候，他用很怪異的眼光看著我，然後說：「愜意？在這鳥地方？你別開玩笑好不好！是我的父母把我帶來這裏的。我可不想在這裏長期待下去。我做點兒生意，我可不要留在這地方。何況，你看看這些西藏人！他們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笨得像犛牛一樣！」

漢人和藏人之間的怨恨到處都可以感覺出來。當怨情高漲的時候，在商店裏、在飯館裏一下就打將起來。當一個戴著綠色棉帽的中國人，嘴裏叼著一根香煙走進寺廟，唇邊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他很可能會受到西藏人的辱罵。如果他落單一個人，他寧可忍氣吞聲快步離開這塊是非地。如果他是一夥的，他也覺得他們的聲勢夠大的話，很可能他就要反擊了。在飯館裏，當老闆拒絕藏人顧客的時候，通常是以翻桌擲椅的武戲收場。當一位西藏婦女到飯館裏兜售一些小五金零件的時候，她馬上就被最使人丟臉的粗話罵出去。當中國人靠近西藏人做天葬的場所，馬上會受到追擊。相反地，在西藏自治區及舊藏地區，除了特別例子之外，最好的學校都是優先錄取漢人子弟。醫院也是一樣。在行政部門裏，所有有決定權的關鍵職位全都是漢籍幹部的天下。中國的統計學家表示，在西藏自治區的行政部門的五萬五千個職位中，有三萬七千藏籍幹部，約佔百分之六十六・六[61]。然而這些無法證實的數字是騙不了人的。從一九五〇年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西藏人坐上西藏共產黨第一書記或是黨委會書記的職位。爲什麼？

在逃離西藏的難民圈中，指控中國再度加強控制西藏寺廟的證據愈來愈多。從一九八七年年底開始，漢籍幹部的家屬帶著槍械、行李住進寺院，以便盡可能地嚴密監視喇嘛的行動。這些政治幹部原先是單身住進喇嘛院，接著他們把家眷、妻兒子女全部接去安頓下來。在某些寺院中，這批新移民的人數比廟裏的和尚還要多。他們不斷地對堪布（住持）施加壓力。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及時發覺所有不滿的抗議企圖或是所有獨立分子的衝擊。「陰謀造反分子」將立刻被隔離和受罰。

讓我們來聽聽洛桑嘉措的見證。

——在甘肅的情況怎麼樣呢？

——在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的時候，還過得去。現在就難多了。自從拉薩事件之後，他們在我們的地區也開始有動作了。我們喇嘛，衹得忍受。警察每天都到寺廟來檢查、搜索。他們每天都來，我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來。我來自甘肅東部離拉卜楞寺約九十公里的一所寺院。一九八〇年以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間，情勢比較緩和。一般人都認爲生活沒有那麼艱苦。事實上，在第一次拉薩意外事件後，就有一組中國的「工作隊」駐進我們的寺院裏進行管制。自從這些意外事件後，很多的地方警察和幹部按時到寺院來開會，監視有誰來採訪我們，不論是家人或是別人，都受到監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沒有安全感。早上起床，我們不知道晚上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從一九八七年開始

就不再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了。

——有些什麼比較具體的壓力呢？

——這些壓力從文革結束後就開始減輕了。不過現在我們有無時無刻都被監視的感覺。在我們寺院裏的漢人太多了，連走道都是擠的。如果我想要去拿點水，一路上擠滿了漢人。我們寺院裏的中國人一天比一天多。

——爲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呢？

——我的感受是中國人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住進我們的地區。這是一種移民政策。隨著他們不斷地到來，中國人逐漸地取得了地區的控制權。他們控制了當地的藏族人民。住進寺院的主要都是幹部及其眷屬。慢慢地，連他們的朋友，他們認識的人都來了。他們在寺院裏開起店舖來了！現在，在寺院裏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的中國人和他們管制的人，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才是寺院的眞正居民，喇嘛。

——喇嘛的負責單位沒有向中國人抗議嗎？

——我們不斷地向他們說，這種事情是無法忍受的，我們要求中國人搬到寺院外面去住。可是這些意見必須先要經過負責單位的「主管」們的同意才行。這些著名的「主管」是誰呢？是一群向其他中國人提出抗議的中國人。換句話說：中共的抗議轉呈給中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在寺院裏提出了好幾次的抗議了，然而我們卻得到了和我們預期中完全相反的結果。就拿這口泉水來說吧，如果我們抗議走道上有太多的中國人因此沒有辦法汲水，那就會有一塊告示牌禁止使用這口泉水！……

註釋

①《解放軍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

②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③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Beijing, 1989, p. 90.

④日本時事通訊社，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日。

⑤ *Greenpeace Waste Trade Update*，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⑥ *China Daily*，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⑦新華社，一九九二年二月四日。

⑧ *Tib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199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Dharamsala, 1992.

⑨ *Tibet, a Land of Snow Rich in Precious Stones and Mineral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Security,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in-Exile, Dharamsala, 1991.

⑩ *Tib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1992.*

⑪ *Tibetan Bulletin*，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月，第一一～一九頁。

⑫法新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一日。

⑬《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

⑭ *China Daily*，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

⑮新華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

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記者訪問。

⑰ *China Daily*，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記者訪問。

⑱ *Pékin Information.*

⑲一九八九年的統計數字。*Japa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Keizai Koho Center, Jap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⑳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同前書，第八三～八五頁。

㉑新華社，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㉒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

㉓新華社，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㉔ *Tibet, aperçu général, Le droit d'autonomie du peuple tibêtain.* Editions Nouvelle Etoile, Pêkin, 1991.

㉕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㉖《新疆日報》，一九八八年六月。

㉗ Tibet, aperçu gênéral, *Tibet, grand changement en 40 ans,* Editions Nouvelle Etoile, Pêkin, 1991.

Tibet, apercu gênéral, *Nouvel essor de la culture tibêtaine.* Editions Nouvelle Etoile, Pêkin, 1991.

㉘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㉙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㉚西寧電台，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㉛印度PTI新聞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㉜*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同前書，第七五頁。
㉝*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p. 176.
㉞法國《解放報》(*Liberation*)一九八九年九月記者訪問。
㉟*Les Tibétains à propos de Tibet*, Editions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Beijing, 1988, p. 139.
㊱《經濟參考》，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㊲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㊳*Pékin Information*，一九八八年十月。
㊴*Les Tibétains à propos de Tibet*，同前書，第一三一頁。
㊵*Tibet, aperçu général, Nouvel essor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同前書。
㊶*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
㊷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
㊸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取材自新華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㊹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在東京之演說。
㊺《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㊻*Pékin Information*，一九八二年八月二日。
㊼如果想要對這個新的笑裏藏刀政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請參閱 Corinne Vigniel 的傑出論文《*The Shift from*

"Merciless Repress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in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1.

㊽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

㊾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二年一月九日。

㊿ *Tibetan Bulletin*，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月，第四頁。

51 這些數字是一九九二年二月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所提出來的。

52 *The Supression of a People: Acounts of Torture and Zmprisonment in Tibet*, by John Ackerley and Blake Kerr, Physcicans for Human Rights，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53 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

54 拉薩電台，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55 法新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

56 《西藏日報》，一九九二年二月三日。

57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Daniel Southerland 的記者訪問。

58 《西北人口》，一九八六年四月。

59 *Tibetan Bulletin*，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月，第二五頁。

60 *The Long March, Chinese Settlers and Chinese Policies in Eastern Tibe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Washington, 1991.

61 *Tibet, aperçu général; Le droit d'autonomie du peuple tibêtain*，同前書。

第三章　和平有期？

西藏能夠獲得和平的機運有多大呢？說得更明確一點，中國人和西藏人取得妥協的成分有多大呢？因爲沒有妥協就永遠沒有和平。中國建議達賴喇嘛返回「祖國」，共同爲人民謀福利。不過中國提出了二個先決條件。其一，達賴喇嘛要從此放棄所有「雪域」獨立的念頭；其二，達賴喇嘛公開宣布效忠中國政府。西藏人的領袖可不這麼想。對他而言，問題的癥結不在於他個人的地位，而於他的整個人民的命運。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他就儘量想辦法找出新的可能方式，以便和北京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之道。他向中國建議舉行會談，以便取得可以保證西藏未來的持久性妥協。

達賴喇嘛一向就堅決反對使用暴力。他相信，爲西藏能夠重新獲得獨立而鬥爭的藏族人民，不管他們的理由爲何，如果他們使用暴力對抗中國人，那無疑是自殺。身爲印度聖雄甘地的崇拜者，達賴喇嘛認爲暴力違反人類的天性。何況暴力無異是給在北京主張對西藏採取強硬態度的人一個口實，從而削弱中國溫和派的立場。然而達賴喇嘛的主張引起一些激進流亡藏人的極端不滿。他們認爲除了西藏的完全獨立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可以接受的方法。「西藏青年大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是個擁有數千名西藏難民的組織，它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還公然宣

稱，要用恐怖手段在西藏內地和中國人鬥爭。在西藏內地，很多西藏地下抵抗運動的成員也批評達賴喇嘛的建議。在國外，積極支持西藏的西方人士不斷地增加，國際上同情的輿論也逐漸高漲。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正式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不過每當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勞苦奔波的時候，他卻頻頻和當地政府官員接觸會談。某些政府對他不形於外卻眞實而且持久的支持讓中國政府非常不滿。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後逃到西方的中國不滿分子們的想法，給西藏問題帶來了一線希望。「中國民主聯盟」強調，給藏族人民一個滿意的解決之道，是民主中國的優先課題。它已經開始和達賴喇嘛周圍親信接觸討論。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達賴喇嘛是對整個西藏人民的一大鼓舞，尤其是對那些已經對不用暴力爭取西藏自由失去信心的人更是如此。西藏這盤棋的最後一顆棋：中國失去了在西藏最重要的王牌，班禪喇嘛，他於一九八九年元月離奇圓寂。這位西藏人的第二精神領袖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北京。在圓寂前的最後一次演說中，他大出意料之外地高呼，自從中國人進抵西藏後，西藏得不償失。達賴喇嘛稱讚他是一位「自由的鬥士」。

一、達賴喇嘛反對暴力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在國際政治圈上幾年下來，達賴喇嘛已經是個沙場老將了。他也是眞正的民主主義人士。裹著一襲西藏和尚穿的紫紅色袈裟，掛著一副眼鏡，戴著一只手錶，從

外表的裝束，看不出他在西藏階級上的特殊地位。他有一群精通國際外交微妙的西藏和西方政治顧問。譬如說經常在倫敦、美國兩地飛來飛去的國際公法專家麥克・凡・瓦特・凡・布拉格(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達賴喇嘛是個精明、達觀的戰術家，他屢次挫敗中國政府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想要削弱他影響力的各種陰謀詭計。他深知應該要爲明日的自由西藏策劃出一個協調、可靠而且穩固的政策，因此，身爲西藏人精神和世俗雙重領袖的他，開始在流亡的西藏社會中進行現代化的改革，以便做爲中國人離開西藏後的眞正民主基礎。達賴喇嘛相信，總有一天正義會在西藏贏得勝利的。他對和平的呼籲使西藏流亡團體產生分歧，然而卻得到了全世界的贊同。他恪守佛教的教誨不使用暴力，要慈悲爲懷。達賴喇嘛認爲暴力是弱者的行爲，而不是勇者的表現。

在法國史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午宴的時候，我請達賴喇嘛解釋，有什麼原因讓他相信「非暴力」。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到處可以看到祇有利用暴力方式的人才有發言權，才能獲得政府的關心嗎？下面是他的答覆：

> 我知道有些西藏人有要使用暴力的想法。不過我對他們說，他們這樣是錯的，這樣做甚至是一種自殺。如果西藏人走上暴力的路線，中國人將會採取更簡單迅速的方法。就實質而言，我認爲暴力是不人道的行爲，它不合乎人類的尊嚴。相反地，一個人應該修煉我們自己心中的慈悲心。人類怎麼會被血腥所吸引呢？我一直相信暴力是違反自然的。何況，我認爲即使有時候使用暴力可以完成某些事情，然而我可以確定這種成果持續不了多久

的。時常，與其解決問題，暴力卻多加了一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您看吧！我們祇有六百萬人，中國人卻有十億！打算使用暴力是很愚蠢的行爲。有時侯當我向年輕的藏胞解釋這些的時候，他們還搖頭大笑。他們還沒有辦法控制他們的心理衝動。然而他們必須要接受。因爲不管他們高不高興，這是一件事實。

對那些和他談柬埔寨和阿富汗解放運動的人，達賴喇嘛反駁地說，使用武器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在一陣大笑聲中，他招呼著說：「您們看，連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也支持我的做法！」

一九八七年秋天，美國國會邀請達賴喇嘛演講，他在這次的演說中提議中國把西藏劃爲非軍事的「和平區」。在他那所謂「五點和平計畫」的演說中講得很淸楚：中國宣布不再在西藏囤積核子武器和核子廢料，並且逐漸撤走軍事設備；中國保證放棄移民政策；讓西藏重新建立她的自然環境；中國和西藏開始爲西藏的未來進行「眞正的會談」。達賴喇嘛說：「我們希望能夠在坦誠及和解的精神條件下，對這個問題做一次合理而且實際的會談，期望能夠找到符合大家長期利益的辦法：西藏人、中國人以及所有相關的人民。」

不久之後，他又丟了一顆「政治炸彈」，並且在流亡藏民中激起了強烈的爭論。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在法國東北部的史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的歐洲議會上發表演說。這是他第一次隱約地放棄西藏形式獨立的立場。他建議採用中國和西藏的聯盟做爲會談的基礎。達賴喇嘛說：「每一個藏族人民都在爲我們的祖國能夠重新獲得獨立而祈禱。」「長久以來，我一直在考慮如何才能爲我們國家悲慘的局勢找到一個可以實現的解決方法」，我的結論是：把包

括西藏、康和安多的西藏變成「一個民主的、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轄屬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的聯盟組織」。在這個政體下，中國可以繼續行使西藏外交的領導權，她也可以在西藏保留「一小部分的軍事設施」，一直到國際西藏討論會開會決定西藏中立爲止。從此西藏將成爲一個「和平的避風港」。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這個建議，她可以相對地保有指揮西藏外交政策的權力。不過西藏政府依然可以使用外事處、宗教、商業、教育、文化、觀光旅遊、科學和運動以及「其他所有非政治性」的辦事處，來發展與維持和外界的聯繫。西藏政府將在對民主制度賦與保障的「基本法」的基礎上運作。達賴喇嘛說：「這些意味著西藏政府將有權力決定所有關於西藏和西藏人的事情。」根據這個和約，西藏將要負起保障西藏領土上個人自由的責任，並且也可以加入〈國際人權宣言〉。西藏政府將由一位經由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議會以及一個設在拉薩，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所組成。這條中藏和約將會受到決定西藏非軍事區規章的「地區和平討論會」的裁決。

我曾經就把外交主權讓予中國的實際意義請教西藏流亡政府的前任外交部長。這位西藏外交官強調說對「主權」和「宗主權」的眞正意義很難有個互相接受的說法。這二個觀念在亞洲並不存在，這些是上個世紀大英帝國帶來的玩意兒。甚至清朝皇帝也弄不清楚它們的眞實涵義。中國是個宗主國，而西藏是她的附庸？或是這個和約承認中國可以在西藏土地上行使主權？這些在未來的中藏會議上還得討論。不然西藏能夠以獨立國家的身分加入聯合國嗎？洛地嘉日說：「答案是簡單的一個不字。」結被收緊了：嚴格地說，西藏人很可能不能不公開承認他們

把「雪域」的主權交給中國。不論如何，在往後的會談中，中國人一定會堅持這一點的。任何模稜兩可的事情不可能存在。

在達蘭薩拉的寓所裏，達賴喇嘛依舊顯得很安詳。他向我明確地指出西藏和中國「聯盟」的意義：「理論上，六百萬的藏人和十億的中國人聯合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相信這一點。如果中國方面把我們當成眞正的兄弟姊妹看待，如果他們和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話，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要和他們分離。對我們的年輕藏胞，這一點是很難接受的。三十年的痛苦經驗使得西藏人一聽到『中國人』這個字——您知道藏語是『嘉米』——就義憤塡膺。不過我相信中國有一天會變成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尊重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眞正民主化的社會。會有這一天的。何況共產主義已經崩潰了，獨裁制度瓦解了。很自然地，人權之聲處處聞，自由之聲也響徹雲霄。我們是人類。我們祇要求自由一點，民主一點。我們並不要求完全分離。如果中國人把我們當成眞正的朋友，如果中國人照顧我們，我們會附和他們。可是如果中國人打我們，我們就和他們分離。如果中國人用眞誠的友誼對待我們，我們隨時準備和他們在一起。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都是隣居，我們就得一個挨一個地在一起。在我們之間一定要用人性的接觸才可能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要會面，必須要討論。我們必須要相互了解。」

和達賴喇嘛一席談之後，我不禁自問，他對中國做這麼大步的退讓是否眞確呢？中國進入西藏的行動可以認爲是侵略者的行爲，然而現在達賴喇嘛卻要放棄西藏獨立的念頭，這對侵略者而言，不是太美妙了嗎？我甚至懷疑如果有一天雙方達成了這種和議，中國是否有眞正的意願來照顧西藏，遵守這個合約？然後，經過一番深思，我認爲如果西藏不想要完完全全地在世

界地圖上消失，除了達賴喇嘛所宣揚的中間路線，和中國取得妥協之外，沒有其他的任何選擇。和中國「聯盟」可以讓西藏人民有一段有益，而且必要的緩衝時間來包紮傷口，整合力量，重建他們的特性。沒有中國移民在他們的鄉土上，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籌劃除了外交和某些軍事政策之外的國家大事，西藏很可能可以眞的重獲自由。這是最重要的，不是嗎？在即將來臨的死期和微渺的生存希望之間，你們會選擇那一條路呢？因此，達賴喇嘛適度的節制是一種大智的做法，它勾劃出中國和西藏和平共存的道路。

這些建議沒有得到中國方面任何正面的回應，因此達賴喇嘛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在瑞士撤銷他在史特拉斯堡市所提出來的建議：「由於中國政府沒有表示任何要答覆的意願，我現在認爲我在最近一次的提議不再有效。」不過他可沒有因此而選擇暴力：「我承認我在一九八八年的提議失敗了，可是我沒有放棄我一向不使用暴力的主張。我相信眞正能通向解決問題的道路，必須要靠對話和會談。」不過，儘管這個建議取消了，達賴喇嘛身邊的人強調，他還是很願意就史特拉斯堡的演說基礎上和北京討論。事實上，達賴喇嘛的提議和中國允諾給與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後的香港，以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以後的澳門的特殊地位相去不遠。爲了尋求一個對香港、澳門能夠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鄧小平是第一個提出「一國兩制」觀念的人。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後，被滿清政府租借給大英帝國的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將是一個有自己「基本法」的「特別行政區」。中國政府公開保證香港將享有「高度的自治」，也可以保留至少五十年她的資本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合國的五星紅旗將飄揚在香港，人民解放軍也要進駐香港。在珠江河口小島上的經濟圈裏，中國早就無所不在了。不過中國政府卻不會改變香港的地方司法

制度，也允許香港和外國簽訂商業、文化和體育運動和約。身爲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將不需要退出國際組織。天主教堂和梵第岡的關係也不至於中斷。這樣，在中國的領土上，兩種社會、經濟完全相反的制度和平共存。割讓給葡萄牙的澳門，在回歸祖國後也享有大致相同的特殊制度。中國甚至答應不動賭場。

赤色中國政府也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提出「一國兩制」以期統一中國。在對國民黨的笑臉政策中，北京甚至多讓一步：回到中國大陸的懷抱後，台灣島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理論上，中國和台灣還是處在敵對交戰的狀態，不過雙方都已經很久沒有聽到礮聲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外交人員暗地裏不斷地接觸，想要找出一個讓兩邊都有面子的辦法。從一九八八年解除戒嚴，允許赴大陸探親後，幾十萬的台灣居民到大陸訪問。因此，西藏也是「一國兩制」？達賴喇嘛是很贊成的。然而，目前的中國政府卻不願意這麼做。這個問題我們還會談到。

二、一個民主化的西藏

從一走上流亡開始，達賴喇嘛就表現出一位真正民主人士的風範。爲了要打擊他，北京譴責他企圖在西藏重建封建舊制度。然而達賴喇嘛在可能的範圍下，盡量利用機會向西藏人灌輸社會民主化的必要性的思想。幾乎在他所有的演說裏，他都有提到社會民主化的問題。在宗教信念和舊制度所養成的觀念還具有無比影響力的情形下，要想說服西藏人是相當困難的。西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已經到了令人不可異議的程度。一個西藏人遠遠看到達賴喇嘛都會把手合

在胸前，激動地抖了起來。當「神王」在達蘭薩拉寓所前面接見信徒的時候，一大羣虔誠的信徒從一大清早就去排長龍，也祇是爲了要讓達賴喇嘛在他頭上摸一下的這種二、三秒鐘的個人降福而已。那一位西藏人敢公開批評達賴喇嘛？那一位政府閣員敢主動杯葛達賴喇嘛所做的決定？很多西藏人到現在還認爲批評達賴喇嘛是褻瀆神明。然而達賴喇嘛本人卻毫不在意這種尊崇。他不再想要這些了。他盡力去改變傳統。在西藏社會裏，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要重新思量：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宗教地位、建立法治國家的重要性。達賴喇嘛說，爲了要讓西藏能夠繼續生存，連達賴喇嘛的地位也要重新定義。佛教本身的中心思想對他的做法有很大的幫助，因爲佛教與世界上一些主流宗教的精神不同，它是個容忍的宗教。佛教很容易適應現代化的世界。佛教的教條一般都不和個人自由的要求起衝突。在人類史上，佛教從來沒有發動過戰爭，從來沒有人爲菩薩而殺人。

然而要如何才能在西藏社會中引入更多的民主呢？達賴喇嘛是怎麼說呢？「在所有的人類社會裏，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發揮他的創造天分。這祇有在民主社會中才有可能。就本質而言，獨裁與共產主義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於對達賴喇嘛的極度崇拜，而屈服於他的選擇與決定，卻不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應該對達賴喇嘛的身分地位加以重新考量的原因。在中國也是一樣，當然原因不同。每一次一位高級領導一說話，整個世界都得聽從他的才行。這不是個好的辦法。」①

對絕大部分的西藏人而言，民主是個很新而且模糊的觀念。一九五九年踏上流亡路的十萬西藏人之中，有沒有十個人知道民主的眞義？從那個時候開始，散居在印度、尼泊爾、歐洲和

美國的西藏團體親身在民主道上走了一段路。西藏噶廈政府的部長們，到現在還一直受到達賴喇嘛的監護。然而達賴喇嘛在顧問團的協助下，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頒布了西藏人民的第一部憲法。這紙文件在經過全體藏族人民表決通過之前還祇是個「草案」，但是具有法律效力。該憲法保障所有藏民的基本權利，諸如全民選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流亡在外的西藏男女，祇要年滿十八歲就有權選舉他們在「藏族人民議會」的代表；祇要年滿二十一歲就有被選舉權。席設達蘭薩拉議會的主要職稱是討論、修改或批准所有關係到西藏人民前途的重要決定。

然而對一位西藏人而言，投票是如此罕有的事，乃至於連達賴喇嘛的高級行政長官們也承認，他們這一輩子除了最近幾年之外，從來沒有投過票。除此之外，西藏人到現在爲止，對首相的需要性還沒有達到共識。政府首長將負責世俗問題，好讓達賴喇嘛得以全心全意投入西藏和全世界佛教信徒的精神思想問題。達賴喇嘛非常贊同這個計畫，然而對西藏人而言，這卻是觸及他們的「神王」的身分而不可寬恕的行爲。至於噶廈政府，他一直就祇是轉達達賴喇嘛意願的辦公室而已。部長們很少沒有事先獲得達賴喇嘛的首肯或向他請示，就做決定的，沒有人敢負責任。此外，因爲流亡藏人團體立足印度，很正常地隸屬印度法律管轄，所以他們不能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有一次，在達賴喇嘛的駐華盛頓特派洛地嘉日在達蘭薩拉的家裏，我問他藏人圈子的缺點是什麼。他說：「這些人太過依賴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常說『對我來說，這是很榮耀的事』，不過他補充說『這也是我們民族的最大缺點』。我們之間沒有人要做決定。對我們，事情是簡單多

了。在我們必須要做決定的情況下，我們也會想辦法在做決定的過程中和達賴喇嘛沾點邊。這樣子比較能夠說服我們的人民。如果我們的同胞認爲我們的決定並不好，我們永遠可以說，這可是達賴喇嘛的意思。」

達賴喇嘛已經說過幾次了，一旦和中國簽訂了和約，他將放棄政治生涯，把畢生的精力投注在他的和尚生活：洛地嘉日強調說，如果有人懷疑達賴喇嘛無的放矢，那就大錯特錯，因爲這是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之後所下的決定。達賴喇嘛退隱的時候，也就是西藏社會面臨關鍵性抉擇的時刻。這將是西藏史上第一次西藏社會掌握著自己的命運。「我們面臨著很艱鉅的局面。因爲達賴喇嘛在西藏社會裏的地位太崇高了，沒有人可以取代他，那怕是百分之一。他嘗試地設立一個賦有行政權的部長內閣和議會來補救這項缺失。現在，內閣成員的任期是五年。任期一滿就得議會同意連任才能繼續行使政權。事情一直在演化。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這種事情是不會被接受的。」

洛地嘉日繼續說：「民主，對我們而言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您知道，有時候我覺得沒有經過痛苦爭取得到的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您們法國人，您們曾經爲著爭民主而奮鬥犧牲。民主這個字對您們有特殊的意義。可是我們，我們不了解什麼是民主。」洛地嘉日笑著說，西藏人就像是小孩子一樣，沒有精神領袖在前面讓他們亦步亦趨地跟著向前走，他們就迷失在黑暗之中。他還說：「達賴喇嘛對我們說，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這麼說，我們就接受這個觀念。我向您透露一個祕密，一直到最近，我從來沒有投過票。前不久我剛當選爲議會議員，可是我從來沒有履行我的投票權！很奇怪，不是嗎？爲什麼？因爲在心理上，投票對我們並不是一件

重要的事情。前幾天我去投了票，因爲我覺得身爲部長，我至少應該以身作則！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②

我們還可以看到流亡藏人社會朝著民主演化的另一個跡象：達賴喇嘛的祕書對我說，他是最後一位貴族出身的「流亡政府」成員。尋找活佛轉世靈童的情形也是一樣。譬如說，一九八三年達賴喇嘛的監護在達蘭薩拉圓寂後要尋找轉世靈童的時候，有幾個世族抱著很大的希望。然而藉口不知道複雜的程序，達賴喇嘛親自把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向導向農村家庭。

爲了要對流亡的西藏社會民主化情形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也訪問了八十年代後期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努巴・曲札嘉措。這位披著袈裟的八十老人在達蘭薩拉的辦公室接受我的採訪。他指出，就歷史上而言，在幾個世紀之前，大的寺院裏已經有某些民主形式存在。由大喇嘛們組成的權力團把重要事情提交所有的和尚表決裁定。此外，在一九五〇年以前，達賴喇嘛已經開始對政治、社會機關進行改革以便利民主化。中國人的到來，中斷了這個改革措施。然而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此斷言，在一九五〇年之前的西藏政治、宗教制度是不民主的呢？他毫不猶豫地說：「是的。這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您知道，我們並不想要掩飾。」現在，在印度的西藏社會情形怎麼樣了呢？達賴喇嘛仍然是團結西藏人的中心力量，西藏人對他信仰與信任的程度是無可比擬的。

從這個事實來看，徹底而迅速的改變祇會給西藏社會帶來全面的瓦解。因此，目前的階段就是訓練西藏人在日子來臨的時候，能夠在沒有達賴喇嘛的指引和協助下，自己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至於議會，我們現在盡量教育民眾，爲他們灌輸更多的政治意識。何況這正是達賴喇

嘛所想要的。」然而噶廈和議會敢不敢不按照達賴喇嘛的心願辦事呢?努巴·曲札嘉措表示,有時候達賴喇嘛的討論很「活躍」。然而這兩個機構堅持反對達賴喇嘛意願的例子他卻也沒有看過。

我們必須要承認,民主見習是痛苦的,尤其是一個被迫流亡在外的社會。在達蘭薩拉,黨派、私利的紛爭持續不絕。有時候甚至鬧得連「流亡政府」也癱瘓。有時候連達賴喇嘛的親信也被賄賂牽連。北京和台灣的政府對這些事情看得心花怒放,祇要時機到來,他們是不會不去挑撥西藏大老之間的權力鬥爭的。一九九一年七月西藏噶廈政府的噶倫(部長)經由選舉產生,這是西藏史上的第一次。然而從選舉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派系鬥爭的嚴重性。當時要選出噶倫七名,然而四十六名議員先從場外協商,再經過場內二次投票,也祇有選出二位噶倫。每一位噶倫必須要得到百分之七十的議員同意才算當選,的確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在第二次選舉的時候,把百分之七十降為百分之五十五,結果也是祇選出二名噶倫而已。達賴喇嘛祇得在一個月後任命三名噶倫補足人數。

不過民主的種子已經確實播種了。因為當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市演說的時候,在印度、歐洲和西藏內地的西藏人馬上發出吵雜的叫聲。最嚴厲的批評指責達賴喇嘛「把西藏出賣給中國」。另外則有人對這麼重要的決定沒有事先諮詢人民而感到失望。至於達賴喇嘛本人則對他自己的這一妙招心滿意足。因為他這一招,點燃了西藏人大規模的舌戰。民主制度終於開始運行了。

三、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達賴喇嘛的親信們承認，有一大部分的西藏人高度反對所有和中國人簽訂含有放棄西藏主權的和約。這些堅決反對史特拉斯堡市演說的人有些什麼反對的理由呢？爲了這個問題，我優先訪問「西藏青年大會」的祕書長扎西南杰。他在該組織達蘭薩拉的會址接受訪問。底下就是這位在全世界上擁有萬餘名積極成員的老游擊隊員的談話：

事實上，我們認爲那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明智之舉。把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國，就等於是放棄西藏的主權。我們認爲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任何的妥協。我們認爲我們應該鬥爭到底，一直到實現西藏的獨立爲止。這是「西藏青年大會」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國人會談不會有任何的結果的。我們所應該要做的，就是靠鬥爭搶回所有屬於我們的權力。我們應該爲此而戰鬥。不能憑嘴皮子！

中國人絕對不會輕易放棄西藏的。不過我們也不會輕易地放棄我們的動機。面對著中國人也許我們是少了一點，可是我們有堅決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們的目的祇是在我們有生之年，重新獲得西藏的獨立，不過鬥爭的精神必須代代薪傳不絕才有這個可能。我們對達賴喇嘛的建議不敢苟同，我們認爲我們有強烈表達不同意的義務。

一些國際公法的專家們肯定地說，把外交政策交由第三國負責無礙於國家的主權，更

不代表喪失主權……他們錯了；「外交政策乃國之命脈。如果你沒有權力和外國列強磋商，如果你不能和這些國家有外交關係，一個國家所剩爲何？這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在國際上沒有任何的地位。」

爲鬥爭而奉獻的西藏人不能失去希望，因爲在歷史上有不少國家重新獲得主權的先例。甚至有一些解放運動在自己國家尚未重獲獨立之前，長期在國外進行鬥爭。何況蘇聯的瓦解與共和國的獨立，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的獨立，更證明了歷史不是僵化的。中國也不是。

有多少西藏人反對達賴喇嘛的建議，而且願意繼續爲爭取西藏的獨立而鬥爭呢？札西南杰非常肯定：百分之九十，不然就是有更多的西藏人。當這位「西藏青年大會」的領袖提到以暴力爲手段的時候，他變得非常激動：「達賴喇嘛的建議非常不好。他說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達賴喇嘛追求幸福，不祇是爲了西藏人的幸福，更爲全體人類謀幸福。他談沒有國界，沒有護照，沒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這種事情。我們可不，我們不能用相同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要很眞誠。我們不能說：『既然達賴喇嘛不怨恨中國人，我們也不怨恨中國人。』不。相反地，我們非常痛恨中國人。我們痛恨所有的中國人，因爲他們是我們禍害的根源。他們侵略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睡覺的。」

恐怖行動也是在西藏的戰鬥形式之一嗎？札西南杰在措辭上小心翼翼，不過他的觀點卻是非常明確：要用恐怖行動！「我們並不相信恐怖主義。我們不認爲需要謀殺無辜的人。西藏完

全獨立的最終極目標導引我們的動機。不過如果我們殺了中國人，沒有人可以指責我們是恐怖分子。因爲沒有一個在西藏的中國人是無辜的。所有到西藏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目的。」札西南杰會不會支持那些針對中國人安置炸彈的人呢？「毫無疑問地我們會支持他們。這樣可以使中國人心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在這場戰鬥中，任何的手段都是正當的。絕對正當的。您知道，從中國人佔領西藏的行爲變成合法行爲，以及中國人使用各種酷刑虐待西藏人開始，我說好，我們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對抗中國人的手段都是正當的！」這位年輕人的領袖激動地笑了笑，然後補充地說，當然暴力行爲祇能在西藏內部使用，而且祇針對中國人的利益。

甚至連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是贊成使用暴力把中國人趕出「雪域」的一分子。我到達蘭薩拉去找他談這個問題。他非常坦率，直言不諱：「問題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不請自來地安頓在另外一個人的家裏。這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必須要離開。這就是解決問題的終極目標。至於解決問題的方法，您知道，並不容易。非常難以想像中國人會灑脫地自己離去。除非是我們使用這個（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機的手勢）。您知道達賴喇嘛提出了他的計畫。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紅臉。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是通情達理的。他在這上面付出了無比的精神心血。他盡可能地和中國人妥協。可是我不認爲中國人有這種智慧去了解。因此我們必須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給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所認識的唯一壓力就是暴力。我說話的方式就像個激進分子。我已經太老，不能參加『西藏青年大會』了。不過我一直認爲我們應該做某些事情。我們必須要製造流血事件。打個比方說，您正在玩牌。您知道，我們必須要有一手好牌才能贏。所以，換句話說，達賴喇嘛提出和平建議，我們就得把王牌派給他。因此，達賴喇嘛盡可能地和中國人協商，我

們則在一旁動用棍子。不然的話，他們不會了解的。」

隨著我們的談話，達賴喇嘛的胞弟愈來愈激動。音量也提高了。他已經沒有辦法保持冷靜了。點燃了一根香煙，他瞪著我冷冷地說：「我們應該做些不讓達賴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夠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過，您知道，我們生存在一個痛苦的世界裏。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祇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了解。我想中國人祇聽得懂暴力的語言。他們不是說過槍桿子裏出政權嗎？很好，我們就在這上面較量較量吧！問題是我們沒有武器。美國人會提供我們這些嗎？」丹增曲嘉活佛笑了，喝一口茶潤潤喉。氣氛也隨之緩和了下來。一直守在他身邊的太太也開心地笑了。「而且，不要以爲中國的軍隊是無堅不摧的。他們是可以被擊敗的。現在的部隊已經不是當年萬里長征的那批人馬了。不是這些人打的韓戰。以前那一批意識形態高昂。現在的部隊，連和越南的部隊對峙也會丟人現眼。他們沒有士氣，他們什麼也不相信。」

談著談著我們把話題轉向較微妙的西藏戰略問題上面。我們又提到了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的演說。一點疑問也沒有：丹增曲嘉認爲史特拉斯堡的演說是最能夠說服中國人坐下來一起商談的建議。然後呢？這是不是走向完全獨立的跳板呢？達賴喇嘛的弟弟搔著頭一言不語地看著我。很明顯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說些什麼而不會給西藏的外交帶來困擾。經過一段考慮後，他決定了。他說：「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爲世代著想，爲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最後，我也訪問了平措旺杰，倫敦「西藏基金會」的主任，也是達賴喇嘛前任駐英國及北歐國家的代表。他認爲，不論是在形式上或是在實質上，史特拉斯堡的演說都是個嚴重的錯誤：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贊成這個演說的提議。尤其是和中國聯盟並且把國防責任交付給中國這一點。讓中國人有權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們並不要完全獨立。」

期望中國遵守和西藏人簽訂的條約是個妄想：「事實上，中國已經宣判西藏的死刑了：藏族必須要消滅。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死期：宜早不宜遲？還是宜遲不宜早？就這個事實來看，我認爲西藏人應該不惜代價爲爭取獨立而戰鬥。我知道這個戰鬥將會是很艱難的。不過我們可以得到勝利的，因爲在歷史上有很多其他民族成功的先例。爭取獨立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的和平鬥士必須要持續好幾代，我們必須要繼續奮鬥。」

然而我們要如何才能想像幾百萬的西藏人戰勝十餘億的中國人和三百萬的大軍呢？「中國的局勢在變。國際的局勢也在變。蘇聯的局勢在變。西藏的局勢也會變。愈來愈多的西藏人和中國人在政治上成熟了。宗教的力量也許減弱了，可是相對地，政治意識高揚。這就爲改變做出了貢獻。因此，我要說如果我們不爲爭取完全獨立而戰鬥，人民會逐漸喪失這個希望。這也就是說，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卻沒有因而給西藏人帶來一點利益。我不認爲支持獨立鬥爭會給西藏局勢帶來任何不良的影響。我不相信接受成爲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國人在我們的家鄉落籍。」

平措旺杰也認爲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是正當的行爲。當他提到這些字眼的時候，他的表情、語調是會給人有模稜兩可的感覺：「我不是那一種對西藏人說：『打吧！你們打吧！』的人。不過如果留在西藏內地的每一個人，都認爲大家都投入爲國家而戰的聖戰是最好的方法的話，我百分之百的支持他們。我敬仰他們。我會爲他們盡一切心力。我會爲他們祈禱。」甚至他們

使用恐怖手段？「喔，是的！是的！是的！因爲，您必須要了解，我們必須要面對現實。人們常說恐怖主義不是件好事。殺人是應該要受到譴責的。可是就從來沒有人去尋找爲什麼一個人會變成恐怖分子的原因。逼使他使用暴力的原因。您應該問這些問題。如果原因消失了，暴力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沒有人願意被捕。沒有人願意被酷刑拷打。沒有人願意挨槍彈。什麼原因驅使這些人上梁山用暴力？是中國人施加在我們身上的痛苦。我告訴您。中國人是不會自己離開西藏的。沒有一個殖民列強不是在被他們壓迫的人民強烈『邀請』之下悻悻地離開的。不過，對中國的往後幾代我卻抱有希望。至於我們，我們應該要讓他們寢食難安。如果他們在全世界都得隨時隨地提心吊膽的話，他們就可能會改變初衷。」

我向他解釋說，如果流亡藏人的領導們揚棄使用暴力，就會比較容易得到西方各國政府對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然而平措旺杰卻氣得怒火熾烈：「國際支持？笑死人！我告訴您一件事情。人們在談國際支持。在一九五九年之後，我們在西藏使用過暴力嗎？您說的國際支持在那裏？沒有，根本沒有。一九五〇年的時候，國際支持又在那裏？什麼也沒有。連一撇也沒看到！現在，如果我們還是抱著非暴力的政策，而不主動地去吸引全世界對西藏問題的注意，我們一樣會什麼也沒有。一樣的！當阿拉法特殺人，製造恐怖的時候，各國政府爭相會晤。他由此而得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不過，您可別會錯意：我衹是在談恐怖主義是不是一種旁門邪道的東西而已。您再看看，阿富汗的游擊隊也是一樣。當他們到倫敦的時候，他們被邀請上唐寧街十號晚宴。當一直提倡和平、愛與慈悲的達賴喇嘛到倫敦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安排接見他。爲什麼？並不是因爲他不是個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對他敬仰

有加。問題就出在達賴喇嘛沒有攻擊性。他不會製造問題。因此，根本不需要為他的事情操心。」

至於對達賴喇嘛的崇拜，現在也應該是西藏人覺醒的時候了；「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什麼都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是神，所以他不會犯錯。我可不信這一套。我是佛教徒，沒錯。然而就我而言，他也祇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我常常對我的同胞說，達賴喇嘛變老了。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不是菩薩的化身？不過他現在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同樣的，當他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問這些問題。當他犯錯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提醒他。」

關於中國會不會遵守諾言的問題，平措旺杰笑了笑說，不要太天眞，因為幾次以來，中國都出爾反爾危害西藏的利益。一九五一年所簽訂的〈十七條協議〉的例子歷歷在目：簽訂的第二天，中國就違反協議的內容和精神。不過這份協議倒是眞的幫了他們不少的忙。他們取得了足夠的緩衝時間。如果現在西藏再和中國妥協，結局還是會一樣的。中國人又會是主要的獲利者。此外，北京從一九七九年以來所採行的西藏開放政策，並不表示中國放棄消滅西藏的策略。「您知道，讓西藏對外界開放，中國人的眞正目的是要消滅西藏的文化，消滅西藏的人民。這一貫的目標沒有改變。和以前使用暴力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現在幾乎可以說：『你們快點死吧。你們死得不會有痛苦的。』因此，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接受。」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到十六日在達蘭薩拉舉行的第七屆「西藏青年大會」代表大會決定，放棄呼籲使用暴力和武裝鬥爭對抗中國的佔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西藏青年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聚會，有從印度、尼泊爾、不丹、北美、歐洲各地來的代表參加。早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

前，達賴喇嘛已經說服這些按捺不住的年輕人，放棄恐怖行動和武裝鬥爭的想法了。可是這又能維持多久呢？

在西藏內地的青年好像並沒有要緩和的跡象。西藏現在的反抗組織的眞正實力很難評估。他們好像是以不合作、破壞和個人戰鬥爲主要手段。其中一個主要的組織，「虎豹青年協會」最近宣稱，如果國際組織再繼續不理睬西藏問題的話，他們將要放棄不使用暴力的政策。他們在一份發給聯合國組織，在西方廣爲流傳的宣言中指出：「我們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誤解爲力量薄弱的表現」，「我們爭取重新獲得自由的意志堅強。聯合國最近的一次表決很明顯地表明了如果沒有流血，沒有破壞行動，也沒有暴力挑釁，我們得不到宣傳、同情和支持」。該文補充說：「劫機和破壞是巴勒斯坦人的慣用戰術，然而他們卻獲得國際組織的支持。現在我們在想，如果這些暴力行爲可以得到成果，爲什麼我們不用這一招？這個世界就吃這一套。」④

四、漢藏會談淡如水

赤色中國宣稱他們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然而除了一些沒有實質意義，沒有下文的手勢之外，中國的西藏政策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以來就沒有什麼改變：北京可以和達賴喇嘛談他回國的條件，但不是爲西藏的地位作出妥協。中國的達賴喇嘛政策早於一九八一年就提出來了。這個政策有五大點：

㈠中國已經進入新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期。達賴喇嘛和其集團必須要承認，不然的話，他們

可以再等幾年看看。

(二)達賴喇嘛及其集團並不一定要討論最近的事件。一九五九年的騷動和鎮壓應該被遺忘。

(三)如果他們願意回歸「祖國」——中國，中國政府「誠懇地歡迎達賴喇嘛及其親信」。中國希望達賴喇嘛為維護國家統一做出貢獻，尤其是漢族和藏族間的團結。

(四)回國後，達賴喇嘛將享有一九五九年以前相同的生活條件和「政治待遇」。他將被任命為人大副委員長。不過他沒有必要再為西藏負起責任，因為比較年輕的西藏人已經挑起了這份重擔，而且把工作做得很好。當然達賴喇嘛可以隨時到西藏訪問。

(五)如果他決定回來，達賴喇嘛祇要發表宣言就可以。一個部長級的代表團將在他抵達的地點迎接⑤。

這就是西藏人的領袖回歸「祖國」的條件。這些條件一直到一九九〇年初期還有效，而且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在最近的未來中國會有大幅度的讓步。如果達賴喇嘛在這種條件下回去，他一定會遭受到莫大的屈辱：他將變成一個傀儡。和班禪喇嘛一樣，在北京勢孤力單，遠離他的人民，同時也喪失所有的宗教權力。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人大副委員長是沒有任何實權的虛位。班禪喇嘛生前不也是人大副委員長嗎？可是他就從來沒有參與過中國老闆們的任何決定。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禪喇嘛發布了聳人聽聞的消息。像極了中國政策的軟化：達賴喇嘛返國後，如果他願意，他可以住在西藏⑥。很多駐北京的外國外交人員都認為這是北京有膽識的讓步。這個讓步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達賴喇嘛回到布達拉宮一定會造成西藏人的狂熱，甚至會有後果不堪設想的宗教解禁。這種情形很容易造成政府無法控制的局面，也可能會誘發一

九五九年悲劇的重演。不過這個消息從來就沒有被中國政府官員證實過。十天後，李鵬總理認爲達賴喇嘛的駐錫地點「不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達賴喇嘛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國華盛頓，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法國史特拉斯堡的建議，中國認爲這些演說沒有任何新的內容，而且表現出他爲了使「半獨立」或「僞裝的獨立」合法化，而歪曲西藏現有地位的意圖。北京相信達賴喇嘛嘗試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話雖如此，史特拉斯堡的演說依舊大出中國的意料之外。中國考慮了好久才回應：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政府發布消息說，已經準備好和達賴喇嘛或其代表在「他選的任何地方、任何時刻」，在香港、在中國大使館或是其他的地方會面。唯一的條件是他「要有改善和中國政府關係的誠意，以及爲維護漢人和藏人團結做貢獻。」北京的立場是「什麼都可以談，就是不談西藏的獨立問題」。

不過根據中國政府的幕後周邊消息顯示，北京並沒有「上當」：根據史特拉斯堡的演說爲基礎而簽訂的和約，將使西藏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國，雖然臣屬中國宗主，可是仍舊保有準主權。和不丹一樣，雖然外交政策受到印度的監督，卻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國際公法上，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將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國提供保護，西藏接受被保護。因此，中國不能掉入達賴喇嘛所設計的陷阱。因爲達賴喇嘛眞正所要的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國兩制」⑦。達賴喇嘛的顧問麥可．凡．瓦特．凡．布拉格自己就透露說，和中國聯盟，西藏可以重新獲得主權。他指出在這種情形下，同盟國有隨時退出聯盟的權力⑧。這一類妥協的眞正意義將是，在國際公法上西藏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事實上，她卻不是。令人擔心的是中國政府也許比較喜歡相反的方式：在實質上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但在國際公法上，她卻不是。

認為中國願意和達賴喇嘛會晤對話，是中國在尋求妥協的坎坷道上跨出一大步的人都錯了。許多觀察人員在對以後的事實加以研究之後，認為中國一向不誠懇，從來沒有眞正地想要會談，她所有的手勢、言語無非是在拖延時間而已。面對著達賴喇嘛所提出來的充滿著和平，想要對話的建議，中國必須要回應，以免落人口實，被國際視聽指責是妨礙、拒絕妥協的人。這個說法非常具有觀察力，値得嘉許。事實上，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時間！北京希望西藏問題會隨著時間消逝。不過北京的消息靈通人士卻說，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大屠殺之前，中國政府內部對西藏問題有著嚴重的分歧。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是眞的希望能夠和達賴喇嘛達成永久性的妥協。就目前而言，北京仍然有不少的溫和派分子在等待著鄧小平的死期，以便再度提出他們的妥協想法。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藏文系主任王堯教授說：「我祇是一名大學教授而已，我不代表政府的任何人。可我喜歡西藏。我願意做達賴喇嘛和北京政府之間的橋樑。」[9]在重建藏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互信互賴的關係上，像他這一類人將會扮演很吃重的角色。不過正統派和過去一樣堅決反對任何對西藏地位的政治讓步，他們一直支持強硬態度。

不管中國政府內部是合是分，北京天安門大屠殺，確實敲響了中國和達賴喇嘛在近期內取得妥協的喪鐘。達賴喇嘛認為和信譽掃地的李鵬政府尋求對話是很不明智的事情。他在等李鵬的下台，也在等北京溫和派領導層的來臨，以便有效地和中國接觸。在宣布拉薩戒嚴的一個星期之後，北京說「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的對話大門還是敞開的」，唯一的條件還是達賴喇嘛要放棄西藏獨立的念頭[10]。當然這也祇是沒有什麼大意義地虛晃一招而已。一九八九年九月，阿沛·阿旺晉美發表談話說，中國希望和達賴喇嘛及其代表討論，而不是要和噶廈的噶倫。他的說法

證實了中國要討論達賴喇嘛未來身分的意願，而不是西藏未來的問題。

期待著中藏對話能夠重現生機，北京和達賴喇嘛之間是不是有些什麼接觸呢？達賴喇嘛的胞兄嘉洛敦珠定時到北京。謹愼的他，從不曝光，也不發布走訪消息。據我們所知道，他最近幾次到北京的訪問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一九八八年七月和十一月、一九八九年二月和十二月，然後是在一九九一年被選爲噶倫後，於一九九二年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到北京的訪問。中國政府透過他和達賴喇嘛轉換消息。不過中藏接觸的唯一正式管道是達賴喇嘛在新德里的辦事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達賴喇嘛駐新德里辦事處的主任札西旺地，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就以這個身分在印度的首都和中國外交官員會晤了不下十餘次。從一九九一年八月開始，他是噶廈的五位噶倫之一。他向我敍述了會晤的經過：

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史特拉斯堡演說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大屠殺期間，我和他們見了十幾次面。每一次見到的都是同一位中國大使館的政治顧問。他是個很有禮貌的人。偶爾我也在非正式的場合碰到他，譬如說在晚宴上。他的任務是把我們的觀點轉達給他的政府，把他的政府要對我們說的話傳給我們。就這樣，每一次中國有什麼信息，他就打電話給我，我們約了個時間見面。一般說來，有二位西藏翻譯陪著他，我則和一、二位同事一起赴會。不過他會說英文，所以有時候我們就用英文直接交談。當正式會談結束後，我們偶爾也會東拉西扯地聊天。我都是表達我的看法，他也常常發表他的意見，不過他的說法和中國官方的說法沒什麼兩樣！他彬彬有禮。這和幾年前中國外交人員的態度比起來，

眞是天地之差。以前那一批言語粗暴。這幾年來我們所接洽的使館人員變得有禮貌多了。現在，他們會聽我們說了。以前他們時常打斷我們的話，並且大發脾氣。他們不讓我們表達我們的想法。好像在態度上是有所改變。由小可以知大，在他們的政府裏，也應該是有變化的。我們在印度受教育的西藏人，言論比較自由，不像他們有那麼多的禁忌。因此，他們從我們這裏得到的東西，比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的要多。至於那二位西藏翻譯，我們也偶爾會在使館外面碰到。在他們之間，他們是百分之百的西藏人，不過他們不能說他們想要說的話。

這些接觸有什麼實質上的進展呢？當然，雙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西藏人和中國人在交換意見。不過札西旺地並不認爲中國有想要會談的意願。「也許他們沒有誠意，要不然就是他們內部有嚴重的歧見。我們所得到的迹象顯得非常不樂觀。非常不樂觀。有時候在非正式場合的交談中，他們的意思好像是說，史特拉斯堡的建議是合理的，而且談判應該愈早開始愈好。他們好像是要說，妥協是可能的。我在大使館的交談對象對我解釋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爲應該要開始談判。不過官方對我們傳過去的信息的答覆卻是非常不樂觀。對我，這是一個很大的失望。達賴喇嘛已經盡量在做各種可能的建議了。沒有任何的結果。他們一直重複同樣的話。他們沒有爲改善局勢開闢道路。」從這些事實來看，除非北京當局有新的作風，目前的局勢是不會有什麼新的進展的。「就目前的環境，我們沒有必要去嘗試。如果我們感覺到我們應該再和他們接觸，我們會去做的。不過，我們所掌握的所有迹象顯示，目前這些接觸沒有任何的意義。不能

有任何的結果。」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達賴喇嘛發表了嚴厲譴責中國政府的演說。下面是片段的內容：

在一九八七年，我提出了〈五點和平計畫〉以期讓西藏能獲得和平和人權。去年，我在史特拉斯堡市的歐洲議會補充了這個計畫的細節。雖然我的人民指責這個計畫，認爲讓步讓得太多了；我深信這些想法是實際的，是合理的。這也是爲什麼我對中國拒絕我的建議，拒絕和我選派的代表們進行嚴肅的會談感到非常的失望。如果中國目前的領導根本不願意和我們討論我們所提出來的具有大幅度讓步的建議，我們就有權力重新調整我們的立場。問題的癥結並不是像中國平常所說的是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地位，而是六百萬藏族人民的前途，是西藏人自決的權利，不受外國干涉與統治。民族自治不祇是人類的基本權利，也是享有其他權利的起點。

不論是處於何種狀態下，中國和西藏的關係都應該建築在平等、尊重、互信和互利的原則上。也應該建築在西藏和中國充滿高度智慧的領導，在西元八二三年所訂的條約中所提出來的原則上。這個原則刻在立於拉薩大昭寺前面的「長慶會盟碑」上，保存至今。上面刻著：「西藏（唐稱吐蕃）人在西藏大地上快樂生活，中國人在中國大地上快樂生活」。大部分的藏族人民認爲，除非西藏重新獲得完全獨立，不然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中國政府近來對西藏人以及對他自己的人民的態度，更加強了這個論據。

五、難以預料的國際團結

在和強鄰中國的生存鬥爭中，西藏能否寄望得到國際的支助呢？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包括整個歐洲和美國的二百多個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承認，至少都默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承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二十餘國的情形也是一樣，因為中華民國也認為西藏是她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的一部分。這種情勢對達賴喇嘛及其內閣的行動造成了嚴重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和西方政府正式會談，他們祇能有半官方或私人性質的接觸。有時候達賴喇嘛在申請入境簽證的時候受盡刁難，有時候甚至申請被拒絕。然而這些都不能阻止他在全世界不停地奔波。從他唱起「流亡曲」開始，他已經訪問過五十幾個國家了。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他就訪問了七次美國，五次法國。在這些活動中，他和外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而使某些政府逐漸地改變了他們的外交政策。他堅韌不拔的精神助長了在西方民主國家裏日益壯大的壓力集團。

持有王牌的中國當然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達賴喇嘛在積極部署，透過她的大使，中國向達賴喇嘛訪問國的政府不斷地施加外交壓力。她威脅這些國家不得對達賴喇嘛開啟大門，否則將採取外交或商業報復。中國政府的外交措辭舉世皆知。一有機會，中國政府就宣稱：「我們反對所有支持達賴喇嘛破壞祖國統一行為的團體或個人。」⑪

中國是第三世界的大國中唯一還沒有破產的國家，而且還有信譽能在國際金融市場借到二

百億美元，並且有能力承受這筆外債壓力，因此，對西方的工商業界人士而言，中國還是一個很有可為的超級大市場。雖然這個市場還處在萌芽狀態，商業界卻期待著十年後，當中國經濟起飛時，會有奇蹟出現。當這些威脅失效的時候，中國則採用更直接的方法，以打消願意接見達賴喇嘛的人的念頭。中國大使館也對報導西藏消息的記者施加很大的壓力，那一篇文章惹了中國政府，派駐於該地的新聞專員就打電話到該報編輯部抗議或威脅。如果這位惹是生非的記者不自我修正，堅持他對西藏局勢的「錯誤看法」，他就會了解「既然他不是中國的友人，所以，他以後到中國的所有旅行都是不受歡迎的」。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承認有很多的記者因而讓步。

在施加壓力這方面，中國的確是可以大大地炫耀的。因為就憑著這幾句話，中國就把達賴喇嘛封殺了將近十年。在這期間，除了印度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國的政府接見達賴喇嘛。一九八九年三月達賴喇嘛和法國人道行動國務祕書貝納・顧西內(Bernard Kouchner)在法國的會晤打破了這個禁忌。從一開始，這個會談就被列為機密會議。貝納・顧西內在極端隱祕下到達賴喇嘛在巴黎下榻的美麗斯(Meurice)賓館。為了怕走漏風聲，連達賴喇嘛最親信的閣員也被蒙在鼓裏。然而貝納・顧西內卻在二個月後在一家法國電台中暴露了這個會談。他也同時希望能派遣國際調查團到西藏。

在達賴喇嘛抵達法國之前，中國駐法大使周覺親自到法國外交部向法國政府施壓。他嚴厲地申訴「某些圈子」企圖「破壞北京和巴黎的友好關係」，他也很強烈地「建議」法國政府，至少要在達賴喇嘛訪問期間不讓他發表談話。這位親自找上門來的中國外交官被很有禮貌地拒絕接見。法國當局解釋說，巴黎接待一位宗教領袖。至於對貝納・顧西內的談話，法國說，這些

「並不一定」就代表法國政府的立場，不過卻代表著法國人民的普遍憂慮。從這一天開始，達賴喇嘛和世界各國政府的部長、總理，甚至總統的公開會談，就像雨後春筍一般不停地增長，從此我們可以說西藏問題是一個眞正的國際問題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會談對象，應該要算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的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ch)，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日的英國首相梅杰(John Major)、澳大利亞總理吉丁(Paul Keating)、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挪威國王及王后、立陶宛總統藍斯伯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保加利亞總統謝雷夫(Zhelyu Zhelev)，德國總統魏茲塞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愛爾蘭總理羅賓遜夫人(Mary Robinson)，以及法國當時的外交部長瞿馬(Roland Dumas)。達賴喇嘛的姊姊吉尊貝瑪也不斷地和外國官方人士會談，她就和法國當時的總理貝赫戈瓦(Pierre Bérégovoy)會過面。此外達賴喇嘛也可以冀望愈來愈多包括政治、藝術、文學、科學，以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名人與非官方組織的支持。譬如說丹尼爾•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法國密特朗(Frençois Mitterrand)總統夫人、名演員李察•基爾(Richard Gere)、麗芙•鳩曼(Liv Ullman)、史特凡•歐冬(Stephane Audran)、伊莎貝•艾珍妮(Isabelle Adjani)、音樂家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凱特•布希(Kate Buch)、西班牙梅卡諾樂團(Meccano)、亞倫•金斯貝(Allen Ginsberg)、攝影師亨利•卡提•布列松(Heri Cartier Bresson)、教宗保祿二世、歷史學家休格•理查遜(Hugh Richardson)以及衆多的西方國會議員。我們必須指出西方國會有時候很明確地支持達賴喇嘛，尤其是美國的議會。美國參議院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通過大膽的議案，宣布西藏(包括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省的藏人居住區)「在國際公法的原則上而言，是個被佔領的國家，其眞正的代表是達賴喇

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這是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來，第一次被指責爲侵略者。這份決議還提到在一九五〇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的時候，西藏「具有國際公法上所要求所有國家的組成要素：領土、人民、獨立政府以及行使內政和獨立外交的能力」。其他的西方國家國會則設立了有關西藏的研究或友好小組。在法國國會的五百七十七名議員中，除了極右派分子（一九九三年三月改選後，已經沒有極右派議員）與共產黨黨員之外，有上百名隸屬不同黨派的議員加入國會西藏問題研究小組。立陶宛議會也於一九九二年二月通過決議發表宣言說，他們「認爲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的唯一代表」。他們還補充說：「我們保證在國際組織和會議中支持西藏民族合理法的願望。」⑬

達賴喇嘛有時候也會碰一鼻子的灰。有些西方政客考慮到經濟上的因素而公開爲中國辯護。採取明顯的立場，往往在和中國談判重要合同契約時，會有決定性的優勢影響。某些支持中國立場的人則是因爲對西藏問題完全不了解。我猶豫是否應該把奧地利前任外交部長比爾．海頓(Bill Hayden)列入第二類政客裏。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說，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的演說內容是不能讓人接受的。他補充說。報導西藏鎮壓行爲的消息把事情說得「太過誇張了」⑭。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從來沒有聲明反對達賴喇嘛的提議，不過他在一九八七年到西藏的那一次令人議論的訪問，卻間接地承認了中國在西藏的合法性。事實上他是從一九五〇年以來，第一位在在任期間到西藏訪問的外國國家或政府領袖。那個時候我人還在北京，我記得一位西德外交人員向我說，他們部裏一直反應希望他不要去西藏訪問。西德駐北京大使並沒有陪同柯爾到西藏訪問，他對這次訪問「深感惋惜」。有時候，在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題時，外

交手腕的不靈活會把政府弄得很尷尬。比利時合作及發展國務祕書艾力克・德立克(Eric Dercyke)於一九九二年三月的時候，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準備到西藏參加比利時政府贈與西藏的，價值五千三百萬比利時法郎的一座阿勒卡得—貝爾(Alcatel-Bell)公司電話交換中心的開幕啓用典禮⑮。這個消息一經發布，比利時輿論嘩然，逼得德立克取消這個訪問。如果他去了，他將是在天安門屠殺後到西藏訪問的西方政府官員中的第一人。在義大利也有一位高官在西藏問題上，一直支持中國的立場：吉阿尼・得・米給力斯(Gianni De Michelis)曾經是義大利的外交部長，他不止一次表示反對那些在歐洲批評中國在西藏的政策的人。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他還批評那些膽敢要求中國離開西藏的人。他說：「對一個有十二億人的國家說這種話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太狂妄了。」義大利的外交主管認爲：「四百萬西藏人之爲中國人，就如同巴斯克(Basque)少數民族之爲西班牙人……我們可沒有因而要求西班牙讓巴斯克人獨立，我們也沒有因爲一些居民的要求而要求英國人離開烏爾斯特(Ulster，北愛爾蘭)。」⑯

大型的國際機構對西藏問題又持那一種立場呢？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了，在五十年代的時候，聯合國裏面所發出來的抗議之聲甚爲薄弱，也很籠統。不過在一九五九年的時候，聯合國的一個子機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充滿著北京在西藏進行種族滅絕罪證的報告。接著，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尤其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之後，國際組織對西藏問題絕口不提。在這方面，達賴喇嘛也逐漸地攻城掠地頗多斬獲。因爲眼看著一九八七年十月以來的拉薩流血暴動和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屠殺事件，即使是最保守的機構也不能再裝聾作啞推說不知就裏。看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中國警察使用何等的暴力手

段，使拉薩街頭的騷動分子進入「高度入靜」之後，歐洲議會對在西藏所發生的「暴力鎮壓」感到失望[17]。這個史無前例的決議是中國外交上的一大挫敗。北京立即反應，認爲歐洲議會的表決是「輕率的」。幾天後，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馬丁・班傑民(Martin Bangemann)配合議會立場，對北京再補一槍。他向中國副總理吳學謙表達了歐洲共同體「面對喪失人命」的感受，以及不希望看到類似事件重演的期望。自然的直接反應：稍後，中國對「公然干涉」他們的內政問題表示「非常憤怒」。一九九二年四月，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主席雅各・德洛(Jacques Delors)在回答法國議員的問題時，重申歐洲共同體對西藏問題的立場：「我想我可以確定地說，共同體及其會員國對尊重人權，以及對西藏情勢關心的立場是很清楚的，中國政府也知道我們公開要求藏族人民的思想自由必須要受到尊重，以及和達賴喇嘛的對話應該要繼續的立場。」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中國在外交上再度受到挫敗。在聯合國史上，日內瓦人權小組委員會第一次通過決議譴責中國部隊野蠻鎮壓的行爲。儘管中國外交人員對有投票權的專家們施加強大的壓力，決議案還是通過。中共的壓力主要針對積極參與辯論的法國專家路易・如瓦內(Louis Joinet)。該小組委員會以十五票對九票通過議案。北京政府再度發表聲明對這種「干涉中國內政問題」的做法表示「憤怒」。她斷言反動集團在國外所施加的壓力永遠不能讓中國人民屈服。不過在這種沒有什麼意義的文宣措辭的後面，根據消息靈通人士說，這份決議的確使中國領導大發雷霆。因爲幾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裏唱做俱佳地，爲自己塑造出一個值得尊敬的民主國家形象，然而這份不很重要的決議，卻把她這幾年的心血付諸流水。這

份決議結束了聯合國二十五年，來對中國所發生的事件不聞不問的態度。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甚至在一九六五年，聯合國大會還重申「藏族人民自決的權力」和「再次莊嚴地呼籲，停止所有剝奪藏族人民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做法」。從那個時候開始，聯合國對西藏問題就一直保持緘默。在日內瓦的人權小組委員會，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通過了一項有關西藏的決議。二十六個國家的專家們在這項決議中，對在西藏的長期侵犯人權和自由而「導致藏族在文化、宗教、種族上即將失去特性的危機」感到「擔憂」。這些年間，中國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身分，很輕易地就把不中聽的反調銷聲匿迹，並且博得西方工商界的好感。

聯合國對西藏問題的立場還在演變，西藏的未來很可能就取決於聯合國和其他大型的國際組織。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人權小組委員會認爲，沒有必要通過另外一項抨擊中國在西藏的政策的議案。粗略看起來，好像是支持達賴喇嘛的人以及達賴喇嘛的信徒們痛失一城，其實不然，這對他們而言是一大勝利。事實上，從中國入侵西藏和達賴喇嘛開始流亡到現在，在聯合國裏，從來沒有像這幾年一樣，這麼熱烈地談論西藏。在這次會議中，我們看出日本已經走出了美國的陰影，變得比較獨立，並且支持歐洲共同體提議中的原則。事實上，在投反對票的二十七個國家（總共有五十三個國家參加委員會的表決）中，有一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寧願站在中國那一邊來自我保護，以免國際好奇的矛頭對準自己國內侵犯人權的事件。從這些顧慮看來，我們可以確定，西藏問題想要在聯合國中圓滿的解決，還有一段遙遠艱苦的路程。話雖如此，國際輿論卻在爲西藏鼓動風潮。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由挪威西藏委員會發起的請願書獲得八十六個國家二十多萬人的聯署，並且提呈紐約聯合國人權中心轉呈聯合國祕書長。這次的動員，顯示了決定協

助西藏人的非官方組織已經遍布全球。根據我的統計，從日本算到法國，包括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等，至少有一百五十個組織。

西藏人奮鬥的因子，好像也逐漸獲得其他國際機構的支持，因爲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的時候，西歐聯盟(Union de l'Europe Occidentale,U.E.O) 抨擊中國的西藏政策。這個聯盟包括除了愛爾蘭之外的所有歐洲共同市場的會員國。該組織的議會宣稱：「中國人佔領西藏已有多年，並且剝奪西藏人享受人權的權利。」對北京而言，這份宣言「明顯地干涉中國內政並且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更是一記痛徹心肺的沉重打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奧斯陸的頒獎典禮上，達賴喇嘛當著挪威國王和王后的面宣布說：「我衷心代表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接受這個和平獎。」奧斯陸的審察團的決定在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做了貢獻。此外，諾貝爾獎來得正是時候，這是給藏族人民的極大鼓舞。在達蘭薩拉的大街小巷裏，西藏人載歌載舞，高聲歡呼慶祝達賴喇嘛獲獎。在拉薩，祇要能夠避開中國警察的耳目，西藏人也都以無比的熱忱慶祝這一大好消息。路透社的通訊員吉•丁摩是幾位在一九八九年十月間，得以在拉薩停留幾天的記者之一。趁著監視的疏忽，一位年輕藏人向他講述拉薩藏族人民的歡欣：「我們對這個消息感到非常高興。我們跳舞、焚香，我們也喝了不少。」另外一位則說：「我們大肆慶祝這件好消息。人民政府很惱火，卻也無能爲力。」

諾貝爾和平獎對拒絕使用暴力，相信可以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的西藏人，也是一劑強心針，同時也是對想要採取其他辦法的人的一種警告。在充滿著公開或潛伏的衝突的世界裏，非暴力

終於得到應有的代價。和平獎是對一個破產制度的羞辱，也讓中國民族大失面子，事實上，從來沒有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獲得諾貝爾獎，然而西藏蠻人的頭頭卻榮登桂冠榜！無庸待言地，中國表達她「極度的憤怒」和她的「深度遺憾」。她指責奧斯陸審察團「明顯干涉中國內政而傷及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人民日報》趁此機會把達賴喇嘛說成是「政治歹徒」⑱。

然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被長期孤立。此外，即使中國的威嚴受到嚴重損傷，即使達賴喇嘛可以從中得到利益，說達賴喇嘛可以很快地得到西方政府的正式外交承認，那將是一大錯誤。北京依然擁有強而有力的夥伴。在中蘇冷戰期間，蘇俄和流亡藏人頻繁接觸，其關係之密切，甚至已經到要懷疑中國在西藏主權的歷史可靠性的程度了。不過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和莫斯科關係正常化之後，蘇俄又轉而支持中國在西藏的合法性。蘇俄分崩離析之後，葉爾欽(Boris Eltsine)的俄羅斯並沒有採取明確的立場。不過蘇俄並不是對西藏問題毫不關心。一九八九年就有二位蘇俄人到達蘭薩拉參加「研習會」。其中一位是來自南西伯利亞，外蒙古北部的烏蘭烏德的布里亞人。他對我說他到達蘭薩拉是要學習藏傳佛教的。另外一位則是來研究西藏的傳統醫學。然而很奇怪的，這二個人都持用蘇俄的「公務護照」。

至於印度這邊則更是不願意支持西藏的地下抵抗軍了。印度總理是爲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高興，可是他也正在和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艱苦談判，爲此他還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拉薩流血暴動後，到北京做數天的正式訪問。他是一九五四年以來，第一位到中國訪問的印度政府首長。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對「印度政府對西藏問題的原則表示敬佩」。哈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總理則公開發表談話，認爲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不允許在印度

的藏族分裂分子進行任何分化中國的政治活動」⑲。

至於尼泊爾，她可以協助西藏人的活動範圍更爲狹隘。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中國和印度間正在開發中的小國家，能夠不自量力地觸怒中國嗎？不，尼泊爾玩不起這麼奢侈的遊戲。一九七四年的時候，一萬五千藏族抵抗軍選擇了尼泊爾的木斯塘，做爲對西藏內地發動攻擊騷擾中國部隊的工具。這件事一直拖到毛澤東大發雷霆，並且揚言以強烈的報復來威脅尼泊爾國王，才算結束。從那個時候開始，尼泊爾變成了西藏難民的臨時避難所而已。尼泊爾早就把維護人權的義務拋諸腦後，也不再猶豫是否要把新來的難民，送交給中國的邊界守衛。應中國人之要求，也算是對西藏人提出警告，尼泊爾政府把在加德滿都的監獄裏，已經關了一年的二十六位西藏人遣送給中國警察。這些可憐的人在坐監期間，祇有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可以探監。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尼泊爾外交部長烏巴得夏亞(Shailendra Kumar Upadhyaya)說：「我們和我們的鄰國有著很好的關係，我們不希望我們的領土，被用來從事敵對這些鄰國的行爲。」⑳一九九一年二月，尼泊爾政府自己承認，是受到北京的壓力而要求達賴喇嘛取消到尼泊爾的訪問。達賴喇嘛祇到過尼泊爾一次，那還是一九七〇年年底，到釋迦牟尼的誕生地倫比尼的訪問！對那些嚴厲抨擊尼泊爾的人，我們必須要提醒他們，一些像日本高度文明化的國家，也是把天安門廣場慘案之後逃離中國的新「船民」遣送回中國！不過達賴喇嘛在中國的亞洲友好鄰國之間，似乎也有一些收穫。譬如說，儘管受到泰國軍方的抗議和中國政府對泰國政府的警告，藏族人民的領袖還是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到泰國和其他六位諾貝爾獎得主一起參加在曼谷爲抗議緬甸異議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被軟禁而舉行的聚會。此外，他於同年十月訪問

法國，與法國總統密特朗及數位法國內閣閣員會晤。歐洲則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增強壓力。一九九三年一月，英國政府公開表示希望中國和達賴喇嘛無條件對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人民永久法庭(Tribunal Permanent des Peuples)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召開的一次以西藏問題爲主題的會議中判決，認爲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中國軍隊「違反國際公法，而且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軍隊以佔領軍的身分一直違反國際公法」。這個法庭認爲，在藏族人民應該有權自由行使民族自決權的情況下，藏族人民「可以選擇獨立，或是和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做任何形式的聯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這項決議「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西藏環境的破壞以及經濟的開採」，「要求立即停止鼓勵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要求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政府立即重新會談」和「要求在會談中討論眞正的民族自決問題」。最後，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到十一日間，四十餘名國際律師和法學家在倫敦參加，英國議會西藏小組和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所共同舉辦，有關西藏民族自決觀念的討論會。他們認爲中國在藏人居住區大量移民，將會對藏族人民帶來極嚴重的危險。

六、班禪喇嘛圓寂之謎

「我們非常沉痛宣告智慧大師，無量光佛、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於藏曆土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格里曆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時十六分與世長辭。班禪大師不祇是我們的宗教領袖，他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佛教會名譽會長。

他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利益。他爲國務和宗教事業做了偉大的貢獻。他贏得了僧俗的愛戴、尊敬和崇拜。我們扎什倫布寺全體僧眾誠心爲班禪大師的靈童早日轉世祈禱。

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⑭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禪喇嘛五十一歲誕辰前幾天，在極端離奇的情況下猝然圓寂。六天前，他還在扎什倫布寺中，在五千名信徒和西藏高級代表們的觀禮下，爲日喀則的「大卒塔婆」（埋葬佛骨的半圓形墳墓，即靈塔祀殿）——班禪東陵札什南捷開光，接著他參加了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刨墳的五、六、七、八、九世班禪喇嘛遺體合葬靈塔祀殿典禮。紅衛兵打壞「卒塔婆」把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遺體丟進河裏，不過信徒們把殘留的遺骸謹慎地蒐集起來，放在祕密的山洞裏。在爲金頂的靈塔祀殿開光後，班禪喇嘛向大家宣布說：「我剛剛完成了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務！」幾天前，班禪喇嘛坐著開敞的吉普車抵達日喀則受到三萬藏民的夾道歡呼。在白天，當車隊越過了一座海拔五千公尺隘口的頂點時，他要車隊停下來，然後下車到祭台前祈禱。穿著褐色鑲金的袈裟，班禪喇嘛在祈禱幡旗前高興地婆娑起舞。班禪喇嘛是很愉快的，他終於回到了他的國度裏！在靈塔開光後的第二天，班禪喇嘛公開發表嚴厲抨擊中國政府的演說。這份講辭將會被認爲是班禪喇嘛的遺囑而留存於歷史上。那些話出自對中國

在西藏政策最有價值的同盟班禪喇嘛的嘴裏，對中國政府是個很沉重的打擊。中國有足夠的理由認爲被她最忠實的助手背叛了。底下是英文版《中國日報》所轉載的演講全文㉒：

自治區最高宗教領袖班禪大師於星期一說，在近三十年來，西藏爲了地區的開發所付出的代價比實際上獲得的還要多。

專程前往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合葬靈塔祀殿——班禪東陵札什南捷開光典禮的十世班禪大師表示，自從解放以來，地區有著極大的改變。不過他說：「我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我們永遠也不應該重犯這種錯誤。」

在文革期間坐監一年八個月的宗教領袖指出，就西藏的情形而言，由於左傾分子的錯誤而造成的禍害，比右傾分子所造成的損害要嚴重得多。

班禪大師在一次和拉薩以及其他五個中國藏人居住區的黨政高級領導的討論會中，發表了他個人的評論。他對他們說，西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也記取了可怕的教訓。大部分的領導幹部明瞭這些教訓。班禪大師說他是一個坦誠的人。他補充地說，有一些領導完全忘了悲慘事件，有些則甚至又開始重複這些錯誤。

從封建農奴制度一下子跳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西藏社會，連社會主義最基本的階段都沒有達到。今後的重點應該要放在修正左傾的錯誤上面。

班禪大師說，在最近的幾年間，西藏和比鄰的中國地區在經濟上產生了差距。西藏應該努力利用豐富的天然資源，以便迎頭趕上經濟超前的地區。

班禪大師說有一些對西藏不友好或是甚至敵對西藏的人，援引這些經濟上的差距嘗試地要破壞漢人和藏人的關係。

二年前，也就是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時候，班禪喇嘛就曾經對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西藏自治區常務委員會，做了一個強烈批評的演說。他對駐紮在藏人居住區的人民解放軍「同志」說：「我們時常說由於你們在西藏解放時期的努力，使得西藏有長足的進步，這些功績西藏人永遠不會忘懷。然而你們也在西藏確實犯了很多的錯誤，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些。」至於對西藏人的迫害，「藏族人民在安多和康區受到不可名狀的酷刑。他們每十人、二十人一組組地被殺。我知道談論這些事情並不很好。不過這類行為在藏族人民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有關在青海（安多）的暴行，「如果把在青海省的殘忍暴行拍攝成影片，所有看的人都會被嚇壞。在果洛地區，有很多人被殺，屍體被從高處丟進大墳坑。士兵們告訴死者的家屬和親友說，他們必須為消滅叛亂分子而慶祝。他們被迫踩著屍體跳舞。然後他們也被機關槍屠殺，一起埋在那裏。」[23]

如果我們相信中國官方的說法，班禪喇嘛於元月二十八日清晨四點三十分在日喀則行宮德虔普彰突然發病。當時他說他後背疼痛並且波及兩臂。隨身醫師立即進行檢查，心電圖顯示急性下壁及廣泛前壁心肌梗塞。搶救小組立即予以吸氧、血管擴張劑、鎮靜劑和心律調整劑治療，八時二十五分複查心電圖的過程中，突然抽搐，神志不清，八時三十四分心電圖顯示心室仍有細微的跳動，當即採取胸外扣擊，心內注射強心藥物，胸外按摩，用呼吸機進行人工呼吸等搶

救措施。十八時三十分，由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北京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專家劉元恕，心血管專家沈瑾主任醫師等組成的專家組到達後，先後做兩次心內起搏，持續搶救，仍未見效，於二十時十六分逝世。最後診斷結論爲急性下壁、廣泛前壁心肌梗塞，引起心臟驟停㉔。和我討論的流亡藏人一致認爲他是被中國人謀殺的。其他的藏人卻確信十世班禪喇嘛像西藏的宗教大師們一樣，自己決定圓寂的時辰。他們認爲班禪喇嘛決定在他的城市，在他的寺廟裏圓寂。他決定從此和他的前世們一起安息在他剛剛開光的靈塔裏面。伴隨班禪喇嘛的人說，在他圓寂的前一天夜裏，日喀則吹起一陣狂風，刮得全城黃沙，這是班禪喇嘛圓寂的預兆。

雖然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證實或是否認任何一方的論點，然而班禪喇嘛死於心臟病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從他的復權開始，班禪喇嘛就變得很肥胖，套他自己的說法「胖喇嘛」。他在日喀則的這段期間讓他非常疲憊，他每天都花好幾個小時爲虔誠的信徒們灌頂說法。達賴喇嘛痛失「自由的鬥士」。他的死也大出北京意料之外。中國政府的確對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逝世感到沉痛哀傷。

用這種讚美詞來紀念一位在北京「秦城一號監獄」或是在「勞動改造營」的牢房中被囚禁九年八個月，然後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間被軟禁在北京的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爲他死了。有一天，他突然再度露面，並且發表了大爲丟臉的自我批評：「有一段時間我拒絕了愛國主義的旗幟，我犯了錯誤。跟隨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修正了我的錯誤。」

在收押期間，黨對他的照顧無微不至，甚至幫他找了個女人，董其武將軍的外孫女李潔。

班禪喇嘛置佛教的不成文規定於不顧而和她結婚，並且於一九八三年生了一位名叫仁吉旺姆的女兒。中國政府的領導們認爲結了婚的班禪喇嘛一定會在西藏人中喪失威信，因爲所有的黃教喇嘛都必須保持獨身。然而事與願違，大部分他的信徒從來沒有責怪他，他們也沒有公開批評他在北京豪華官邸中大吃大喝的事情。班禪喇嘛圓寂後，他那位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太太終於第一次走出了中國政府所規定的言行保留範圍區。

她接受了香港名記者陸鏗在北京的訪問。她表示他們的結婚不是黨的安排，而是班禪喇嘛的意願。她說婚禮是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後，於一九七八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班禪喇嘛圓寂後，中國政府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以鄧小平爲首的高層人士都參加了這個大會，然而李潔女士卻沒有受到邀請。主辦單位不想看到難堪尷尬的場面。她對這件事大發脾氣，在北京甚至有謠傳，說她打算在天安門廣場焚身抗議。她對陸鏗說：「其實，喇嘛結婚並不違反教規。達賴喇嘛的哥哥結了婚，達賴喇嘛的弟弟也結了婚，他們都是活佛。」

這可沒錯，事實上達賴喇嘛的三個兄弟都被認爲是活佛轉世，然而三個都脫下袈裟還俗了。達賴喇嘛的哥哥圖登．晋美諾布曾經是安多地區一座寺廟的堪布，如今在美國印地安那州大學任教；哥哥羅桑桑天已婚，育有子女，於一九八四年去世；弟弟丹增曲嘉已婚。她繼續說：「爲什麼我們結婚十年並不違反宗教法則，到他逝世之後反而加以隱諱呢？」班禪喇嘛爲她取了個藏名叫德虔旺姆。班禪喇嘛到西藏訪問的時候，她時常陪同出行。她補充著說：「大師生前我跟他出行，很多藏人以『藏母』視我」[25]。

班禪喇嘛的一生和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歷史糾纏不清。官保慈丹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出生於青

海（安多）的農村家庭。他在三歲的時候被認定是一世班禪的轉世。九世班禪喇嘛於一九三七年圓寂。轉世靈童的認定是由被國民黨控制的黃教喇嘛所決定，然而這個決定卻是國民黨的意思。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共產黨控制了班禪喇嘛，並且把他塑造成達賴喇嘛的勁敵。我們知道這位小朋友可能曾經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日向毛澤東電傳道賀。這眞是荒謬至極，因爲他當時祇有十一歲而已！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受到毛澤東的召見，然後他成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國家委員會委員之一。後來的情形我們已經知道了，可憐！

班禪喇嘛之死開創了從未見過的局面：西藏大活佛在共產主義下的土地上的靈童轉世問題。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北京就一直拒絕承認圓寂活佛的轉世。黨內的思想工作同志認爲藏傳佛教的這種傳統，是「封建制度的遺毒」。此外，尋找轉世靈童的事如果沒有受到達賴喇嘛的嚴密監督，是不能獲得西藏人的認同的。然而很快地，北京御用報紙《人民日報》用大標題向中國人及西藏人發布令人難以相信的消息：尋訪認定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有關準備工作已經開始。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國家裏，竟然正式開始尋找活佛的轉世靈童！在扎什倫布寺裏，七百名和尚在爲班禪喇嘛誦經祈禱。

扎什倫布寺的高僧們按照藏傳宗教儀軌和傳統保存遺體的方法，花了五天的時間用多種名貴藥水精心沐浴，擦洗班禪喇嘛遺體，用高級綢緞纏裹遺體，按時更換，並採取其他措施，以保證遺體能長期保存。北京並沒有反對。相反地：中國共產黨西藏地區黨委會主動負責調用車隊運載五百五十三公斤的藥草。此外，由於他死後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班禪喇嘛的遺體原則上應該和其他大部分的中國革命「英雄」，不論是共產黨員或非共產

黨員的骨灰一樣存放在八寶山墓園。不過爲了要平息西藏人的憤怒，中國政府再度做出讓步：班禪喇嘛的遺體存放在他幾天前開光的靈塔祀殿——班禪東陵札什南捷。他的木乃伊被小心翼翼地按照順序和歷代班禪的遺體擺在一起。十世班禪喇嘛當了一輩子中國的玩偶，死後終於得到解脫，得以回到扎什倫布寺，所有班禪喇嘛的駐錫地。

到了一九九〇年春天，轉世靈童還沒有找到。我們很難想像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會沉湎於占卜祈禱。然而中國人的企圖太明顯了：他們一定會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掌握關鍵性的決定。中國政府的文告可以爲證。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政府最高單位國務院批准第十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由扎什倫布寺負責，請第十世班禪大師的經師嘉雅活佛和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恰扎．強巴赤列活佛主持。此外，還明文規定「根據我國憲法規定，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和尋訪認定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歷史慣例，第十世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在我國國內尋訪」。最後的決定必須要經過國務院的同意。達賴喇嘛及其集團明白表示，他們不承認北京選擇的轉世靈童。他們強調新一代的班禪喇嘛大可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尋得認定。看起來雙方是要在尋找認定轉世靈童上面暗中較勁，看誰捷足先登了。到目前爲止，扎什倫布寺的高僧們前往仁布縣雍布則隆神湖和加查縣拉摩拉錯神湖觀看吉祥預言及徵兆的宗教活動已經完成了。

七、和「中國民主聯盟」的對話

如果有一天中國民主化了，西藏問題是否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呢？達賴喇嘛及其集團可真

相信這種事。最近的幾件事證明他們是對的：逃亡到法國和美國的中國不滿分子們，對西藏及其領袖採取了具有建設性的動作。「中國民主聯盟」（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中國民主聯盟」和「中國民主陣線」整合成為「中國民主聯盟陣線」）的做法是值得鼓勵的，因為西藏是個敏感問題，而他們是冒著實質的危險在做事。祇要走錯一步路，說錯一句話，他們可以確定，北京政府絕對不會輕易放過機會的。他們接受西藏獨立的原則？這是天賜良機，可以把他們抨擊為叛國賊，從而使他們失去民望；他們拒絕讓步？他們將失去好不容易才在西方世界掙出來的「有灼見的政治改革者」的稱號。

流亡在外的中國異議運動的領袖們很快就注意到西藏問題。從一九八九年七月，天安門廣場屠殺後的一個月，嚴家其就確定了指導路線：中國必須變成「聯邦」，必須要和達賴喇嘛談判。九月，「中國民主聯盟」在巴黎舉行創社大會的時候，趙紫陽的心腹再進一步說，西藏人從一九五九年以來的鬥爭，應該被認為是爭人權的鬥爭：「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八九年間，西藏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暴亂不是反革命的，我們對這種情勢必須要給與正當的評判。」㉖嚴家其在當選為「中國民主聯盟」主席後，曾經在聽到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後，立即向他拍送「熱烈的祝賀」。此外，他還向達賴喇嘛表達他對達賴喇嘛「為重建正義和人權的勇敢鬥爭」的敬佩。

流亡藏人和流亡中國人的對話，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在「中國民主聯盟」的巴黎總部正式開談。這個第一次的會談在祕密中進行，沒有任何外人在場。總共祇有六個人與會：西藏方面有達賴喇嘛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贊、在法國的西藏事務負責人烏仁諾布巴和平措達克拉。在「中國民主聯盟」這一邊，則有嚴家其、總書記萬潤南（中國民營電腦公司四通的前任主任，

該公司已不存在）和「中國民主聯盟」的另外一位負責人林希翎。為了要使這個會談有成功的機會，雙方同意嚴守機密。這一點我們可以了解。這是想要有進展的必要條件。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達賴喇嘛在巴黎接見了嚴家其。二個人都認為這是個「歷史性」的會晤，他們也同意雙方的代表將繼續對話，以求得「雙方更深的互相了解」和「尋求合作的項目」。北京立即嚴斥「罪犯與叛國賊」嚴家其和達賴喇嘛「勾搭」企圖「分裂祖國」。

有一天，當我接到嚴家其將假巴黎政治學院做有關中國的演說消息時，我也去了，準備問他他對西藏問題的看法。他有點不自在，不過還是願意答覆，但是他聲明他所說的祇是他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中國民主聯盟」的立場。

嚴家其同意班禪喇嘛所說從一九五〇年中國部隊入境以來，西藏得不償失的說法嗎？「我同意這種說法。四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有所建樹，不過很自然地也有不少缺失。就不好的方面而言，共產黨強迫西藏人接受他們一黨專攻的政治制度。然而在好的方面，我們必須要承認，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貢獻了很大的力量。在不好的方面，我們也得提到藏族人民宗教自由和文化自由的被剝奪。」

既然進入了主題，我乾脆問個棘手的問題：總的來說，西藏是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嚴家其看著我，遲疑一秒鐘後，他回答說是的，西藏是屬於中國的。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這是歷史上的問題。我沒有做過很深的研究。如果我有做過研究……我不是個藏學家。我本人是個研究員、科學家。你看得出來我對西藏的認識不夠充分。不過，關於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八八年在西藏所發生的事件，應該要和六月四日在北京的大屠殺相提並論。這些事件喚起了中國人

民對西藏的注意。」

可是如果你認爲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你又如何解釋民族自決權呢？這不是民主的一大基礎嗎？你要對那些爲爭取西藏完全獨立的鬥士們怎麼說呢？「我想有些西藏人有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我們必須要同時考慮到台灣問題。在台灣也一樣，有人想要獨立。然而不論是台灣還是西藏，終結的問題並不在獨立。在台灣，有人要爭獨立是因爲台灣人民看過共產黨的所做所爲，他們害怕海峽統一後會失去得到自由的希望。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不管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或是退走台灣島以後，也從來沒有朝自由去努力。最近幾年來台灣有著有限度的開放和民主化。然而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問題的癥結是這些制度沒有接受人民有自由權利的觀念。這就是爲什麼獨立念頭的市場會方興未艾的原因。對西藏，中國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事實上是長久以來，就不很尊重西藏的文化、宗教信仰或是她的社會經濟發展。從這種情形衍生了對民族自決權的需求。我認爲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不過我相信如果中國眞正地民主化了，如果北京的政府變得眞正的民主了，如果中國保證西藏有眞正的高度自治，贊成民族自決的思潮就會淡化得多了。如果事情是這樣子發展的話，我不認爲還會有高漲的獨立主義行爲。達賴喇嘛有個立場我非常贊成。他說應該要擴大西藏自治的權限範圍，包括信仰自由，包括西藏的政治體制。我認爲在這種結構下，因爲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她的國防由中央政府負全責，外交事務也是一樣。所有其他的事務均屬於西藏政府全權管轄。我相信這樣子的話，獨立的意願會淡化的。因此這不是民族自決的問題。西藏有這個權力，她可以使用這個權力。台灣的情形也是一樣。看看夏威夷。如果有一天夏威夷的居民

有人說：『我們要獨立』，我們不能說要獨立的意願本身是個錯誤。問題是他們能夠實現這個獨立的願望嗎？」

我繼續問他這一方面的問題，雖然我看得出來他已經有點不耐煩了，嚴家其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在民主化的中國裏，藏族人民是否有可能自己舉行全民表決來決定是否要獨立？

「如果我們問這是不是一種權力，那麼，這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族都有這個權力。這個權力屬於所有的種族。不過對西藏，我認爲她的獨立是不可能的。就我而言，我是江蘇省的中國人，我認爲西藏的獨立將會爲西藏人民以及整個中國帶來災禍。不過如果我們祇談權力，藏族人民，海外藏胞（西藏難民）有權力表達他們的看法與想法。民族自決是個不可剝奪的權力。如果中國拒絕西藏人民的自決權，西藏人民會以更大的聲音來爭取它。對台灣也是一樣。不過我相信在中國，台灣和西藏的獨立是不可能實現的。就拿海南島爲例。這也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海南島的居民有權力要求民族自決嗎？有。可是事實上，島上的人民要獨立並且建立『海南國』的事是不需要考慮的。對西藏也是一樣。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下述四個條件必須齊備：

㈠要爲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八九年被判爲反革命分子的人平反。要承認這些事件是西藏人民爲自己權益的鬥爭；

㈡要保證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文化保護。這些都必須要由憲法和法律予以保障；

㈢西藏政府的組織結構應該由藏族人民自己決定。並不是上海、北京或山西、四川的議會決定後在西藏強制執行。西藏必須要能夠自由選擇他的政府組織。中國憲法必須要給予

保障；

㈣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他必須加入聯邦組織。聯邦組織必須要解決西藏問題。這樣子，上海、北京、四川、山西、江蘇等全都是這個聯邦的一分子，全部受聯邦政府統轄。

如果事情是這樣發展的話，我不認為西藏會成為獨立國。不過如果西藏一定要獨立的話，這對她將會是一大災禍。我想達賴喇嘛自己也不贊成獨立。當他提出類似的看法的時候，那也祇是對共產黨的抗議而已。」

這種情形不就是和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的地位一樣了嗎？「不，這是兩碼子事。香港政府與議會並不是經由自由選舉產生的。對西藏，我認為我們可以研究出一種可行的政治體制。它將和香港、台灣的制度不一樣。也和上海、北京的不一樣。首先，西藏將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大會的權限之內。」那是否應該重新定義西藏的疆界並且收回現在隸屬中國甘肅、青海和四川等省的舊地呢？「這個問題應該在聯邦體制內討論。一個像西德或美國式的聯邦。西藏疆域的重新定義將在包括藏族人民的中國人民之間協調談判。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並不一定是要我所說的這些。這個問題關係到整個中國。我知道在青海，在四川有不少的西藏人。」

然而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就有大量的漢人移民西藏，一九八〇年胡耀邦到西藏視察的時候曾經批評這種做法。你同意嗎？「我同意這個批評。他到了西藏，也親眼看到這種事實。這對漢族、對藏族都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如果這些移民是自願的，而且藏族人民接受他們，我同意這種移民方式。可是他們都採用強制的手段。依我的看法，這些移民潮應該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如果他們願意，西藏人也可以移民到中國內地。所有的強制方式祇會導致禍害。」如果我

眞的了解您所說的，在西藏的漢人都應該返鄉回府了？「所有的這些都應該是自願的。如果他們有自由的權力，毫無疑問地會有很多的漢人回到內地的。可是他們的離開也會爲西藏帶來諸多的問題。因爲西藏的經濟建設需要所有華夏民族一起努力，藏族、漢族或蒙族人民。我想達賴喇嘛同意這種說法。最重要的是不使用任何強制的手段。在一個聯邦體制下，西藏將可以自己自由地決定要如何發展有關教育、文化、經濟各種項目。他們也可以自己主動邀請漢人或是蒙古人，或是其他的民族。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外國人。譬如說您，您是藏族人民的朋友，您也可以去幫助他們。」

可是西藏人時常被中國的諾言所欺騙。他們爲什麼還要相信你們呢？「懷疑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並不民主。甚至憲法也是空虛而沒有實質的意義。因此，當北京把西藏改稱爲『西藏自治區』時，西藏並不因此而享有自治。他們沒有辦法行使自治條例中所賦與的權力。這些全部都要改變。不久以後，將不會再有『自治區』的問題，取而代之的將是『聯邦』一分子的問題。」可是，比比看：漢民族人丁旺盛，藏民族家丁單薄，漢人會尊重藏人嗎？「會的。我現在和您所說的並不是出自我自己的度測。我可以確定包括漢人的一般中國人和我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提及西藏的獨立問題時，幾乎沒有人會同意。即使是普普通通的漢人也不會同意的。這種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如果我們說『給西藏獨立』，馬上就會有新的問題產生。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之道。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此，就必須考慮到採用聯邦體制來尋求解決的辦法。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人民運動平反之後，而且在共產黨失勢之後，達賴喇嘛將會返回中國。在那個時候，我們再在一起來談如何建立這個聯邦。」

可是想像一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所造成的激情。如果一大群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人突然要求西藏獨立，您會和一九五九年一樣下令動用部隊鎮壓嗎？「我不認為達賴喇嘛會這麼做。我對他有信心。確實是有許多西藏人這麼想。不過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認為如果像達賴喇嘛這些有真知灼見的西藏人回到那裏，我們也總會有一天回去中國。在那一天，西藏將會變成真正的自治。當然，西藏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就能解決的，不過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很久了。要求得解決西藏問題之方法，我們還需要多次的會談，多次的會晤。祇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有利於藏族人民和有利於整個中國的解決方法。」

可是，如果在權力民主化之後，中國再度陷入混沌的局面，西藏人不就又得付出代價了嗎？您如何能夠保證未來呢？「聽清楚哦，我相信這是很不容易的。中國所受到的災難已經夠多了。此外，我們可不代表共產黨，我們沒有理由為他們贖罪。何況中國內地的人民在等待，在期望著民主化的來臨。他們不會允許過去曾經發生的動亂再度重演的。總的來說，沒有民主，中國就沒有前途。在這一點上，我們和達賴喇嘛周圍的人想法完全一致。我們不允許這一類的事件重演。我們不允許重回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八九年之間的情勢。」

如果你們成功了，你們是否允許西藏有多黨制度？「當然，應該要有多黨制度。可是西藏有需要政黨嗎？當然這是由西藏人民自己決定。」如果有個要爭取獨立的政黨出現怎麼辦？「這種情形是很有可能的。達賴喇嘛應該要注意這個問題。不過讓我重申我的立場，在民主化的中國裏，要求西藏獨立的政黨是可以存在的。我們不能禁止他們。想想我剛才提到的解決西藏問題的四個條件。達賴喇嘛返回中國的時候，一定是會受到盛大歡迎的！」

嚴家其的溫和路線是値得鼓勵的：這一類的看法從中國共產黨前任黨魁親信顧問的口中說出來，甚至可以讓人有非分之想。如果有一天趙紫陽重新掌握政權，並且斥退還陶醉在毛澤東思想裏的死硬派份子……。這是不是政治幻想呢？不完全是。簡單的生理定律是躲不過的：中國僅存的幾位領導年事已高，來日有限。這批老賊蒙主恩寵的時候，我們是很難想像中國還會堅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後所採取的極端立場；何況，如果蘇俄和其他的東歐國家在自由化的道路上依舊繼續前進的話。那麼西藏很快就會有和平囉？也沒有這麼簡單。因爲即使是在最美好的情況下，在雙方言歸和好的努力上還是有個很大的障礙：中國的民族主義。每當國家存亡危難之秋，民族主義的脈絡一向就很成功地激發著中國人的奮鬥——這是很正常的情形。

可是要如何向佔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解釋，區區的六百萬西藏人有權和他們平起平坐呢？要如何才能夠讓他們了解，西藏人有權過他們自己的生活呢？要如何才能使中國人和西藏人心平氣和地討論，而不相互殘殺呢？即使是在香港的中國人也對西藏人持有激進的態度。我有個來自香港的中國朋友，每一次我和他談起達賴喇嘛的時候，他都馬上大發雷霆。對他來說，只要看一下達賴喇嘛的嘴臉就知道他是個叛徒。

我還記得，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香港《爭鳴》月刊曾經刊出一篇引起筆戰的文章。一位我認識的中國女性用明蕾爲筆名，轉述了西方新聞媒體對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騷動的鎮壓事件的抨擊性文章。明蕾大膽地寫道：「一般說來，中國人對西藏人並不很了解，他們提到西藏的時候，都常常帶著輕蔑的口氣。然而西方人，他們都對西藏的宗教感興趣。」在引用一篇報紙上的文章後，她補充地說：「歷史證明西藏人並不像台灣所說的反對共產黨人，他們是反

對所有的中國政府，不管是那一種政府。」她下結論說：「我們不能說西藏本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她眞的犯了大不敬的罪！讀者不滿的投書像雪花般飄向《爭鳴》雜誌的編輯部。這份雜誌刊登了其中幾篇文章，其中以鄭飛雄署名的一篇以〈明蕾是中國人嗎？〉爲標題。一個中國女人竟然膽敢寫出這種賣國文章是超出他的理解之外。他識破了一個針對著要分裂中國的國際陰謀，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慣用的教條。另外一位筆名不平人的讀者卻爲明蕾辯駁說，我們不會因爲引用外國的評論而變成外國人。這位住在瑞士的讀者還說，何況他在瑞士從來沒有碰過自認是中國人的西藏人。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流亡的中藏對話不但沒有中止，而且還逐漸擴大。達賴喇嘛或其親信和中國不滿分子已經有過多次的接觸。第一次中藏討論會議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裏舉行。當時有不少流亡的中國和西藏教育界人士以及研究員參加。另外一次以「中藏關係：未來的展望」爲題的討論會，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和六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這次討論會有中藏學者三十餘名參加。包括西藏親中的主要合作分子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阿沛晉美在內的第一個中國不滿分子代表團，於一九九二年七月抵達達蘭薩拉會晤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和達賴喇嘛。此外，愈來愈多流亡的中國人或是海外華僑現在敢公開談論他們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方勵之就說過好幾次，西藏獨立的問題應該要由藏族人民自己決定，而且不管他們的決定如何，中國人都應該予以尊重。「中國民主聯盟」的成員梅揚中認爲達賴喇嘛及其擁護者獲得西藏獨立的「機會很大」。他表示說，「根據我的研究，藏族和中國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是

另外一種民族。我在日本討論會上就一再強調這一點。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民主聯盟』對西藏人的特徵做了很多的研究。藏族人民有正當的權力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㉗。

在一九八七年被開除黨籍後，移居美國的中國共產黨的著名老兵作家王若望，也贊成藏族人民有自決權的原則。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他在巴黎宣稱：「如果藏族人民願意，他們有不可剝奪的獨立權。當一個眞正民主化的政府在北京成立後，漢人和藏人一定會進行談判。我們可以建議西藏留下來成爲聯邦的一分子。不過如果他們不願意，沒有人可以拒絕他們自決的基本權力。」

至於我個人，寫有關西藏的事情也不是很輕鬆的。我是，而且一直是個局外的外國觀察員。這個立場一方面很愜意，因爲我不用害怕任何報復行爲；一方面也很棘手，因爲這場論戰太過尖銳。我可以以旁觀者清的態度來審查這個問題，這是中國人和西藏人所不能有的超脫立場。然而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不斷地在想，某些特定的人要指責我是想要分裂中國以便削弱其力量的「外國帝國主義集團」的一分子，是很容易的事。古有明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時候我也在想，這本書發表以後，在我的中國和西藏朋友中，很可能沒有一個人會滿意。一些中國朋友將會說我栽進了藏人的「反漢」陣營裏；西藏朋友則會因爲我沒有通融舊西藏而大爲惱怒，並且認定我贊成西藏不要獨立的想法。然而一句話，我從來沒有後悔打「智慧」這個賭，因爲我有一個希望，儘管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儘管敵對態度的尖銳性，我希望有一天理智將會獲勝。我們只希望，在這一天來臨的時候，西藏依舊存在……。

註釋

①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所舉行的「西藏青年大會」代表大會開幕典禮的演說。

②這些是一九八八年洛地嘉日還是「外交部長」的時候所做的聲明。

③就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在日內瓦的人權委員會沒有通過抨擊中國在西藏的政策的決議案的那一次表決。

④*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

⑤*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Beijing, 1989.

⑥《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

⑦《瞭望》，香港，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⑧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87.

⑨*Hong Kong Standard*，一九九〇年五月十日。

⑩中國政府發言人袁木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

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之談話。

⑫*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第七二頁。

⑬*Tibet Press Watch*,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一九九二年四月，第四、五頁。

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⑮*La libre Belgique*，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⑯路透社，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

⑰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六日歐洲議會在史特拉斯堡的表決。

⑱《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

⑲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⑳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之記者訪問。

㉑新華社，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㉒*China Daily*，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五日第一版。

㉓*The Penchen Lama Speaks*, ps.11,12.

㉔新華社，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㉕陸鏗的記者訪問，發表於香港月刊《百姓》第一八九期，一九八九年四月號。

㉖《世界日報》，紐約，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㉗*Actualités Tibétaines*, vol. Ⅲ n°2，一九九二年夏季，第八、九頁。

脆弱的希望

如果西藏能夠撐得夠久的話，她可以冀望於世界性的非殖民化運動，並可望從中獲取利益。這種演化是符合歷史潮流的。遠離殖民母國的地區的非殖民化運動已經接近尾聲了。舉個例子：一個身心正常的法國人，是很難想像新喀里多尼亞（Nouvelle Calédonie，法國在南太平洋屬地）永遠沒有辦法獨立的。然而和侵略者毗鄰的地區的非殖民化運動，則要複雜得多，要痛苦得多。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一月的時候，沒有人想到柏林圍牆會被拆掉、東歐會回歸民主、蘇聯會快速分崩離析，而且各加盟共和國相繼獨立。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過程爲這個世界，包括亞洲和西藏的非殖民化運動，敞開了大門。離西藏不遠的遠東地區，一般類似非殖民化的運動正在進行著。在經濟上走投無路，又碰上蘇聯終止援助的連夜雨，越南不得不放棄「中南半島聯邦」的夢想。他們從柬埔寨撤軍，使得柬埔寨再度獲得眞正的主權。寮國也因此更自由地和外界接觸。當然，沒有人可以肯定，在蘇聯和東歐所發生的事情不會走回頭路。對那些急急忙忙大肆慶祝的人，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和深深閉鎖在僵化的意識形態裏的中國所提供的例子，是很發人深省的。中國是否能夠繼續離群索居呢？如果她想要趕上經濟發展的列車，如果她想要圓她那成爲超級強國的願望，她就必須要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西藏問題是不可

能一成不變的。追根究柢，西藏問題祇有三個可能的結果：中國政府表現出大智大慧，而大幅度地放寬對西藏的控制；要不就是西藏人民在絕望中發動解放戰爭；再不然就是中國把整個西藏消化掉了。

智慧指引中國政府尋求一個持久性的妥協。毫無疑問地，祇有眞正而廣泛的自治才能讓西藏人滿意。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北京和她所有鄰國的關係都正常化了。中國和越南的矛盾也很快就可以解決了。和西藏取得和平、持久的妥協，可以讓中國有穩定的環境來致力於經濟的現代化。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翌日了。這個世界變了。輿論影響政府。如果再發生西藏武裝反抗，中國將會失去很多。西藏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破壞中國的利益將會更爲難受。這種現象很可能會污染中國別的地區，在新疆的回族人民可沒有被完全安撫。在中國南部也是一樣，他們受不了北京的霸權；分裂主義的壓力隨著中國首都的政治惡習而高漲。

那麼中國不就要爆炸了嗎？如果中國還是停留在鄧小平死前的情形，我們就得承認以武力保證沉默仍然會是中國政府的最愛。以目前的情形來說，漢人擁有各類的軍隊和警察來讓西藏屈服。北京好像已經等不及了……西藏民族主義最後堡壘的崩潰，所有的西藏人都說中文——一個終於可以宣布西藏滅亡的時刻。然而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有大幅度的變化，這個變化還會持續下去。在未來的十幾年內，有更強烈的動亂等著她。因此，西藏的前途取決於中國比較開放，對世界局勢比較了解的未來幾代。沒有人可以預言保證西藏能夠繼續生存……



附錄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北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光榮的責任。但是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並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而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採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打倒了各民族共同的內部敵人——國民黨反動政府，驅逐了各民族共同的外部敵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此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國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則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

業，自此以後，國內各民族除西藏及台灣區域外，均已獲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之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到達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於友好的基礎上舉行了談判。談判結果，雙方同意成立本協議，並保證其付諸實行。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

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人民解放軍，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爲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

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　李維漢

代表　張經武

張國華

孫志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

代表　凱墨・索安旺堆

土丹旦達

土登列門

桑頗・登增頓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畫

（華盛頓，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們的世界變得愈來愈互相依賴；因此除非我們能夠考慮到整體的利益，而不祇是個別的利益，否則不會有國家、區域和整體性的長期和平。在我們這個時代，從最強壯到最虛弱的每一個人所能提供的貢獻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以藏族人民和遵循以愛與慈悲為教條的佛門僧侶的領袖身分和各位談話。然而首先，我要以命運注定要和各位以及所有我們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這塊大地的人類的身分和各位談談。隨著世界的變小，我們更需要互相依賴，這在整個世界都是一樣，包括我來的那個大陸。

今天，在亞洲及其他地區，局勢緊張。公開的衝突橫行中東、東南亞和我自己的國家——。然而就某一程序上而言，這些問題也祇不過是區域性列強之間緊張局勢的徵兆而已。想要解決這些區域性的衝突，就必須先要找到一種能夠考慮到所有國家、所有有關民族不論是大是小的利益的方法。這類全盤性的解決方案必須是要能夠考慮到關係最深切的民族的需求，否則就會因為措施的零碎或是人為的行為而產生新的問題。

藏族人民一直想要為建立區域和世界和平盡一分力量；我認為他們不使用暴力與和平主義的傳統使他們特別具有這種素質。佛教傳入西藏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了，從那個時候開始，藏

族人民就不對任何形式的生命使用暴力。這種態度也表現於國家的對外關係上。夾在亞洲大陸列強——印度、中國和蘇俄——之間，西藏這種地處亞洲心臟地帶的高度戰略要地的情勢，使得西藏在維護和平及穩定上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歷史上亞洲的帝國都盡量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帝國染指西藏。西藏緩衝國的獨立是區域穩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立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五〇年侵略西藏的同時，它也造成了新的衝突原因。在西藏全國起義反抗中國人以及我逃亡印度之後，中國和印度的局勢由緊張演變成邊界衝突是顯而易見的。今天，在喜馬拉雅山脈疆界兩側再度聚集了大量的部隊從而更增加了緊張的危險度。

當然，眞正的問題並不是中國和印度的疆界問題。而是中國非法佔領西藏，從而取得直接進入印度次大陸的通道。中國政權企圖以聲稱西藏一向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來混淆視聽。然而這不是事實。一九四九～五〇年，當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的時候，西藏是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從千餘年前西藏國王統一西藏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我們的國家一直很成功地保有它的獨立。在某些時期，西藏曾經把它的影響力推展到鄰近的國家、鄰近的民族；在另外的一些時期，西藏也曾經屈服於外國勢力的影響：蒙古可汗、尼泊爾的廓爾喀人、滿洲皇帝和在印度的英國人。

當然一個國家受到外力影響或干涉的情形並非罕見。即使所謂的「衛星」國家是這種關係最明顯的例子，然而大部分的列強都對勢力比較薄弱的盟國或鄰邦施加影響力。最値得相信的法理研究報告顯示，即使西藏曾經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它可從來沒有喪失它的獨立。不可否

認地，在北京的共產主義部隊抵達之前，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西藏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幾乎被所有自由世界所譴責的中國侵略行爲構成違反國際公法的現行罪行。西藏受到中國長期佔領的這一事實並不能讓世人忘卻即使西藏人喪失了自由，在國際公法上而言，西藏依然是個獨立國家，祇不過是被非法佔領而已。

我的意圖並不在於發起一場對西藏身分地位的政治法理討論。我祇是要強調一件明顯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藏族人民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民族，它有它自己的文化、語言、宗教和歷史。如果它沒有被中國佔領，西藏今天仍然會是一個天然自成的緩衝國，從而維護並且促進亞洲的和平。

我最大的願望，也是所有藏族人民的願望，就是重建西藏的這種具有高度意義價值的角色，並且把包括後藏、康、安多三大地區的西藏建造成爲一個和平、和諧而穩定的地區。西藏將遵循佛教高尚的傳統協助所有爲世界和平、爲人類幸福、爲維護我們自然環境共有財富而奮鬥的人士。

雖然我們的同胞成爲幾十年來被佔領的犧牲品，我卻一直不斷地，爲著能夠經由和中國人誠懇而直接的討論以獲得解決辦法而努力。一九八二年，在中國政府全盤改組以及和中國新政府建立起直接的接觸之後，我派遣了我的代表們到北京。就我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問題展開討論。

我們抱著積極與誠摯的心態進行對話，也準備考慮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乎理法的需求。我希望這會是一種相互對等的心態，也希望我們終於可以找到足以滿足雙方需求和利益的解決方法。不幸地，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努力卻報以防衛性的態度，就好像是我們所說的有關西藏的

實際問題祇是對中國的一種詆評而已。

讓我們最灰心喪氣的是中國拒絕了建立眞正對話的可能性。中國迴避了六百萬藏族人民所面臨的眞正問題，卻把西藏問題縮減成爲我個人身分地位的討論。

鑑於這些事實，也爲了回應各位以及我在這次旅行中所見到的人們所給我的支持和鼓勵，我想趁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提出以開放與妥協爲基本構架的主要問題和建議，這些將會是長期性解決辦法的第一步驟。我希望藉此可以促進我們和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所有我們的鄰邦人民之間充滿友誼和了解的未來。

這個計畫包含有五個基本要素：

㈠把整個西藏轉化成爲一個和平地區。

㈡中國停止危及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㈢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

㈣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

㈤對西藏未來的身分地位以及中國人民和藏族人民關係的問題進行眞正的會談。

底下就談談這五大要素的一些細節。

I

我建議把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和安多地區，轉變爲一個「阿喜姆沙」(Ahimsa)地區，在

印地語中，這個名詞代表和平而不用暴力的狀態。

把西藏建立成爲一種和平地區是符合西藏的歷史角色。西藏是佛教、和平、中立的國家，西藏是亞洲大陸各列強間的緩衝國。這也符合尼泊爾的尼泊爾和平地區的建議和中國同意這個建議的做法。如果這個和平地區包括西藏及鄰近地區，尼泊爾和平地區的建議將會更有成效。

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區，意味著中國在西藏的部隊及軍事設施的撤除；這樣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駐防在喜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區的部隊及軍事設施。這一切都將根據國際條約進行，以滿足中國在安全顧慮上的合理要求，並且促進西藏、印度、中國及其他同一地區內民族之間的信心。每一個有關國家都獲得利益，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因爲這麼一來不但強化了他們的安全感，並且減輕了爲了維持喜馬拉雅山沿線疆界的龐大軍事開銷。

在過去，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緊張。一直要到中國部隊侵入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區之後，兩大列強的關係才緊張起來，終於造成了一九六二年的戰爭。從那個時候開始，危險的意外事件層出不窮。如果他們像過去一樣被一個廣闊友好的緩衝國家隔離，這兩大超級人口大國要重修友好關係將不是一件難事。

想要改善藏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首先要培養信心。做了幾十年的犧牲品，西藏喪失了一百餘萬的同胞，約爲全國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此外還有至少相同數量的西藏人因爲宗教的信仰或是政治的觀點而被囚禁在監獄或是勞動改造營，因此，祇有撤除中國部隊才能有眞正妥協的開始。大量佔領軍的存在祇會無時無刻地讓藏族人民回憶起他們所遭受到的鎮壓和痛苦。撤軍是最重要的表態，它代表著可以和中國人建立以友誼和信心爲基礎的眞正關係。

2

中國人移民西藏必須要停止。這個政策是北京政府爲了要把藏族人民削弱成爲不具有任何政治行爲，微不足道的少數民族，從而強制解決西藏問題的「最終辦法」。

中國百姓大量移居西藏不但違反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公約〉第四條，而且嚴重威脅藏族的生存。在我們國家的東部地區，中國人變得比西藏人還要多。譬如說，在我的出生地安多地區，(中國人口統計顯示)有二百五十萬的中國人，卻祇有七十五萬的西藏人。即使是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也就是我國的中部和西部)中國政府的資料證實目前中國人的數量超過了西藏人。

移民並不是中國人的新政策，他們早已有系統地在別的地方進行了。在本世紀初起，滿人是一種不同的民族，有著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到如今，在滿洲祇剩下二百萬到三百萬的滿人，卻有七千五百萬的中國人。

在中國人現在稱爲新疆的東土耳其斯坦，中國人的人數從一九四九年的二十萬激增到七百萬，占全人口一千三百萬的大半數。從中國人殖民內蒙古以來，在內蒙古有八百五十萬的中國人，卻祇有二百五十萬的蒙古人。

到今天爲止，已經有七百五十萬的中國人被遣送到西藏，這個數目已經超過了六百萬的藏人。在中國人稱爲西藏自治區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國人自己承認一百九十萬的西藏人已經成爲該地區的少數民族了。這些有關中國人的數字還不包括部隊，他們大約有三十萬到五十萬人，

其中二十五萬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

要讓西藏人能以民族的名義繼續生存，移民政策就必須要停止，中國移民必須要回歸中國。不然西藏人將會很快地成爲觀光點也會變成輝煌歷史的痕跡。

3

基本人權和民主自由在西藏必須要受到尊重。西藏人必須可以再度體驗文化、智識、經濟和精神的自由發展以及行使基本民主自由的權利。

在西藏侵犯人權的事件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在那裏，中國人推行所謂的「隔離與同化」政治來歧視西藏人。在最好的情形下，西藏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是第二等公民。他們沒有最基本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他們處在殖民行政制度下的奴役地位。所有的眞正實權全部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幹部和軍隊的手裏。

即使政府允許西藏人重蓋某些佛教寺廟，並且從事宗教活動，它一直禁止所有比較嚴肅的宗教研究或傳授。祇有某一小群得到共產黨特許的人才可以從事寺廟生活。

如果流亡的西藏人依據我於一九六三年所頒定的憲法而享有民主權利，我們數以千計的同胞卻因爲宗教或政治的觀點而被關在監牢或勞動改造營。

4

要恢復西藏的自然環境，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西藏不應該被用來製造核子武器，也不應該用來貯藏核子廢料。

藏族人民非常尊重各種生命，不論是人或是動物；佛教禁止傷害任何形式的生命的教條強化了他的這種天賦情懷。在中國人入侵之前，西藏是個很特殊，保全完好、充滿野性的自然保留區。可惜在最近幾十年來中國人幾乎毀滅了西藏所有的野生動物和森林。這對西藏原本就脆弱的生態系統帶來了很嚴重的後果。必須要保護剩下來的一點，並且嘗試恢復已經被破壞的自然環境。

中國把西藏當成製造核子武器的地方；它也可能已經在那裏貯藏核子廢棄物。它不但在那裏貯存它自己的核子廢料，還貯存其他願意付錢讓北京幫它們清理它們的有毒物質的國家的核子廢料。

這種情形所帶來的危險是很明顯的。中國這種漠視西藏生態的態度威脅著當代和未來的藏族人民。

5

關於西藏未來的身分地位，以及中國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間的關係的眞正會談必須要開始進行。

我們希望能夠本著坦誠和妥協的精神，以合理而實際的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以便求得符合所有人：西藏人、中國人及其他有關人民長期利益的解決方法。西藏人和中國人是二個不同的種族；各有各的國家、歷史、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必須要承認和尊重民族間的差異，但是不能對有利於雙方的眞正合作造成障礙。我眞誠地相信如果有關各方面能夠見面，以開放、帶有想要找出一種公平而且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的意念，來討論他們的未來的話，我們就可以毫無疑問地走出死胡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表現出理智和智慧，並且抱著誠懇和了解的精神來會商。

我感謝各位以及您們衆多的同事與同胞對受壓迫民族處境的關注與支持。您們公開表達對我們藏族人民的同情這一事實，已經對生活在西藏的西藏人的生活條件產生了正面影響。我懇切地要求各位對處在歷史上黑暗時期的我的國家繼續予以支持。謝謝！

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詞

（史特拉斯堡，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個國家再也不能獨自解決所有的自身問題。如果缺乏世界責任，我們的生存就會危機四伏。這就是爲什麼我堅信更進一步的了解、更密切的合作，和世界各民族更互相尊重的理由。我們可以從歐洲議會的例子汲取經驗。在混亂的戰爭之後，昔日的死敵僅僅在一代之間就學會和平共存與合作。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在歐洲議會向各位表達我的想法是一件特別榮耀，令人高興的事。

各位都知道，我的國家——西藏——目前正處在極端艱苦的時期。藏族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中國人統治下的藏族人民，渴望著呈現自由、正義和自決的未來，以便保護他們的民族特徵，並且和鄰邦和平相處。

千餘年來，我們，藏族人民，爲著要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高原上的生態平衡，而不斷地從事精神和生態環境的潛修。遵循菩薩慈悲和不用暴力的教誨，又有高山峻嶺爲屏障，我們盡量尊重各種生命，並且揚棄以戰爭做爲國家政策工具的想法。

在我們可以遠溯至二千餘年的歷史中，處處顯示出我們是獨立的。從西元前一二七年立國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我們藏族人民，曾經把我們的主權讓給外國勢力。就和其他

的國家一樣，西藏也曾經走過幾段受到蒙古人、滿人、中國人、英國人、尼泊爾廓爾喀人影響的時期。這些時期都是很短暫的，藏族人民從來不認爲這是主權的喪失。事實上，在某些時期西藏國王還不是一樣曾經在中國和其他鄰近國家占領大片土地。然而這些並不就表示我們，藏族人民，可以要求取回這些領土。

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侵犯西藏。從那個時候開始，西藏就處在它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從佔領開始，我們已經喪失了一百餘萬的同胞。數以千計的寺廟被摧毀成廢墟。新生的一代沒有受到教育，生活不能溫飽，也沒有自己的民族特徵。雖然現在的中國政府曾經推行某些改革，但他們也相對地對西藏高原進行大量的移民。這個政策已經使六百萬的藏族人民淪爲西藏的少數民族了。以所有藏族人民的名義發表談話的我，很遺憾地對各位說：我們的悲劇還在持續進行著。

我一再勸告我的人民要他們不要採取暴力行爲來紓解痛苦。然而我相信就道德標準而言，所有的人民都有權利使用和平的方式來抗議不正當的行爲。不幸的是，在西藏的示威遊行卻被中國的警察和部隊以暴力血腥鎭壓。我繼續要求不要使用暴力，然而如果中國不放棄他們的粗暴手段，藏族人民對未來情勢的惡化將不負任何責任。

每一位藏族人民都希望也企求重新建立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上百萬的同胞已經爲爭取獨立而犧牲了，我們整個國家都在爲這場鬥爭而煎熬。不久前，又有一些藏族人民再度爲著追求這個珍貴的目標而勇敢地犧牲。相反地，中國人對藏族人民的渴望沒有任何的回應，並且繼續採行高壓政策。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爲能夠爲我國家的悲慘情形找到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法而深思熟慮。我的內閣和我自己，我們曾經爲了這個問題請教了很多的朋友以及有關人士。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時候，我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的人權委員會上提出了西藏和平的五點計畫。這個計畫極力主張將西藏轉化成爲和平地區，一個人類和自然能夠和諧共處的地區。此外，它也要求尊重人權和民主思想，保護自然環境以及停止中國人向西藏的遷徙。

計畫中的第五點要求中國人和西藏人進行眞正的會談。因此，我們提出一些我們認爲可以做爲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我想藉今天這個機會和各位提出我們反覆思考的成果的大要。

總的來說，包括後藏、康、安多的西藏，將在經過人民同意的法律基礎上成爲一個民主的自治政體。這個政體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以保有負起西藏外交政策的責任，然而西藏政府在宗教、商業、教育、文化、旅遊、科學、運動及其他非政治領域將以外交辦事處來推展及維持對外關係。在這些範圍內，西藏將會成爲國際專業組織的成員。

西藏政府將會在憲法或基本法的基礎上成立。基本法將會規定負有保障經濟平等、社會正義和保護環境等責任的民主政府的組織結構。這也就是說，西藏政府將有權力決定所有涉及西藏和藏族人民的事件。

由於個人自由是所有社會的眞正根源，是社會發展的胚芽，西藏政府必須要加入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際人權宣言」以保障個人自由。又因爲宗教是西藏民族特徵的根基，而且靈修又是西藏燦爛文化的精華，西藏政府有特殊的義務以維護和發展宗教。

政府將會由經由全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國會和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所組成。政府所在地將設在拉薩。

西藏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將取決於藏族人民之需求，尤其要考慮到提高所有人民生活水準的要求。

西藏政府將頒定嚴格的法令以保護野生動植物。天然資源的開採將受到嚴格的管制。核子及其他武器的製造、試驗和貯存應該全面禁止。核子能源及其他會產生污染和危險的技術的利用也應該禁止。西藏政府將負有把這個國家建設成我們星球上最大的自然保護區的責任。

將來將會召開一個區域性的和平會議來確定西藏爲非軍事區，從而成爲一個眞正的和平避風港。在此類會議召開之前，以及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數的軍事設施。當然這些祇能是具有防衛性的軍事設施。

爲了培養有利於會帶來成果的會談所需要的互信氣氛，中國政府必須要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權，並且放棄對西藏的移民政策。

以上就是我們思考的主體。我知道很多藏族人民會因爲我的提議不夠急進而失望。毫無疑問地，在未來的幾個月內，在我們自己的團體之間，不論是流亡在外，或是生活在西藏本土的藏族人民，都會有一場大的爭辯。然而這卻是構成所有變化程序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因子。我深深地認爲，這些想法是重新賦予西藏民族特徵，是重修藏族人民基本權益同時又能和中國利益妥協的最實際可行的方法，然而我要強調，不論和中國的談判結果將會如何，最後的決定權應該是屬於藏族人民，由他們自己決定他們的命運。因此，所有的建議將都會包含有一個詳

細的程序計畫，以便經由全民表決的方式而獲知什麼是藏族人民的意願。

我要藉這個機會宣布我並不希望在西藏政府中擔任職位。然而我會繼續爲著藏族人民的福祉而奮鬥不輟。我們隨時可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以我們的想法爲基本結構的建議。西藏政府的和談代表團已經準備好要和中國人商討這類型提議的細節，以尋求合理的解決辦法。

愈來愈多的政府和包括美國前任總統吉米・卡特先生在內的政治領袖，對我們的情形所給予關注鼓舞了我們。中國近年來作風比較重實用、自由的新領導班底所帶來的改變也激勵了我們，我們懇切地希望中國政府和他們的領導同志能夠嚴肅、認眞地考慮我剛才提出來的想法。唯有對話和以清晰與坦誠來對待西藏事實的態度，才有可能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我們希望和中國政府能夠本著人類更廣泛的利益的精神來共同商討。如此，我們的建議將會以和解爲基本精神，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因而相呼應。

我的國家的獨特史實以及它精深的精神遺產，顯示著它可以完美地成爲亞洲中樞的和平保護區。它在歷史上中立國家的地位是可以重建的，並且可以由此而加強整個亞洲的穩定性。如此就更能強化亞洲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從此，西藏將不再會是個被佔領、被武力鎭壓、沒有生產能力、生活在痛苦深淵裏的國家。它將成爲人類和自然和諧生存的自由避難所，一個足以解決各地區衝突的緊張局勢的模式。

中國的領導人必須要了解，在今天這個時代，以殖民的方式來統治佔領區已經是行不通的了。眞正的團結或聯盟必須是也祇能是自發自願的。這種意願祇有在有關的各方面都得到滿意的利益下才有可能產生。歐洲共同體本來就是個絕佳的例子。此外，如果缺乏信心或利益，或

是武力被用來當成政府統治的主要手段時，一個國家或共同體也可能會分裂成二個或許多個政體。

我想以呼籲高貴的歐洲議會議員及其選民們支持我們的努力來做結論。在以我們所提出來的方案下解決西藏問題，不僅僅是藏族人民和中國人的共同利益，它也可以強化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我深深地感激各位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可以和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西藏大事紀

・西元前一二〇〇〇到六〇〇〇年：考古學家按出土文物證明，在中石器時代西藏就有人類居住。

・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一九七八年以來，在昌都發現的骸骨和陶器屬於新石器時代。

・西元六二〇～六四九年：藏王松贊干布在位期。藏文成型期。

・西元七五五～七九七年：藏王赤松德贊在位期。王國武力達到顛峯。影響力遠達帕米爾、尼泊爾和土耳其斯坦。

・西元八二一年：中、藏第一個和平條約，即〈長慶會盟〉。

・西元第九世紀：佛教傳入西藏。開始建築大寺廟。藏王世系中衰。

・西元一二七年：忽必烈可汗征服中國和高麗，勢力遠達歐洲。西藏爲蒙古帝國統治。

・西元一三五〇年：西藏脫離蒙古統治。

・西元一三五七～一四一九年：宗喀巴創立格魯教派（黃教）。

・西元一五四三～一五八八年：宗喀巴的弟子一世達賴喇嘛根敦朱巴的第三代轉世，四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被認爲是觀世音的化身。

・西元一六五二年：五世達賴喇嘛應清朝第一位皇帝康熙皇帝之邀請，到北京訪問。

・西元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清康熙皇帝在位期。撤回幾乎所有駐拉薩清軍。從一七二八年開始，在拉薩有兩位案辦（駐藏大臣）代表清廷。

・西元一七八〇年：六世班禪喇嘛到北京訪問清乾隆皇帝。

・西元一七八八年：尼泊爾入侵西藏。清乾隆皇帝派大軍支援西藏。一七九二年簽訂和約。所有重要決定必須經過駐藏大臣。

・西元一七九五年：清乾隆皇帝駕崩。清朝中衰。西藏從此得到自由。

・西元一八五四年：尼泊爾再度入侵西藏，清廷不予協助。一八五六年簽訂藏尼和約。

・西元一九〇七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入北京訪問清光緒皇帝。

・西元一九一〇年：清軍第一次不請入藏。一九一一年滿清推翻，民國肇造後撤軍。

・西元一九一二年：西藏政府驅逐漢人。最後一位漢人於一九一三年元月離開西藏。

・西元一九一三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西藏議會宣告西藏獨立。北京拒絕承認。

・西元一九一四年：英國、西藏、中國達成西姆拉草案。倫敦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而不是「主權」。西藏被分成內、外兩部分。中國保證不干涉「外西藏」的事務。中國政府拒絕簽字。

・西元一九四二年：拉薩成立外交部。

・西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西元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八萬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

・西元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簽訂〈十七點協議〉。西藏隸屬中國，北京保證西藏自

治。

- 西元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紅軍進入拉薩。
- 西元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鎮壓拉薩反中國人暴動，造成數千名死亡。達賴喇嘛遠走印度。
- 西元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北京宣布成立「西藏自治區」。
- 西元一九六六年八月：拉薩開始了西藏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所有的寺廟被先洗刼後摧毀。數千名西藏僧俗被迫害，送進勞改營。
- 西元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
- 西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宣布修正思想路線。西藏得到較大幅度之宗教自由。
- 西元一九七九年一月：達賴喇嘛的第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和西藏。另外三個代表團到西藏、中國，但均無實質之對話。
- 西元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反中國暴亂。中國政府發布六人死亡，數百名受傷。西方目擊者稱至少有十三人死亡。
- 西元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拉薩再度發生反中國人暴動。中國武警向群衆開槍。根據北京的報導有一人死亡，三〇九人受傷。西藏之消息則說有八人死亡。
- 西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反中國示威演變成暴亂。中國警察向群衆開槍。根據目擊者之證辭有十二人死亡，多人受傷。
- 西元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血濺拉薩。暴亂持續數日。三月七日宣布拉薩戒嚴。不滿分子受

到血腥鎮壓。

・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國部隊在北京市中心向數千名示威者開槍。中國的正式報告指出有三〇〇人死亡。目擊者證辭卻說約有二千到三千人死亡。全世界終於看清鄧小平之眞面目。

・西元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和「中國民主聯盟」的中國不滿分子代表第一次在巴黎會談。

・西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達賴喇嘛在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西元一九九一年：「國際西藏年」。

・西元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布希接見達賴喇嘛。

・西元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美國國會宣布西藏為「被佔領國家」。

・西元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聯合國人權小組委員會通過決議抨擊中國的西藏政策。

主要參考文獻

歷史、參考書及遊記

——John Ackerly and Blake Kerr, *THE SUPRESSION OF A PEOPLE: Accounts of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in Tibet,* November 1989.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CENT REPORTS ON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IBET.* October 1991.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E, LA REPRESSION AU TIBET DE 1987 A 1992.* Londres, mai 1992.

——Asia Watch, *PRISON LABOR IN CHINA*, April 1991.

——John F.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Wisdom Publications, 1985 London.

——Aten, *UN CAVALIER DANS LA NEIGE, un vieux guerrier Khampa.* Jean Maisonneuve, 1981, Paris.

——Noel Barber *THE FLIGHT OF THE DALAI LAMA.* Hodder & Stoughton, 1960, London.

——Sir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and the Clavenson Press, 1968,

London.

——Sir Charles Bell, *CHINA AND TIBET*.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49, London.

——Charles-Eudes Bonin, *LES ROYAUMES DES NEIGES, ETATS HIMALAYENS*, A. Colin, 1911 Paris.

——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antam Books, 1982, New York.

——Canakuya(compiled by), *TIBET DISAPP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ibe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ian Publishing House, 1960,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Sir Olaf Caroe,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60, London.

——*Sa Sainteté le XIVème dalaï-lama, AU LOIN LA LIBERTE*, Editions Fayard, 1990.

——Tenzin Gyatso, dalaï-lama, *MON PAYS ET MON PEUPLE*. Editions Olizane, 1984, Genève.

——Alexandra David-Néel, *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 Plon, 1927, Paris. Rééditions 1972 et 1983.

——Alexandra David-Néel, *LE VIEUX TIBET FACE A LA CHINE NOUVELLE*. Plon, 1953, Paris.

——Alexandra David-Néel, *A L'OUEST BARBARE DE LA VASTE CHINE*. Plon, 1947, Paris. Réédition 1981.

——Alexandra David-Néel, *MYSTIQUES ET MAGICIENS DU TIBET*. Plon, 1929, Paris. Rééditions 1973 et 1985.

——Alexandra David-Néel, *GRAND TIBET AU PAYS DES BRIGANDS GENTILSHOMMES.* Plon, 1933, Paris. Réédition 1980.

——P. A. Donnet, G. Privat, J. P. Ribes, *TIBET, DES JOURNALISTES TEMOIGNENT.* Editions L'Harmattan, 1992.

——Dorje Yudon Yuthok, *HOUSE OF THE TURQUOISE ROOF,* Snow Lion, 1990.

——J. H. Edgar, *THE GREAT OPEN LAND.*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1930-34, Shanghai.

——Jérome Edou et René Vernadet, *LES CHEVAUX DU VENT.* Editions Shambala, 1988. Editions L'Asiathèque, 1993.

——Peter Gold, *TIBETAN REFLECTIONS: LIFE IN A TIBETAN REFUGEE COMMUNITY,* Wisdom Publications, 1984, London.

——Francis Goré, *TRENTE ANS AUX PORTES DU THIBET INTERDIT.* Editions Kimé, Paris 1992.

——M. H. Goodman, *THE LAST DALAI LAMA, A BIOGRAPHY.* Sidgwick & Jackson, 1986, London.

——Ram Gopal, *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Lucknow, 1964, India.

——David Graham, *AN EXPEDITION TO THE CHINA-TIBETAN BORDER,* 1937, Shanghai.

——Jacques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AU POUVOIR,* Payto, 1972, Paris.

——Han Suyin, *LHASSA, THE OPEN CITY,* Triad Panther Books, 1979, London.

——Hein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 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 1984, London.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Penguin Books Ltd., 1987, England.
——Peter Hopkirk, *TRE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John Murray, 1982, London.
——Evariste Huc, *MAIS QUI SONGE A LA TARTARIE?* Editions Kimé, 1992 Paris.
——Evariste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HIBET*, 1854, Paris.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HE LONG MARCH, CHINESE SETTLERS AND CHINESE POLICIES IN EASTERN TIBET*. Washington, September 199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1959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60, Geneva.
——Fabienne Jagou, *Tibet langue de bois. 10 ans de chroniques tibétaines du journal chinois "le quotidien du peuple" de 1980 à 1989*. Travail de these. Paris 1991.
——Maurice Jamatel(traduit du chinois par), *HISTOIRE DE LA PACIFICATION DU TIBET SOUS LE REGNE DE L'EMPEREUR KIEN-LONG*, Ernest Leroux, 1882, Paris.
——Nicolas Lang, *LE COLONIALISME CHINOIS AU TIBET*, Est-Ouest, 1962, Paris.
——Gilbert Leroy, *LE RIRE JAUNE*. Editions L'Harmattan, Collection Partir Là-bas, 1988, Paris.

——Simon Leys, *OMBRES CHINOISES*, 10 18 Christian Bourgois, 1974, Paris.

——Claude B. Levenson, *LE CHEMIN DE LHASSA*, Lieu Commun, 1985, Paris.

——Claude B. Levenson, *LE SEIGNEUR DU LOTUS BLANC, LE DALAI LAMA,* Lieu Commun, 1987, Paris.

——Claude B. Levenson, *AINSI PARLE LE DALAI-LAMA*. Editions Balland, 1990.

——Claude B. Levenson, *L'AN PROCHAIN A LHASSA*. Editions Balland, 1993.

——Fosco Maraini, *TIBET SECRET*. Editions Arthaud, 1990.

——J. P. Mitter, *BETRAYAL OF TIBET,*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td., 1964, India.

——Frank Moraes, *THE REVOLT IN TIBET,* Sterling Publishers Ltd., 1959, Delhi.

——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Sterling Publishers Ltd., 1987, Delhi.

——Jamyang Norbu, *WARRIORS OF TIBET,* Wisdom Publications, 1986, London.

——Thubten Jigme Norbu, *TIBET IS MY COUNTRY,* Wisdom Publications, 1986, London.

——Thubten Jigme Norbu and Colin Turnbull, *TIBET, ITS HISTORY, RELIGION AND PEOPLE,* Penguin Books, 1969, England.

——George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Faber and Faber, 1960, London.

——Michel Peissel, *LES CAVALIERS DU KHAM,* Robert Laffont, 1972, Paris.

——Tsewang Pemba, *TIBET, L'AN DU DRAGON,* Maisonneuve & Larose, 1975, Paris.

——Hugh E. Richardson,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 Dutton, 1962, New York.

——Hug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London.

——James D. Seymour, *HUMAN RIGHTS AND TIBET, THE MANY LAYERS OF CONTRADIC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1.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otala Publications, 1988, New York.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TRENTE ANS AUX PORTES DU THIBET INTERDIT 1908-1938.* Maison de Nazareth, 1939, Hong Kong.

——R. 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tanford.

——H. Stoddard, *LE MENDIANT DE L'AMDO,* Société d'Ethnographie, 1985, Paris.

——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John Murray, 1970, London. Reprint Allied Publishers, 1983, New Delhi.

——Erwan Templé, *BIBLIOGRAPHIE DU TIBET,* Tome 1-*Bouddhisme.* Editions Tibet Diffusion, 1992.

——K. Thondup, *TIBET IN TURMOIL, A PICTORIAL ACCOUNT,* Nihon Kogyo Shinbun, 1983, Tokyo.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Asia Watch,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IBET,* February 1992.

——Tieh-Tseng Li,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6, New York.

——Chogyam Trungpa, *BORN IN TIBET,*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 London.

——Claudine Vernier-Palliez et Benjamin Auger, *LE DALAI-LAMA, LA PRESENCE ET L'EXIL.* Editions Lattès-Filipacchi. 1991 Paris.

——Corinne Vigniel *THE SHIFT FROM "MERCILESS REPRESS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IN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1991,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1987, Colorado.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TIBETAN IDENTITY*, The U. S. Tibet Committee, 1986, New York.

——Musée de l'Homme, *VOYAGES DANS LES MARCHES TIBETAINES*, Musée de l'Homme, 1990, Paris.

中國政府之刊物及資料

——Xi Changhao and Gao Yuanmei, *TIBET LEAPS FORWARD*,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Peking.

——Israel Epstein, *TIBET TRANSFORMED*, New World Press, 1983, Beijing.

——Israel Epstein, *FROM OPIUM WAR TO LIBERATION*, Joint Publishing Co., 1980, Hong Kong.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New World Press, 1985, Beijing.

——*LE TIBET HIER ET AUJOURD'HUI*, Beijing Information, 1984, Beijing.

——*TIBET, APERCU GENERAL* (tomes 1 à 10, intitulés *"Pourquoi le Tibet es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Chine", "Origine de la prétendue 'indépendance du Tibet' et la vérité sur cette question", "Le Dalai Lama et S' accord en 17 article,", "Tibet, le dernier Shangri-La?", "Le droit d' autonomie du peuple tibétain", "La population du Tibet: chiffres et faits", "Nouvel essor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La liberté de croyance religieuses au Tibet", "Tibet. Grand changement en 40 ans", "Un grand tournant dans l'évolution de l'histoire du Tibet"*. Editions Nouvelle Etoile, Pékin 1991.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1989, Beijing.

——Wang Furen and Suo Wenqing, *HIGHLIGHTS OF TIBETAN HISTORY*, New World Press, 1984, Beijing.

——*LES TIBETAINS A PROPOS DU TIBET*. Editions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1988, Beijing.

——*TIBET, A GENERAL SURVEY*, New World Press, 1988, Beijing.

——*TIBET: MYTH VS. REALITY*, Beijing Review Publications, 1988, Beijing.

——Su Kaiming, *MODERN CHINA, A TOPICAL HISTORY*, New World Press, 1985, Beijing.

——*GREAT CHANGES IN TIBET*,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Peking.

——*TIBET: NO LONGER MEDI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1, Peking.

——*TIBET TODAY*,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4, Peking.

——《中國少數民族》，國家民族委員會，新華書店，一九八一，北京。

——《來自西藏的報導》，中國建設雜誌社，一九八三，北京。

西藏流亡政府之刊物及資料

——Gompo Tashi Andrugtsang, *FOUR RIVERS, SIX RANGES. A true account of Khampa resistance to Chinese in Tibet.*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73, Dharamsala, India.

——Ribhur Trulku, *THE SEARCH FOR JOWO MIKYOE DORJEE.*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 Int. Relations, 1988, Dharamsala.

——Dhondub Choedon, *LIFE IN THE RED FLAG PEOPLE'S COMMUNE.*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78, Dharamsala.

——Norbu Chopel, *FOLK CULTURE OF TIBET.*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83, Dharamsala.

——Tsering Dorje Gashi, *NEW TIBET.*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80, Dharamsala.

——Kunsang Paljor, *TIBET UNDER THE UNDYING FLAME.*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77, Dharamsala.

——*TIBET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50-1961. The Bureau of H. H. the Dalai Lama, New Delhi.

——*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A compilation of Refugee Statements, 1958

-1975.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76, Dharamsala.

——*TIBET, A LAND OF SNOWS RICH IN PRECIOUS STONES AND MINERALS RESOUR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Centre, department of Security,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in-Exile, Dharamsala, 1991.

——*TIB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199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Dharamsala, 1992.

——*FROM LIBERATION TO LIBERALISATION.* Views in liberalised Tibet.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82, Dharamsala.

——*GLIMPSES OF TIBET TODA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78, Dharamsala.

——*TIBETAN IN EXILE.*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1981, Dharamsala.

雜誌、期刊及組織刊物

——*TIBETAN REVIEW.* Mensuel édité par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 H. the Dalai Lama, Dharamsala, India.

——*ACTUALITES TIBETAINES.* Trimestriel en français publié par le Département d'informations e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haramsala, India.

——*LA LETTRE DU TIBET.* Mensuel en français. 1 rue St Vincent, Château d'Agnou. Tél et Fax: 30908825.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rvice d'information indépendant. Abonnement pour envois par fax et/ou courrier. 7 Beck Road. London E8 4RE. United Kingdom. Tél: 44-81-5335458 Fax: 44-81-9854751.

——*TIBET PRESS WATCH,* An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of Noteworthy Article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TIBETAN BULLETIN,* bi-monthl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he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Central Tibetan Secretariat,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 India.

——*METOK. A newsletter from the Tibetan Children Village.* Dharamsala Cantt., Distric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India 176216.

——*LUNGTA NOUVELLES TIBETAINES.* Mensuel du Comité de Soutien au Peuple Tibétain (Suisse). BP 2204 CH 1211 Genève.

——*3615 TIBET INFO.* Serveur Minitel, service d'informations et banque de données animés par La Maison du Tibet Paris.

歷史與現場㊼

西藏生與死

——雪域的民族主義(Tibet mort ou vif)

著　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
譯　者——蘇瑛憲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 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主編——廖立文
責任編輯—李濰美
校對——陳錦生・盧明琴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初版二刷——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
定價——三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1040-9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董尼德(
Pierre Antoine Donnet)著；蘇瑛憲譯. --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4[民83]
面：　公分. -- (歷史與現場：47)
譯自：Tibet mort ou vif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3-1040-9(平裝)

1.西藏—歷史

676.62　　　83002123